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高等学校文科21世纪新教材

历史语言学

H i s t o r i c a l L i n g u i s t i c s

吴安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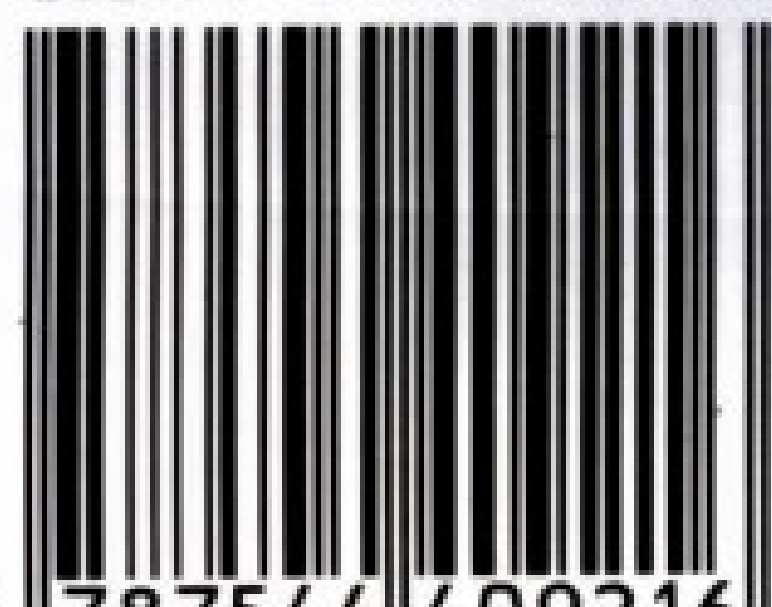
历史语言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H i s t o r i c a l L i n g u i s t i c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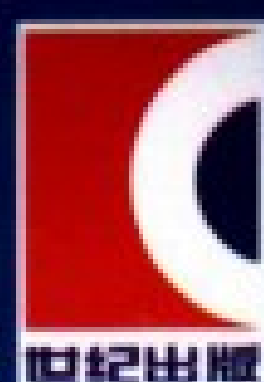
ISBN 7-5444-0921-X



9 787544 409216 >

易文网: www.ewen.cc

定 价: 35.00 元



世纪出版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项目

历史语言学常用符号

(1) 连字符号 - (hyphen)

s-: 辅音 s 处于声母的位置, 或用来表示这是 s 前缀;

-s: 辅音 s 处于韵尾的位置, 或用来表示这是 s 后缀;

-l-: 辅音 l 处于词中的位置, 或用来表示这是 l 中缀。

连字符号 - 也经常放在词根的后面或前面, 用来表示这是省略了后缀或前缀的词根。如 bhar- 是梵语“带来”的词根形式。

(2) > 和 <

符号 > : 一种形式演变为另一种形式。

符号 < : 一种形式来自另一种形式。

(3) *

符号 * : 表示语音构拟形式的记号。也有学者用 * * 来表示这是一个更早时期的构拟形式。如 * bher- 是构拟的古印欧语“带来”的词根, 梵语的 bhar- < 古印欧语的 * bher-。

(4) 调值的表示

国内一般采用赵元任先生的五度标调法表示音节的声调。55 调为高平调, 35 调为中升调, 51 调为高降调, 315 调为降升调等等。如, pi⁵³ 是布央语“一”, 调值标于音节的右上角。

(5) 调类的表示

调类是亲属语或方言声调发生关系的约定表示。中古时期侗台语、苗瑶语和汉语方言都有 4 个调, 汉语中古时期的这 4 个调分别称为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侗台、苗瑶语分别用 A、B、C、D 表示它们的这 4 个调, 并约定侗台语和苗瑶语的中古汉语平、上、去、入调的借词分别用 A、B、C、D 表示, 固有词调类的表示与之一致。

侗台、苗瑶语中因声母清浊引起了声调的第一次分化, 通常是 4 个调分化为 8 个调。如, deu¹ 是西双版纳傣语的“一”。单数数词(1、3、5、7)表示与原来的清声母有关的声调, 双数数词(2、4、6、8)表示与原来的浊辅音声母有关的声调, 分别称为单数调和双数调。如, * ntæ^B 是王辅世先生构拟的古苗语的“长”, 对应于畲语的 to³。

目 录

历史语言学常用符号	1
导 言	1

上篇 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5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	5
1. 格里姆定律	6
2. 谱系理论	8
3. 方言地理学	9
4. 波浪理论	10
5. 新语法学派的理论	11
6. 类推	11
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12
1. 索绪尔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12
2. 布拉格学派的观点	13
3. 内部构拟法、空格和互补	14
4. 链移	16
5. 语音演变过程的解释	17
6. 语言年代学	17
7. 语言的接触关系和底层理论	21
8. 有关形态和句法演变的理论	24
9. 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	26
第二章 方言和亲属语	32
一、社团方言和地域方言	32
1. 社团方言	32
2. 地域方言	34
二、方言的演变	34
1. 方言的传播和演变的趋向	34
2. 方言的底层	36
3. 文白异读	37

三、方言的分化史和亲属语的谱系关系	39
1. 方言的分化史	40
2. 确定方言分化史的原则	42
第三章 语言结构的历史演变	46
一、语言演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46
1. 语言演变的内部因素	46
2. 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	47
二、语音结构的历史演变	48
1. 语音的演变	48
2. 音位结构的演变	50
3. 声韵调结构的演变	51
4. 声调的起源和格局的调整	52
5. 语音存古的方式	53
三、形态的历史演变	53
1. 形态的范畴和类型	53
2. 形态的历史演变	55
3. 形态系统变化的原因	57
4. 形态的存古	59
四、句法的历史演变	60
1. 句法的范畴	60
2. 句法历时变化的特点	61
3. 句法演变的机制	62
五、词汇的历史演变	63
1. 借词和借词的历史层次	63
2. 词的废弃与创新	64
3. 词义的变化	65
4. 同源词根和同源词	66
六、系统间的关系	67
1. 语音系统和形态系统的关系	67
2. 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关系	68
3. 形态句法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关系	69
第四章 发生学关系的研究	71
一、原始语和祖方言	71
1. 原始语	71
2. 不同历时阶段的划分	72
二、语音对应的解释和构拟	73

1. 语音的对应	73
2. 语音对应关系的解释	74
3. 文献的利用	76
4. 语音系统的构拟	78
三、同源词和借词	83
1. 词的同源对应关系	83
2. 借词的区分	86
3. 词源研究	88
四、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	92
1. 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	93
2. 形态和句法的构拟	97

下篇 印欧语、汉藏语的分类和比较

第五章 印欧语的分类和比较	103
一、印欧语的分类	103
1. 日耳曼语族	103
2. 罗曼语族	103
3. 凯尔特语族	104
4. 希腊语族	104
5. 印度—伊朗语族	104
6. 波罗的语族	104
7. 斯拉夫语族	104
8. 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	104
9. 吐火罗语族和安纳托利亚语族	105
二、日耳曼语的比较	106
1. 日耳曼语的语音	106
2. 日耳曼语的形态	106
三、罗曼语的比较	109
1. 罗曼语的语音	109
2. 罗曼语的形态	109
四、古印欧语的构拟	112
1. 古印欧语的语音	113
2. 古印欧语的形态	123
3. 古印欧语的数词、亲属称谓及其他	126
第六章 汉藏语的分类和比较	129
一、汉藏语的分布和分类	129

1. 汉藏语的发生学关系	129
2. 汉语的古今方言	131
3. 藏缅语的分布和分类	132
4. 侗台语的分布和分类	135
5. 苗瑶语的分布和分类	137
二、汉藏语谱系关系的不同观点	138
1. 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研究史	138
2. 关于侗台苗瑶语归属的不同观点	139
3. 汉藏语系诸语内部的分类问题	139
三、汉语的历史比较	139
1. 汉语古音构拟依据的材料和方法	140
2. 中古音的构拟	141
3. 上古音的构拟	142
4. 汉语的历史形态	145
5. 汉语的历史句法	151
6. 词源研究	153
四、藏缅语的历史比较	154
1. 文献材料	154
2. 亲属语的比较	156
3. 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和原始藏缅语的构拟	159
五、侗台语的历史比较	161
1. 文献材料	161
2. 亲属语的比较	162
3. 原始侗台语的构拟	162
4. 侗台语与南岛语的接触关系	166
六、苗瑶语的历史比较	170
1. 苗瑶语族语言的关系	170
2. 苗瑶语共同语与原始苗瑶语	172
3. 苗瑶语与南亚语的历史关系	175
七、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明	175
1. 汉藏语的语音对应关系	175
2. 汉藏语的同源词	177
3. 汉藏语的历史形态	179
附录	185
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187
主要参考文献	209

导 言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以印欧语为基本研究对象,到了 20 世纪成为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印欧语以外的各种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研究语言接触关系的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奠定 20 世纪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理论基础的是瑞士学者费尔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和把语言视为符号系统的理论成为 20 世纪哲学和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他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共时和历时。他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混杂总体中确定的对象,是个人以外的,是可以区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是同质的。

索绪尔注重语言的符号学特点,忽略语言的接触关系和引起语言变化的外在因素和条件。如他指出,“借词只要放到系统当中去研究,首先就不算是借词了;它会跟任何土生土长的符号一样,只因与它有关联的词的关系和对立而存在”,“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①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的不同派别,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的结构主义学派分别都有自己的贡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继承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创立了音位学(phonology)。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伊(Trubetzkoy)在他的《音位学原理》(1939 年)中阐述了他的音位学理论,主张主要从语言成分区别词或意义的功能分析音位。

与布拉格学派齐名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崛起的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他们建立了语言符号学(glossematics),认为只有纯粹相互关系的结构才是语言学研究的真正的对象。

而美国的结构主义学派是在印第安语的描写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又称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American descriptivists)。他们着重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在历史语言学理论方面仍属于欧洲新语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和萨丕尔(E. Sapir)等。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历史语言学领域中语言接触的研究比较受重视。如混合语(mixed language)、克里奥尔语(creole)和洋泾浜语(pidgin)的研究受到关注。克里奥尔语常常描写以某种(或几种)语言的词汇为词汇,以另一种语言的语法为语法的语言。为了解释混合语等形成的原因又出现了不同的解释流派。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 45、46 页,商务印书馆,2001 年。

20 世纪中期斯瓦迪什(M. Swadesh)提出可以通过统计语言基本词(basic vocabulary)的替换速率来估计语言所经历的年代及亲属语的分化年代。这一学说被称为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又称为词汇统计学(lexicostatistics)。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较为热门的研究。语法化学研究新语法成分形成的过程。词成为语法成分的过程为:实词 → 虚词 → 附着形式 → 屈折词缀。语法化的过程中不同语音层面上的语法语素向弱化方向移动。原本成音节的形态成分可能弱化成为单一的辅音或弱化的元音,进一步则可能发生粘附成分完全脱落,原有的形态特征转移到词根上,成为屈折形式。

本书以介绍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主要目的,以印欧语和汉藏语为讨论的主要依据材料。上篇介绍和解释历史语言学的经典理论,下篇介绍印欧语和汉藏语的研究。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经历了二百多年,20 世纪赫梯语和吐火罗语文献的发现使印欧语历史比较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方面,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只能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工作者不能不研究汉语的历史。汉语有三千多年的文献积累,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数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的文字系统。利用汉字文献研究汉语语音的历史需要以汉语音韵学、传统文字学和训诂学为基础。传统的汉语音韵学,数十年来由于瑞典学者高本汉等西方学者的介入和以李方桂、王力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得以发扬光大。汉语史的研究,除了语音史外,还包括形态和句法历时变化的研究,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历史语言学。

欧美学者对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一直相当感兴趣。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除了汉语跟藏缅语的比较外,国内外学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苗瑶语和侗台语的系属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历史语言学对于形态变化较为简单的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研究要另辟新途。

中国台湾学者近 30 年来在南岛语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南岛语有近千种语言,主要分布在太平洋的岛屿上,分布在台湾的南岛语有的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有关的研究只能作一些简单的说明。阿尔泰和南亚两个语系的语言一部分分布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分布于中国境外的情况也很复杂。笔者由于学识所限,不能更多引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历史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任何一个学科,分类是最基本的研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语言数以千计,它们的发生学分类,或称为谱系分类,是历史语言学家的任务。直到今天,多数语言的归属还只有简单的研究,或尚未有定论。

我们要强调的是:当语言的创新只是发生在语言的一个局部之时,就是语言分化为不同方言之际。较晚的创新只是与亲缘关系更为密切的语言或方言有关。发生学分类所依据的就是不同时期的创新。分类的研究中,从近到远的比较是最基本的方法,否则我们就不能区分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并对这些历史演变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本书的附录《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方法》中除了介绍了一些音韵学的基本概念外,还介绍了汉语中古音的构拟和利用谐声研究上古音的方法。

上篇 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历史比较语言学 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

在欧洲,语言学一开始就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家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讨论。^①中世纪时“拉丁语语法”是“语法”的同义词。到了18世纪欧洲的学者才开始重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他们搜集了大量的语言材料,为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把语言分为孤立、粘着和屈折三个类型。洪堡特的语言学理论为后来的描写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其他学科的比较方法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语言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在19世纪得以丰富和发展。

英国东方学者威廉·琼斯(W. Jones, 1746~1794)在18世纪后期根据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的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有共同的来源。19世纪初拉斯克在他的《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的研究》中从冰岛语研究入手,把冰岛语与欧洲的其他语言作比较,除了确定冰岛语与拉丁语、希腊语的发生学关系外,还认为拉丁语、希腊语并非冰岛语的决定性来源,更为深刻的来源还须进一步寻找。弗朗兹·葆朴(F. Bopp, 1791~1867)是第一个将梵语和其他印欧语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1816年发表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互相比较》。后来他还出版了三卷本巨著《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

丹麦学者拉斯姆斯·拉斯克(R. Rask, 1787~1832)、德国语言学家弗朗兹·葆朴、德国学者格里姆(J. Grimm, 1785~1863,或译为格里木)、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赫尔(August Scheicher, 1821~1868)等在学科发展的前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世纪80年代自称为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的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批评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提出了对建立当代历史语言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语音和形态历史演变规律的表述:“语音规律无例外”和“类推作用有普遍性”。

与青年语法学派有密切关系的瑞士学者费尔南·德·索绪尔把语言的要素看作语言系统中互有联系的成分。他说,“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②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奠定了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的基础。

①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第13页,学林出版社,1990年。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6页。

1. 格里姆定律

格里姆《德语史》中的一段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是意味深长的。^①他说：“有一种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格里姆的伟大贡献在于发现了早期印欧语到日耳曼语的塞音(和擦音)的演变规律，即“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②格里姆在拉斯克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从印欧语塞音(和擦音)系统到日耳曼语的演变为：

印欧语	日耳曼语
p, t, k	f, θ, x
bh, dh, gh (f, θ, x)	b, d, g
b, d, g	p, t, k

印欧语 bh、dh、gh 也有学者根据梵语的反映形式认为是 f、θ、x，^③古日耳曼语的 d 为 ð。

根据日耳曼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等的对应情况，印欧语的学者还为原始印欧语构拟了 *k^w、*g^w、*g^wh，诸语中塞音(和擦音)的对应情况如：^④

原始印欧语	*p		*b		*bh	
希腊语	anepasiós	“表兄弟”	—		nephelé	“雾”
拉丁语	nepōs	“孙子”	trobá ^⑤	“建筑物”	nebula	“雾”
梵语	nápat	“后代”	treb ^⑥	“房子”	nábhs	“雾”
日耳曼语	nefa	“侄子”	θaurp	“村庄”	Nebel	“雾”

原始印欧语的 *p、*b、*bh 分别演变为日耳曼语的 f、p、b，对应于梵语的 p、b、bh，也就是说当时的研究者认为梵语在这一类的读法中还保存着原始印欧语的形式。

原始印欧语	*t		*d		*bh	
希腊语	phrátēr	“同族人”	édomai	“(我将)吃”	eruthrós	“红色”
拉丁语	frāter	“兄弟”	edō	“(我)吃”	ruber	“红色”
梵语	bhrātā	“兄弟”	ád-mi	“(我)吃”	rudhirás	“血色”
日耳曼语	broθar	“兄弟”	etan ^⑦	“吃”	rēad ^⑧	“红色”

① 格里姆在《德语史》中对日耳曼语族语言进行比较并讨论了它们的历史。

②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第 80—95 页。

③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105 页，商务印书馆，1991 年。

④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Fetter Lane, 1992, p. 148.

⑤ 立陶宛语。

⑥ 古威尔士语。

⑦ 古英语。

⑧ 古英语。

原始印欧语的 *t、*d、*dh 分别演变为日耳曼语的 θ、t、d，对应于梵语的 t、d、dh。

原始印欧语	*k		*g		*gh	
希腊语	déka	“十”	agrós	“田野”	stékhō	“攀登”
拉丁语	decem	“十”	ager	“田野”	vestigium	“足迹”
梵语	dásá	“十”	ájas	“平原”	strighnoti	“攀登”
日耳曼语	taihun	“十”	æcer ^①	“田野”	steigan	“攀登”

原始印欧语的 *k、*g、*gh 分别演变为日耳曼语的 h、k、g，对应于梵语的 k、g、gh。

原始印欧语	*k ^w		*g ^w		*g ^w h	
希腊语	lúkos	“狼”	érebos	“地狱”	nípha	“雪”
拉丁语	lupus	“狼”	—		nivis	“雪”
梵语	vrkas	“狼”	rajas	“云”	snāēzaiti	“下雪”
日耳曼语	ylga ^②	“母狼”	riqis	“黑暗”	snāw ^③	“雪”

原始印欧语的 *k^w、*g^w、*g^wh 分别演变为日耳曼语的 g、q、w，对应于梵语的 k、j、ž。

如古高地德语、哥特语 b 与梵语 bh 的对应关系和构拟的原始印欧语的 *bh：

	古高地德语	哥特语	梵语	古印欧语
带来	beran	bairan	bhar-	*bher-
连接	—	bindan	bandh-	*bhendh
牙齿	kamb	—	ḡambhas	*gombho-

这种列表的直观形式在历史比较中经常用来说明语音的对应关系。同一个语音现象不仅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而必须用成组的例子来说明。只是把个别的语音现象联系起来企图得出结论的做法往往使研究者误入歧途，也不能令人信服。

古日耳曼民族据说在公元前 750 年时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及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古日耳曼语有西支、东支和北支三个支系。西支的语言演变为今天的德语、荷兰语和英语，北支的语言演变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和冰岛语。东支的哥特语(Gothic)大约在 3 世纪时从维斯杜拉(Visdula)向黑海一带传播，成为勃艮地语(Burgundian)和汪达语(Vandalic)。④ 哥特语和北欧语言的碑铭是今天所知最早的古日耳曼语文献，古高地德语是今德语的前身。

维尔纳(Karl Verner, 1846~1896)的研究指出原始印欧语的清塞音 p、t、k 在古日耳曼语中确实演变为 f、θ、h，但只有位于词首或重读元音之后的 p、t、k 演变为 f、θ、h，而其他位置上的 p、t、k 演变为 b、d、g。这一演变规律被称为维尔纳定律。

① 古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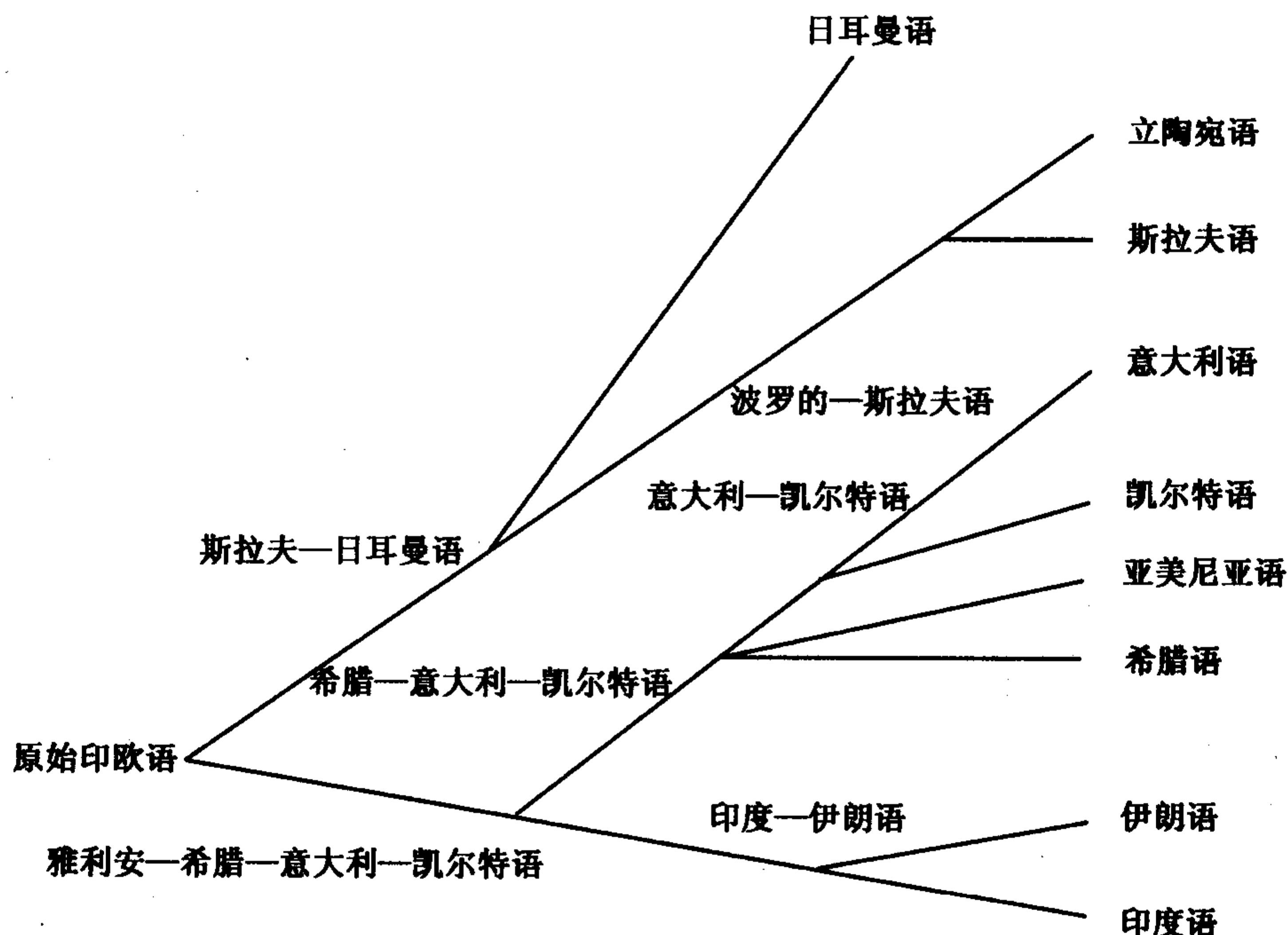
② 日耳曼语和古冰岛语。

③ 古英语。

④ Albert C. Baugh,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 2001 年, p. 30.

2. 谱系理论

19 世纪的施莱赫尔提出语言谱系理论。他当时为印欧语提供的谱系树图(1863 年)为①:



他将印欧语比作一棵树，树干是“母语”(原始印欧语)，支干是印欧语诸分支——日耳曼语、希腊语等，细支是印欧语的现代方言。施莱赫尔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亲属语言谱系分类的学者。施莱赫尔的另一贡献是创造了构拟的方法。构拟或叫做重建(reconstruction)，是用来解释亲属语或方言之间同源词的分歧形式采用的办法。他在构拟的语音形式前加 * 号用来表示构拟的对象，后来的学者就沿用他的办法。

施莱赫尔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但他把语言看作是不受人们的意志影响的有机体的想法和把生物学的分类法引进语言学的做法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施莱赫尔的谱系理论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但语言的谱系分类法至今仍是语言发生学分类的主要方法。

施莱赫尔认为语言的一切高级形式都来自低级形式。屈折形式来自结合形式，结合形式来自孤立形式。他认为所构拟的印欧语母语已获得最高级的屈折形式，它们在史前时期已经历了一切形态类型。反映他这一观点的《比较语法纲要》是当时重要的著作，再版多次。②

施莱赫尔的语言谱系理论并不能解释亲属语之间由于接触引起的复杂的对应关系，后来的“波浪理论”和“底层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亲属语之间及非亲属语之间的种

①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第 88 页，科学出版社，1960 年。

②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36—37 页，科学出版社，1960 年。

种关系。

20 世纪以来的结构主义不否定谱系理论的基本思想,语言谱系理论仍然是现代用来解释语言发生学关系的基本理论。正如梅耶所指出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用比较的方法来建立一些语言的历史,是因为我们确信,每一种新的系统都应该从单一的系统出发来解释。”^①

3. 方言地理学

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又叫语言地理学。

19 世纪 70 年代方言地理学的兴起是印欧语的研究和语言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方言地理学采用在语言地图上使用同语线(isogloss)区分不同区域方言的语音、词和语法形式的方法。同语线又叫做同言线(isoglossic line, isograph)和等语线。

这一学派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的语言学家温克(Georg Wenker)。温克想通过调查确定德国的高地德语(High German)与低地德语(Low German)的分界线。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是日耳曼西支(West Germanic)的语言。日耳曼西支的 *p、*t、*k 在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中读法不同。温克向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的相邻地区学校的教员寄去几个句子,^②学校的教员用德语字母把土语的读法记下来寄给温克。起初是 1 500 个点的读法,后来扩大到近 5 000 个点。调查没有得到预想的结论。同语线很少在长度上全部吻合,语音、词和语法上几乎每一个特点都有自己通行使用的领域。

方言地理学的调查研究仍在继续,除了德语,方言学家还对意大利语、法语等语言的方言进行调查,但仍然没有找到区分方言的办法。当时的方言学家甚至否定了土语的存在,认为可以用对词的历史的研究来代替对方言的研究。^③ 他们的结论是:“每一个词有自己的历史。”这也是方言地理学派跟新语法学派“语言规律无例外”的口号相抗衡的观点。梅耶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批评方言地理学的观点:“我们如果只限于考察由调查得来的并用地理方法记录下来的一些词和形式,就会有一种危险,只是孤立地研究一个词或一小组词,一个形式或者一小组形式,这种支离破碎的方法是会葬送整个历史语言学的。”^④

19 世纪方言地理学的调查证实了波浪理论,客观上为 20 世纪的语言区域特征和底层理论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尽管这一学派的观点不能得到后来学者的完全赞同,但他们的调查方法得到了肯定。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方言调查,就不会认识到语言演变的细节。方言地理学的调查表明:有些语言特征从前可能分布在大片的区域,现在只是保留它们的残余形式。

方言的地理分布和行政辖区、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解释古代行政辖区、人群迁徙和现代方言关系也就成为现代方言学的一部分。如布龙菲尔德持这样的观点: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69 页,科学出版社,1957 年。

② 温克所选用的句子为:“The good old man fell with his horse into the cold water.” “He always eats eggs without salt and pepper.”

③ 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190.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228—234 页。

④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59 页。

“我们找到了一个地域的语言分区,不妨拿来同其他的隔离界线来互相比。这种比较会显示出重要的方言分界是紧挨着政治界线并行的。显而易见,共同的政府和宗教,特别是同一政治单位内部互通婚姻的习惯,导致语言的相对统一。大致估计,在较古老的环境条件之下,政治疆域的改变在五十年以内会引起语言的某种分歧,而在政治疆界已经取消之后,那些同悠久的政治界线相平行的同语线,会继续维持二百年光景而绝少变动。”^①

4. 波浪理论

19 世纪的印欧语研究者发现印欧语不同分支之间的一些分歧不能用原有的语言分化理论来解释。如:

(1) 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的西部语群和东部语群,但它们有不同于其他印欧语名词中“以 m 代替 bh 的格尾形式”。

(2) 希腊语和印度—伊朗语也分别属于印欧语的西部语群和东部语群,它们“被动态以 r 为词尾”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印欧语。

(3) 意大利语和希腊语都有“阴性名词用阳性名词的后缀”的情况。

(4) 意大利语和日耳曼语都用“完成时式用来表示一般过去时”。^②

施莱赫尔的学生史密特(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1872 年在面对印欧语系任何两支语言之间都能找出特殊的相似点,而在地理上相近的语支这样的特殊相似点最多时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说,不同的语言变化像波浪似的散播在一个言语地域,每个变化可以在这个地域的一部分彻底完成,同先前被另一变化所渗透的部分并不平行一致。一波一波地回荡的结果形成了同语线(isogloss)。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波浪理论”(wave theory)。

影响较大的方言或亲属语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向其他方言或亲属语传播自己的说法。布龙菲尔德说:“比较法是我们重构史前语言的唯一方法,只对内部绝对一致的言语社团和明确的突然分裂才能加以准确的运用。”“比较法预想语支连续的明确分裂,但是反复无常的局部近似明明告诉我们后起的变化散布开来,越过早期变化遗留下的同语线;邻近语言间的相似也许由于中间地带方言的消失(波浪理论);某些方面已经分化的几个语言也会产生相似的变化。”^③

索绪尔指出:“某一特殊事实的推广,不管它的界限如何,都需要时间,这一时间有时并且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例如由 p 变 d 这种变化,交际曾把它扩展到整个大陆德国,起初是 800 至 850 年间在南方传播开来的,只有法兰克语除外。在这种语言里, p 仍然以软音 d 的形式被保存着,到后来才变成 d。”^④

波浪理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方言、亲属语之间在一定的分布条件下经常发生词、语法成分甚至语音的借用。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第 427 页,商务印书馆,1988 年。

② 同上,第 396 页。

③ 同上,第 401 页。

④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288 页。

5. 新语法学派的理论

语音对应关系的研究是历史比较研究的核心。对于格里姆提出的印欧语之间的辅音对应还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情况。新语法学派的成员丹麦的维尔纳(Karl Verner, 1846~1896)成功地解释了原始印欧语的 *p、*t、*k 与日耳曼语的 f、θ、h 和 b、d、g 的对应关系。维尔纳甚至提出,“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那就是说,曾支配一个语言的规律尚有任何例外的话,这个例外一定另有原因”。^①

新语法学派所强调的另一特点就是“类推作用有普遍性”。“类推作用”除了用来解释语音的不规则对应,还用来解释形态结构划一的变化。新语法学派的“类推作用”理论对形态的历史演变作出了解释。“在活的语言发展过程中所看到的形态因类推而划一的现象,词干重新分解和简化的现象,原有独立词汇单位的语法化(以后转变为构词法附加成分和变词法附加成分)的真实情况,语音现象和形态现象互相作用的情况(特别是在某些语言中逐渐取得一定语法意义的语音交替现象)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地扩展了历史语言学家的眼界,使他们有可能更好、更充分地阐明较远的过去的事实。”^②

新语法学派推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为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6. 类推

类推(analogy)是语言某些词法或句法形式类似性的推广。如古英语的名词有性、数、格的词尾变化,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形也发生变化,与名词性、数、格方面保持一致。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形容词所有的形态变化逐渐被取消,绝大多数名词也是如此。在抹平古英语这些形态形式的过程中,类推起了主要的作用。古英语 hūs“房子”的格变化和单复数形式为:

	单数	复数
主 格	hūs	hūs
所有格	hūses	hūsa
与 格	hūse	hūsum
宾 格	hūs	hūs

中古英语中长元音 ū 由于推链的作用变成 ou, 与格和宾格的词尾变化也已消失, 名词的复数形式在南部方言中多用后缀 -en 表示, 北部多用 -(e)s 表示, 于是当时的南部方言中 hūs 的复数读成 housen, 北部读成 houses。

-(e)s 作为后缀表示现代英语一般普通名词的复数是类推在起作用。古英语“母牛”的单复数形式分别为 cū 和 cȳ, 1300 年的中古英语中复数形式还有记录为 kyn 的, 几个世纪以后其复数皆为 cows。类推大约是在比较中发挥作用。原本人们只知道“母猪”的单复数形式分别为 sow 和 sows, 没听说过 cow 的复数是 cows。于是有 sow : sows = cow : x 这样的类比, x = cows。^③ 现代英语名词规则的复数形式和动词

① 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钱晋华等译, 第 291 页, 科学出版社, 1958 年。

②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107 页。

③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501 页。

过去式、过去分词规则形式是经历了历史上的类推留下的,不规则形式是类推受到习惯的抗拒造成的。

“打”是唐代开始意义泛化的动词,语法化和类推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动词的前缀。如“打场”“打伞”“打票”“打哈哈”等。汉语中“出租车”先是在方言中根据英语读作“的士”。“的士”被“再分析”(reanalysis)后,“叫出租车”北京话里说成“打的”。广西南宁一带管“叫出租用的牛车”为“打牛的”。

类推在语法的历时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语法上的每一项创新都是通过类推代替原有的形式,不同范畴的类推逐渐地改变语法系统的结构,最终使语言的语法有较大的变化。

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奠定了 20 世纪的语言学、哲学和符号学的基础。

1. 索绪尔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索绪尔 21 岁时写成了著名的论文《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青年时期同莱比锡的新语法学派有密切的联系,基本赞同这一学派的观点。后来索绪尔的学生 A. 梅耶是这样评价索绪尔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的:“不仅总结和确定了以前有关元音系统的发现,它还使一种严整的系统得以产生。这种系统包罗一切已知的事实,并且揭露了许多新的事实,就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新的成就。从此以后,无论在哪个问题上都不容许忽视这样一个原理:每一个语言都构成一种系统,其中一切成分都互相连接着,而且都从属于一个非常严格的总纲。”^①

梅耶继承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强调把语言作为系统来研究,认为在语言的系统中还包含着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他说:“任何土语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我们应当经常想到每一个细节在每一个系统中的地位”,“只是孤立地研究一个词或者一小组词,一个形式或者一小组形式,这种支离破碎的方法是会葬送整个历史语言学的”。^② 这种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显然与 19 世纪的有很大的差别。

索绪尔从符号学的观念出发考虑语言的系统性。他说:“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断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间的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③

索绪尔强调语言是符号系统,他说:“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学科中第一次为语言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它归属于符号学”。^④ 符号在使用中包含着三项要素:符号、符号的对象和解释。语言的使用者兼为语言的解释者,语言的变化始于符号的解释。

①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104 页。

②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59 页。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67 页。

④ 同上,第 38、100 页。

索绪尔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他说:“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①索绪尔的观点是: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混杂总体中确定的对象,是个人以外的;语言是可以区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是同质的。每个音响形象是若干个音位的总和,在文字中可以用相应数量有限的符号把它们唤起。^②我们注意到索绪尔是把一定范围的个人言语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致的那一部分称为语言。

他说:“毫无疑问,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从历史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人们不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他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了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③

他区分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和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指出:“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④不过当我们考虑语言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结构时,必须把所有的要素放到一个系统中去设想。

索绪尔这些区分对立的研究范畴的设想对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后来的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对索绪尔的一些想法有不同意见,一些批评显然对他的哲学思想和他的研究方法有误解。

2. 布拉格学派的观点

索绪尔之后,继承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并作出重大贡献,但又宣称他们的看法与索绪尔不同的是欧洲的布拉格学派。“布拉格学派”这一称号的使用始于1932年。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捷克的语言学家马德休斯(V. Mathesius)、先是在欧洲后来移居到美国的犹太人雅可布逊(R. Jakobson)、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伊(Trubetzkoy)等。布拉格学派又称为“布拉格功能结构学派”。他们以结构主义的语言观研究语言,又主张功能说。他们的一些成员在他们共同起草的“论纲”中指出:“在语言分析中应该采用功能的观点。从这个观点看,语言是服从于一定目的的表达手段的系统。若是不考虑到语言材料所隶属的系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语言材料。”他们认为,一个系统的历史本身创造了系统,每一个共时性系统都包含了它的过去和未来。^⑤

布拉格学派的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音位学(phonology)。音位(phoneme)这个语言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1页。

② 同上,第36页。

③ 同上,第41页。

④ 同上,第143页。

⑤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第169、174页。

学术语最初是俄国学者博顿(Бодуэн де Кртенэ)和他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Н. В. Крушевский)1879~1880年间根据他们共同的研究提出的。^① 俄国喀山语言学派的波兰籍学者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提出应当有两种描写语音学:一种是把声音作为物理现象的研究,另一种是把声音作为某一语言共同体内部用于交际目的的语言符号的研究。特鲁别茨柯伊把索绪尔和库尔德内看作现代语音学的先驱。特鲁别茨柯伊在他的《音位学原理》(1939年)中用索绪尔的理论阐述了音位(phoneme)的概念。在他们的“论纲”中宣布,音位学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共时语言学,也适用于历时语言学。用音位学的观点来研究语音演变就叫历时音位学(diachronic phonemics, historical phonology)。历时音位学对于音变,只注意引起语音结构变化的音变。他们管这种有功能作用的演变叫“音位学转换”。语言的系统遵循一定的和谐原则和经济原则。一切孤立的、不对称的音位对立趋向消亡,一切不符合相关原则的音变趋向消失。这样语言可以用最少的区别特征来区分最多的音位。^②

布拉格学派在他们的《论纲》中指出比较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发生学问题。他们认为,结构比较的方法也可以用于非亲属语。就共时的结构比较分析而言,可比较各语言系统的结构规律,比较不同语言为了适应交际需要而运用的不同手段等等。这为后来的类型学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提出语言“区域联盟”(unions régionales)这样的概念,认为:“临近地域的语言通过互相接触可获得共同特征,因此语言之间的相类似并非一定导源于语言的亲属关系。”^③

布拉格学派的继承者马丁内(A. Martinet)提出:“在相关系统中,音位系列(series)和音位序列(order)的交叉点上可能有一个音位而实际上没有,这就出现一个空格,这个空格就叫空位。空位在音位演变中最有吸引力,能促使同系列和同序列的音位衍生出新的、填补空白的音位。”^④

3. 内部构拟法、空格和互补

历史比较法通常通过几个方言或亲属语之间的比较来推测它们的历史演变,但不能将历史比较法用于没有亲属语的语言。索绪尔在他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根据印欧语以e为元音的多数词根的结构是CeC(C代表辅音),但有些普通的词根只有一个辅音,推测这些只有一个辅音的词根原本与通常的词根的结构是平行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辅音已丢失,丢失的可能是喉音。一直到1927年人们才在赫梯语中发现丢失辅音的残留。^⑤ 索绪尔的这种构拟法后来被称为“内部构拟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西方历史语言学教科书中或称“内部构拟法”的对象为“形态结构中的

① 傅懋勳《论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第90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

② 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第120—128页,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1995年。

③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第171页。

④ 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第131页。

⑤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202页。

Robert J. Jeffers and Ilse Lehisté, *Principal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50.

过去的语音变化留下的痕迹”，^①或称“内部构拟法”“是用来构拟单一语言的较早时期的特点”。^② 内部构拟法关注着上述的不规则的形态交替和语音结构中的空格。拉丁语的研究中有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方法。

拉丁语动词第一人称单数加后缀-o, 不定式加-ere, 第一人称单数完成时加-si, 动名词加-tum。试比较下面古拉丁语“爬行”等一组动词：

	第一人称单数	不定式	第一人称单数完成	动名词
爬行	repo	repere	repsi	reptum
写	scribo	scribere	scripsi	scriptum
说	dico	dicere	dixi	dictum
覆盖	tego	tegere	texi	tectum

拉丁语的字母 x 代表读音 ks, c 代表 k。“写”和“覆盖”两词的词根结尾辅音在不同的派生词中清浊不同。排除其他情况后肯定“写”的完成时、动名词中词根的 -p < * -b-, “覆盖”完成时和动名词的 -ks < * -gs-。梅祖麟先生在《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一文中的说明是很合适的，“内部拟构在资料方面设了两个限制。第一，只限于一种语言，不涉及到其他亲属语。第二，在这个语言也只是限于某个阶段的共时资料，这个阶段可古可今，但是不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阶段的资料作为推论的出发点”^③。

音系结构中空格和结构成分的互补现象的研究及对于它们来历的拟测也在汉藏语的研究中得到较多的运用，如李方桂先生运用这样的方法对汉语的古音进行解释和构拟。对高本汉所拟的上古声母李先生指出，有的声母只在中古三等-j 介音前出现。也就是说这些声母的出现以介音-j 的出现为条件。于是他认为只在介音-j 前出现的声母从上古到中古有这样的演变规律，如：

上古 *t- 等 + *j- > *tj- 等 > 中古 tj- 等 ^④

那么中古 t- 和 tj- 就是互补关系，谐声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语音要素的互补关系是：有共同的来历的语音 A 和 B 中的 B 总是以 C 的出现为条件，那么 A 和 B 是互补关系。如果语音 A 的出现总是以语音 C 的出现为条件，我们就可以推测它可能与另一个不以 C 的出现为条件的音有共同的来历。

空格(slot)是语音结构所表现出来的语音历史演变造成的在结构的某一个(或几个)位置上的空缺。如李方桂先生在构拟汉语上古音时提出，根据谐声，上古有清鼻音声母，上古既然有清鼻音声母，就可能有清的流音。他说：“上古时代来母也应当有个清音来配，这可以从来母字跟透母彻母互谐的例子看出线索，如獭 thât : 赖 lâi, 體 thiei : 禮

① “Traces of past phonological change remaining in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89.

② “be applied to a single language so as to allow us to reconstruct important characters of earlier stages of that language”——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248.

③ 梅祖麟《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中国语文》1988 年第 3 期。

④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11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

liei……”“藏语的清边音,普通写作 lh-的,唐代译音多用透母来译,如 lha mthong 译作贪通……,因此我们也可以拟出下列两条演变律:

上古 *hl- (一、二、四等字) > 中古透母 th-

上古 *hlj- (三等字) > 中古彻母 th-

李先生这是从系统结构缺少 l- (hl-) 声母留下空格引起的不对称推断并用谐声和对音材料来说明汉语从上古到中古可能发生的演变。如果缺少证明,光凭猜想就不能说明问题。

4. 链移

19 世纪早期的历史比较中语音对应关系被叫做“字母转换的法则”,^①而 19 世纪后期的新语法学派尽管已经重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但缺乏把语音规律放到语音系统中来考虑的思想。索绪尔之后的历史语言学家更为深入地探索语音历史演变的规律。布拉格学派音位的对立是从音位系统的角度来看的。语音系统中一个音位的变动往往会引起一连串音位的移动。有“推链”(push chain)和“拉链”(drag chain)两种形式的音位变化,合称为“链移”(chain shift)。“推链”是第一个音位的移动变化很接近舌位上邻近的第二个音位时,第二个音位又因此接近第三个音位等等。“拉链”是第一个音位的移动留下的空位吸引邻近的第二个音位,又因此吸引第三个音位到它留下的空位上等等。

我们在许多语言(或方言)中都能找到链移留下的足迹。如中世纪英语在以下七个词 pine, gees, bead, name, gote, goos, doun 中分别有长元音 /i: e: ε: a: ɔ: o: u:/。后来 i: 成为 ai, e: 成为 i:, ε: 成为 e:, a: 成为 ε:, ɔ: 成为 o:, o: 成为 u:, u: 成为 au。^② 这两个演变的系列可以解释为是“推链”的例子,也可以解释为是“拉链”的例子。有的学者认为是“推链”,^③有的学者认为是“拉链”。^④ 这两个链移就是著名的“英语元音大转移”(the English Great Vowel Shift)。英语的元音大转移大约从 1500 年开始,经历了 250 年才完成。事实上,语音系统的元音或辅音的历史演变中链移这样的模式往往只是整个演变的一部分。

魏晋南北朝期间北方的汉语方言中发生了 *ai > *a > *o > *u > *ou 这样的链移,隋唐之后的链移为 *a > *o > *u > *ou > *au。^⑤

格里姆定律和维尔纳定律所说明的是辅音的推链。后来的学者认为从原始印欧语到古日耳曼语经历了这样的演变:^⑥

原始印欧语	b	d	g	g ^w	p	t	k	k ^w	bh	dh	gh	gh ^w
	↓	↓	↓	↓	↓	↓	↓	↓	↓	↓	↓	↓
古日耳曼语	p	t	k	k ^w	f	θ	x	x ^w	β	ð	ɣ	ɣ ^w

①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第 81—82 页。

② Theodora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82.

③ 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85.

④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187 页。

⑤ 朱晓农《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民族语文》2005 年第 1 期。

⑥ Theodora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83.

5. 语音演变过程的解释

新语法学派形成以来,人们通常认为语音的变化是连续的、逐渐的。如布龙菲尔德说:“从历史上说,我们想象音变是逐渐形成的,逐渐喜欢某些非区别性的变体而不喜欢旁的变体。”“如果我们能够剔除借用和类推变化,这样搜集所得的材料可以显示出一方面是某些变体越来越流行,伴随着相反的极端是另一些变体被废弃了。”^①20 世纪后半期,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讨论较以前更深入。王士元提出了他的词汇扩散理论。他说:“可以通过三种相对独立的参量来研究这种演变的时间范畴:(1) 语音方面的,从语音 x 到语音 y;(2) 词汇方面的,在个人语汇中有关的部分,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3) 社会方面的,在同一方言中,从一个说话人到另一个说话人。”“当 x 和 y 各有不同的发音部位,并在两个发音部位之间不存在生理上的连续(例如在夏威夷语中的 t>k,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语音上有个中间阶段,更难以想象会有声学上的连续)。”^②

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在这一点上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新语法学派和类型学派的模式(taxonomic model)认为每一种语音的变化会立即影响到词项的读音,他们的模式不是这样的。在转换生成学派看来,“基本表达(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s)中的变化会随着作为重建过程的一部分的规则的增加而变化,实际上也无需全部发生变化。”“词项形式的变化较慢。事实上是由于生成音系是非自主的(non-autonomous)。”^③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因为有的例外确是语言规律以外的因素造的。

6. 语言年代学

(1) 语言年代学基本理论

20 世纪中期斯瓦迪什(M. Swadesh)受放射性碳考古断代法的启发,提出可以通过统计语言基本词(basic vocabulary)的替换速率来估计语言所经历的年代及亲属语的分化年代。这一学说认为亲属语之间分化的年代越久分歧越大,词汇之间的不同尤为明显。基本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核心词。这一学说被称为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又称为词汇统计学(lexicoststistics)。

基本词是不同历史条件下都使用的词。如,“太阳”“月亮”“星星”“水”“火”“头”“眼睛”“鼻子”“手”“鱼”“鸟”“树”,以及最基本的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等。开始时设定的基本词词表有 200 个词。统计表明,许多种古语一千年中基本词的保留率大约为 81%。后来斯氏对词表作修正,挑选其中的 100 个构成词表,后来学者多利用这个百词表的词项来统计。^④

古语与它的后代语言相比较,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它们的词根,形态附加成分或构词附加成分有所变化。如,古汉语为“鼻”,现代汉语是“鼻子”,古汉语“星”,现代汉语“星星”等。这仍然算是对古语词的保留。语言年代学把他们统计的对象称为基本词根语素(basic-root-morphemes)。语言年代学较多地应用于对亲属语及假定为亲属语分化年代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453 页。

② 王士元《竞争性演变是残留的原因》,《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第 5、6 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年。

③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117.

④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413—420 页。

的估计。统计结果表明,经历了一千年,两种亲属语(或方言)的同源词根的保留率相当于一种语言两千年后核心词的保留率。

语言年代学应用于对亲属语和假定为亲属语的语言分化年代的估计时统计的对象是基本词根语素,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值得注意的是词的选择和对应的词或词根是否有同源关系的判断。有时借词可能被当成同源词,语言的接触关系使统计失误。由于对亲属语语音对应关系的研究不够,貌似没有同源关系的同源词或同源词根因未能归入统计也会使统计失误。所以亲属语间语音对应关系的研究,词或词根同源关系的研究成为统计的关键。

语言年代学常用于无文字记载语言早期发生学关系和追溯语言史前关系的研究。表面看涉及的词不多,实际上只有对有关语言的诸方面做较为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李兹(Robert B. Lees)比较了 13 种语言,发现保留率最高的是 9 世纪到现代的德语,为 85.4%,保留率最低的是古拉丁语发展而来的罗马尼亚语,为 76.4%。他认为两种方言(或亲属语)每千年同源词的平均保留率为 0.8048 ± 0.0176 。徐通锵计算的古今汉语每千年的词根语素保留率为 83%。^①

李兹估计分离年代的公式为:

$$t = \log c / 2 \log r$$

t 为分离的时间, c 为同源词根语素保留的百分比, $r = 0.81$ (分化一千年后同源词根语素保留率)。

以下是斯瓦迪什的 200 基本词表:^②

- | | | | |
|--------------------|-----------------------|-------------------|------------------|
| 1. <i>all</i> | 2. <i>animal</i> | 3. <i>a</i> | 4. <i>ashes</i> |
| 5. <i>at</i> | 6. <i>back</i> | 7. <i>bad</i> | 8. <i>bark</i> |
| 9. <i>because</i> | 10. <i>belly</i> | 11. <i>big</i> | 12. <i>bird</i> |
| 13. <i>bite</i> | 14. <i>black</i> | 15. <i>blood</i> | 16. <i>blow</i> |
| 17. <i>bone</i> | 18. <i>breathe</i> | 19. <i>burn</i> | 20. <i>child</i> |
| 21. <i>cloud</i> | 22. <i>cold</i> | 23. <i>come</i> | 24. <i>count</i> |
| 25. <i>cut</i> | 26. <i>day</i> | 27. <i>die</i> | 28. <i>dig</i> |
| 29. <i>dirty</i> | 30. <i>dog</i> | 31. <i>drink</i> | 32. <i>dry</i> |
| 33. <i>dull</i> | 34. <i>dust</i> | 35. <i>ear</i> | 36. <i>earth</i> |
| 37. <i>eat</i> | 38. <i>egg</i> | 39. <i>eye</i> | 40. <i>fall</i> |
| 41. <i>far</i> | 42. <i>fat/grease</i> | 43. <i>father</i> | 44. <i>fear</i> |
| 45. <i>feather</i> | 46. <i>few</i> | 47. <i>fight</i> | 48. <i>fire</i> |
| 49. <i>fish</i> | 50. <i>five</i> | 51. <i>float</i> | 52. <i>flow</i> |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415—418 页。

②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p. 180—181.

53. flower	54. <i>fly</i>	55. fog	56. <i>foot</i>
57. four	58. freeze	59. fruit	60. <i>give</i>
61. <i>good</i>	62. grass	63. <i>green</i>	64. guts
65. <i>hair</i>	66. <i>hand</i>	67. he	68. <i>head</i>
69. <i>hear</i>	70. <i>heart</i>	71. heavy	72. here
73. hit	74. hold/take	75. how	76. hunt
77. husband	78. <i>I</i>	79. ice	80. if
81. in	82. <i>kill</i>	83. <i>know</i>	84. lake
85. laugh	86. <i>leaf</i>	87. leftside	88. leg
89. <i>lie</i>	90. live	91. <i>liver</i>	92. <i>long</i>
93. <i>louse</i>	94. <i>man/male</i>	95. <i>many</i>	96. <i>meat/flesh</i>
97. mother	98. <i>moutain</i>	99. <i>mouth</i>	100. <i>name</i>
101. narrow	102. near	103. <i>neck</i>	104. <i>new</i>
105. <i>night</i>	106. <i>nose</i>	107. <i>not</i>	108. old
109. <i>one</i>	110. other	111. <i>person</i>	112. play
113. pull	114. push	115. <i>rain</i>	116. <i>red</i>
117. right/correct	118. rightside	119. river	120. <i>road</i>
121. <i>root</i>	122. rope	123. rotten	124. rub
125. salt	126. <i>sand</i>	127. <i>say</i>	128. scratch
129. sea	130. <i>see</i>	131. <i>seed</i>	132. sew
133. sharp	134. short	135. sing	136. <i>sit</i>
137. <i>skin</i>	138. sky	139. <i>sleep</i>	140. <i>small</i>
141. smell	142. <i>smoke</i>	143. smooth	144. snake
145. snow	146. some	147. spit	148. split
149. squeeze	150. stab/pierce	151. <i>stand</i>	152. <i>star</i>
153. stick	154. <i>stone</i>	155. straight	156. suck
157. <i>sun</i>	158. swell	159. <i>swim</i>	160. <i>tail</i>
161. <i>that</i>	162. there	163. they	164. thick
165. thin	166. think	167. <i>this</i>	168. <i>thou</i>
169. three	170. throw	171. tie	172. <i>tongue</i>
173. <i>tooth</i>	174. tree	175. turn	176. <i>two</i>
177. vomit	178. <i>walk</i>	179. <i>warm</i>	180. wash
181. <i>water</i>	182. <i>we</i>	183. wet	184. <i>what</i>
185. when	186. where	187. <i>white</i>	188. <i>who</i>
189. wide	190. wife	191. wind	192. wing
193. wipe	194. with	195. <i>women</i>	196. woods
197. worm	198. ye	199. year	200. <i>yellow</i>

表中的斜体词后来收入斯瓦迪什修正的百词表。

修正词表的 100 词为：

I, you, we, this, that, who, what, not, all, many, one, two, big, long, small, woman, man, person, fish, bird, dog, louse, tree, seed, leaf, root, bark, skin, flesh, blood, bone, greese, egg, horn, tail, feather, hair, head, ear, eye, nose, mouth, tooth, tongue, claw, foot, knee, hand, belly, neck, breasts, heart, liver, drink, eat, bite, see, hear, know, sleep, die, kill, swim, fly, walk, come, lie, sit, stand, give, say, sun, moon, star, water, rain, stone, sand, earth, cloud, smoke, fire, ash, burn, path, mountain, red, green, yellow, white, black, night, hot, cold, full, new, good, round, dry, name.

补充了：breast, claw, full, horn, knee, moon, round。

(2) 语言年代学的检验

估算德语和英语分离年代语言年代学的检验多被引以为例。^① 英语与德语核心词同源率为 60%，斯瓦迪什最初估计每千年的核心词保留率为 85%，故：

$$t = \frac{\log 60\%}{2 \log 85\%} = \frac{-0.511}{2 \times (-0.163)} = 1.561(\text{千年})$$

估计英语与德语的分离是在 1 500~1 600 年前。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古英语离开欧洲大陆与西日耳曼语分家发生在公元 449 年。

徐通锵据斯氏百词表的词项计算的汉语诸方言百词同源百分比为^②：

	梅县	广州	南昌	长沙	苏州	北京
厦门(闽)	68	63	64	61	59	56
梅县(客)		79	77	72	73	69
广州(粤)			78	76	77	74
南昌(赣)				88	84	76
长沙(湘)					86	79
苏州(吴)						73

厦门话与北京话根据它们百词的同源百分比测算的分化年代为 1559 年前 ($r = 0.83$)。我们知道今闽方言来自西晋时期的北方方言，是 4 世纪初永嘉之乱北人南迁带来的。

(3) 关于语言年代学的不同意见

一些语言学家不太赞同语言年代学设想。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核心词的保留率不同的语言可能表现不同，与其他语言较少接触的语言和与其他语言接触较多的语言它们之间核心词的保留率可能有较大的差别。李兹公式只是一种经验公式。

语言的基本核心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继承的情况也可能不甚相同。斯氏的 200

①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 176.

②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422 页。

词中如“冰”“雪”之类的词在热带或靠近热带的语言中从来不怎么使用,而“草”“树”这样的植物通名和“动物”这样的总称在有的语言中是较晚才出现的,通常较为原始的社会中总是这样。“洗”“砍”这样的动词在古代汉语及中国南方其他的一些语言中有很仔细的分别。

一些语言中指示代词是三分的,甚至是四分的。如中国南方的一些语言中除了近指的“这”,还有远指的“那”和更远指的“那”。而且它们不是较晚才有的。有的语言对于看得见的地方和视力不能及处的指示还有区别。至于冠词和介词一类的虚词,它们往往是后起的,作为核心词也不太合适。

7. 语言的接触关系和底层理论

(1) 语言的接触关系

语言或方言之间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接触关系,如:① 社团方言之间的接触关系;② 相近的亲属语或方言之间的接触关系;③ 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接触关系。正如萨丕尔所指出的:“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①双语者往往是语言接触的主要媒介。

语言接触的研究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语言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语言接触影响到语言诸方面的历史演变。如果不是语言的接触,英语形态的演变就不会那样迅速。^②到了杰弗里·乔叟之后,英国平民的通俗英语占了重要的地位,成为英语的权威方言。

亲属语间相近的词有的是同源词,有的是借词。同源词来自祖语的共同形式,分化后在不同的语言中分别经历各自不同的历史演变。亲属语之间的借词,借入前参与了贷方的语音和形态的演变(包括构词特征的变化),不能参与借方的演变;借入后参与借方的语音和形态的演变,不能参与贷方此后的历史演变。故从语音和形态的历史入手,同源词和借词是可以区分的。不同历史层次的借词在借方和贷方中的历史不一样,可以在研究借方和贷方语音和形态历史的基础上再加区分。

一个词的词源就是它较早时的可以追溯的语音和语义的历史,包括构成这个词较早时的词法(构词及构形)或借贷语的词法特点(如果它是借词)。如英语的 murder“谋杀”和德语的 mord“谋杀”来源于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 *mrtró 或 *mrtó,词根为 *mr-“死”(如拉丁语动词 mori“死”,名词 mors, mort-“死”)。英语的 murder 和德语的 mord 词源的意思是“死”,在古德语支的语言中语义演变为“有预谋地非法杀死一个人”。我们一定不能忘了词汇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与使用者的精神及物质的文明有直接的关系。^③

欧洲和东亚的语言工作者都经历了把语言间的借用作为发生学关系的证据和认为是产生混合语的原因这样的时代。由于一种语言的词汇来源复杂因而就断定它是混合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第 173 页,商务印书馆,1991 年。

② 从 1066 年开始的 300 多年间,英国的国王都说法语,学校里和行政部门用法语,只有平民在用英语。

③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62 - 63.

语,回避了进一步的研究。

(2) 底层理论

语言或方言的转用在历史上经常发生。被放弃的语言或方言往往对被采用的语言或方言有所影响,把它的一些成分保存在所采用的语言或方言中。被放弃的语言(或方言)成为所采用的语言的底层语言(或底层方言),这一类保存下来的成分被称为底层成分(substratum)。布龙菲尔德讨论过这样的几种情况:“假使外来移民在语言上被孤立了,假使他的文化水平很低,而尤其是,假使他跟一个言语不同的人结婚,那么他也许完全停止使用他的母语,甚至于逐渐失掉灵活运用它的能力。英语变成他唯一的语言了,虽然他还说得很不完全;到了他的孩子们一代,英语却变成他们的母语。孩子们最初讲英语也许带些外来特点,但是跟外界接触以后很快会得到完全的或者近乎完全的纠正。”“假使征服者为数不多。或者,特别是,假使他们没有携带他们的妇女,那么这样的结局是很可能的。”“劣势语言可以继续存在而优势语言趋于消亡。”“仿佛优势语言也曾受了劣势语言的影响。最清楚的例证是智利的西班牙语。智利土著人民勇猛善战,西班牙士兵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大量增援,随后定居下来,同土著女子结婚。跟拉丁美洲的其余部分相反,智利丢了它的印第安语,只说西班牙语了,这儿的西班牙语在语音上不同于拉丁美洲其余地方(统治的上层阶级)所说的西班牙语。不同的特点大概来自被西班牙语替代了的土著语言;据推测,第一代异族通婚的子女从母亲学得了不完善的发音。”^①

语言及方言间常常是词汇和语法成分的借用,有时也涉及语音。词的借用可能造成原有词(固有词)语义的变化,语法成分的借用会影响到原有语法成分功能的变化。如罗曼语对英语的影响除了词汇和语法成分外,还表现在语音方面。^②而底层语言对于被转用的语言(或叫做战胜的语言)的语法和语音两个系统的影响往往更深入。被转用语言的语法类型和语音格局可能由于底层语言的影响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3) 语言的区域性特征

语言区(linguistic area)是指具有一定结构上共同特点的相邻语言构成的语言群,它们的区域性特征(areal feature)是由语言的接触造成的。这个概念最初是特鲁别茨柯伊在1928年提出来的,后来或称这样的一群语言为语言联盟(language association)。^③依照语言的区域性特征对语言做发生学分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困难。语言的区域性特征一般有一定程度的地理延伸,通常的研究中它们是语言共时特征的表现,或者是在古代的某一语言或方言的底层上不同发生学关系的语言接触的结果。“所以,总的说来,我们要把语言形式——语音格局和形态——的主要一致和分歧归因于语言的自主的沿流,而不是归因于个别的、蔓延开来的、一会儿集合在这里一会儿集合在那里的特征。”^④研究语言区域性特征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对亲属语的分歧特点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570—578页。

②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239.

③ 同上, p. 245, p. 246.

④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85页。

(4) 混合语和洋泾浜语

语言接触的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混合语(mixed language)。一些语言学家不承认有混合语。梅耶说:“我们却不能断定,在某些合适的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的‘混合’。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形,语言学家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用比较方法来建立一些语言的历史,是因为我们确信,每种新的系统都应该从一种单一的系统出发来解释。”^①

混合语的研究始于19世纪80年代,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研究的高潮。^②

洋泾浜语(pidgin)^③是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社会交际中产生的“语言”。往往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语言提供词汇而社会地位较低的语言提供语音和语法。洋泾浜语通常未能成为使用者的母语,甚至不能称之为语言。克里奥尔语(creole)是在洋泾浜语的基础上,语法和词汇得以丰富和完整,进一步成为使用者母语的语。④ 克里奥尔语常常描写为以某种(或几种)语言的词汇为词汇,以另一种语言的语法为语法的语言。如,菲律宾的查瓦卡诺语(Chavacano)是以菲律宾语的语法为一方,西班牙语词汇为另一方;斯里兰卡的克里奥马来语(Sri Lankan Creole Malay)的语法是斯里兰卡摩尔泰米尔语的,马来语的词汇;^⑤吉普赛人的罗马尼语(Romani),印地语的语法,词汇来自欧洲不同语言;爪维语(Javino),爪哇语语法,西班牙语词汇;波丢语(Petjo),马来语语法,词汇来自荷兰语。^⑥

也有学者认为,克里奥尔语是某种语言的变体(variety),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English-based Creole)就是英语的变体,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French-based Creole)就是法语的变体。某地区受某种目标语(比如说英语)的影响形成克里奥尔语,如果这种克里奥尔语进一步与目标语接触,与目标语相近,认为是经历了“去克里奥尔化”(decreolization)。^⑦ 有的学者认为既然今天的克里奥尔语的存在与其他语言一样,那么语言除了来自于方言的分化外,还可能来自于古代的克里奥尔语。^⑧

混合语研究方面解释上的分歧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

单一起源理论(monogenesis)认为混合语有共同的起源,不同的混合语只是词汇被替换。

克里尔奥连续流(creole continuum)假说认为克里奥尔语在一定的阶段可向高层语靠拢,即经历“去克里奥尔化”。这样从洋泾浜语到克里奥尔语再到标准语,就形成了一个连续流。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69页。

② 石定栩《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4期。

③ 该词据说来自于英语 business 的汉语读音,或者说是英汉洋泾浜语的说法。参见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257.

④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258.

⑤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leventh Edition, Barbara F. Grime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Dallas, Texas.

⑥ *Notes on Linguistics*, February 1997,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⑦ 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319.

⑧ 同上, pp. 317 - 319.

简单理论(simplification theory)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洋泾浜语是简化了的高层语,从本质上说同父母跟子女说话时使用的幼儿语差不多。

普遍语法理论(language universals)主张混合语代表了人类语言的本质。各种自然语言的差别来自非本质的边缘语法,是在普遍语法许可范围内的变化。混合语扬弃了各种边缘语法,只留下普遍语法,所以各种混合语会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①

8. 有关形态和句法演变的理论

(1) 语法化理论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讨论的是语法成分形成的过程。语法化学的研究范围比传统的实词虚化的研究范围要大。19世纪开始的语法化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逐渐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较为热门的话题。^②

词的语法化过程为:“实词→虚词→附着形式→屈折词缀。”^③这个过程被称为是语法化的斜坡(cline)。也就是说,实词可能虚化,虚化了的实词可进一步演变为粘附式的语法成分,粘附式的语法成分进一步可能成为词的屈折形式。

语法化理论的另一个式子是: $A > A/B > B$ 。它的意思是,A虚化为B之后总有一个A和B共存的阶段。语言的共时系统中往往保存着语法成分历时演变留下的痕迹。

可能经历语法化的不光是单个的词,也有词组。如英语表示“打算”的be going to原本只是动词go的进行时的形式。^④ be going to这个词组的意义被再分析(reanalysis),成为助动词词组。

汉语的“了”早期的先秦文献中尚未出现,后来的文献中“了戾”意为“缭绕”。“了”为“结束、完结”义,南北朝时书面语中放在宾语之后表示完成,到了唐代逐渐虚化,可附于动词之后兼作完成时的标记,如“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李商隐诗)。宋时可置于宾语之后,如“九龙咸伏,被抽背脊筋了,更被脊铁棒八百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七)。现代汉语表示持续的“着”是近代汉语表示“附着”义的“著”虚化的结果。

实词成为虚词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或归于“联想”(association)和“重新分析”(reanalysis),或认为是语用、语义的因素。^⑤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被重新分析的词或词组都会成为语法成分,也不是所有的虚词都会成为粘附成分(clitics)并成为词缀。词或词组从有虚实两义到完全虚化,或从虚词到词缀,除了语法化规律起作用外,还有形态发展的需要。

从语法化的语音表现看,不同语音层面上的语法语素向弱化方向移动。原本成音节的形态成分可能弱化成为单一的辅音或弱化的元音,进一步则可能发生粘附成分完全脱落,原有的形态特征转移到词根上,成为屈折形式。如汉语的构词成分“儿”在北京话中

① 石定栩《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② 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F29.

③ 同上, p. 7. 原文为“content item > grammatical word > clitics > inflectional affix”。

④ 同上, p. 1.

⑤ 同上, p. F30—F31.

已演变为儿化韵的成分。汉语北京话儿化音,从历时看有不同的来历,来自“儿”(花儿、鸟儿)、“日”(今日→今儿,明日→明儿)、“里”(这里→这儿,那里→那儿)、“了”(吃了→吃儿)。不同性质的构词语素归并到了一起。^①

试比较藏语和缅甸语的自动词“断”(棍子断)和它的使动形式“弄断”:

	藏文	藏语拉萨话	藏语夏河话	缅文	仰光话
断	tɕhag	tɕha ⁵²	tɕhaɣ	kjo ³	tɕo ⁵⁵
弄断	gtɕog	tɕa ⁵²	hteax	khjo ³	tɕho ⁵⁵

古藏语以 g 为使动前缀,现代藏语拉萨话中这个词的使动前缀 g 已完全丢失,原来词根的声母由于前缀的影响从送气变成不送气还保留着。古缅甸语用不送气和送气的声母表示自动和使动的对立,更早时可能也像古藏语那样用前缀来表示。

在词语语法化的斜坡上,形态的创新是层出不穷的,并且从这个语音层次转移到另一个语音层次。一种语言中不同语法范畴的形态形式可能不同,同一范畴中的不同形态形式可互为补充。从词法的角度看,词干与粘着语素结合的构词方式占优势时,是粘着型语言。不同的语素相融合的构词方式(以元音、辅音或音节的声调的变化来构词)占优势的语言是屈折型语言。分析型语言通常较少粘着和屈折方式的形态手段。

(2) 形态和形态的历史演变

形态学(morphology)通常理解为是语法学领域的一部分,是研究词法的理论。马修斯(P. H. Matthews)说:“形态学是语法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词的内部结构。”^②

语言的形态可简单地划分为“分析”、“粘着”和“屈折”三个类型。^③或加上“多式综合”有 4 个类型。现代汉语是分析型语言,不同的方言和普通话中仍使用粘着和屈折方式的手段。如名词用前、后缀,声调的变化可用来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等等。^④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形态形式共存于一种语言中,较少有单一形态形式的语言。

有关形态历史演变最重要的理论还是新语法学派的“类推”理论,前面已经介绍过。再就是语法化学的“重新分析”理论。

词法是构词的规则,句法是构成句子的规则。从共时描写的角度看,词组和短语的构成往往与词法和句法两个范畴有关。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着重讨论了复合词的结构。他说:“在词和短语之间可以分成很多层次,却往往不能定出严格的区别。”^⑤短语

① 李思敬《汉语“儿”[ɛr]音史研究》第 92—106 页,商务印书馆,1994 年。

② P. H. Matthews,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年。

③ 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 language),这样就有 4 种类型。多式综合语又称为多重综合语,如楚克奇语,一个词就是一句话,这个词中包含着不同的词汇语素和语法语素。而爱斯基摩语这样的多式综合语的一个词除了一个词汇语素外,其余的是语法语素。在一般的形态类型的讨论中多式综合型被排除在外,如爱斯基摩语,或可视其为粘着语的极端形式。

④ 如北京话里,读作轻声的“子”“头”等。中古的后缀“儿”,北京话中成为元音形式的后附成分,杭州话中成为-l,温州话中读作-ŋ。“中间”的“中”读平声,“中奖”的“中”读去声等等。

⑤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283 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

结构的分析通常被分配到词法和句法的范畴中进行讨论。从历时的角度看,词法范畴的表达可成为句法范畴的表达,词法范畴的形式可转换为句法范畴的形式。“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是一句颇有道理的话。

一些语言在语法化的斜坡上停留着更多的粘着形态语素,成为粘着型的语言。当较多的粘着形态语素走到斜坡的末端构成屈折形式时,这种语言被称为屈折型。形态类型的历史演变中把一些词法范畴的表达转移到句法领域,就意味着词法变得更简单,在语法化的斜坡上停留着更多句法语素,成为分析型的语言。

古印欧语的屈折形态在后世不同的语言中都处于瓦解的状态。如古日耳曼语时代日耳曼语的形态已开始逐渐瓦解,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越来越失去屈折语的特点,分析型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① 有时语言从一种形态类型到另一种形态类型的演变往往要二三十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而英语在十几个世纪中成为有较多分析方式构词的语言,其过程主要是分析形式在一些语法范畴中不断地代替旧的形式。而德语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中古以来汉语中双音节词常用来代替原来的单音节词。名词构词中“儿”“子”“头”这样的后缀和“老”“阿”这样的前缀使用得越来越多,成为构词的重要手段。词类的语法化过程通常是某些实词先是兼有语法成分的功能,然后逐渐成为完全的语法成分。标记进行时的“着”,其来历与读作入声的“著衣”的“著”有关系。大约汉末时已有虚化的迹象,到了唐代带“著”的动词可以带宾语,如“日暮拂云堆下过,马前逢著射雕人”(杜牧诗)。^② 词类语法化的过程就是新的形态成分形成的过程。进行时标记“着”的出现是汉语句法演变的需要。

“打”晚唐时用于表示人的动作行为的动词前,构成动词的双音形式。“打”,《广韵》:“击也。”现代汉语中起到前缀的作用,从“打人”“打铁”到“打票”“打字”“打包”“打伞”“打赌”“打嗝”“打尖”“打光棍”“打哑谜”“打摆子”“打哈哈”等等。而且“打”也可加在名词前派生出与这个名词有关的动词。在这些由“打”构成的词中,它与后一个名词性语素之间有时还可以插入数词或量词等构成动宾结构。“打”在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还没有完全虚化。

9. 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

(1) 不同角度的类型学

1818年奥古斯特·谢勒戈尔(August Schlegel)提出了类型学的分类,类型学分类此后在19世纪的欧洲流行。后来洪堡特把语言区分为孤立(isolating)、粘着(agglutinative)和屈折(inflectional)三个类型。孤立语又叫做分析语(analytic language)和词根语(root language)。这是从形态角度分类的类型学。

根据宾格情况,另一种分类是把语言区分为宾格语言和作格语言。宾格类型的语言有主格和宾格的不同。作格类型的语言没有主格和宾格的区分,及物动词的主语另用一

^① 以斯瓦迪什200核心词词项对应的现代英语词为统计对象,单音节及单音节词根的词占近九成。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304—310页,中华书局,1980年。

个形式表示,叫做作格。^①

句法语序类型的研究是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1963年开创的。他从SOV、SVO等基本语序出发,寻找语序方面的普遍规律。世界上的语言以SOV、SVO和VSO基本语序为常见,VOS、OSV和OVS的语序极少见。其普遍情况为:

- I. 带名词性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中,优势语序几乎总是主语处于宾语前。
- II. 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所有格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所有格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
- III. 优势语序为VSO的语言,总是使用前置词。
- IV. 以SOV为正常语序的语言,使用后置词。
- V. 如果一种语言以SOV为优势语序,并且所有格置于中心名词之后,那么形容词也处于名词之后。

他提出的这一类倾向性的语序情况有45种之多。^②

语言也可以区分为“主语—谓语句”(subject-predicate)和“主题—述题句”(topic-comment)两种不同结构的类型,这是不同于语序类型的分析法。有的语言以第一种形式为主,有的语言以第二种形式为主。于是有四种类型的语言:

- I. 注重主语的语言:印欧语、尼日尔—刚果语等。
- II. 注重主题的语言:汉语、拉祜语、傈僳语等。
- III. 主语和主题都注重的语言:日语、朝鲜语等。
- IV. 主语和主题都不注重的语言:他加洛语、伊洛干诺语等。

注重主语的语言中被动结构很普遍,注重主题的语言中被动结构看来是边缘结构。^③

注重主题的语言中,主语与动词的语法关系往往以一定的标记来表示;在主题—述题型的句子中,主题的选择通常不取决于动词。

汉语“我喝茶。”是主语—谓语句。“茶,我喝。”是主题—述题句。“茶”后面的停顿是主题的标记。汉语是主题优先(或称话题优先)的语言,以下是一些主题—述题句:

- “一条板凳坐四个人。”
- “一件衣服穿十年。”
- “台上坐着主席团。”
- “那边来了个人。”

汉语的主语—谓语句以SVO为基本语序。主题—述题句句子中主题是句子的基本成分。于是,除S、V、O外,还有T(话题、主题)可作为句子的基本成分。^④

从语音角度看,语言还可以区分为多种类型。19世纪初的学者就注意到可以把语言区分为单音节语言和多音节语言。如阿德隆(Adelung)1806年把语言区分为单音节和

① 伯纳德·科姆里《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第13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② Joseph H. Greenberg《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陆丙甫、陆致极译,《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2期。

③ Charles N. Li, Sandra A. Thompson,《主语与主题: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李谷城摘译,《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2期。

④ 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第3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多音节两个类型,在他的分类中汉语第一次被归入单音节的语言。^① 汉语与土耳其语比较,是单音节有音节声调的语言。他认为汉语没有屈折形式,而土耳其语的名词有六个格。

语言的语音类型方面受关注的是元音的结构。如一些阿拉伯语是三元音结构的语言,其元音结构为:

i u
 a

而古拉丁语是五元音结构的语言,其短元音的结构为:

i u
 e o
 a

古藏语也是五元音结构的语言,没有长短的对立。

意大利语是七元音结构的语言,其元音结构为:

i u
 e o
 ε ɔ
 a

而另外一些语言的元音构成方形的结构,如通卡瓦语(Tonkawa):

i o
 e a

现代英语 9 个短元音构成的方形结构为: ^②

i ɪ u
e ə o
æ a ɔ

词内部元音的和谐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元音和谐类型。^③

辅音对立构成的类型也具有多样性,就塞音而言,有的语言没有清音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有的语言没有清浊的对立。现代汉语北方方言的塞音有清音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没有清浊的对立,构成的塞音结构为:

①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Fetter Lane, 1992, p. 96.

② 同上, pp. 98 - 99.

③ 参见李兵《元音和谐的类型学问题》,《民族语文》2001 年第 2 期。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归纳 9 种类型的元音和谐类型:腭和谐,舌根位置和谐,舌位高度和谐,唇状和谐,鼻化和谐,咽化和谐,松紧和谐,卷舌和谐,完全和谐。

p	t	k
ph	th	kh

而现代汉语吴方言的塞音结构为：

p	t	k
ph	th	kh
pʰ	tʰ	kʰ

(2) 语言类型的历史演变

语言的词法范畴的变化与句法范畴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古藏语的动词以屈折形态表示过去时。如“吃”现在时 za, 过去式 bzas; “站”现在时 laŋ, 过去式 laŋs 等。^① 过去时用动词的过去式来表示, 而现代藏语拉萨话的已行时以动词的过去式和后随的后加成分结合辅助动词来表示, 方过时用动词的过去式或现在时的形式和后随的后加成分结合辅助动词来表示。如: ^②

ŋa ¹²	kha ⁵⁴	laʔ ¹²	sa ¹²	tʂo ¹⁴	jɿ ¹⁴	我刚吃过饭。
我	饭	吃	(表方过时成分)			

古印欧语的屈折形态到了古英语时代已较为简化, 但不论强式动词(不规则动词)还是弱式动词(规则动词), 仍由它们的变位来表示人称、数、时态和语气等的形态变化。^③ 到了中古时期, 英语逐渐失去它的屈折形态, 时态通常由规则动词(除了残存的不规则动词)和属于句法范畴的助动词相结合来表示。

随着语言主要语序类型的变化, 同时可能发生连带的语序类型的变化。如英语原本是 SOV 为正常语序的语言, 后来逐渐演变为 SVO 型的语言, 连带着名词的修饰语一律前置于所修饰的名词。

我们注意到古今汉语都有较为固定的语序。古汉语中某些情况下宾语前置, 如代词作为宾语前置, 否定句中宾语不是代词亦可前置。甲骨文中既有“商受年”语序, 又有“受年商”这样的句子。

现代汉语通常以“数量名”结构表示数量。殷商卜辞直接用数词与名词结合表示名词的数量。数词可置于名词前, 也可置于名词之后。如:

“甲戌卜贞翌乙□于祖乙三牛。”(陈 30)

“壬申卜贞王田□往来亡灾隻白鹿一狐二。”(前 2. 29. 3)^④

甲骨文献中少数情况下还出现“羌百羌”“狐十又五狐”这样的形式。西周和春秋时代汉语量词和数词构成的结构放在被修饰的名词后面。如: “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多友鼎)“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魏风·伐檀》)这种结构与度量衡等单

① 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 年第 3 期。

② 金鹏《藏语简志》第 49—50 页, 民族出版社, 1983 年。

③ 秦秀白《英语简史》第 39 页,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年。

④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78、1080 页,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 年。

位词构成的名数量结构相同。不过上古时期最为常见的仍是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结构。

春秋以后汉语的数量结构逐渐可以前置于名词,到了中古以后数量名词序成为汉语的正常语序。

从商周时代的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诸方言,汉语始终表现出主题优先的特点。

(3) 语言类型演变的研究

“形态学”这个词 19 世纪 60 年代借自生物学。当时的学者把语言的历史演变类比如生物的演变,认为语言的形式是从简单的形式向复杂的形式演变。施莱赫尔认为语言的一切高级形式都来自低级形式。屈折形式来自结合形式,结合形式来自孤立形式。印欧语母语已获得最高级的屈折形式,史前时期已经历了一切形态类型。^① 萨丕尔把古藏语作为“综合(轻度)”的语言,现代藏语归入分析型。^② 他说:“语言处在经常改变的过程中,但是有理由假定它们会把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保持得最长久。如果我们举几大组在发生学关系上有关系的语言(或者说,用文献或比较方法证明是同源的语言),从这一组看到那一组,或者追溯它们的发展道路,我们不时会遇到逐渐的、形态类型上的改变。这也无足为奇,因为一种语言没有理由要永远保持它原来的形式。”^③

在不同类型亲属语的比较研究中对它们类型分歧的解释是必要的,于是有必要对它们祖语的语音、形态和句法的类型进行构拟,以求得合理的解释。语言不同类型方面的表现有一定的连带关系。如元音系统较为简单的语言通常它们的辅音系统要较为复杂,或有复辅音的形式以增加音节的表现能力。而元音和辅音都比较简单的语言,如日语,词的音节数较多,弥补了音节较为简单的不足。而单音节词根为主的语言,如中古时代的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在简化音节某些声母和韵母特征的同时,发展了音节的声调。

思考题:

- (1) 历史语言学的任务是什么?
- (2) 新语法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 (3) 为什么要区分语言和言语?
- (4) 语言年代学如何统计亲属语的分化年代?
- (5) 举例说明语言的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演变。
- (6) 土耳其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是典型的粘着型语言,名词有六个格,试比较土耳其语的一组词:

	手	村子	女人	结尾
单 数 主 格	el	köy	kadın	son
宾 格	eli	köyü	kadını	sonu
所有格	elin	köyün	kadının	sonun
与 格	ele	köye	kadına	sona

①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36—37 页。

② 萨丕尔《语言论》第 130—131 页。

③ 同上,第 127 页。

	方位格	elde	köyde	kadında	sonda
	离 格	elden	köyden	kadından	sondan
复 数	主 格	eller	köyler	kadınlar	sonlar
	宾 格	elleri	köyleri	kadınları	sonları
	所有格	ellerin	köylerin	kadınların	sonların
	与 格	elllere	köylere	kadınlara	sonlara
	方位格	ellerde	köylerde	kadınlarda	sonlarda
	离 格	ellerden	köylerden	kadınlardan	sonlardan

土耳其语和分布在中国境内的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一样,词内部元音和谐。其特点是词中的前元音和后元音分别构成和谐的形式,中性元音可以在前元音和后元音的和谐中出现。其元音结构为:

i	ü	ı	u
e	ö	a	o

请对上面土耳其语的词表进行研究,指出表示宾格、所有格、与格、方位格、离格的单数和复数的后缀。

参考书目:

-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史》,黄振华译,科学出版社,1960年。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高名凯译,科学出版社,1957年。
-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97年。
-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
-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年。
- Joseph H. Greenberg《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陆丙甫、陆致极译,《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2期。
- Theodora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aul. J. Hopper,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语法化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Fetter Lane, 199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 P. H. Matthews,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第二章 方言和亲属语

以历史语言学的观点看,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方言,实际上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亲属语,亲属语和方言是一码事。语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中通常把一个民族所使用的有共同来源的土语群看作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如汉语闽方言与汉语其他诸方言的差别很大,仍视其为汉语的方言。即使是闽方言、吴方言内部差别较大的土语间不能通话,也不称它们为不同的语言。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支、彝语支中,一些不同民族的语言差别较小能通话,却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言。无论是亲属语还是方言都是历史上共同祖语或祖方言后代的语言。无论差别多大的亲属语或方言,追根溯源,它们都曾是相近的方言。

一、社团方言和地域方言

1. 社团方言

方言实际上是由许多土语和较小的社团方言组成的。通常,方言的差别可以用它们的地理分布来区分,这是地域性的方言。一种地方话中往往有新、老两派方言的存在,或者一个地方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有不同的方言,它们是不同的社团方言。

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在复杂的言语社团里,主要的言语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书面标准语。用于最正式的交谈和写作中(例如: I have none);

(2) 口头标准语。这是特权阶层的语言(例如: I haven't any 或者 I haven't got any——在英国,只有用南部‘公学’的语音和语调来说才行);

(3) 地方标准语。在美国可能和上述第(2)种话没有区别,是‘中产’阶层的人说的,和(2)十分接近,但各地区略有出入(例如: I haven't any 或者 I haven't got any;在英国是用跟‘公学’标准语不同的语音和语调说的);

(4) 次标准语。跟(1)、(2)、(3)有明显的不同,在欧洲各国是‘中下’阶层的人说,在美国除了说上述(2)、(3)两种人以外几乎都说这种话,因地区不同,不过没有那种十分突出的地区差别(例如: I ain't got none);

(5) 地区方言。这是社会上最没有地位的人说的。在美国很少见;在瑞士,其他阶层也用它作家庭的语言;几乎各个乡村都不一样;它的种类很复杂,往往彼此都不能理解,说(2)、(3)、(4)三种的人更听不懂它(例如: a hae none)。”^①

但“书面标准语”没有自己独立的语音,它的语音取决于使用者。书面语不是语言,它没有自己的语音,它是一种语言的记录。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方言新、老派的不同是更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56—57页。

重要的分别。不同的社团方言只要是有着不同的语音系统,它们就是不同的语言,没有理由视之为变体或言语。

北京本地人的普通话在语音上和北京土话最接近,带着一套复杂的儿化韵,许多复音词有轻声。北京知识界的普通话儿化韵的词不那么多,也就没有那么多儿化韵。带儿化韵的普通话是北京本地人和久住北京人的普通话。不带儿化韵的普通话通行于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即使在带儿化韵的北京话中还可以再加区分。

当语言包含有不同的方言时它就是这些方言的集合,当方言包含有不同的土语时它就是这些土语的集合,当一种土语包含有不同的社团方言时它就是这些社团方言的集合。单一的方言、土语或它的社团方言是一些“个人方言”的集合。严格地说,单一的方言土语,或社团方言中的“个人方言”有着一致的语音和语法形态的系统。“个人方言”之间“词典”的不同与语音和语法系统无关。“个人方言”中的一切个人的言语行为必须排除在语言之外。

社团方言的系统是最近一次历史演变的结果,直到下一次的历史演变不能遍及它们整体的时候才能再做区分。新派的语音变化应追溯他们幼年和少年时期习得的他们的母语。那个母语环境在古代可能是氏族或部落,后来是村庄或城邑,今天除了村庄外可能是街区及学校。现代社会中,家庭以外的环境对新一代的语言的影响比家庭更大。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和《语言问题》中都提到了北京话儿化韵有老派和新派的不同。李思敬先生发现有老派、半老派和新派的区别。^①北京城区的老派方言、半老派方言及新派方言是北京本地话不同的社团方言。不同年龄层次的新老派方言的并存为日后方言的替换做好了准备。

外来的移民群体在学习新的语言或方言时,由于原有的口音,他们讲的本地话与本地人讲的本地话往往是不同的。

20世纪60年代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曾对纽约曼哈顿本地口音居民的语音进行调查,了解oh读法的情况。^②car、four、board这样的词曼哈顿本地的一些居民的口音中带-r,另一些不带-r,或用-h代替-r。调查表明是否带-r口音与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他把这些人分为两个年龄段:40岁以上的和18—39岁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为四等:低阶层,工人,中等偏低阶层(lower middle class),中高阶层(upper middle class)。在40岁以上人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不带-r;中高阶层的只有10%的人带-r。18—39岁的人群中,中高阶层的100%带-r;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阶层和中等偏低的,工人中只有百分之几的带。用-h代替-r主要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年龄的因素不很明显,60岁以上的更多一些。拉波夫把不同社团方言的语音系统称之为一个语音系统中的变体单位(variable units)。^③

布龙菲尔德和拉波夫把社团方言视为语言的变体,又承认“变体”有自己的特点,还

① 李思敬《汉语“儿”[ər]音史研究》第125—13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 《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第63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同上,第64、65页。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207, p. 200.

不如承认它们就是不同的方言。索绪尔的方言理论不仅适用于地域方言,亦适用于社团方言,即创新可在一定的社团范围内完成,形成新的社团方言而有别于原有的社团方言。因为严格说,我们不能用一种变体来代表另一种变体。

2. 地域方言

同一语言分处两地经历了各自的演变则成为不同的方言。索绪尔解释道:“这些差别是什么造成的呢?如果认为那只是空间造成的,那就受了错觉的欺骗。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殖民者在离开G在G'登陆的第二天所说的语言跟前一天晚上所说的完全一样。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空间那么具体。但是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①因此方言和亲属语的发生学分类只能建立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而不能以别的什么为依据。

汉语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每一种大方言又是若干个方言的集合。北方方言又由若干种被称为官话的小方言组成。如北京话是北方方言北方官话中的一种地方话。北京市区与郊区的话不一样,早年间不同城区的地方话也往往有所不同。

苗语有黔东南、湘西和川黔滇三大方言。黔东南方言有南、北两种土语,湘西方言有东、西两种土语。川黔滇方言较为复杂,是川黔滇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贵阳次方言、惠水次方言、麻山次方言、罗泊河次方言、重安次方言等7种次方言的集合。其中贵阳次方言又是北部、西北、西南、中南等4种土语的集合。

要描写一种像汉语或苗语这样的语言中的一种方言或地方话,必须指出是哪一個地方的。在乡下,相邻的村子或山寨的土语可能差别很大,即使是稍有差别也应加以区别。

同一地区的方言可能有新、老派的不同,也可能有外来移民和本地人语音上的差别,调查中不可不察。

二、方言的演变

1. 方言的传播和演变的趋向

语言从共时的角度说是封闭的,从历时的角度说是开放的。它们是自主的系统,又受其他的语言(或方言)的影响。

(1) 方言传播

布龙菲尔德解释了波浪理论并评论说:“比较法预想语支连续地明确分裂,但是反复无常的局部近似明明告诉我们后起的变化散布开来,越过早期变化遗留下来的同语线;邻近语言间的相似也许由于中间地带方言的消失(波浪理论);某些方面已经分化的几个语言也会产生相似的变化。”^②

方言地理学的同语线又叫作“同言线”“等语线”,指语言地图上划出的用来表示在发音、语法或词汇方面有相同特点的语言线。由于相邻的方言在用词、词的读法和语法成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77页。

②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400—401页。

分方面常常互相借用,在方言地图上很难找到用来表示读音、语法或词汇的同语线是一致的,19世纪方言地理学派的大规模调查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在人群迁移较少的地区,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相邻的村子村民的口音也可能略有不同。如果依据他们的用词来判断,那么不同的同语线很难说明什么。关键在于语音系统。每一种土语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存在于一种土语或一种社团方言中的语音系统只能按照自己的结构演变。

方言地理学学派不了解方言之间的接触关系,甚至否定了土语的存在,认为可以用对词的历史的研究来代替方言的研究。^① 由于系统研究比较复杂,比较一些词的异同较为容易,故简单的研究和判断直到今天仍为常见。

方言的传播与人群的迁移有密切关系,而语言分化却不是人群的迁移造成的。索绪尔解释说:“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要么,某一创新的区域遍及整个地区,不造成任何方言的差别(这种情况最少);要么,像通常所看到的那样,变化只影响到一部分地区,每个方言事实都有它的特殊区域:二者必居其一。”^②创新是新方言的标志。产生方言的创新是那些引起方言结构性变化的要素的出现,而不是一两个词等的变化。

早期的印欧语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是设想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科勒特人是“一群群从同一蜂窝里飞出来的蜜蜂;这些土民离乡背井,把共同印欧语带到了各个不同的地区”。“波浪理论使语言学家大开眼界。他们明白了就地分裂就足以解释印欧语系语言的相互关系,不一定要承认各民族已经离开各自的原地。”^③

于是我们面对两种情况。一种是分隔两地的方言或亲属语,过去的共同创新可以用来说明它们的远近关系。“连接地区的各种语言关系却完全不是这样。它们的共同特征不一定比使它们变了样的特征更古老;事实上,从任何地点出发的创新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推广到各地,甚至席卷整个地区。”^④

就汉语北方方言,吴、粤、赣和客家诸方言看,它们与《切韵》声韵结构类似,都经历了重唇变轻唇的历史($p > f$),当完成于唐末。如果我们说 $p > f$ 的创新是传播的结果,应该说明它的传播以合口三等的存在为条件,或者说是古方言诱发性的共同演变。

隋唐时代有的方言鱼虞有别,有的鱼虞合流。现代北方方言鱼虞合流,承自隋代的一种北方方言。现代吴语的北部方言只有鱼虞有别的残存,南部的温州方言鱼虞有别,与《切韵》依据的方言有承传关系。温州方言古轻唇音应是中古时期独立演变的结果。而中古时期的闽方言未能接受重唇变轻唇的演变也说明这一传播是有条件的。

(2) 方言演变的趋向

语言和方言的演变受自身结构的制约,有一定的演变的趋向。

① 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190.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228—234页。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79—280页。

③ 同上,第292页。

④ 同上,第295页。

汉藏语系众多的亲属语及方言分别经历了类似的声母简化、声调产生、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清化等等的演变。汉语北方方言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来自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古苗瑶语、侗台语诸支的古方言、彝缅语的古方言都曾四个声调,它们都经历了四个声调的历史时期。但亲属语及方言的演变也往往是不平衡的,使得它们的系统一个时期内可能处在不同的演变阶段。

萨丕尔把语言的历史演变称为“沿流”。他说:“我们环顾一下流行的语言习惯,大概不会想到我们的语言有一个‘坡度’,下几个世纪的变化可以说正在今天的暗流里预先成形,这些变化一旦完成,就能看出它们不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继续。”^①

方言有相似的历史演变,因为它们开始时有相似的结构,在共同的语言演变规律的作用下可能有相近的演变阶段和相近的演变结果。

2. 方言的底层

粤方言地区的普通话往往缺少舌尖塞擦音,吴方言包围中的普通话一般没有舌尖后塞擦音。北京话的轻声体现在北京的普通话中,而在外地的普通话中被忽视。带有外埠色彩的普通话在一定范围内,譬如说在外地的机关和学校中可能成为一种特色。如果标准的普通话不能完全纠正这样的非标准普通话,带有本地特征的新方言可能成为当地的权威方言,就发生如同通俗拉丁语分化为法语、西班牙语这样的事情。

据郑张尚芳先生调查,浙江丽水的缙云、青田、云和、庆元,温州的永嘉、文成,台州仙居,金华永康等地帮端母字的声母分别读作带先喉塞音的浊塞音声母 ʔb- 和 ʔd- 。^②上海市区的老派,松江、奉贤、金山、嘉定等地的方言也是如此。永康、缙云等地 ʔb- 、 ʔd- 为声母的鼻音尾字 ʔb- 、 ʔd- 又分别同化读作 m- 和 n- 。^③ 汉语吴、闽、粤等方言确有一种非汉语的“本地底子”——底层语影响的遗存。这些方言中都有像侗台语那样把“先吃”、“先走”说成“吃先”和“走先”。温州话管咸菜叫“菜咸”,腌生鱼叫“鱼生”,腌萝卜叫“菜头生”等等。吴方言土语中一些颇有特色的读音通常认为与侗台语底层有关。

侗台语中的 ʔb- 、 ʔd- 分布于不同的支系中,分别来自侗台语祖方言的 $^*\text{ʔb-}$ 和 $^*\text{ʔd-}$ 。由于春秋以后汉语方言在长江以南的传播,原侗台语地区的侗台人转用汉语方言,便把他们的口音带到他们所说的汉语中来。

侗台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底层先是保存在古汉语的方言中,后来经历了中古南方汉语方言的变迁。两广地区的汉语方言中较晚的侗台语底层与之相似。

桥本万太郎先生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讨论过汉语从南到北主要方言中不同音节数量逐渐减少,声调数减少,而北方方言复音词较多。^④ 北方方言声、韵、调简

① 萨丕尔《语言论》第 139 页。

② 2002 年我们到永嘉调查,发现当地人端母字读作带先喉塞的 ʔd- 。

③ 郑张尚芳《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紧喉浊塞音声母 ʔbʔd 初探》,《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年。

④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第 104—11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化,复音词增加。汉语南、北方言的这些差别显然与底层有关。结构的演变是语言内部的事,但在外部的影响下,系统结构的某些支撑点的变化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

3. 文白异读

文白异读研究的是,表示某个意义的汉字在方言中可以有两种或更多种的读法,我们称之为文白异读。传统上一个字的文白异读的区分是区分口语和读书音的不同,着重区分方言中来自权威方言的所谓的读书音,注重区分字音。

(1) 文白异读的形成

文读通常来自本地方言以外的权威方言。现代汉语的标准音是北京话,各地的地方话在表达某种新概念时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模仿北京话的读法来说;另外是根据方言中字的读书音来说,这种办法较为常见;再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创一种说法。文白异读研究的是读书音,即文读,与本地话所对应汉字读法的比较。方言中的文读来自当地的读书音。

汉语历来有书面语与口语的不同。书面语与汉字配合使用,口语则各行其是。书面语的词(文字上表达的词)可以进入口语流行起来。来自书面语和地方性权威方言的各种说法总是不断地把它们说法传播给地方话。地方话中用文读表达的词可能把原有的词排挤掉,或两者意义有分工而并存。

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文读源头可能不同。如今天边远地区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以北京的知识界和正式场合的北京话为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于是不同地区文读的源头也会有所不同。其他地区性的权威方言也往往对偏僻地区方言的用词和读音有影响,成为文读的来源。

权威方言的变化和更替,使得方言中往往有多个历史层次和不同来历的文读,再加上早时的方言固有词便构成文白异读的复杂层次。

白读也有不同的层次。如闽方言和温州话中有几个歌韵和戈韵的字读作 ai 韵。“饿”,温州话 ŋai⁶，“蛾”mai²。“蛾”读 mai² 是很令人奇怪的,可能原本有一个 *ma- 前缀,使 ŋ 变成 m-。古今方言的口语中有两个因素对词的选择在起作用。一是语义的表达:为了表达一定的语义(概念、所指)需要一定读法的词,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二是模仿:模仿外部语言或方言的说法。模仿是文读得以推广的原因,表达的需要是底层说法得以保存的原因。一些文读词的创造与认字的读书人有关,他们通常借用权威方言的说法。

汉语南方方言文白异读的复杂情况只有仔细地分析才能弄清楚。

(2) 北京话中的文白异读

北京话与河北话有更密切的关系,它们的文读主要来自唐代以后和清以前权威方言的读法。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字(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分别用右上角上标的数字 1、2、3、5 表示)如^①:

^① 李荣《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57 年第 4 期。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嫩	nuən ⁵	nən ⁵	色	sɿ ⁵	sai ³
乱	luən ⁵	lan ⁵	脉	mo ⁵	mai ⁵
谁	ʂuei ²	ʂei ²	贼	tsɿ ²	tsei ²
脓	nuŋ ²	nəŋ ²	北	po ⁵	pei ³
更	kəŋ ¹	tɕiŋ ¹	给	tɕi ³	kei ³
耕	kəŋ ¹	tɕiŋ ¹	薄	po ²	pau ²
隔	kɿ ²	tɕie ¹	落	luo ⁵	lau ⁵
熟	ʂu ²	ʂou ²	六	lu ⁵	liou ⁵

我们把这些读音放到中古的声、韵、调的类中去考察会得到一些认识。

如“北”有 po⁵ 和 pei³ 两读,前者为文读,后者为白读。“北”是德韵字,应与“德”有相同的韵和调。这一韵的字现代北京话有多种读法,“得”“德”“特”“克”等读 ɿ 韵,“北”“贼”“黑”等读 ei 韵,与其他各地北方方言的读法形成对应关系。而读作 o 韵(实际上是 uo)的“北”没有这种对应关系,是外来的文读。“贼”的 ɿ 韵也是文读。这一方面徐通锵先生已有说明,“文白异读的分布格局的基本特点是:黄河以北(北京、太原)和长江以南(苏州以下各方言点)有文白异读,而黄河、长江之间的广大中原地区没有文白异读”,“文读和白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文读系统德与陌(麦)合流,而白读系统德与陌(麦)分立;2. 德韵的主元音高,陌(麦)韵的主元音低。没有文白异读的方言,德、陌(麦)已经合流,所以它们对应于其他方言的文读系统。”^①

王福堂先生认为北京话里的一些文读来自明代的南京话。^②

我们注意到北京话清入声字的文白读的声调不同。如入声字“薄”po²/pau²,“落”luo⁵/lau⁵的声母是全浊和次浊的,文读和白读分别都是阳上和去声。^③而“北”po⁵/pei³、“客”khy⁵/tɕhie³、“塞”sɿ⁵/sai¹的声母分别是全清和次清的,文读和白读的声调不同。

入声字北京话的原有读法是这样的:全浊的入声字读阳平,次浊的读去声。全清和次清有的读阴平,有的读上声。后来的文读中清声母的读阳平和去声。^④与14世纪《中原音韵》不同的是它所依据的方言清入声字归上声。

“我”,北京话白读 uo³,原本还有 ɿ³这样的文读说法。ɿ³这样的说法大约在20世纪初还分布于北京及郊区的密云、昌平等地。^⑤北京话中“饿”读 ɿ⁵,而河北固安等地“饿”和“我”都读 uo 韵。我们再来看中古的歌韵字,声母属见匣组的“歌”“俄”“河”“何”等都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385—387页。

② 王福堂《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

③ 汉语传统的音韵学将声母分为“全清”、“次清”、“全浊”和“次浊”四类。“全清”指中古不送气的塞、擦、塞擦音声母,“次清”指送气的清音,“全浊”指浊的塞、擦、塞擦音声母,“次浊”即鼻音和边音。

④ 参见平山久雄《北京文言音基础方言里入声的情况》,《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⑤ 陈刚《北京话里的“我”及其变体》,《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

读 γ 韵,端精组的读 uo 韵。我们推测北京等地近代歌韵的元音原本是 $*o$,因声母不同而分化。更早的河北古方言中 $*\eta$ 的疑母后 $*o > *u\gamma$ 等,这种说法到了北京话里与戈韵的读法一样,都成为 uo 。北京和河北歌韵字白读的一致表明它们应有共同的来历。^①

(3) 文读和白读的层次

北京话德韵字“北”文读为 o 韵,与陌韵字“迫”“帛”等合流,是比德韵读作 γ 的文读更早的文读。

温州话中“日”字或在不同的词中有 ne^8 、 ηai^8 、 zai^8 三种读法,“人”字或在不同的词中可分别读作 $na\eta^2$ 、 $\eta a\eta^2$ 、 $za\eta^2$ 。日母词 n - 的读法来自它的古吴方言底层,日母词 η - 来自古温州方言, z - 是后来的文读。

温州话中“饿”说成 ηai^6 ,声母和声调都符合中古的地位,只是不像“歌”“河”字那样读 u 韵。歌韵字读 ai 韵,也见于闽方言,因为温州话有古吴方言的底层。古吴方言是今闽语的祖方言。上古的歌部原本是 $*-ar$ 韵,上古末期成为 $*-ai$,中古早期演变为 $*-a$,在古吴方言中歌韵字保留了 $*-ai$ 这样的读法,成为底层进入温州话。

“车”在温州话中可读作 $tshei^1$ 和 $tsho^1$,如农具“水车”、“风车”的“车”读作前者,是白读;“汽车”、“黄包车”的“车”读作后者,是文读,是近晚从北部的吴方言借来的读法。方言间的借用、亲属语间的借用,与非亲属语间的借用一样,同样是通过土语本身的音系来表达。无论有多少借词,都是用土语当时的音系来表达。除非是使用者愿意放弃他的作为母语的本地话,专用外来的方言。

文读中有一类读法与它们的源头不是完整的对应关系,一些词的声韵调从方言中某一类换成文读的类。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有意见认为,“文白异读的‘异’不是词的‘异’,而是词中的某一个音类的‘异’”。^② 这种改变与该方言的音位系统及声韵系统没有关系,只是改变词的读法。因为这些音位及声韵的类在方言中原本都是存在的。如“日”是质韵字。这一韵的字在温州话中除了帮组和来母读 i 韵,其他的都读作 $-ai$ 韵。“日”字的文读 zai^8 只是声母按文读的规矩而变,韵和声调都与白读 ηai^8 一样。 z - 这个声类在温州话里原本是禅母的读法。文读的这种改变实际上是读音的类推。

文读是相对于白读而言的,温州话“日”字读 ηai^8 ,相对于白读的 ne^8 而言是文读,实际上它是温州方言系统中的原有读法。

三、方言的分化史和亲属语的谱系关系

方言的分化史和亲属语谱系关系的确定是语言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语言发生学关系研究的基本工作。

① 关于北京话的来历有不同的意见。林焘先生在《北京官话区的划分》中把北京话和东北官话划到一起(《方言》1987年第3期),而贺巍所划分的东北官话不包括北京话(《方言》1986年第3期)。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比较接近,共同的特点是日疑母合流。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13页。

②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348页。

1. 方言的分化史

同一地区的不同社团方言通常是新老交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成为古今方言的差别。分处两地的相近方言随着一代又一代各自的新老派社团方言的交替，最终成为差别较大的地域方言。古方言的历史层次就是今天亲属语的谱系关系。

(1) 汉语方言的历史

夏代的汉语已无文献可考。商人主中原，汉语从东向西发展。周原出土的卜辞的字体与殷墟第三至第五期的相似。用词和句式亦与殷商的基本相同。西周时期的金文仍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写法相近。商周的交替可能伴随着权威方言的改变。如第一人称代词商用“余”，“我”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多指殷商。殷商甲骨文未见“吾”，西周“吾”为第一人称单数。

商时，汉语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地区。从先商时代算起，到了商周之交，汉语已有大约 10 个世纪的历史。周以后的 8 个世纪中汉语主要是向长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扩展，方言分歧越来越大。春秋时代，汉语已传播到长江中下游的楚、吴地区。战国的数百年中，燕国向北发展，秦拓蜀地，楚、越向南扩张，汉语方言的分歧越来越大。到了秦汉时期，汉语有秦晋、周洛、齐鲁、陈楚、吴越和北燕等 6 种主要的方言。扬雄在他的《方言》中以函谷关作为区分两侧方言的界线。

如：“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扬雄《方言》卷一）殷商甲骨文中用“逆”不用“迎”。“逆”“迎”读法的差异在韵尾上。

据扬雄《方言》中所记，自关往东有周洛、齐鲁、北燕方言，关西有秦晋方言，长江中下游分别有陈楚和吴越方言。如：

“揜、擢、拂、戎，拔也。自关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关而东江淮南楚之间或曰戎，东齐海岱之间曰揜。”（《方言》卷三）“揜”是原有的通行说法，秦汉之后以“拔”为通语。

“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自关西或曰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间谓之莽。”（《方言》卷三）此条这一部分说明野草之名方言有别，其后未引的部分是说明“苏”这种植物周郑、沅湘方言中另有叫法。“野草”叫做“草”起于关西。

其他如“矢”叫做“箭”，“舟”叫做“船”，“干”叫做“盾”，“晞”改做“晒”，“冢”叫做“坟”等等，后起者源于关西的方言。可见经历了秦和西汉的一段时间之后，汉语西部方言词大量进入通语。

西汉时期黄河流域自西往东方言的地理分布可简要表示为：

				齐
秦晋	函谷关西——	函谷关东	卫	鲁
			郑	宋
			楚	

汉时的楚方言，分楚和南楚。此时的楚方言与秦晋方言有较大差别，与江淮、吴扬的说法常一致。

到了东汉时期，长江以北地区的方言用词的差别渐缩小。据周振鹤、游汝杰研究，

《说文》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区域是‘楚’，共二十三处，这说明当时楚方言的差异可能是最明显的；其次是‘秦’十九次（不包括秦晋并提的五次）……再是‘齐’十六次，也是很突出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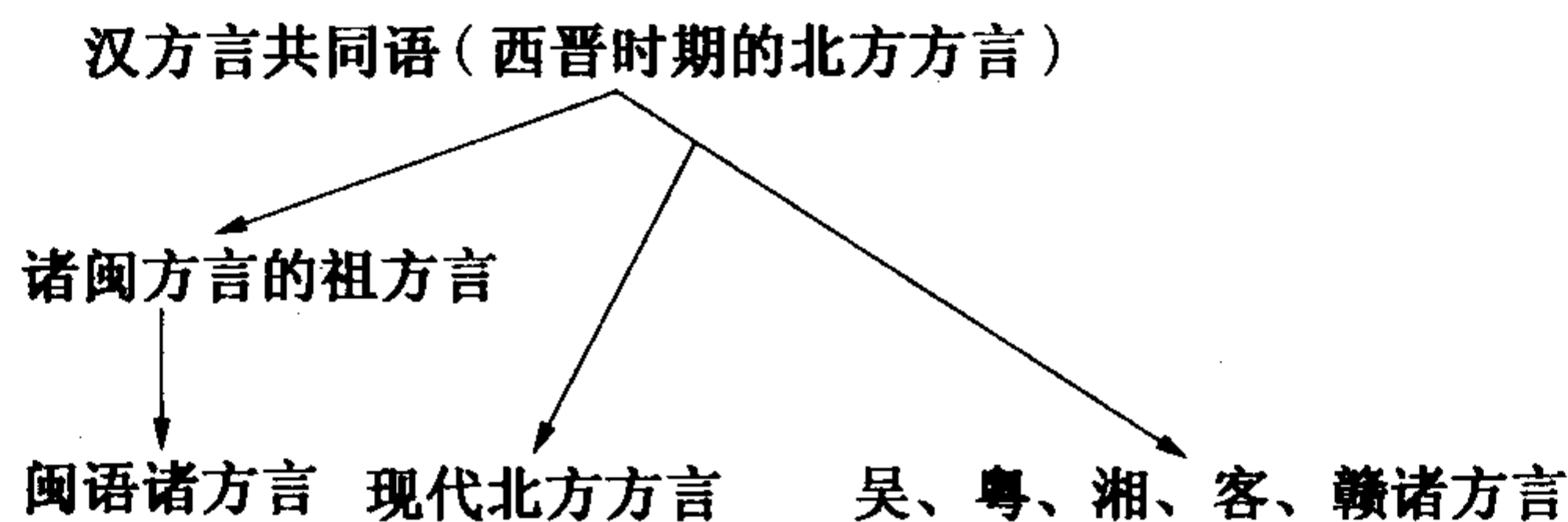
汉代末年及三国之时，北方有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北人大批南下分别建立蜀、吴地方政权。西晋之后又有东晋在淮河以南建立王朝，都建康。此时北人南迁，新的吴方言代替了汉时的吴方言。“兰陵郡和东莞郡本来都在今山东境内，后来因为居民迁居今江苏常州一带，于是在该地侨置南兰陵郡和南东莞郡。部分中原人民迁入福建，所以福州被改名为晋安，泉州被改名为晋江。”“甘肃和陕西北部的人们迁移至四川及陕西的汉中，四川境内的侨置县皆在金牛道（即南栈道）附近，所以金牛道应是陕甘人南下的通道。”^②

到了晋代，如从郭璞为扬雄《方言》所作的注中可以看出，以函谷关为界，东西两边汉语方言的差别已经比较小了。

隋时洛阳为东都。《切韵》作者陆法言评四方之音：“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京师（西安）西边的秦陇方言是非标准语。隋时的标准语应是洛阳话。

汉语历史上另一次最大的方言运动是中古早期北方方言覆盖了一些南方方言。造成今天的吴、湘、赣、客家、平话和粤诸方言的音系与《切韵》音系相当接近。吴方言内部的差别不是单纯的内部分化。一方面是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北边的方言波浪式地向南推进。汉语方言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运动是明清时代北方方言的南进，消灭了四川、贵州和云南境内原有的汉语方言。

今汉语方言的发生学关系如下图所示：



客、赣方言有密切的关系，吴、粤、湘、客、赣和北方方言的亲疏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东晋南渡，晋代的北方方言成为闽方言的祖方言。南北朝期间北方方言中一些声母进一步增生-j介音，成为后来出现轻唇和舌上音的条件。至唐早期汉语北方方言重唇中开始分化出轻唇（pj->f, bj->v, mj->ɱ），舌头音中分化出舌上音（tj->t, thj->th, dj->d, nj->ɳ）。而来自西晋北方方言的闽方言的祖方言（古吴方言）没有经历这样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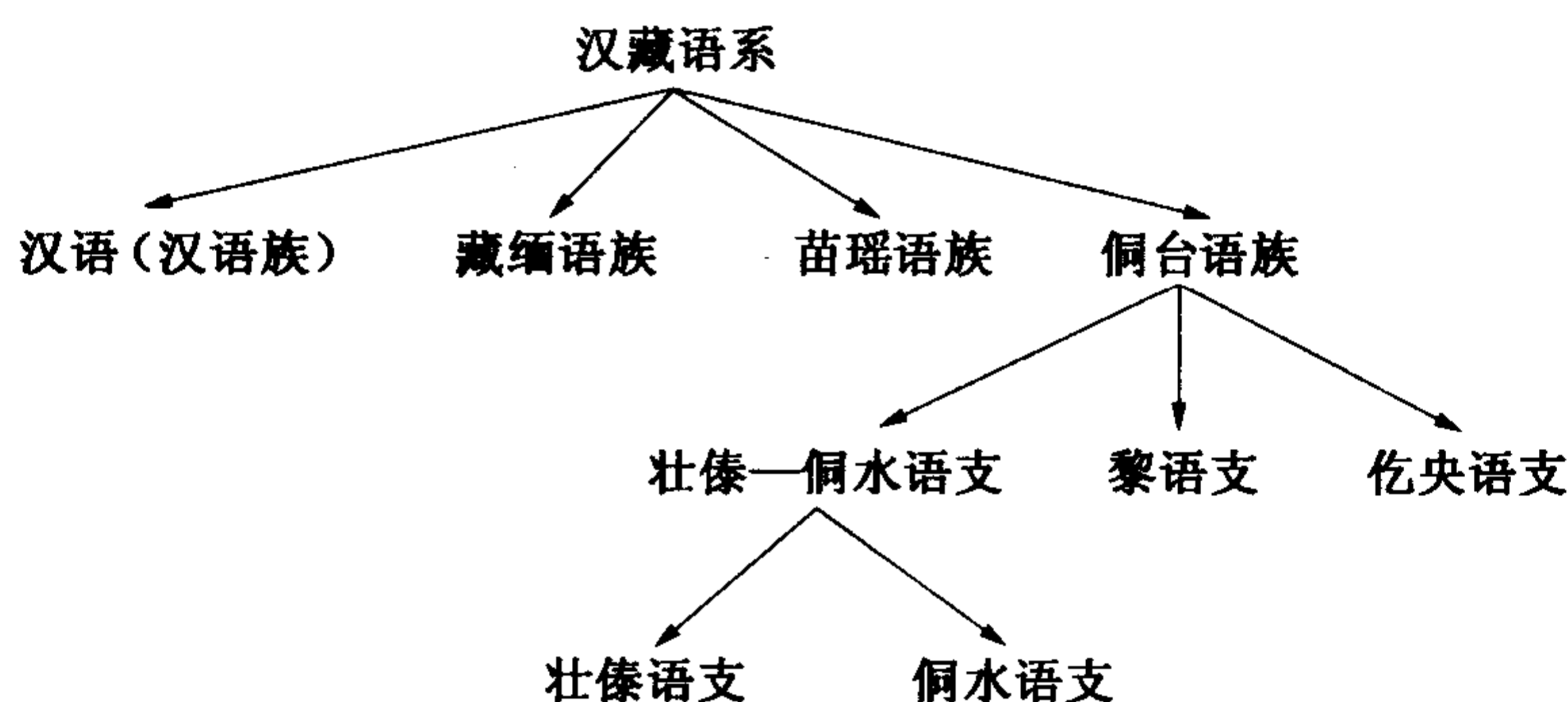
（2）汉藏语的亲属语和方言

中国学者传统上对语言以下的分类是：方言→次方言→土语→地方话等。亲属语的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第102、10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发生学分类的层次为：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汉藏语系国内的意见大体上认为包括汉语、藏缅语、苗瑶语和侗台语四个语族。其发生学关系为：



汉语可视为汉语族，诸大方言就是汉语族的诸语支。相对来说苗瑶语、侗台语内部的分类比较清楚，争议较少，汉语方言的划分和藏缅语内部的划分争议较大。这在第六章还有说明。

苗瑶语共有苗、瑶和畲三个语支。苗语支除了苗语，还有布努语、巴哼语和炯奈语，瑶语支只有勉语，畲语支只有畲语。这些语言的声调有共同的来历，来自苗瑶共同语的A、B、C、D四个原始调。苗瑶语和侗台语中都有一批汉语借词的声调分属四个调并与汉语中古早期的声调分别对应。如现代苗瑶语诸支的原始语从苗瑶共同语中分化时，四个原始调的调值相近或相同。它们的分化大抵在汉语四声完备之后，四声分化之前。因为不同的方言分化以后调值易变。^①

苗瑶先民史籍称为“武陵蛮”和“五溪蛮”，关于他们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从湖南、湖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变迁看，古苗瑶文化原本分布在湖北。我们可以设想，原本苗瑶语有不同的支系，其中的一支是今苗瑶语的祖方言，从湖北到湖南，原来留在湖北的其他方言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

壮傣、侗水语支较接近，黎语支的语言又与侗水、壮傣语支的语言较接近，仡央语支的语言除了内部差别较大外，与其他三个语支的语言差别也较大。侗台诸语支的声调是后起的，侗台共同语塞音声母清、清送气、浊和先喉塞浊四分，有别于汉和藏缅语的清、清送气和浊相对立的三分。壮傣语支又称为台语支，它与侗水语支有更密切的发生学关系，通常也把侗台语族划分为四个语支。

境外的学术界往往采用更为复杂的层次分类。如果真正地从亲属语、方言的客观历史出发，更多层次的分类是有必要的。

2. 确定方言分化史的原则

原本一致的方言由于创新不能遍及整个方言就成为不同的方言。由于方言的代代相传，最初的创新随着系统的演变在它们的后代方言中就成为有别于最初没有这一创新的方言的后代方言。历史上的创新是划分方言以及语言在语族、语支或语组中的地位的依据。

^① 大约南北朝时期汉语四声完备，《切韵》时代诸方言四声的读法已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共同创新可能在后代的不同方言或亲属语中演变为不甚相同的形式,如果历史比较能够说明这些不同的特征来自它们共同的创新,也就能用这一创新来把它们与另一组方言和亲属语区别开来。这两组不同的方言或亲属语原有的共同语的特征则很难能用来作为区别它们的条件。

譬如说,中古汉语北方方言有浊的塞音和浊的塞擦音,从中古汉语北方方言分化出来的吴、湘、粤、赣、客家及今天的北方方言有的土语中还保存这一类浊的塞音和塞擦音,我们不能以此为条件来划分方言;同样的,也不能以是否保留入声韵尾为汉语方言划分的条件,而只能以是否有过共同的历史演变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

王福堂先生在他的《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历史层次》中参考丁邦新先生的意见,提出划分汉语方言依据历史性语音演变。^①

早期历史性语音标准主要有:古浊声母的音值、轻唇音的音值、舌上音的音值等三条。

晚期历史性语音标准主要有:照二组照三组声母的音值、见组晓组声母的音值、阴声韵韵尾的演变、阳声韵韵尾的演变、入声韵韵尾的演变、调类的分合、入声调的分派等。

罗杰瑞先生的划分原则有较大的不同,用语音、语法和词的用法综合起来作为标准。^②

汉语的擦音 f、v 是中古时期的北方方言中才出现的,汉语的吴、湘、粤、赣、客家及今天的北方方言的祖方言经历了中古的 *p-、*ph- 和 *b- 演变为擦音 f、v 的历史,这就成为把没有经历过这一历史变化的闽方言从汉语其他方言中区别开来的依据。中古中原诸方言 *p-、*ph- 和 *b- 演变为擦音 f、v 的创新以三等合口为条件,严格地说是南北朝期间三等合口这样的创新把汉语方言区别开来。

汉语方言中另一重要的创新是晚唐时期北方方言中的浊上变去,即全浊的上声与去声合流,这也波及其他的一些方言。如“弟”“坐”,北方方言、粤方言和湘方言中读去声,吴方言读上声,客家方言白读为平声。

北方方言在入派三声前还发生过全浊声母的清化,平声的塞音、塞擦音浊声母变成送气的清音,仄声(上声、去声和入声)的变成不送气的。划归粤方言的一些土语大体上也是如此,广西平话正好相反,平声的不送气,仄声的送气。吴方言不论南北,塞音和塞擦音保持清浊的对立。^③

北方方言塞擦音声母一般出现在船禅母的平声中,不出现在上去声中,如“垂/睡”、“仇/受”、“蝉/善”、“臣/肾”等(入声中也只有个别的,如“植”“殖”为塞擦音声母),王力先生认为这种分化 14 世纪时已经完成。^④ 吴、湘、粤、客等方言禅母字平声的白读通常是擦

①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历史层次》第 47 页,语文出版社,1999 年。

② 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第 162 页,语文出版社,1995 年。他的标准一共有 10 条:第三人称的说法;属格标记的形式;否定词是否用“不”;表示动物雄雌修饰语在前还是在后;是否只有平声才分阴阳;古舌根音是否腭化;是否用“站”表示站;是否用“走”表示走;是否管儿子叫“儿子”;是否管房子叫“房子”。

③ 吴方言浊的塞音和塞擦音多为清音浊流,仍与清不送气和清送气保持对立。

④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 117 页。

音。北方方言中船禅母读法的塞擦音创新是后起的,内部也没有进行到底,仍有少数平声的船禅母字读擦音。

现代汉语诸方言来自中古早期的北方方言,中古早期北方方言的语音结构的特点不是今天划分汉语方言的标准,划分的标准应是那个基础上的结构性的创新。如根据《切韵》和当时的其他文献,我们知道当时的方言有鱼虞两韵分和合的不同。《切韵》是分的,闽方言追溯其源头是分的,温州话也是分的,而北部的吴方言、粤方言是合的。既然吴方言的北部方言中鱼虞两韵的区分只能靠个别的残留读法,我们就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划分吴方言。

苗瑶共同语阶段有别于汉藏语其他亲属语的创新是塞音的六分: *p-、*ph-、*b-、*mp-、*mph- 和 *mb- (以唇塞音代表各种塞音)。畲语和勉语没有保持塞音六分的格局,只有苗语的共同语还保持着这个格局。苗语有湘西、黔东和川黔滇三大方言。川黔滇方言和湘西方言土语的音系中有鼻冠塞音声母。黔东方言的清塞音声母与湘西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的鼻冠清塞音对应(参见第六章第六节的讨论)。王辅世先生为古苗语构拟了一套鼻冠塞音声母,根据诸方言包括声调在内语音系统的对应情况指出川黔滇方言的鼻冠清塞音来自古苗语的鼻冠清塞音。^① 于是根据苗语湘西方言和黔东方言的创新可以把苗语复杂的方言区分开来。没有文献的亲属语或方言可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把问题搞清楚。

创新可能是语音、形态和词汇方面的,相邻的方言经常有密切的接触关系,创新的扩散便不可避免。语法成分和词的借用使这一类的创新难以辨认。即使是根据语音的判断,也可能有问题,如汉语北方方言晚唐浊上变去的词作为文读借到一些南方方言中,可能影响我们对这些方言历史的判断。语音的变化受到整个系统的约束,并对整个语音系统有影响。所以只有最终追溯到跟系统有关的语音上的创新才有意义。语音上的创新在相近方言中的扩散过程中往往受诸方言语音结构的限制。

思考题:

- (1) 方言和亲属语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语言学怎样看方言与亲属语?
- (2) 为什么很难用同语线区分不同的方言?
- (3) 方言的接触有什么特点?
- (4) 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是怎样形成的?
- (5) 为什么要以创新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

(6)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入派三声”反映了当时北方一种权威方言的读法。《中原音韵》中知庄章组与精组有别。北京话知庄章组与精组有别,与《中原音韵》描写的情况相同。“择”(知组)、“册”(庄组)、“瑟”(庄组)等字北京话的读法中声母不卷舌,与精组的相同。试将它们的读法与南京话的读法比较,说明它们可能借自明代的南京话。

^①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4—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参考书目：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 年。

王福堂《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 年。

第三章 语言结构的历史演变

任何土语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我们应当经常想到每一个细节在每一个系统中的地位,“只是孤立地研究一个词或者一小组词,一个形式或者一小组形式,这种支离破碎的方法是会葬送整个历史语言学的”^①。

一、语言演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索绪尔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一概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排除在外。他说:“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当我们从共时的角度描写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将一切与语言组织无关的因素排除在外,但在研究语言历时变化的时候,就不能局限于单一语言结构变化的描述。因为外部的因素也是引起语言变化的原因。

1. 语言演变的内部因素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每一个成分,“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沿流模铸着”。^② 也正如布拉格学派所认识的那样,语言的结构已经在预示着它的未来。

(1) 语言系统的独立性

梅耶说:“任何语言都包含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大体上这三个系统可以各自独立发生变化。这三个不同的系统就是:形态、语音和词汇。”

系统的空间中每一个要素都是有赖于其他要素的存在而存在。一个要素的变化往往引起其他要素的一系列变化。如元音的链移和辅音的转移。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定形式空间中的自组织系统。^③

语音系统内部严密的组织关系即使受到外部的干扰,也只是在演变中作调整,而不会涣散。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演变中又体现出种种有机的关联。子系统中较高层次上的变化对较低层次的演变有更大的影响。

概念和语音结合的匹配往往不是一对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非对称性匹配可能引起语音、语义和句法的演变。

(2) 语言结构的层次

语音系统的结构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是:区别性特征的构成、音位系统的结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59 页。

② 萨丕尔《语言论》第 154 页。

③ 自组织性表现为外界不能改变它的基本结构的关系,诸元素在空间上全域关联。

构、声韵的结构、音节系统的结构及复音音节的结构。词汇系统一方面表现为较为稳定的核心词系统和非核心词系统,另一方面词的语义场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语义场构成。如身体部位词、动植物名称词、亲属称谓词、动作词、数词、量词等有各自的子语义场。诸子语义场中一个词项的语义变化往往引起其他相关词项语义的变化。

语法系统由两个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的系统——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构成。两个范畴的变化互相影响。词法范畴的内容可以成为句法范畴的内容,句法范畴的内容也可成为词法范畴的内容。

词的语义结构有赖于语音和形态的形式而存在,系统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

2. 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

(1) 社团方言中的变化

语言习得的研究表明造成语言演变的最基本的外部因素就是语言习得的环境。

语言习得的环境可能促使语言发生变化。方言的初始状态就是得以延续和传播的社团方言的状态。尽管方言的使用者“不知道”语言变化的规律,可是他们所采用的语言或方言是有社会意义的。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某一种方言或某一社会地位的人的话是言语的行为,一旦成为一个社团的风尚,便可能对整个社团方言产生影响,言语影响了语言。方言土语中年轻一代的社团方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派,常常要成为以后的老派,甚至成为权威方言中的权威社团方言。

权威方言的创新也总是向其他方言传播,成为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共同的创新。当权威方言系统的演变、词的读法的变化正处于它的某一个阶段,模仿者有可能使原有的过程中断。不甚成功的模仿者获得的只是一些词,而不是语言的系统。如果这一类方言间的借用,随着模仿者最初的模仿传播流传下去,后世的研究者难免以此作为语音突变的例子。

据梁敏先生调查,广西南宁西郊下楞乡的壮语在两代人交替的短时间里就完成了复辅音的演变:

老派	pl	phl	ml	hl
	kl	khl		
			↓	
新派	p	ph	m	l
	k	kh		

令人惊讶的是老派(老人)认为 kla³⁵“稻秧”和 ka³⁵“假的”读音不同,新派(年轻人)认为读法相同。^① 新的读法多在年轻一代中得以推广,一些新的说法在词汇的扩散中得以实现,决定语音演变的最终还是语言自身的结构。

(2) 外部干扰下结构的调整

语音系统在外部因素的干扰下会进行调整。语言经常吸纳新的词汇成员,核心词也常常有借来的。侗台语中的黎语和仡央语曾向南岛语借数词,壮傣语和侗水语向汉语借

^① 梁敏《两代人之间的语音变化》,《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数词。英语向拉丁语、法语等借用构词成分,壮傣语支的不同语言借用汉语的虚词“了”和“着”。^①

任何借用的成分,不论是形态成分还是词,必定经过方言本身的系统来表达。借用和模仿诱使语言要素发生变化,因而触动系统的演变。正如索绪尔所说的:“外部语言现象的研究是富有成果的;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些现象就不能认识语言的内部机构。试以外来借词为例: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它绝对不是语言生命中的经常要素。”“借词只要放到系统当中去研究,首先就不算是借词了;它会跟任何土生土长的符号一样,只因为与它有关联的词的关系和对立而存在。”^②

二、语音结构的历史演变

“一种语言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它的语音格局,而不是个别的声音本身。”^③我们只有弄清语音格局的历史,才能弄清语言的历史,弄清方言或亲属语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有两种最基本的语音结构的描写方法:音位描写法和声韵调描写法。现代的声韵调描写法又建立在经典的音位描写法上。音位描写法和声韵调描写法都是在音节分析基础上的描写。中国传统的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声类和韵类历时演变的学问,在汉语古音的构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研究方法在共时描写和历史比较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1. 语音的演变

(1) 语音演变的条件

语音的演变通常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如在中古时代的汉语北方方言中重唇音变为轻唇音($p > f$)的条件是介音-j-和-u-的存在(或主元音是-u-),彝语支语言由于塞音韵尾而产生紧元音。这一类是音位的分化。还有一类是音位的合并。如汉语北方方言浊塞擦音清化之后进一步发生 $kj > tɕ$, $tsi > tɕ$ 合并为相同的读法。

辅音和元音的演变最终与整个系统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如古日耳曼语的塞音系统的变化和英语长元音的推链式变化。

音位的变体通常是音位的条件音变,大多因同化而产生。异化产生的音位的变化亦不少见。上古中期汉语后高元音-m 尾的韵,由于后高元音的异化作用成为-ŋ 尾。如“冬” $*tum > tuŋ$ 。

(2) 不同语音层面的历史演变

语音结构可分析为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构成词的双音节和多音节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固定重音以外的音节常常弱化引起音节范围内结构的变化。“连读变调”和“元音和谐”这一类现象是跨音节的语音现象。

第二个层面是构成音节的声韵结构,声调语言的音节分析为声、韵、调结构。在这个层面上,声母的特征可演变为韵母的特征,声母和韵母的特征可演变为声调的特征。如

① 邢公畹《现代汉语和台语的助词“了”和“着”》,《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5页。

③ 萨丕尔《语言论》第180页。

景颇语紧元音的产生与不送气的清塞音声母有密切关系。^① 通常分析为介音的-j亦可归入声母的范畴。中古汉语三等字的介音*-j如除了对见组和晓组字的声母的演变有影响外还对后随的元音的演变有影响。中古汉语合口的介音*-u李方桂先生认为,“大部分是从圆唇舌根音来的,一部分是后起的”。^② 这个*-u初时应是声母的过渡音,后来成为韵头。

第三个层面才是构成声母和韵母的音位。

语音的演变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上。第一个层面上的历史演变,如重音的变化不能用其他的方式作解释。第二个层面上的声、韵、调的变化包含着音位的变化,声调的变化有自己规律性的特点。西方的学者把有辨义作用的声调叫做“超音段音位”。第三个层面上音位的变化,如元音的链移等,如果用韵的变化来解释显然不得要领。

区别性特征的对立,如辅音的清/浊、送气/不送气,元音的长/短、松/紧等的对立通常是成组的对立。它们的出现或丢失与成组的辅音或元音有关。

元音和辅音区别特征要素是相对独立的,却又互相影响。元音鼻化特征在汉语云贵川的土语中成为代替鼻音韵尾的特征,没有送气塞音的壮族地区,当地壮人说的汉语也往往没有送气塞音。

(3) 语音演变中不同层次的关系

所有的语言都有基本的复音结构模式,人们叫它们韵律特征。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通常有词重音。古汉语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通常都有意义,一般认为古汉语是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③ 中古以后汉语逐渐成为以复音词为主的语言。北京话的复音词常以末音节的弱化为特征(这种复音词性的特征被归入声调特征的范畴而被称为“轻声”)。根据古藏语的拼写形式和古汉语的读法,一些学者认为原始汉藏语是单音节性的语言,藏缅语族一些语言的双音节词的前一个音节是由前缀辅音演变而来的,事实可能不是如此。如博多—加洛语支、库基—那加语支的语言的单纯词多为复音性。

古藏语有繁复的复辅音,没有音节声调。现代藏语拉萨话等是有音节声调的语言,拉萨话等的声调来自声韵的特征。汉语声调的发生与韵尾的不同有关。*-p、*-t、*-k韵尾的音节读作入声, *-s韵尾的读作去声, *-ʔ韵尾的读作上声。藏语拉萨话声调的发生与韵尾和声母有关。^④ 声调初时不过是音节声母或韵尾的伴随特征,或互为伴随特征。随着韵尾及声母的简化,声调就成为区别音节的特征。

占语(西部方言)、加莱语、雷德语、亚齐语等是占语支的语言。除了亚齐语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其余的语言都分布在越南和柬埔寨等地。构拟的结果表明,古占语与马来语

① 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1979年第1期。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21页。

③ 如丁邦新先生说:“汉语大致是单音节性的语言,尤其上古汉语单音节性的特征更为明显,也许这个缘故,以前讨论上古音拟测的人很少注意音节结构的问题。”参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④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

相近。^① 南岛语的发生学分类中一些学者把占语等归入马来语的巽他语支。占语支语言的语音与其他南岛语有较大的不同。其送气塞音在南岛语中是罕见的。如：

	占语	加莱语	雷德语	亚齐语
大腿	pha	pha	pha	pha
苦	phiʔ	phĩʔ	phĩʔ	phet
知道	thau	thəu	thau	theə
年	thũn	thun	thũn	thon

古占语的送气塞音声母恰巧是原始占语*-h-音节前的塞音因元音弱化脱落而形成的。试比较印尼语“大腿”paha、“苦”pahit、“知道”tahu 和“年”tahun。占语支的语言及方言音位系统变得比马来语等复杂得多。“针”占语 dʒrum, 印尼语 dʒaram。占语中一些双音节词的首音节完全失去。如,“雨”占语 dʒan,加莱语 hədʒan;“风”占语 ŋĩn,加莱语 aŋĩn。^② 萨丕尔说,语言的沿流,“从语音的轻微调整或扰动开始,会在几千年的历程中引起最深刻的结构变化。例如,只要有一种成长着的趋势,自动地把重音放在词的第一个音节上,就会改变语言的基本类型,使词的最后音节缩减到没有。”^③占语的演变与萨丕尔所说的很相似。而触发占语语音大格局变化的外部因素是占语与孟高棉语的接触。

重音在前的语言韵尾辅音和韵尾的元音易弱化脱落,而重音在词末的语言前一个音节的元音易弱化丢失。占语支语言音节的缩减引起语音系统极大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占语首音节的变化与重音在末音节有关。羌语北部方言(麻窝话)有重音无声调,南部方言(桃坪话)有声调无重音。北部方言中复音词的末音节可以弱化,于是韵母脱落,声母成为韵尾,不同的韵尾有 44 个之多,其中 22 个是复辅音韵尾。^④

2. 音位结构的演变

萨丕尔说:“一种语言的语音格局不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它变得远比组成它的各个声音为慢。它所包括的每一个声音都可以改变而格局不变。”“直到如今,英语词首辅音的系列:

	p	t	k
	b	d	g
	f	th	h

还一点对一点地相应于梵语的系列:

	b	d	g
	bh	dh	gh
	p	t	k

① Graham Thurgood,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 Two Thousand Year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② 占语等语言资料引自 Graham Thurgood,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

③ 萨丕尔《语言论》第 156 页。

④ 孙宏开编著《羌语简志》第 7、33 页,民族出版社,1981 年。

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①

我们可以把语言的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结构的历时演变理解为是符号矩阵的数学变换,它们的行和列中的符号随着整个矩阵的变换和改变,不能任意地改变其中的一个符号。而其中一个符号的改变就会引起整个矩阵的变换。

3. 声韵调结构的演变

(1) 声韵调结构的分析

历史语言学在汉藏语的研究中不同于印欧语的是关于声、韵、调关系,声调的发生和发展等相关的研究。

中国古代词的读音先是用形声字的声符来表示,造了很多的字。到了汉代,如《说文》用了“读若”这样的形式说明一个字的读音与另一个字相近,或用直音法说明某字的读音。^②直音法就是用一个字的读音注另一个字的读音。反切注音法始于汉末,一直沿用到清代。汉以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韵书。现代研究汉语古音讨论最多的就是隋代的《切韵》和宋代的《广韵》。早期韵书中字的读音按韵分类,用反切注音。根据《切韵》等的反切用字,就能知道字音的声母的类和韵母的类。宋元时代的韵图把声韵调和韵的等分得很清楚。

声调是区别音节的特征。如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吴方言温州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和阳入八个声调。温州话塞音、擦音、塞擦音和鼻音都有清浊的对立,它的阴平、阴上、阴去和阴入是清辅音声母音节的声调,阳平、阳上、阳去和阳入是浊辅音声母音节的声调。温州话从共时的角度看,阴平和阳平的不同是声母清浊对立的伴随特征;从共时的角度看,平、上、去、入各分阴阳是辅音声母分清浊的演变结果。而在北京话这样的北方方言中,塞音和塞擦音的清浊对立早已消失,阴平和阳平的不同可用来区分原有声母的清浊。苗瑶语和侗台语一些方言中的情况和汉语方言的情况类似。

声调一旦成为区别意义的成分,声韵调结构的格局如同用音位所描写的格局那样,有自己的结构特点。在汉藏语声韵调历史演变的研究中,首先是对声母、韵母和声调的系统作为不同的系统分别加以讨论,并进一步讨论演变中的结构关系。

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词的声母和韵母读法易变,但相同方言中不同音节同一类的声母和韵母通常保持相同的读法。如“妇”“负”《广韵》皆为房九切,今诸方言中这两字的读法可有所不同,方言内读法通常相同:^③

	北京	苏州	温州	双峰	福州
妇	fu ⁵	vu ⁶	vøy ⁴	ɣəu ⁶	xou ⁶
负	fu ⁵	vu ⁶	vu ⁴	ɣəu ⁶	xou ⁶

“妇”“负”两字中古早期为浊声母上声,晚唐浊上变去,北京、苏州、双峰及福州(文读)为去声。温州话仍读上声,“负”读作 vu⁴ 是文读。福州话“妇”白读 pou⁶。

① 萨丕尔《语言论》第 168—169 页。

②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 2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③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 106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年。表中的调号 4、5、6 分别代表阳上、阴去和阳去。

(2) 声韵调结构的历史演变

方言中声类、韵类和调类的分化和合并常常可以见到。中古以后北方方言中浊塞音、浊的擦音和塞擦音清化,与清的合并,是声类的合并。晓母一分为二,分别读作 h-和 ɕ-,是声类的分化。平、上、去、入四声一些方言中因声母清浊的不同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和阳入 8 个调。北方官话古入声字先分后合,从《中原音韵》看是全浊声母(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声母)的入声并入阳平,次浊声母(鼻音和流音声母)的入声并入去声,清声母入声并入上声,称为入派三声。^①

今藏文的拼法来自古藏语的读法。古藏语构成声母的复辅音较为复杂,在已产生声调的现代藏语方言中声母系统大为简化,没有声调的仍有繁复的声母系统:^②

	藏文	拉萨话	巴塘话	阿力克话
米	ɦbras	tɕɛ ¹³²	ndzɛ ⁵⁵	mdzi
八	brɕjad	ɕɛ ¹³²	dzɛɾ ⁵³	wdzat

复杂的古藏语的声母演变为拉萨话这样较为简单的声母系统或阿力克话那样仍是没有声调语言的声母系统,其演变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总的说来,声调一旦产生,语言为了坚持声调的结构格局便要简化声韵结构格局。

4. 声调的起源和格局的调整

东亚有声调的语言主要集中在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中。南岛语的少数语言是有声调的语言,如回辉语。非洲的班图语也是有音节声调的语言。^③就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的一些语言而言,我们大体上已经知道声调的产生有多种模式。藏语拉萨话声调的产生与声母的清浊及韵尾有密切关系,汉语声调的产生与韵尾有关。白语声调的产生与元音的松紧对立有关。^④

声调产生后通常要趋向复杂化。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的不同方言中最为普通的是原始的 4 个调可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8 个调,有的方言中因元音长短的对立声调会进一步分化。它们的分化也可能不完整。南北朝时代的汉语诸方言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晚唐时汉语的北方方言大约先是平声、上声因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和阳上,有的方言没有显示去声分化的迹象,而阳上与去声合并。

温州话保持自己中古以来四声分阴阳的格局应与阳调与浊声母的浊音互为伴随特征有关。上声的喉塞音韵尾在温州市的土语中趋于消失,有的土语中还能保存。入声的韵尾原是-p、-t、-k,不久前成为-ʔ。上声和入声也是韵尾的伴随特征,只有平声和去声的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上)第 196 页。

②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③ 周流溪《班图诸语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 17—18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

④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 年第 1 期。

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黄宣范译,《幼狮月刊》第四十卷第六期。

吴安其《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

吴安其《上古汉语的韵尾和声调的起源》,《民族语文》2001 年第 2 期。

音节靠声调的特征来区别。声母、韵母和声调分别有自己的系统特点又互有联系,声调格局的变化受到声母和韵母系统特征的制约。

5. 语音存古的方式

语音以不同的方式保存自己古音的某些特点。就语言内部而言大约有三种保存方式:语音演变的残余、语音演变的滞后、古方言的底层。通过方言或亲属语的比较我们才能确定语音的存古方式。

(1) 语音演变的特殊情况

语音要素的演变往往不能遍及包含该音素的所有语素成分,部分语素可以保留原来的读法。语音演变的例外可以是其他语音或形态要素的影响造成的,也可能由社会因素造成。

汉语“阿”是《切韵》的歌韵字,北方方言中中古前已经是称谓的前缀,直至现代,读作a,而在“阿胶”中读ɤ。《切韵》的歌韵字中古以来逐渐地从a演变为ɤ,而作为称谓前缀仍读作a。温州话中歌韵字通常读作u或əu,而“阿弥陀佛”中的“阿”读o。

(2) 语音演变的滞后

语音演变的滞后是指一类音的存古。如拉丁语 *costa/kosta* /“旁边”成为法语的 *côte/kot* /,元音o的读法被保留下来,拉丁语的 *corpus/korpus* /“身体”成为法语的 *corps/kɔr* /,o演变为ɔ。从拉丁语到现代法语,重音在第一音节,末音节的元音或辅音丢失。

汉语的南北方言声调的读法尽管经历了一两千年各自的演变,今天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其中不规则的对应另有原因。北京话平声分阴阳,阳上变去,而原来的去声南北朝以来近两千年没有分化。

(3) 古方言的底层

当一种方言被另一种方言覆盖时,也就是一种方言的持有者转用另一种方言时可能把原有方言的语音特点作为底层带进覆盖的方言。一方面可能使覆盖的方言的语音系统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原来的一些词的读法带进新方言。

如古汉语歌部从上古到中古经历了 *ar* → *ai* → *a* 的演变,闽方言和吴方言温州话中保留着底层 *ai* 的读法,是汉代的汉语南方方言的遗存。

三、形态的历史演变

语素是构成词的基本单位,把语素构成词的方式就是词的形态。汉语传统语法理论不太重视形态学,历时形态的研究尚有欠缺。

1. 形态的范畴和类型

(1) 形态的形式

区别语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是音位,然后是声母和韵母,它们构成表达语义的基本单位即音节。两个及多个音节构成的语音单位是复音词的基础。一些语言还以双音节及多音节结构中的重音来区别意义,即非线性音系学所指的节律。不同类型的形态形式表现在不同层次的语音上,也就是说,形态以一定的语音方式来表示。屈折形态的词表现为以元音、辅音或音节的声调的变化构词(不同的语素已融合在一个词中,语素的界限不清楚);粘着形态以粘附在词上的成音节或不成音节的前缀、后缀或中缀来构词;分析

形态以复合、重叠等方式构词。

英语名词的复数有规则和不规则两类形式。如“牙齿”tooth,复数形式 teeth,以元音的不同来表示单复数的区别,是一种屈折形式。汉语“牙齿”没有复数形式,如果要表明不是一颗牙,就得说明是几颗,或用一个表示约数的词结合成复合词。如“两三颗牙”、“好几颗牙”等等。

形态变化的基本形式有:屈折、缀加和重叠。

(2) 形态的范畴

语素是语法的基本单位,不同的词类可以有基于语素的不同范畴。

不同的语言,名词可以有不同的性、数、格的变化。古英语的形容词也有性和数的变化。藏缅语一些语言的动词,如羌语,缀加成分除了要表现它们的数、人称外还表现趋向。有的南岛语数词上遗留着古代的后缀。汉语北方方言用 *ty*(的)后缀把形容词变成名词,南方方言用 *ge*(来自“个”)等把形容词变成名词。温州话的乐清土语用入声的变调表示爱称。汉语不同的方言在形态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3) 形态的类型

形态类型学通常认为有分析型、粘着型和屈折型三种典型的语言类型。分析型又称为孤立型,屈折型又称为融合型。古英语是屈折型的语言,但仍包含着一些粘着形态的构词形式;汉语是分析型的语言,在构词上仍有一些屈折形态和粘着形态的形式。分析形态的一个简单词通常由一个语素构成,粘着形态的一个词可以包含不止一个的语素,屈折形态的一个词中语素的分界已消失。

苗瑶语族、侗台语族的语言,越南语和中古汉语等是较为典型的分析类型的语言。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朝鲜语、日语及绝大多数的南岛语是粘着形态占主导的语言。古拉丁语、古英语、俄语和阿拉伯语是屈折型的语言。

俄语的名词有性、数、格的不同,形容词与被修饰名词要保持性、数、格的一致,动词有三式(叙述式、命令式和假定式)和三时(现在、过去和将来)的变化。^① 俄语名词有单复数的不同,又有主格、宾格、属格、与格、工具格和前置格等六种格。数和格两个范畴的形式在俄语名词里往往已经结合在一起。如: ^②

桌 子			椴 树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主 格	stol	stol-y	lip-a	lip-y
宾 格	stol	stol-y	lip-u	lip-y
属 格	stol-a	stol-ov	lip-y	lip
与 格	stol-u	stol-am	lip-e	lip-am
工具格	stol-om	stol-ami	lip-oj	lip-ami
前置格	stol-e	stol-ax	lip-e	lip-ax

① 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编《现代俄语形态学》,黑龙江大学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
② 伯纳德·科姆里《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51页。

现代汉语是分析形态为主的语言,也以声调或声母和韵的变化来构词,如上声的“好”是形容词,去声的“好”是动词。平声的“间”(中间)是名词,去声的“间”(间断)是动词。古代汉语的一些词和它们的派生词原本用相同的汉字来表示,后来用不同的字联系不同的读法以示区别,如“见”和“现”,“安”和“按”。共时的形态结构是历史的积累和叠加。

正如伯纳德·科姆里所指出的,“形态类型包括三种或四种典型的类型,在这些类型内我们可以划分世界上各种语言。但是,事实上虽然我们能确立这些典型的类型,世界上绝大多数(或许全部)语言并不确切地相当于这些类型中的某一种类型,而是在综合指标和融合指标上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①事实上由于屈折语的语法语素已和词根融合在一起,以语素数除以词素数的统计方法来区分形态的类型有一定的局限性。

2. 形态的历史演变

(1) 形态范畴的变化

形态范畴可以有多个方面的变化。古英语到现代英语名词格范畴的简化,如宾格形式的丢失,用句法上的词序来表示。古代汉语用前缀和后缀表示的动词的词形变化,后来以分析形式来表示。如中古时“败”仍有自动和使动的两种读法。

在形态简单化的过程中,原本形态范畴的表达可以成为句法范畴的表达。形态发展的过程中,句法范畴的表达也可以成为形态范畴的表达,如羌语用元音、声调的屈折变化和附加成分表示动词的人称、数和时的不同。^②

(2) 形态类型的变化

正如萨丕尔所指出的,“严格地说,我们事先就知道不可能树立起有限的几个类型,就把世界上几千种语言和方言的特点都照顾到。就像人类的一切制度一样,语言也是花样万千、变幻多端的东西,难以妥当地贴上标签。哪怕类型的尺度分得再细致,还几乎一定会有许多语言必须经过一番修剪才能放进表格里去”,“语言的历史研究已经无疑地证明,语言不但是逐渐地改变,也是一贯地改变着的;它不自觉地从一个类型变向另一种类型,在世界上相隔很远的地区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③

形态是历史的产物。语言的形态系统只能就一定的范畴而言。语言中所包含的不同的形态总是处在旧的系统被破坏,新的形式在出现的过程中,不论这个过程的历史有多长。新的形式可能由于类推的作用成为一定范畴中的系统性的东西。语音的历史演变也会改变形态成分的形式,然后危及它的系统,引发形态系统的变化。

英语是日耳曼语族西支的语言。英语的历史是从盎格鲁等部落渡海到不列颠岛那时算起。公元450~1150年为古英语时期,1150~1450年为中古时期,1450年以后为近代英语时期。古英语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分阴性、阳性和中性。名词的性是随意规定的,如“太阳”sunne是阴性的;“女孩”mægden是中性的。名词的复数形式相当复杂。“书”的单数形式为bōc,复数形式为beek。名词有四个格:主格、所有格、与格和宾格。

① 伯纳德·科姆里《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54页。

② 孙宏开《羌语简志》第99页。

③ 萨丕尔《语言论》第108—109页。

形容词也像名词那样地变化,与被它们修饰的名词在性、数、格上保持一致。动词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类,强式动词即现代的不规则动词,弱式动词即现代的规则动词等等。古英语名词的数和格的形式如:

	日子(阳性)	水(中性)	牛(阴性)
单数 主 格	daeg	waeter	oxa
单数 宾 格	daeg	waeter	oxan
单数 与 格 ^①	daege	waetere	oxan
单数 所有格	daeges	waeteres	oxan
复数 主 格	dagas	waeter	oxan
复数 宾 格	dagas	waeter	oxan
复数 与 格	dagum	waeterum	oxum
复数 所有格	daga	waetera	oxena

到了中古时代,东中部方言成为标准英语的基础,有三分之一的强式动词成为弱式动词,名词的性已摆脱了古英语的随意性,到了 14 世纪时-(e)s 已成为表示名词复数的主要形式,名词的与格、宾格的词尾变化形式逐渐消失,只保留所有格词尾的变化。中古后期,形容词基本上失去性、数、格及人称的屈折变化。^② 在十多个世纪中英语的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以分析特征为主的语言。

上古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常带有成音节的前缀,王力先生把它们叫做“类似词头的前加成分”。《诗经》时代“爰”“曰”“言”是常见的动词前缀,如“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诗经·周南》)。“无”和“聿”偶尔也当动词的前缀,如“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诗经·大雅》)^③，“无念”就是“念”，“无”上古音 *ma(-g),相当于汉藏语其他语言的 ma-前缀。“有”这个前缀上古早期和中期一般加在国名、部落名、地名及其他名词前。如，“有夏”“有殷”“有周”“有苗”“有梅”“有的”等。“有殷”就是指殷商，“有苗”是指苗人的部落，“有梅”是指梅子，“有的”就是目标。^④ “越”称之为“於越”，“吴”称之为“句吴”。“阿”作为前缀上古末期开始流行。曹操小名“阿瞞”，刘备的儿子刘禅小名“阿斗”，疑问代词“谁”成为“阿谁”。

梅祖麟先生曾说明上古汉语 *s- 前缀的功用。^⑤ 如,通过对“亡”和“丧”、“吏”和“使”、“占”和“苦”等的比较可知上古汉语 *s-前缀可以用来表示使动。^⑥ 我们不清楚那个时代一些动词和形容词成为使动词时读法上有什么不同,如“死”和“死之”、“活”和“活之”、“小”和“小之”、“广”和“广之”。到了汉代,这一类的意义用先是一个动词再续接一

① 做动词的间接宾语。

② 秦秀白《英语简史》第 25—39、70—71 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 299—300 页。

④ 同上,第 219—220 页。

⑤ 梅祖麟《上古汉语 *s-前缀的构词功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研院编印,1989 年。

⑥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99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

个动词或形容词来表示。如,“推坠”“警起”“推远”“引近”等。^①

研究表明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中的去声来自上古末期的*-s韵尾。中古用平声和去声区别意义的如:

“空”,《广韵》苦红切,空虚;苦贡切,空缺。

“中”,陟弓切,平也,和也;陟仲切,当也。

“间”,古闲切,隙也;古莧切,隔也。

“离”,吕支切,近曰离,远曰别;力智切,去也。

也就是说,上古汉语中*-s后缀是形态的成分,加在一些名词和形容词之后能把它们变成动词。汉语的这种形态特点上古末期之后渐失去,新的构词方式代替了旧的方式。“空”与“虚”“缺”等构成不同意义的复音词。

中古以后后缀“子”“儿”“头”在汉语中广为使用。尤其在现代是北京话中中古成音节的后缀“儿”已失去,使名词的读法产生了屈折的变化,北京本地话韵的系统发生变化,多出一套儿化韵。

英语的后缀-ly(manly)是like的弱化形式。后缀-dom(kingdom)是doom“命运”的弱化。^②如藏缅语族的一些语言动词表示人称的后缀来自代词。*ŋa是古藏缅语的代词“我”,-ŋ是嘉戎语、独龙语等的动词人称后缀,等等。^③这一类语法现象被称为词的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或语法化。

语言形态系统的诸多方面永远不会停止它们的变化,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语言可以从一种类型演变成另一种类型。

3. 形态系统变化的原因

19世纪的学者认为语言形态的演变是从分析型(孤立型)到粘着型再到屈折型,后来知道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类推”不断地改变原有的形式,形态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语言的使用者在形态方面推广某些形式。如英语cow的复数形式是cows,古英语中分别为cu和cy。中古时期还用过kyn这样的复数形式。^④从英语许多名词使用复数后缀-(e)s的形式类推,于是cow有了cows这样的复数形式。类推有拉平(levelling)的作用。英语复数后缀-(e)s形式的类推作用在名词数的形态范畴中把不同的形式拉平了。英语的后缀-able来自拉丁语的-bilis,现代英语中有数以百计的词由词根跟这个后缀构成,如imagine→imaginable。英语imagine这个词也是从拉丁语借来的。对应于英语imagine和imaginable的拉丁语词分别是imagine和tolerate,英语自己把后缀-able加到imagine上。

屈折型的古英语十多个世纪后成为以分析为主的语言。

古印欧语的形态系统到了古日耳曼语时代已大为简化。古印欧语的7个格,在古日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403—405页。王力先生把这一类形式分析为是一个外动词带一个内动词或形容词的结构。另外他认为这是“使成式”的产生。实际上应是使动形式的演变。

②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512页。

③ 孙宏开《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

④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499页。

耳曼语中简化成4个。在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中,表达格变化的音节形式已简化,格变系统大致还完整。萨丕尔说:“我们不必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沿流的历史。知道下面这一点就够了:英语的屈折形式越来越少,词本身的形式越来越不足以表达造句关系,句子里的位置就逐渐接管了原来不属于它的功能。”^①

从古日耳曼语到现代英语,不同范畴的形态在趋于简化。与德语比较,英语形态的加速简化可能与英语跟拉丁语、丹麦语、法语等的密切接触有关。

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大体上是趋向于典型的分析化。在南北朝时代的北方方言中,汉语和北方的阿尔泰语有较多的接触。而中古以后,汉语的诸方言显示出向形态的多样化演变。汉语中古以后语音的简化促使复音词流行以增加语音的辨义作用,不同的名词后缀应运而生。

景颇语双音节词占多数,其语音结构的特点影响了它的语法和构词。^② 景颇语中实词虚化为前缀的形态化仍在进行中。如:

ŋa ⁵⁵	“鱼”	→	wǎ-	wǎ ³¹ lai ⁵⁵	“鲫鱼”	wǎ ³¹ man ⁵⁵	“鲨鱼”
mam ³³	“谷子”	→	n-	n ³³ khje ³³	“红谷”	n ⁵⁵ loi ⁵¹	“旱谷”

景颇语双音节性的语音特点诱使不断出现前缀和词根结合的双音节词。当区分名词类的前缀不足时便虚化实词产生新的类称前缀,以上例子可以说明。

汉语语素的单音节性和复音词以双音节为主的结构在制约着词的语法化和类推。从实词到虚词,语音演变大体上是音节的弱化。从虚词到粘着成分,或省略辅音或元音。当屈折形态代替粘着形态时便发生了融合。可见语法语素的历史演变不同于实词。语法语素无论在哪一个(或哪一些)语音层面上又会受到那一个(或那一些)层面的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制约。复音词的弱化音节受节律变化的制约,有的语言中受元音和谐律的制约。当声调成为形态特征时,又受声调结构和这个结构演变的制约。

语言中的不同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又互相依存。形态系统的演变是语言内部的事。亲属语往往有相同的形态演变方向,这是它们原有的相近结构决定的。亲属语也可能有不同的形态演变方向,这有时与和不同类型的语言接触有关。

占语支的亚齐语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与印尼语有密切的接触关系,有不少印尼语借词。亚齐语仍然保存着古南岛语用前缀和中缀构词的形态手段,如 *pur* 是动词的使动前缀, *tur* 是动词不及物和非意愿式的前缀, *mur* 是不及物前缀, *-um* 是把其他动词变成表示习惯或持续状态不及物动词的中缀, *-un* 是派生名词的中缀。^③ 其中 *pur*、*mur* 和 *-un* 应来自古南岛语。分布在中国海南岛三亚地区的占语支的语言回辉语,已成为分析型的有声调的语言。回辉语是当地回族的语言,据说来自马来西亚,史书记载宋时迁至此地,至今约10个世纪。回辉语早已与故土的其他南岛语失去联系,这么多年来主要与当地的汉语方言有密切的接触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双语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的回辉人大

① 萨丕尔《语言论》第146—149页。

② 戴庆厦《景颇语词的双音节化对语法的影响》,《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③ Darrell T. Tryon,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Part 1: Fascicle 1.

多数是能说回辉语和汉语的双语人(他们往往通多种汉语方言)。^① 小聚居和多双语人这两个因素使得回辉语变成不同于亚齐语和其他占语支语言的一种南岛语。

4. 形态的存古

梅耶说:“我们要确定一种古代共同语的存在,必须在所比较的语言中尽量找出这种古代语言的那些被保存下来的特性。因此应当研究这种语言的各个成分的作用是怎样的,因为它们并不是以同等的程度保存下来的,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保存下来的。”“虽然习惯常常使某种类型保持得很久,甚至在这个类型趋于整个废弃的时候,还留下一些痕迹,可是我们却不大能利用这些共同的类型来证明一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因为类型常常有以不等的程度逐渐趋于完全消失的趋势,比方各个印欧语言的历史里就有过这种现象。”“由此常常可以看到,古代系统的一般性质是保持得很久久的。比方在共同印欧语里,每个词本身都带着它在句中的功用的符号,名词和动词有很明显的区别;而在现代各个印欧系的语言里,名词和动词的区别都还依然是明显的。”^②

形态成分往往经历着四个阶段:语法化→类推→不能产→残余。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态形式可共处于一种语言中。

(1) 形态演变的滞后

形态演变的滞后是形态形式不活跃阶段的情况。中古时期英语的屈折形态逐渐消失,现代英语有的名词的复数不规则形式是中古英语的遗留。-en 是中古英语南部方言名词复数后缀,有的保留至今。如: oxe/oxen, child/children。现代汉语中“好”仍有形容词及动词的两种读法,是古汉语形态的滞后。

(2) 形态演变的残余

汉语的去声来自上古汉语的*-s, *-s 原本是上古汉语派生动词或名词等的后缀,在这种派生手段失去之后, *-s 凝固为韵尾,产生去声后 *-s 作为伴随特征丢失。

上古汉语从形容词派生动词的如:

空 *koŋ (空虚)	空 *koŋs (空缺)
间 *kran (隙也)	间 *krans > *kans (隔也)
恶 *ʔak (坏)	恶 *ʔak-s (厌恶)
好 *huʔ (不坏)	好 *huʔ-s > *hus (喜欢)

古印欧语和现代俄语格的屈折变化是较早前粘着形式演变的结果。英语有的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和分词的形式是古英语屈折形式的残余,仍然是可以分析的。如古英语的屈折形式:

	不定式	过去式(单数)	过去分词
写	writan	wrāt	writen
冻	frēosan	frēas	frosen
吹	blāwan	blēow	blāwen

① 郑贻青《回辉话研究》第 1—14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

②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19、20、25 页。

现代英语中残存的是这几个词的过去分词的形式。

(3) 底层语言的形态特点

底层语言不但在语音和词汇方面表现出它们的特点,有时也表现在形态方面。如温州方言的侗台语底层来自古吴方言。“蟑螂”叫做 kuɔ¹ za⁸,“臭虫”kuɔ¹ sai⁷,“茭白”kuɔ¹ ɕoŋ³,“配菜”(包括蔬菜和荤菜)kuɔ¹ pai⁵。kuɔ¹ < *kaŋ 是底层语言的前缀。我们知道除了“蟑螂”的 za⁸,其他三个都是在汉语词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茭白”古称“菰”。*kaŋ 来自底层语言。

古汉语东部方言有 *ma-前缀,缀加于昆虫等名词词根前。如:“马蜂”“蚂蚁”“蚂蚱”“蚂蟥”等词的“蚂”是古方言前缀 *ma-的遗存。俗名为“草鞋虫”的“马蚰”,又叫“马陆”“马蠲”。《方言》(卷十一):“马蚰,北燕谓之蛆蝶,其大者谓之马蚰。”戴震疏《方言》“螳螂”,“齐济以东谓之马敷”。今粤方言管“青蛙”叫“蜗”或“马蜗”,“蜗”读作 kəp⁷,来自侗台语。如壮语“青蛙”kop⁷,傣语 kop⁷,毛南语 kəp⁷。粤方言来自唐代的北方方言,古方言底层的 ma-前缀仍在该方言中构成“马蜗”这样的词。

四、句法的历史演变

1. 句法的范畴

(1) 不同句法理论的句法范畴

传统语法、功能语法和生成语法都区分句法结构中的不同层次。词是句法研究中的基本单位,功能语法理论中词组/短语是词的高一层结构,生成语法理论中高一层的结构是词组,不同的分析方法大体上不影响句法历时变化的研究。

(2) 词法范畴和句法范畴

句法和词法在共时的语法框架中大体上是可以区分的。但在历时的演变中它们范畴领域可能有较大的变化。原本是句法范畴表达范围的内容在后来的语言中可能成为词法形态范畴的内容,词法形态范畴的表达也可能成为句法表达的内容。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

历时句法关注的是:句法领域中与词法相关的句法旧范畴的消失和新范畴的产生,以及它们伴随的新的语法成分的产生和旧的语法成分的萎缩和残留。如根据中古汉语与语义有关的一字两音的音义关系,我们可以推测上古汉语中可能是一种可类推的形态形式。

(3) 句法的基本类型

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开创的语序类型研究,从 SOV、SVO 等基本语序出发寻找语序方面的普遍规律。世界上的语言以 SOV、SVO 和 VSO 基本语序为常见,VOS、OSV 和 OVS 语序极少见。其普遍情况为:带名词性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中,优势语序几乎总是主语处于宾语前;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所有格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所有格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优势语序为 VSO 的语言,总是使用前置词;以 SOV 为正常语序的语言,使用后置词。

主语—谓语(subject-predicate)和主题—述题(topic-comment)是句子的两种基本结

构形式。有的语言以第一种形式为主,有的语言以第二种形式为主。于是有四种类型的语言(参见上文)。

主题优先(或称话题优先)的语言,其句子的基本结构不同于主语优先的语言,主题是句子的基本成分。于是,除了 S、V、O,还有 T(话题、主题)应作为句子的基本成分。^①主题型语言句子结构的分析不能硬套 SVO 结构等。

主题型的句子,如:

“一件衣服穿十年。”述题部分是述补结构。

“一条板凳坐四个人。”

“台上坐着主席团。”

主题和述题的逻辑关系也不同于“一件衣服穿十年”。同一句法表达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逻辑关系。

2. 句法历时变化的特点

(1) 句法范畴的变化

句法历时演变表现为句法类型和有关结构的变化。从历时的角度看,词法范畴的表达可成为句法范畴的表达,词法范畴的形式可成为句法范畴的形式。“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英语的 be going to 本来是句法的形式,经语法化的再分析用来表示将来时。汉语中的“起来”在“看起来”“说起来”这样的词中起后缀作用。

从古藏语到现代藏语拉萨话,词法范畴的表达成为句法范畴的表达是显而易见的。古藏语的动词区分现在时、未来时、过去时和命令式(三时一式),区分使动和自动。动词“完成”的变化为:^②

	现在时	未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使动	sgrub	bsgrub	bsgrub	sgrubs
自动	fgrub	fgrub	grub	

也不是每一个动词都有三时一式的变化,有的有四种形式,有的没有。如:

	现在时	未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吃	za	bzafi	bzas	zo
站	laŋ	laŋ	laŋs	loŋs
睡	ŋal	ŋal	ŋal	ŋol
死	fiŋchi	fiŋchi	gi	

古藏语的动词还有自主和不自主对立的形态范畴。

以下是现代藏语拉萨话的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已经不再用古藏语的形态形式,代之以句法形式来表示:^③

① 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第 36 页。

② 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 年第 1 期。

③ 金鹏《藏文动词屈折形态在现代拉萨话里衍变的情况》,《金鹏民族语文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2 年。

a. “我在写字”(现在时、现在进行时):

藏文 $\eta as\ yi\ ge\ bris\ ki\ yod.$

拉萨话 $\eta e^3\ ji^3\ ge^3\ dz_i^3\ ki^3\ j\emptyset^3.$

我 字 写(助动词)

b. “我写字了”(过去时):

藏文 $\eta as\ yi\ ge\ bris\ pa\ yin.$

拉萨话 $\eta e^3\ ji^3\ ge^3\ dz_i^3\ pa^1\ jin^3.$

我 字 写(助动词)

(2) 句法结构的变化

汉语词序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汉代之以前,句法范畴的结构变化周代的文献中就可以看到,较大的变化始于汉代。

被动形式的结构出现于春秋,早期用“於”“为”“见”等构成被动结构,到了汉代“为……所”和“被”字句为常见。

代词类宾语前置于动词和介词的形式先秦时代常见,汉代之后残存于书面语。

汉语分析型的使动形式从文献看产生于汉代,南北朝时代渐扩展,普遍应用于唐代。

“打死”“喝醉”之类的动结式结构王力先生认为始于汉代,梅祖麟先生认为产生于六朝。^①

(3) 语法结构的残留

句法范畴的规则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在一定的时期,有的句法规则还处于类推阶段,有的有较大的局限性,有的只是古代规则的残留。

古汉语的句法形式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文体中为常见,口语中不用。如“之所以”现代书面语中的用法可追溯至先秦的书面语,现代书面语和口语中的连词“所以”古汉语中原本不是连词。

3. 句法演变的机制

(1) 句法演变的内在因素

语言句法的演变包括范畴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变化。前面已经说过,句法范畴的变化与形态范畴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当语法的不同范畴发生变化时,新的范畴需要新的表达形式,新的结构和新的句法成分必定应运而生。旧的形式受侵蚀后必定需要新的形式来弥补,新形式的发展加速旧形式的消亡。古藏语和古英语形态的简化导致句法形式的发展,使得原有的词法变化成为残存。

语法化的动因(motivation)我们可以从词和词组的语法化过程中观察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语言表达的需要。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中。

(2) 句法演变的外部因素

语言接触被认为是促成语言演变的原因。语言的演变可以从两代人的新老两派社

^① 刘丹青《从所谓“补语”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团方言的不同中观察到。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英语、藏语等有十多个世纪的文献语言中寻找,也可以在亲属语的历史比较中观察到。在一千多年中,英语从屈折型成为分析综合型,藏语从粘着型成为分析综合型,一千年中,回辉话从粘着型语言成为分析型语言,应与其他语言的密切接触有关。而一千多年中,突厥语族的语言与伊朗语、汉语等有很多的接触,但构成的规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猜想英语、藏语原本就有一种演变的必然性,它们的内部原本就有冲突。对此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研究。主要的讨论还集中在历史演变的细节上。

五、词汇的历史演变

语言的词汇是复杂的系统,形式上与语音和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词的语义关系构成另一个系统,是语义学研究的范畴。历史语言学关心的是词在这些不同范畴的变化。

1. 借词和借词的历史层次

借词(loan word)通常是根据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说法为自己增加的说法。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说法一旦进入了这种语言或方言则用该语言或方言的语音来表示。当借出方这个词的某个音借入方不具备时,借入方以相近的音来表示。如,汉语“客”成为壮语不同方言土语的借词后它们的声母不同,壮语龙州话中为 khe:k⁷,武鸣话 he:k⁷,龙胜话 ke:k⁹等。这是因为龙州话塞音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武鸣话和龙胜话没有送气塞音。

借入方往往把借词的语义调整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与自己词汇中原有某词的语义重合。如布央语有自己的数词,从汉语借用的数词局限在表示月份和日期等的范围内。^①借词有时也喧宾夺主,占了主要的地位,把该语言原有的词排挤到次要的位子上去,或完全排挤掉。核心词中也有这种情况。譬如说,“太阳”这个词在唐时的汉语中只是“日”的别名,大约到了宋代才进入基本词汇。^②如今在汉语南方吴方言和湘方言中取代了“日”成为核心词的一部分。^③

借词形态方面的特点是,借入方会把附着于借词上的形态成分作为借词的一部分借过来,或在借词的读法上添上自己的形态标记。汉语的声调用来区别词义,有的词的词性也用声调来区分。“中间”的“中”读平声,“打中”的“中”读去声。借到侗台语里也用相近的声调来表示。布依语的汉语借词“中心”读作 tɕaŋ¹ sam¹,如同其他汉语老借词,汉语清声母平声字借入后读第1调。“打中”的“中”仡佬语的汉语借词读作 tɕoŋ⁵,汉语清声母去声老借词读第5调。英语从俄语借了 bolshevik“布尔什维克”以及它的复数形式 bolsheviki,另外又按照自己的方式派生了复数形式 bolsheviks,两种复数形式并用。英语中有许多来自法语的词,带着法语的形态特点,又按英语的方式派生新词。^④朝鲜语和日语中汉语借词当动词用时仍照它们的办法把汉语借词当作词根,加上动词后缀。如朝

① 小坂隆一、周国炎、李锦芳《仡央语词汇集》第77—7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下)第495—496页。

③ 汉语南方方言中另外较为流行的是把“太阳”叫做“日头”。

④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559、572—573页。

鲜语“变化”读作 *pjən-hata*, *pjən* 即汉语“变”, *-hata*“做”。

有文献为依据的语言借词的历史较易研究。不列颠早期曾为罗马人所征服, 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是丹麦人)的入侵始于 8 世纪末, 前后有 3 个世纪。11 世纪开始不列颠又沦为诺曼人的殖民地达 3 个世纪。古英语的拉丁语、丹麦语借词, 中古英语的法语借词多是显而易见的。但英语后来也向有关的这些语言借词, 不同历史时期的借词可以根据借入方和借出方的历史读法来区分。英语 *street*“街道”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 *strāta*“铺砌的道路”。这个词古撒克逊语 *ˈsta:ta*, 古高地德语 *ˈsta:ssa*, 古英语 *stret*。德语的 *a:* 和英语元音 *e:* 的对应关系来自原始日耳曼语的 *e:*。古高地德语中日耳曼语音节中的 *t* 演变为 *ss*。英语这个词来自早期的日耳曼语, 是英语迁入不列颠以前从古拉丁语借来的。^①

苗瑶语和侗台语汉语借词的声调有一个特点。中古汉语词的平、上、去、入分别对应于苗瑶语和侗台语一些汉语借词的 A、B、C、D 四调。因为中古时期的苗瑶语、壮傣和侗水语都是四个声调的语言。因此那个时期的汉语借词分别读成苗瑶语和侗台语的四个声调。这些汉语借词的声调后来在它们的语言中随着这些语言各调类调值的变化而变化, 只要是中古属于汉语同一个调类的, 一般说来借词的声调还属同一类。这一类汉语借词通常称为老借词。苗瑶语和侗台语诸语中较晚的汉语借词声调只有与后来借给它们的汉语方言的声调相比较。

2. 词的废弃与创新

自然环境的不同, 生活方式的不同, 使得人们有不同的说明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居民用不同的词来表达他们的思想。环境的改变、制度的变化也要引起词汇的变化。不同的时代语言接触其他语言的机会不同, 借词也一直在改变着语言的词汇。语言的历史是旧词的废弃和新词的出现的历史。甚至语言的核心词或词根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也常常被替换。数以万计的古汉语词现在已不用了。

如今天在汉语的口语里“洗头”“洗脚”“洗衣服”都用“洗”。古汉语中“洗”原本专指“洗脚”。《说文》:“洗, 洒足也。”其他如《说文》:“浴, 洒身也。”“澡, 洒手也。”“沫, 洒面也。”“沐, 濯发也。”“浣, 濯衣垢也。”在今天汉语的口语中已见不到这样的分辨。“濯”这个词在书面语里也极少使用, 古汉语的“洒”现代不再用来表示“洗”了, 成为“灑”的简化字。

古汉语里第二人称代词“汝”常作“女”, 现在口语和书面语里都已不用。作代词的“汝”从语音看与“尔”不同。^② 许多语言原本没有第三人称代词, 通常用指示代词指第三者。汉语的“它”原本是指“蛇”, 现代“他”“她”“它”的分别是文字上的。

把其他语言或其他方言的说法借过来再创造自己的说法是常见的丰富词汇的手段。今天英语的许多词是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时期先借自拉丁语、丹麦语、法语的, 然后在这些

① 布龙菲尔德《言论》第 557 页。

② “汝”作为第二人称代词可能来自藏缅语。藏缅语中可构拟出 **na* 这样的读法(参阅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190 页)。自周至秦汉, 带有古羌戎语(古藏缅语)借词和底层词的汉语西部的方言往往把它们的藏缅语词传播开来。

词的基础上又派生出更多的词来。英语 due 来自法语, duty、dutiful 等词是英语中派生出来的。中古英语借用了大量的法语词,借用的法语词在一段时间里可与英语词并用,最终可能是废弃一种用法或并用词重新分工。如英语的 anda 曾与法语借词 envy“嫉妒”在中古英语中并用,到了乔叟时代 anda 被废弃。法语词 beef“牛”,借入英语后转指“牛肉”。“火”英语 fire, 法语 flame, flame 到了英语里指“火焰”。

甲骨文以“逆”为“迎”,刻为倒人形,从止。如,“王于宗门逆羌”(甲 896)。《方言》(卷一):“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后来“逆”转义为“叛逆”之“逆”,关西方言的“迎”取代了“逆”。

现代汉语用“黄金”表示“宝贵”,有“黄金地段”“黄金时间”之说。用“洋”表示来自外国,或进一步引申为指像是外国来的,有“洋博士”“洋专家”“洋芋”“洋玩意儿”“洋里洋气”之说。用“土”表示出自本地,或比较差,有“土专家”“土财主”“土包子”“土里土气”之说。近代汉语中用“番”表示来自外国的,如“番人”“番薯”“番茄”。“胡”曾用来表示外域的,如“胡人”“胡马”“胡琴”等。

南方方言中常依文读的读法创造新词。如“拖”温州话中白读为 tha¹, 文读为 thou¹。在“鞋拖”(即拖鞋)、“猫儿拖老鼠”中“拖”为白读。“地拖”(即拖把)“拖拉机”“拖延”“拖后腿”“拖欠”等中为文读。^① 现代见诸文字包含“拖”字的词,温州本地话都按文读构词。

3. 词义的变化

词所包含的意义经历了一段时间后往往有所变化。原有的词义涵盖范围变小时,通常是概念的区分比原来细致,原本一个词就能概括的用两个或多个词来说明。原有的词只好退居其次,用来表示较小的概念。当词义涵盖的范围得以延伸,意义就扩大了。原本是专名的,后来可能成为通名。有的词,它的意义一再引申,原来的意义为别的词所取代,或原义不为所知。

如上古汉语中“臭”,原本是指“气味”,包括“香气”和“臭气”,后来仅指“臭气”。《易经系辞》:“其臭如兰。”意思是说,它的气味(香)如兰花。“河”和“江”上古汉语中是专名,“河”即“黄河”,“江”即“长江”,后来成为通名。“文”甲骨文指人身上的“纹”,刻为胸口有纹之形。^②《考工记》:“画绩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到了汉代,“文章”用来指文艺作品,^③与文身没有什么关系。

身体部位的叫法古今或有所不同。古汉语“首”,中古以后称“头”,“首”成为“首脑”“首先”等词的构词成分。古汉语“目”,现代的多数方言中叫做“眼”或“眼睛”,“目”在“目光”“目前”等词中作为构词成分。古汉语“面”,北方方言中叫做“脸”,在“面子”“面孔”“路面”“正面”等词中作为构词成分。而“脸”原本只用于女人(女人擦胭脂的地方)。“轻匀两脸花,淡扫双眉柳。”晏几道这首词中的“两脸”是指女人的两

① “拖”,中古歌韵字。这一韵(平赅上去)的端组、精组字温州话中通常读作 ou 韵,如“多”“陀”“驮”“舵”“左”“做”。“拖”的白读 tha¹ 应是古方言的底层读法。“蛾”读作 mai²,“饿”读作 ɲai⁶ 来自早期的底层读法。大约在汉代的汉语方言中上古歌部的 *-ar > ai。

②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996 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下)第 551—552 页。

颊。“口”这个词在诸方言中为“嘴”所取代,保留在“口头”“口气”“口粮”“人口”等词中。少数身体部位的叫法,古今无异,如“背”“手”。也有一些是原词作为词根或合成词的一部分构成新词还用来指原来的部位。如,“鼻”→“鼻子”,“耳”→“耳朵”,“舌”→“舌头”,“眉”→“眉毛”,“发”→“头发”,“拳”→“拳头”,“膝”→“膝盖”等等。闽方言中多有存古的情况,如潮州话“眼睛”仍叫“目”,“脸”仍叫“面”,“鼻子”仍为“鼻”,“耳朵”仍是“耳”,“舌头”还叫“舌”。

以下是古英语或中古英语到现代英语词义变化的例子。古英语 *mete*“食物”>现代英语 *meat*“食用的肉”,古英语 *dēor*“野兽”>现代英语 *deer*“鹿”,古英语 *hund*“狗”>现代英语 *hound*“一种猎犬”。中古英语 *bridle*“小鸟、幼雏”>现代英语 *bird*“鸟”,中古英语 *dogge*“一种狗”>现代英语 *dog*“狗”。^①

语言中往往因为避讳而造成某些词不能用。社会组织处于比较原始状态时,图腾的名称不能说。中国古代皇帝名字所用的字不能说。与性有关的词也要回避,甚至有的同音词因此改了读法。“野鸡”古代叫做“雉”,因汉时的吕后名“雉”,于是“野鸡”代替了“雉”。“尿”《广韵》奴弔切,这个字或作“溺”,两个字今读法不同。方言中“尿”读作 *sui*,是为了回避不雅的说法。

4. 同源词根和同源词

词根(*root*)是词中表示语义的主要语素。屈折形态中词根的形式较难区分,元音和辅音也可能有所变化,甚至很难指出词根的原形。粘着形态中词根的形式比较清楚。分析形态中的词根是独立的。即便是典型分析形态的中古汉语,也不是纯粹的分析形态。无论是共时还是历时的研究中,把词根和它们的派生形式区分开来都是很有必要的。来自祖语或祖方言的同源词根的识别建立在对它们的语音和形态历史演变研究的基础上。而它们的语音和形态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又与同源词根的识别有密切关系。所以词根的研究在历史比较中是很重要的。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中,如果忽视所比较亲属语的历史形态及语音的历史变化,只是简单地说汉语中的某某词与其他汉藏语中的某某词有同源关系,是不对的。来自祖语的同源词根在不同的亲属语中可能有过形态的变化,是在亲属语各自演变的基础上的变化,我们所比较的往往是同源的词根及其形态成分的演变形式,而不是简单的词与词的对应。试比较分别属于不同语族的几种藏缅语的数词:

	一	二	三	四	五
藏 文	<i>gteig</i>	<i>gn̥is</i>	<i>gsum</i>	<i>bzi</i>	<i>l̥ɣa</i>
缅 文	<i>tas⁴</i>	<i>hnas⁴</i>	<i>tθum³</i>	<i>le³</i>	<i>ŋa³</i>
景颇语	<i>lā⁵⁵ŋai⁵¹</i>	<i>lā⁵⁵khon̥⁵¹</i>	<i>mǎ³¹sum³³</i>	<i>mǎ³¹li³³</i>	<i>mǎ³¹ŋa³³</i>
卢舍依语	<i>pa-khat</i>	<i>pa-hni</i>	<i>pa-thum</i>	<i>pa-li</i>	<i>pa-ŋa</i>

藏文转写的古藏语的数词 1~3 都用 *g* 前缀,“四”用 *b* 前缀,“五”用 *l* 前缀。缅文转写的古缅语这几个数词的前缀已丢失,景颇语用 *lā*-和 *mǎ*-前缀,卢舍依语(*Lusei*)用 *pa*-前缀。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527 页。

古藏缅语还有过*-g后缀,如喜马拉雅语支的马加里语(Magari)“一”kat,与卢舍依语等库基语支语言的读法相近。古缅语说明古藏缅语数词用过-s后缀。原始藏缅语数词“一”*g-ti-g,“二”*g-ni-s,“三”*g-sum,“四”*b-li,“五”*l-ŋa。景颇语“一”和“二”的词根恐怕另有来历。藏缅语不同亲属语的这几个数词的词根较为一致。分布在印度的喜马拉雅语支的吐龙语(Thulong)数词用-le后缀。如“一”kole,“二”na-le,“三”su-le,“四”bo-lē,“五”ŋo-lo。

古藏语多用后缀,但*-n后缀更为古老。如,“偷”rku/“贼”rkun po,“老”rga/“老头”rgan po,“疯”smjo/“疯子”smjon pa,“剥皮”bɕu/“皮”ɕun pa,“屠宰”bɕaŋ/“屠夫”bɕan pa。^①又如,“乳房”nu ma→“吸乳”nu ba→“喂乳”s-nun pa, s-是使动前缀。“乳房”道孚语 nu nu,独龙语 nuŋ⁵⁵,缅文 no¹(<*nu?),克伦语阿果话 ny³¹,原始藏缅语*nu(-g)。汉语“乳”见于甲骨文,刻为母哺乳形,上古音*no-g。汉语该词的词根与藏缅语的词根有同源关系。

在语言学词典中“同源词”(cognate, cognate words)也指“同根词”。在汉藏语同源关系的研究中通常也是笼统地把不同语言中包含着同源词根的词叫做同源词。这可能让我们忽视了古代不同语言中同源词根由于形态的变化造成的差异。如“新”,藏文 gsar pa,词根是 sar,分布在尼泊尔喜马拉雅语支的坎语(Kam)sār-o,-o是坎语的形容词后缀。阿昌语 ɕək⁵⁵,缅文 tθas<*sak-s,那加语(坦库尔方言)ka-thar。^②原始藏缅语“新”可构拟为*g-sar和*sar-g。汉语“新”是“薪”的本字,见于甲骨文,“辛”是声符。“亲”“新”等字为-n尾韵,“遲”亦以“辛”为声符,古音为*-r尾。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新”原本是*-r尾,与藏缅语的读法有同源关系。词源研究在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中无疑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六、系统间的关系

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提到语音、形态和词汇三个系统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是密切相关的。语言是表达信息的符号系统,表达的信息负载在约定的符号上。语音是形式,词法形态是表达形式的约定,词是语音和形态跟概念相结合的约定。语音、形态和词三个方面可分别作为历史比较的对象,但应注意到同一个总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1. 语音系统和形态系统的关系

语音系统和形态系统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两个系统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上。语言的形态,就其狭义的形式而言,由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如元音和辅音的变化,声调的变化,音节的附加等。不同语音层面上的形态形式可以互相转移。当语言产生声调后,原本用元音或辅音的屈折形式来表示的形态形式可能用声调的变化来表示。原本以音节作为形态形式的,作为形态成分的音节可能弱化,由粘着形式变成屈折形式。也可能发生粘附的形态成分完全脱落,原有的形态特征转移到词根上,成为屈折形式。如:

① 金理新《汉藏语的名词后缀*-n》,《民族语文》1998年第1期。

②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188页。

	藏文	藏语拉萨话	藏语夏河话	缅文	仰光话
断	tɕhag	tɕha ⁵²	tɕhaɣ	kjo ³	tɕo ⁵⁵
弄断	gɕeog	tɕa ⁵²	htɕaɣ	khjo ³	tɕho ⁵⁵

“棍子断了”的“断”，在藏缅语中是自动词，“把棍子弄断”的“断”是派生的使动形式，藏文中以 g 为使动前缀。现代藏语拉萨话中这个词的使动前缀 g 已完全丢失，原来词根的声母由于前缀的影响从送气变成不送气还保留着。古缅语已用不送气和送气的声母表示自动和使动的对立。

语言现有的形态系统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形态形式共存于一个系统中。语言中所包含的不同的形态总是处在旧的系统被破坏，新的形式在出现的过程中。新的形式可能由于类推的作用成为一定范畴中的系统性的东西。语音的历史演变先是改变了形态成分的形式，然后危及它的系统，引发形态系统的变化。新形态系统的出现也可能与语音系统有密切关系。如汉语，由于音节形式的简化，上古末期以来复音词，尤其是双音节词常用来代替原来的单音节词。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子”“头”这样的后缀和“老”“阿”这样的前缀应运而生，成为构词的成分。“打”原本是动词，《广韵》“击也”，现代汉语中起到前缀的作用。从“打人”“打铁”到“打票”“打字”“打赌”“打嗝”“打尖”“打光棍”“打哑谜”“打摆子”“打哈哈”等等。ta³-加在名词前派生出与这个名词有关的动词。“起来”“下去”等起到后缀的作用，如“说起来”“看起来”“听起来”“做起来”“说下去”“听下去”等等。

古汉语用“之”表示所属，中古早期的北方方言中用“底”。南唐《祖堂集》中“底”已成为汉语传统语法所说的“结构助词”和名物化的后缀。^① 宋元时代开始用“的”代替“底”。一方面这是形态形式的延续，另一方面是语音形式的变化。

而语音系统的演变也受形态发展的影响。如，由于后缀“儿”等的普遍使用，北京话中出现一系列的儿化韵。独龙语的长元音只出现在形态变化中。^② 形态系统的规则要求语音有特殊的表达。像藏语、嘉戎语和道孚语这一类语言繁复辅音系统的形成便与它们的形态系统的要求有关，而不是原本就是这样的。

2. 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关系

语音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系统，在历史演变中坚持自己的格局。词是语言基本的语义单位。语音是词的外在形式，语音的变化表现在词的读法上。语音的演变在不同的词中不是孤立地变化，而是成批地变。同一类的音，可能没有例外地都变了，也可能有一部分没有变。

词的读音支持着语音系统。如汉语方言中往往只有几个词支撑着鼻音分清浊的格局。如北京话里“猫”通常读成清鼻音的 mau¹，也有读作 mau²；“孬”读作 nau¹，“挠”读作 nau²。温州话里 mai¹ 是对小孩子的昵称，mai⁵ 是对小孩子通常的称呼；a¹ ni¹ “阿孃”是对长一辈女性的尊称，ni² ni² 指“祖母”；“扭”有 nau¹ 和 nau² 两读，前者

① 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

② 戴庆厦、刘菊黄《独龙语木力王话的长短元音》，《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杨将领《独龙语的长元音》，《民族语文》2000年第2期。

是及物动词,后者是不及物动词。温州话清鼻音声母最初可能来自早期汉语带*s-前缀的鼻音声母,不管怎么说,如今只是演变的残存。如果最后的支撑点失去了,表达系统的格局就改变了。

语音演变的结果可能使某些音位负担过重,结果是同音词过多,可能要求语音发生变化,分化出新的音位,引起语音系统的变化。一般说来,有复辅音的语言,元音比较简单;而辅音系统较简单的语言,元音系统较复杂。从古藏语到现代藏语拉萨话,是具有复杂的复辅音和简单元音的语音结构向辅音系统较简单元音系统较复杂的语言的演变,其演变的机制是表达上的需要。中古以后的汉语北方方言声韵调系统在简化,复音词一直在增加,也是表达的需要。

3. 形态句法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关系

形态是构词的规则,句法是构成句子的规则。句法范畴与词法范畴有互补关系。两个范畴的表达经常地处于变化中。词汇意义上的表达可成为句法上的表达。古印欧语较少使用人称代词,人称范畴的意义在动词的屈折变化中得以体现。现代印欧语,如日耳曼语,人称代词的反身形式是后起的。

形态的形式是历史的产物。古英语动词词尾的变化相当复杂,多数弱式动词的过去式是在原形后加-ed、-ode 和 -de 等后缀,名词的复数形式也相当复杂。到了中古时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古英语的强式动词成为弱式动词(规则动词),-ed 已成为弱式动词的后缀,一直到 18 世纪时,-ed 的 e 还是发音的。中古早期英语名词的复数用-(e)s 和 -en 表示。到了 13 世纪,北部地区的方言多用-(e)s 来表示名词的复数,南部地区的方言普遍用 -en 表示名词的复数。经历了十几个世纪,英语动词的过去式才规范成以相对统一的后缀来表示。类推的作用是由一个一个词的历史来实现的。英语动词过去式的形态的历史是从屈折形态向粘着形态演变的历史。

汉语从上古末期以后先是向着中古的分析形态演变,中古以后越来越多地用“子”“儿”等后加成分,从分析形态向粘着形态演变,这一类型的复音词也越来越多。

当语言或方言借用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词时,往往连同那些词所带的构词成分也一起借过来。中古英语在借用法语词的同时,由于类推作用,把法语的一些构词成分也在英语中推开。如法语的后缀 -age、-able、-ess、-ment、-ance 等成为英语的构词成分。汉语的“匠”作为借词在壮语武鸣话中,如“木匠”mok⁸ ɕiəŋ⁶、“铁匠”ɕaŋ⁶ tiət⁷。在壮语靖西话中成了构词成分,“木匠”tsaŋ⁶ mai⁴、“铁匠”tsaŋ⁶ le:k⁷。①

思考题:

- (1) 汉藏语语音史的研究方法与印欧语的有什么不同?
- (2) 语音格局演变有什么特点?
- (3) 形态的演变有什么特点?
- (4) 举例说明亲属语的同源词根。
- (5) 语音系统、形态系统和词在各自的历史演变中相互间有什么关系?

① 张均如等《壮语方言研究》第 659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年。

(6) 汉语不同方言的声调有对应关系, 以下是汉语不同方言不同声调的读音, ①请根据它们的对应情况说明古方言中可能发生的声调的分化和合并。

	北京	济南	苏州	温州	广州	厦门
风(平)	fəŋ ⁵⁵	fəŋ ²¹³	foŋ ⁴⁴	hoŋ ⁴⁴	fuŋ ⁵³	həŋ ⁵⁵
雷(平)	lei ³⁵	luei ⁴²	le ²⁴	lai ³¹	ləy ²¹	lui ²⁴
海(上)	xai ²¹⁴	xɛ ⁵⁵	hɛ ⁵²	he ⁴⁵	hɔi ³⁵	hai ⁵¹
近(上)	təin ⁵¹	tɕie ²¹	dzin ³¹	dziaŋ ³⁴	khən ²³	kun ³³
正(去)	tʂəŋ ⁵¹	tʂəŋ ²¹	tsən ⁴¹²	tseŋ ⁴²	tʃɛŋ ³³	tsĩāŋ ¹¹
大(去)	ta ⁵¹	ta ²¹	dəu ³¹	dəu ²²	tai ²²	tua ³³
角(入)	tɕiao ²¹⁴	tɕia ²¹³	koʔ ⁴	ko ³²³	kək ³³	kak ³²
直(入)	tʂɿ ³⁵	tʂɿ ⁴²	zyʔ ²³	dzei ²¹²	tʃɿk ²	tit ⁵

参考书目: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 袁家骅译,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
 王力《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1980 年。
 傅懋勣《论民族语言调查研究》, 语文出版社, 1998 年。
 金鹏《藏文动词屈折形态在现代拉萨话里衍变的情况》, 《金鹏民族语文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①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语文出版社, 1995 年。

第四章 发生学关系的研究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揭示了印欧诸语的发生学关系,于是学科的视野扩大到印欧系以外的语言。汉语与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得到了肯定,并把它们与苗瑶语、侗台语联系起来。太平洋诸岛、台湾和马达加斯加的语言被认为有发生学关系,统称为南岛语(Austronisian)。

任何语言都包含着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在语言演变的历史中,这三个系统各自独立地发生变化,又互相影响。不同亲属语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以后,它们的这些系统大多差别很大。而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由于历史上的接触也形成某些方面的相似。

一、原始语和祖方言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为了探究语言的源头或指出亲属语的关系,称一种语言或一组亲属语的祖语为原始语。印欧语系诸语的共同祖语称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汉藏语系诸语的共同祖语称为原始汉藏语(Proto-Sino-Tibetan)。壮傣语支是侗台语的一个支系,又称为台语,这一支中的语言有壮语、布依语、傣语、泰语、老挝语等,它们的共同祖语称为原始台语。侗台语的这一族中共有壮傣、侗水、黎和仡央四支,它们的祖语就是原始侗台语。较早时的原始侗台语分化出不同的方言,其中的四种方言就是后来这四支的祖方言,其他在历史上可能存在过的古侗台语的方言因无后代的方言而无据可查。原始语中最初分化出来的方言称为祖方言。我们也把一组方言的早期的共同方言称为它们的祖方言,把一组亲属语直接的祖语称为它们的共同语。

1. 原始语

历史语言学在说明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之时,又用历史比较和构拟的方法解释亲属语之间的分歧,探求它们的历史。原始语言 and 不同历史阶段共同语的构拟是为了解释亲属语之间的联系。原始印欧语构拟中提出的问题促使波浪理论的出现。施莱赫尔曾为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写了一篇寓言《山羊和马》。^①但这一创举没有得到肯定。因为我们很难把古代语言的所有细节都弄清楚。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材料构拟原始语。原始语是根据亲属语的材料构拟的,而不是拼凑的。如原始印欧语构拟为屈折语,原始汉藏语构拟为粘着语。汉语的分析形态应是后起的。汉语词的读法中残存着类似于藏语等的形态。

汉藏语的构拟中不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语言中的语音演变进行深入研究,仅

^①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73 - 74.

根据不同方言的共时现象而作的叠床架屋式的构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语言的结构中包含着语音、形态和词汇系统,它们总是处在系统的演变之中。结构的完整、平衡和对称是相对的。就拿语音系统中的音位系统来说,北京话擦音有卷舌的一清一浊 $\mathfrak{s}$ 和 $\mathfrak{z}$,不卷舌的只有 s 没有 z 。塞音和塞擦音只有清的没有浊的,清的还分送气和不送气。这些结构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英语动词的形态中规则动词的过去式等加-ed,少数动词保留着不规则的变化,有的除了规则变化外还有残留的不规则变化。如果今天的北京话和通用的英语是几百数千年前的祖语或祖方言,我们怎么来构拟它们呢?如果用我们手头的材料来构拟原始印欧语、原始汉藏语,或某些语支的原始共同语,我们很难设想它们真的是“原始的”,具有完整、平衡和对称的音系结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实际上的或潜在的原始语。”^①

有一种流行的自我矛盾的说法,认为原始语中原本就包含着不同的方言。布龙菲尔德说:“根据实际的观察,没有一个言语社团曾经是完全统一的。”^②他们把印欧语不同支系之间不能解释的交叉特点归于原始印欧语内部原本有分歧。紧接着他又说:“我们描写一种语言,可以暂不理睬它的内部分歧,专注于任意选定的一种语型,把其他的变异类型留待以后再讨论,但是要研究语言的变化,我们可不能这样办,因为一切变化必然首先表现为变异的特征而出现。”^③布龙菲尔德这种矛盾的态度应来自不肯承认独立的社团方言可以视为一种方言,代表一种语言。

2. 不同历时阶段的划分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历史:语言的历时的演变和亲属语分化的演变。于是我们也有两种划分语言历史阶段的方法。

(1) 语言的历时演变阶段的划分

汉语,通常区分为原始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把商周至秦汉时代作为汉语的上古时代,但跨度很大,又把上古汉语区分为上古早期、上古中期和上古末期三个阶段。汉语上古中期的面貌以《诗经》的文献为代表,汉代是上古的末期。^④南北朝时代为汉语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时期。像汉语这样积累有从商周到明清三千多年文献资料的语言,从有的文献中甚至能考察出一二百年中语音的变化,类似于上述这样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仍嫌粗略。

(2) 亲属语比较中的不同历史阶段

方言及亲属语的不同特点可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把它们的历史演变追溯到它们的祖方言及原始语的时代。由于方言及亲属语可以根据它们历史上的主要的创新对它们的历史层次或谱系关系作出说明,对这些创新的历史次序加以区分,就可能对方言及亲属

① Roger Las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72.

②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39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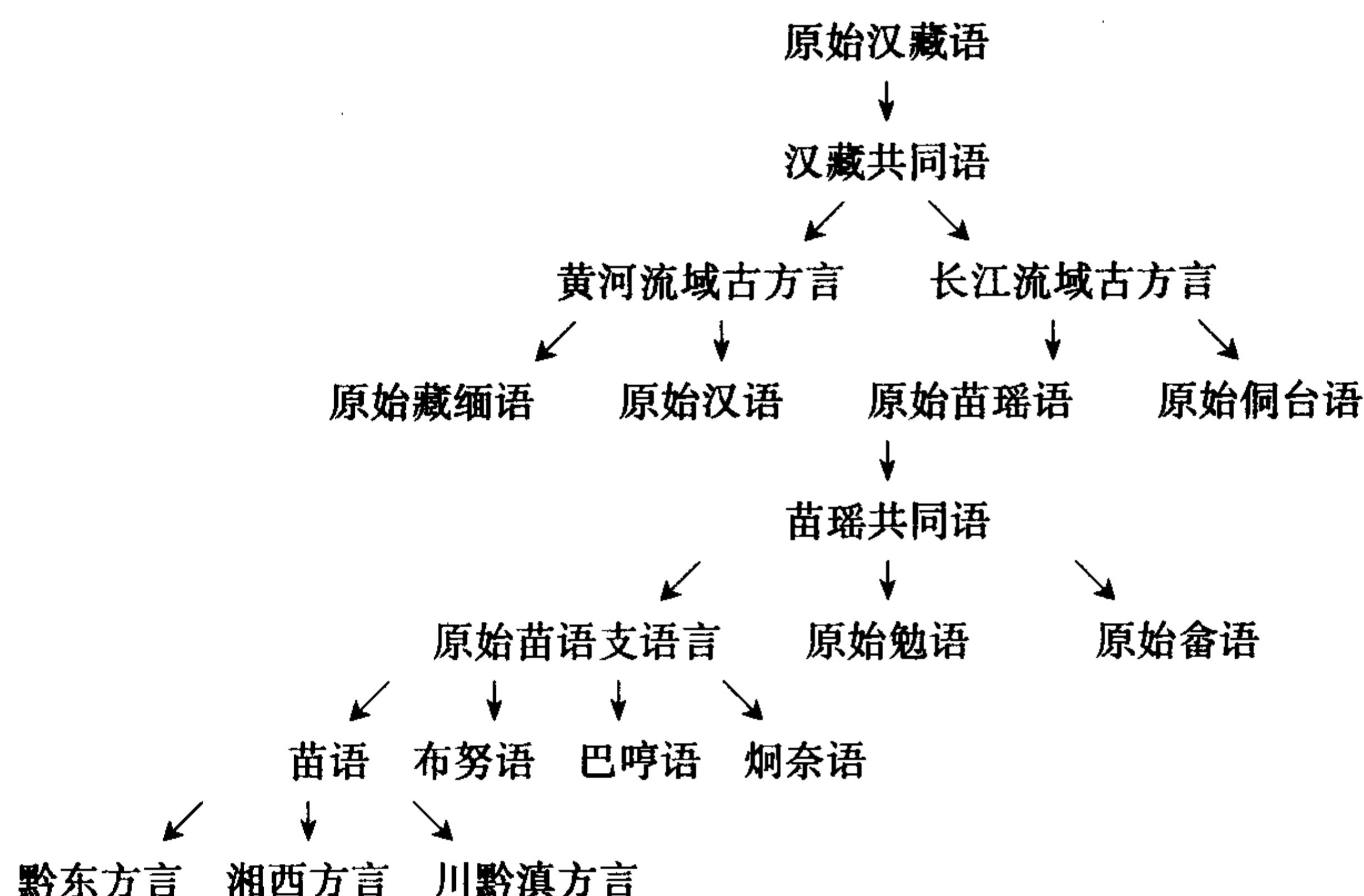
③ 同上,第 391 页。

④ 王力先生的意见是:公元 3 世纪以前为上古期,3~4 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 4 世纪到 12 世纪为中古期,12~13 世纪为过渡期;公元 13 世纪到 19 世纪为近代;20 世纪为现代。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上)第 35 页。

语历史演变的阶段进行划分,或者在未能完全认识它们的历史之前作出大致的区分。

汉藏语的研究中我们假定:数千年前有汉藏黄河流域古方言和长江流域古方言两个主要的方言,它们来自原始汉藏语。前者分化出原始藏缅语和原始汉语,后者分化出原始苗瑶语和原始侗台语。原始苗瑶语到了苗瑶共同语时期产生了鼻冠塞音,并分化为苗、瑶(勉)和畲三支。

从原始汉藏语到现代苗语的不同方言,它们的不同历史阶段可大致区分为:



二、语音对应的解释和构拟

语音的演变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可是系统总能保持一定的格局。亲属语或方言既然有共同的来历,系统的结构上必定是有共同来源的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语言一定历史阶段结构上的构拟是对此后分化的解释。

1. 语音的对应

(1) 发生学关系的对应

我们要区分两类不同的语音对应关系——发生学的对应关系和非发生学的对应关系。发生学的对应关系是亲属语或方言的同源词或同源词根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如苗语黔东南方言养蒿话、湘西方言腊乙坪话、川黔滇方言大南山话、野鸡坡话和甲定话同源词之间的这种语音对应关系。而非发生学的语音对应关系又有种种不同情况。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之间往往有巧合的对应,这种对应与系统对应无关,牵强的解释则没有说服力。发生学关系的对应可能是直观的,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无关,但实际上是经历了复杂的语音演变仍保持的对应关系。“两种语言之间相符的事实愈特殊,这个相符之点的证明力量就愈大。”^①如,数词“二”拉丁语为 duo,希腊语为 dyo,亚美尼亚语(亚尔明尼亚语)为 erku。亚美尼亚语的读法表面看与希腊语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亚美尼亚语的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23 页。

erk-与希腊语的 dw-有对应关系。“怕”，亚美尼亚语 erki-，希腊语 dwi-。“长”，亚美尼亚语 erakar，希腊语 dwarón。亲属语之间这种差别很大但一致的对应关系显然不是借用造成的。

如果只是发现个别词之间的语音和语义上的相似，是不能称为发生学上的对应关系的。两种语言语音和语义上的一系列的对应关系才是历史语言学要研究的对应关系。

(2) 借用的对应

语言间的借用，尤其是一定数量的借词也会构成成组的语音对应关系，支持某种假说。亲属语之间近期的密切接触会造成一些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如侗台语族仡央语支的布央语跟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有近期密切的接触关系，不少词有相近的读法。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语言在它们的共同语阶段曾从当时的汉语南方方言借了不少词，构成各种不同类型的语音对应关系。中古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汉语借词也构成不同的语音对应关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对应关系被作为侗台语和汉语有发生学关系的证据。越南语是南亚语系的语言，但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主要是早期的借词，也曾使研究者误认为越南语跟汉语有较相近的发生学关系。

2. 语音对应关系的解释

(1) 音素对应关系的解释

梅耶关于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数词对应关系的解释可以作为例子：

	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一	un, une	uno, una	uno, una
二	deux	due	dos
三	toris	tre	tres
四	quatre	quattro	cuatro
五	cinq	cinque	cinco
六	six	sei	seis
七	sept	sette	siete
八	huit	otto	ocho
九	neuf	nuove	nueve
十	dix	dieci	dies

对应的情况可以假定这三种语言的数词同出一源。其中差别较大的是“八”，法语 huit、意大利语 otto 和西班牙语的 ocho。

法语的 uit 与意大利语的 ott 及西班牙语 och 等的对应关系，如：

	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夜	nuit	notte	noche
煮	cuit	cotte	—
乳	lait	latte	leche
事实	fait	fatto	hecho

进一步的比较表明意大利语的 otto 不能借自法语的 huit 和西班牙语的 ocho。

(2) 声韵调对应关系的解释

语言之间读法碰巧相近不说明什么。亲属语或方言之间有的读法往往差别很大。如苗语方言中有这样一组词：①

	白	黑	狗	鹰
养蒿	lu ¹	le ¹	la ³	laŋ ³
腊乙坪	qwə ¹	que ¹	qwu ³	qwen ³
大南山	tleu ¹	tlo ¹	tle ³	tləŋ ³

这一组词中黔东南方言养蒿话的声母 l- 与湘西方言腊乙坪话 qw-、川黔滇方言大南山话 tl- 分别有对应关系。这一种对应关系绝非出自偶然，它们的不同读法必定来自原始苗语的一种声母。

苗语的方言土语大多数是 8 个调，野鸡坡话是 4 个调。野鸡坡的每一个调分别与养蒿和大南山的两个调有对应关系。有的土语的声调比较复杂，但诸方言土语声调的对应关系是清楚的。② 苗语中的中古汉语借词的声调在苗语诸方言中泾渭分明，根据它们与汉语中古声调的对应关系，古苗语的声调定为 A、B、C、D 四调，分别和汉语中古的平、上、去、入诸调对应。古苗语的四个原始调在野鸡坡话中仍能保存，在养蒿和大南山话中分别因古声母的清浊分化为不同的调。于是标调的方式有两种，标实际的调值或标调类。8 个调的方言土语用单数表示古声母是清的，用双数表示古声母是浊的。

苗语诸方言都没有塞音韵尾，有简单的鼻音韵尾。如：③

	黑	日	虱子	问
养蒿	le ¹	nhē ¹	te ³	ne ⁶
腊乙坪	que ¹	nhē ¹	te ³	ne ⁶
大南山	tlo ¹	no ¹	to ³	no ⁶
野鸡坡	qlaŋ ^A	na ^A	taŋ ^B	na ^C
甲定	tləŋ ¹	nhəŋ ¹	təŋ ³	nhəŋ ⁶

表中这些词的元音有一致的对应关系，韵尾的情况较为特殊。野鸡坡话这一类韵的词当声母是鼻音时不带鼻韵尾，不是鼻音声母时带鼻韵尾。“黑”如苗语支炯奈语 klaŋ¹，畲语多祝话 kjaŋ¹。原始苗语、原始苗语支共同语这个词是有鼻音韵尾的。苗语这一韵的词原来都带鼻韵尾。野鸡坡话中由于鼻音声母的异化，“日”“问”两词丢失了鼻音尾。

(3) 语音系统的对应关系

个别的语音对应关系只有放到语音系统中考察才有意义。如上文苗语诸方言“白”“黑”“狗”“鹰”和“黑”“日”“虱子”“问”两组词的比较包含着声、韵、调三个方面对应的比

①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 38 页，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4 年。

② 同上，第 3 页。

③ 同上，第 58—59 页。

较。任何一方的不对应就有必要作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我们很难设想原始苗语什么样的声母会成为不同方言中的这个样子。单凭这两组对应关系来拟测原始苗语的声母是不够的。王辅世先生在他的《苗语古音构拟》中列出了苗语诸方言的 130 组的声母对应关系,把“白”“黑”“狗”“鹰”这一组词的声母拟为 *ql-。如苗语川黔滇方言罗泊河次方言野鸡坡话里“白”读作 qlo^{31(A)}，“黑”qlaŋ^{31(A)}等。养蒿话中原始苗语(或古苗语)的 *-l- 由于 *q- 的缘故成为清音,而在腊乙坪话中成为 -w-。大南山话中塞音 *q- 由于 *-l- 的缘故成为 t-, 全部得到解释了。

3. 文献的利用

文字记录的文献是语言工作者可资利用的材料。即使是拼音文字记录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一番研究才能从它们的符号中分析出它们所代表的语音。拿书面语文献作为语言比较的依据,必须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甄别。

(1) 书面语材料的分析

确定书面语的语音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汉语白话文书面语倾向于反映权威方言的语法和词汇,而文言文反映的是较早时期的语法和用词。我们从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不能得出书写人的读法。

汉字的谐声依据是谐声时代的方言读法。周早期出现的谐声字反映的是周早期某种方言的读法,春秋时代才出现的谐声字反映的是春秋时代的读法。

藏文是拼音文字。其拼写法相传是 7 世纪上半叶创制的。拼音文字在创制之初一般能反映当时的读音,几百年后拼写与实际读音就不一致了。10 世纪后藏文的正字法又对藏文的拼写做了一些规定。^① 现代的一些词又是根据古代的拼写法和现代的读音拼写的。现代英语原有词的拼写反映的是 17 世纪的读法。

(2) 转写就是构拟

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常常要对古代的拼音文字的文献进行转写。这是用一种符号系统来代替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表述。

现代藏语有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相互间不通话。今天藏语诸方言的读法的对应关系可与古藏文的拼法比较,古藏文所依据的方言是今藏语诸方言的祖方言。藏文创制时代及后来厘定时代的读音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拟定。我们没有那些时代的录音。

7 世纪初的隋代出了本叫作《切韵》的韵书,用反切来表示汉字的读音。宋代的韵书《广韵》是《切韵》的扩充版。根据这些韵书读音的分类和反切的用法可以对中古汉语声、韵、调诸类的结构框架作出描写。但要确切地说明《切韵》系统的声韵调的各项音值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汉语音韵学要考虑《切韵》的系统性,那个时代它到底代表哪一地区的方言,它的后代方言分布在今天的何处。

(3) 文献材料的作用

印欧诸语发生学关系的确认建立在以古代语言文献为依据的比较和构拟的基础上。但许多语言原本没有文字,或它们文字的历史不足以证明它们与有可能跟它们有发生学

^① 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民族语文》1991 年第 6 期。

关系的语言的亲缘关系。如印欧语最早的文献是三千多年前的《梨俱吠陀》，也只能说明古印度—伊朗语的面貌。印度—伊朗语与其他印欧语的发生学关系是在诸语支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索绪尔说：“印欧语语言学在它的早期没有了解比较研究的真正目的，也没有了解重建方法的重要性。这可以解释它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错误：在比较中赋予梵语过分夸大的、几乎独一无二的作用；由于它是印欧语的最古文献，于是把这文献提升到了原始型的高贵地位。”^①如果没有亲属语的比较，文献转写和某一时代的读音的构拟也是很难做到的。

文献的用处有多种，只要与研究对象有语言学上的关联就有价值。藏文、缅文等古拼音文字的文献在藏缅语和汉藏语历史比较中很有价值。汉语的文献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到近现代，虽非拼音文字文献，但以一脉相承的文字系统对一种语言连续的记录是世所罕见的。三千多年前的古梵语文献的利用为印欧语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汉藏语的比较中，古藏语和古汉语文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印欧语历史比较中以音位系统为构拟对象，汉语中古音、上古音的构拟虽然也是以音位系统为构拟对象，但有自己的特色，诸家总是从声、韵、调的研究入手，因为所依据的材料的性质不同。印欧语所依据的主要是拼音文字的文献，汉语所依据的主要是中古的韵书《切韵》和反切、上古《诗经》等的押韵和谐声等材料。东汉时代的《说文》中已有汉字形、音、义的解释。稍晚出现的“反切”是一种注音法。要从反切的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中求得当时的读音，还是要对上字和下字的系统分别进行归纳，在声、韵、调的框架中构拟读音。谐声材料的使用也有所依材料的时代问题。较晚的材料不能说明较早的谐声关系。早期的文献往往是稍晚整理的，有的字经过改动。

中国的语言学发轫于文献用词的解释，即训诂学。如《尔雅》：“如、适、之、嫁、徂、逝，往也。”扬雄在他的《方言》（卷一）中解释说：“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往，凡语也。”扬雄《方言》中既有方言的比较也有古今语的比较。《方言》（卷一）：“秦晋之间凡物之大谓之赧，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樊，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

另外，无亲缘关系语言的古音材料也可以作为古音构拟的重要参考资料。如高本汉利用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等中古汉语借词的读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前文我们谈到李方桂先生推测中古汉语透母字(th-)来自上古*hl-(*!-)，以唐代的藏文文献为佐证。我们当然考虑到这是符号的再转换，音值的再构拟。

非汉藏语材料的利用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学者奥德里古尔(A. G. Haudricourt)对于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的研究。古汉语读作去声和上声的音节借到越南语中分别读作两类，每一类由于声母的清浊又分别归入两个声调。越南语与它的亲属语——其他孟高棉语比较表明，跟去声有关的问声和跌声来自*-s，跟上声有关的锐声和重声来自*-ʔ。^②于是可以设想汉语读作去声的借入越南语时带*-s韵尾，上声带*-ʔ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00页。

② A. G. 奥德利古尔《越南语声调的起源》，冯蒸译，袁家骅校，《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韵尾。

4. 语音系统的构拟

梅耶强调了系统比较的重要。他说：“比较方法既然是建立语言史的唯一方法，因此，一种语言只要是孤立的，就没有历史可言。”“就系属已经确定并且按照一定方法研究过的各组语言来说，对它们进行比较的办法，就是在它们之间构拟出一种原始的‘共同语’来。这并不是提出语言之间一些局部的相符合之处，语言里头每一项事实都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不当把一件琐碎的事实和另一件琐碎的事实拿来比较，而应当把一个语言系统和另一个语言系统拿来比较。”^①

印欧语发生学关系的研究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150多年。代表性的著作早期有：葆朴的《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索绪尔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等。印欧诸语的形态系统和语音系统及原始印欧语的语音和形态的构拟在印欧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明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特鲁别茨柯伊抛弃关于印欧语同一起源的设想，用语言联盟的概念代替语系的设想曾受到批评。^② 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中除了语音、形态和词汇系统的比较外，就是一再强调的系统的历史性。

(1) 亲属语的比较

语言诸系统的演变是一代一代的，许多年以后不同的亲属语的系统有较大的差别。比较两种差别较大的亲属语，要对它们的历时情况作出解释。^③

语音系统的构拟有两种依据，一种以那一个时代的该语言的文献为依据，另一种以其后代方言的读法作为依据。

高本汉在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中古汉语的声类和韵类作区分的基础上，参照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构拟了汉语中古音。他的构拟基本上为后来的学者所肯定。

古代没有文字的语言，它们的构拟只有依据后来的记录。苗语现代诸方言的音系结构上有如下对应关系：(1) 所对应的韵母较所对应的声母简单；(2) 诸方言的声母系统普遍有塞音、塞擦音、鼻音、清鼻音、边音、清边音、小舌音、鼻冠塞音等的对应关系。这些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表明原始苗语或古苗语的声母系统相对较复杂，这个系统可能包含有上述普遍分布的音位。如果某些特点是苗语分化以后形成的，要找出分化的条件。如王辅世先生所说明的：“要想找出苗语的声类和韵类，必须进行方言比较。进行方言比较当然代表点越多越好，但我们认为同一个方言或次方言选用许多个点却没有必要，因为既属于同一方言或次方言，其语音差别不大，在比较时，徒费篇幅，得不出更多的结果，如果代表点太少，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构拟所依据的是苗语湘西方言、黔东南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的7个次方言共9个点的方言材料。^④

构拟为*mp-的声母苗语诸方言点通常有鼻冠唇塞音，其对应关系如：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11页。

②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237—238页。

③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5、23页。

④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1页。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甲定	野鸡坡
猪	pa ⁵	mpa ⁵	mpua ⁵	mpa ⁵	mʔpei ^C
梦	pu ⁵	mpei ⁵	mpou ⁵	mpo ⁵	mʔpu ^C
披	pa ⁵	—	mpua ⁵	mpu ⁵	—

苗语以外苗语支的布努语、巴哼语等也有唇塞音和鼻冠唇塞音的对立。“猪”，布努语七百弄话 mpa⁵，巴哼语 mpe⁵；“梦”七百弄话 mpa⁵，巴哼语文界话 mpi⁵。可见古苗语是有塞音与鼻冠塞音对立的语言。

关于苗语的塞擦音，张琨先生说：“并非所有苗语的塞擦音声母在原始苗语都是塞擦音。就像我们所见到的，有的是后随 *r 或 *l 的塞音的反映形式。另一些又是来源于后随 *j 的舌根塞音。但有一些塞擦音，原始苗语必须构拟为塞擦音……”^①王辅世先生构拟的 *dz- 声母诸点的读法如：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甲定	野鸡坡
九	tə ²	tə ²	təua ²	təu ²	za ^A
膝盖	təu ⁶	tə ⁶	təau ⁶	tə ⁶	zu ^C
骑	təi ²	—	təai ²	—	ze ^A
荞麦	—	—	təe ²	təæ ²	zi ^A

这一声类似乎应听取张琨先生的意见加以修改。“九”，畲语多祝话 khju²，巴哼语文界话 kŋo²，勉语大坪话 ku² 等，原始苗语的声母可能是 *gi-。“茄子”“荞麦”是稍晚才有的作物。“茄”东汉时汉语中是指“莲茎”。《说文》：“茄，芙蕖茎。”“茄子”先是在岭南种植，后来才到中原。“茄”，汉语中古音 *gi²。“茄子”，勉语大坪话 kje²，苗语养蒿话 təa²，应是汉语借词。“骑”，汉语中古音 *gie²，养蒿话的 təi² 也是中古汉语借词。^②

如张琨先生所说的苗语 *j- 与舌根音结合为 *kj-、*khj-、*gi- 等。王辅世先生构拟的 *dz- 应修改为 *gi-。但这一构拟音值的修改并不否定王辅世先生声母系统的框架。

主要分布于太平洋诸岛屿上的南岛语是缺少历史文献的语言，南岛语的研究和苗瑶语的研究一样，偏重于现代语言材料的调查和比较。

南岛语最初的描写大约可追溯到 17 世纪荷兰人入侵台湾时对台湾南岛语的记录和西方的学者对汤加语等的记录。荷兰学者哈德里安·乐蓝德 (Hadrian Reland) 曾在 1706 年指出马达加斯加与东印度群岛 (East Indies) 和科科斯岛 (Cocos) 的语言是相近的。^③ 在 18 世纪马来—玻里尼西亚语分类的基础上，19 世纪 30 年代又有密克罗尼西亚语 (Micronesian) 和美拉尼西亚语 (Melanesian) 这样的概念。1899 年，威廉·斯密特

① 张琨《原始苗语的声母》，贺嘉善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②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262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③ 东印度群岛即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的岛屿。

(Wilhelm Schmidt)在他的文章中采用南岛语(Austronesian)这个词。^①

谭博夫(Otto Dempwolf)是最早对南岛语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和构拟的学者,1920~1938年间公布了一系列南岛语的研究成果。在他早期的研究中涉及了92种美拉尼西亚语,1920~1929年间他的研究中共出现了143种南岛语。他自称属于新语法学派,不属于结构主义。^②他从400~500种南岛语中挑选了3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多巴巴塔克语(Toba Batak)和达雅克语(Ngadyu Dayak)构拟南岛语。^③他的构拟尽管也参考了其他的一些语言,但他认为挑选三种语言足以构拟原始南岛语。当时他还不知道台湾的南岛语的情况,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太平洋东部岛屿上的南岛语常丢失辅音尾,谭博夫的构拟多采用印度尼西亚语的形式。现在我们知道谭博夫这种构拟是很初步的,认为只用三种语言就足以构拟原始南岛语的认识也是有很大局限的。

谭博夫之后一段时间里,根据南岛语的地理分布把南岛语分为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4支。

20世纪60年代以后,爱斯多勒·戴恩(Isidore Dyen)、布拉斯特(Robert A. Blust)、达荷尔(Otto Christian Dahl)和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等学者都注意到研究台湾南岛语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南岛语分类中,对台湾的语言有不同程度的重视。

戴恩1964年撰文指出台湾南岛语有“羽毛”“大”“血”“云”“拉”“唱”“舌头”“年”“昨天”“二十”“猴”“穿山甲”“蜜蜂”“鬼”“竹子”“松”“语言”“香蕉”“叶子”“番薯”“数”“祖父”“月亮”“近”“无”“雪”“雷”“尿”“眼”“盐”“正确”“肝”“新”“腐朽”“阳具”“一些”“洗”等37个同源词。^④

1976年达荷尔出版了《原始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对谭博夫的构拟作了修正。南岛语学界普遍同意台湾的南岛语应该分为泰雅(Atayalic)、邹(Tsouic)和排湾(Paiwanic)三个支系。

与印欧语的研究相似,南岛语的研究者也注意到诸语同源词中有关动植物等同源词的来历问题。如柯恩(H. A. Kern)1989年发表论文指出研究南岛语的起源地可以从植物群和动物群找到证据。他认为南岛民族的起源地一定在靠海的地方。因为整个南岛区域一些海洋生物都使用相同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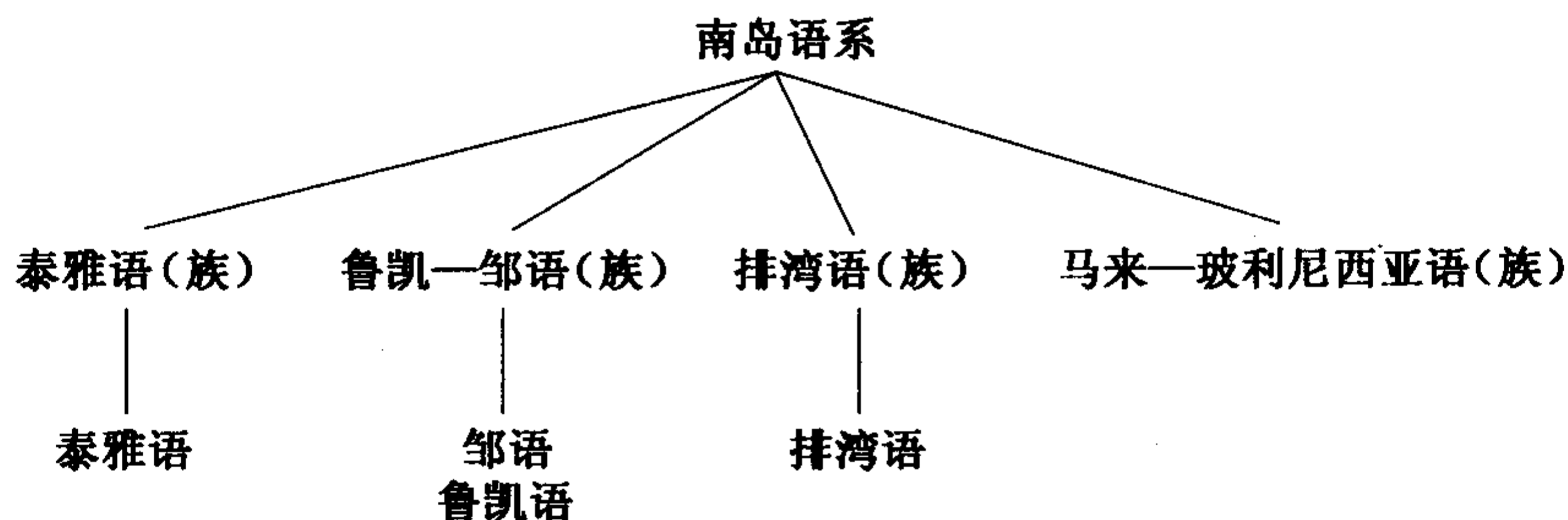
布拉斯特把南岛语一分为四。泰雅、邹和排湾各为独立的一支,其他的南岛语共同组成马来—玻利尼西亚语。(Blust, 1978)马来—玻利尼西亚语进一步被区分为马来—玻利尼西亚语西部语支(Western Malayo-Polynesian)和马来—玻利尼西亚语中东部语支(Central-Eastern Malayo-Polynesian)。布拉斯特1978年的分类已成为目前的主流派意见。他的分类图示如下:

① Darrell T. Tryon, *The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onesian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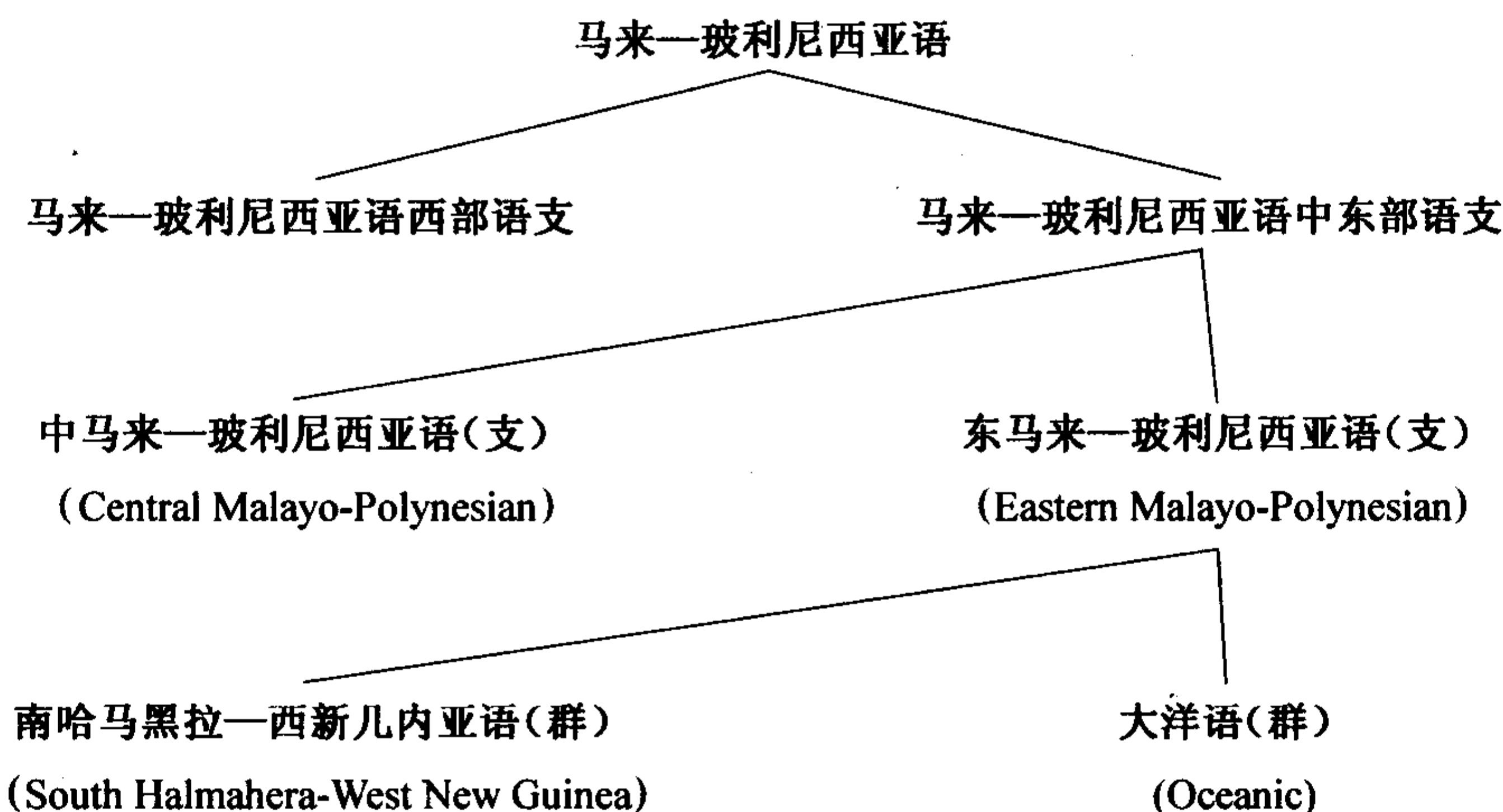
② Otto Christian Dahl, *Proto-Austronesian*, Studentlitteratur Curzon Press, 1977.

③ 谭博夫用德语 Uraustronesisch 表示原始南岛语。

④ 李壬癸《台湾南岛民族的族群与迁徙》第36页,台湾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马来—玻利尼西亚语(族)的构成为：①



台湾学者何大安等认为台湾以外的南岛语都出自台湾。他们的南岛语分类中台湾的南岛语被分为六支，马来—玻利尼西亚语不过是其中一支中的一个分支。②

(2) 不同历史层次的构拟

前面已经说过，可以从语言的历时的演变和亲属语的分化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历史。同时也有两种划分语言历史阶段的方法。

语音的历时演变贯穿于每一种语言的各个历史阶段，历史语言工作者需要尽量了解所有的语音历史事件，解释它们的演变过程。为了解释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构拟是必要的。

在汉语方面，最初高本汉构拟了汉语的中古音和上古音，后来王力先生除了在高本汉的基础上构拟上古音和中古音，还构拟了五代和宋代等时代的语音。现以上古汉语的鼻音类声母构拟为例说明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构拟有什么不同。

《切韵》鼻音声类明母、泥母、娘母、日母和疑母的音值，诸家的构拟差别不大：③

① Blust 1979, Darrell T. Tryon, *The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onesian Study*.

② 何大安、杨秀芳《南岛语与台湾南岛语》，《台湾南岛语言》丛书，台湾远流出版社，2000年。

③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59—6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明母	泥母	娘母	日母	疑母
高本汉	m	n	ɲ	ɲʑ	ŋ
李方桂	m	n	ɲ	ɲʑ	ŋ
潘悟云	m	n	ɲ	ɲ	ŋ

现在大体上可以肯定中古的鼻音声母除了与上古的鼻音声母的演变有关外,还与上古的鼻音前缀有关。上古(中期)鼻音声母系统为:

m	n	ŋ
sm	sn	sŋ
mr	nr	ɲr

上古早期阶段可能还有过鼻音和-l结合的复辅音。① 上古中期的鼻音声母字有:

“无”“舞”“母”“木”“目”“每”“没”“莫”“墨”等,上古声母为*m-。

“南”“念”“内”“脑”“日”“热”“人”“入”等,上古声母为*n-。

“卧”“鱼”“吾”“语”“我”“牛”“言”“月”“银”等,上古声母为*ɲ-。

“戌”“丧”“桑”“黑”等,上古声母为*sm-。②

“絮”“菱”等,上古声母为*sn-。③

“午”“稣”“薛”“猷”等,上古声母为*sŋ-。④

“马”“麻”“买”“卖”“矛”“蛮”“麦”“埋”等,上古声母为*mr-。⑤

“挠”“闹”“赧”等,上古声母为*nr-。

“牙”“瓦”“颜”“雁”“乐”“岳”“额”等,上古声母为*ɲr-。

*m-是上古汉语的前缀,“彌”“湍”“彌”是明母字,“爾”(尔)“邇”是日母字,“禰”是泥母字,可见“尔”“弥”等上古音是*m-n-或*m-l-。⑥“袂”是明母字,谐声字“决”“诀”等是见母字,“袂”的上古音是*m-k-。“朕”(脰)是明母字,“灰”是晓母字,“恢”“盔”溪母字,“朕”的上古音是*m-qh-。⑦

印欧语的研究是从不同语族的比较开始的,最终提出了包括印度—伊朗语族在

① 上古早期大约-l和-r都能和鼻音构成复辅音。到了上古中期,-r仍能 and 鼻音、塞音构成复辅音,而-l只能与塞音和s等构成复辅音。龚煌城先生为“舌”构拟了*m-ljat这样的上古形式。参见龚煌城《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藏语带r和l复声母的构拟》,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第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戌”是心母字,谐声字“滅”是明母字,故此假定“戌”的声母原本是*sm-。“丧”是心母字,谐声字“亡”是明母字,故“丧”的声母是*sm-。“黑”的谐声字“墨”是明母字,故此推测“黑”的声母中古*h-<*m-<上古*sm-。

③ “絮”是心母字,谐声字“如”是日母字,故“絮”的声母原本是*sn-。

④ “午”中古是疑母字,谐声字“许”是晓母字。“午”作为地支字,借入傣语读作si¹ŋa⁴,布依语sa⁴,借入的时代大约是上古末期,可见“午”上古末期的声母是*sŋ-。“稣”从“鱼”,又是心母字。“薛”是心母字,谐声字“孽”是疑母字。晓母字“猷”(猷)的谐声字“猷”是疑母字。

⑤ 以下“马”“挠”“牙”等中古都是二等字,上古介音为*-r-。

⑥ 潘悟云认为是*m-l-,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317页。

⑦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323页。

内的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的假设是受印欧语研究的启发提出的。19 世纪初已有与汉藏语相关的比较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李方桂先生提出包括汉、藏缅、苗瑶和侗台四个语族的汉藏语系。资料的积累和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一直在逐步进行,每一语族每一语支语音历史的研究都做了许多工作。我们要回答藏缅、侗台和苗瑶语族中诸语支共同语的创新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在构拟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诸原始语的基础上论证它们的同源关系,并说明它们各自有别于其他亲属语的创新是什么。实际的工作是从构拟诸语组、诸语支、诸语族共同语的音系开始的。只有把一些较为细节的问题搞清楚才能进行明确的分类。另一方面分类和构拟又有密切关系。分类的错误必定导致构拟的失误。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语有不同的演变情况。构拟是建立在假设上的解释。

“在用比较方法构拟出的原始‘共同语’事实上是有证据的语言之间,可以有一种或几种过渡的‘共同语’。比方在印欧语和各个罗马族语言之间,就夹着一种很大的‘共同语’,即‘共同罗马语’,普通叫做‘大众拉丁语’(latin vulgaire);同样,在印欧语里,哥特语、古高德语、古英语和古北欧语之间,也曾有过一种‘共同语’,即‘共同日耳曼语’。这‘共同日耳曼语’在事实上还没有得到证据,它的存在是根据许多有系统的创新假定的。这些过渡阶段使解释工作容易了许多。”^①

阿尔泰语已经根据显而易见的差别区分为突厥、蒙古和满一通古斯三个语族,但缺少有关诸语族共同语和阿尔泰共同语有说服力的构拟而未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朝鲜语没有差别较大的方言,构拟古朝鲜语显得很不容易,就不易说明朝鲜语与其他的什么语言有发生学关系。

三、同源词和借词

我们很容易从亲缘关系较近的语言的基本词之间看出它们的同源对应关系。而亲缘关系较远的语言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基本词对应的还牵涉到较为复杂的形态和语音的历史演变的结果,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汉藏语系的许多语言较早时已是以分析形态为主,古代形态方面的证据相对较少,词的对应关系更多与语音的历史演变有密切关系。汉藏语系语言之间历史上的长期的接触,对应词中难免有许多借词。借词的区分也就成为不能忽视的问题。

1. 词的同源对应关系

(1) 数词在判断语言亲缘关系中的作用

在以语言亲缘关系的判定为目的的对应词的研究中,印欧语的经验有较大的影响。如印欧语数词的同源对应关系反映了印欧语不同支系的渊源关系:^②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14 页。

② 同上,第 4 页。

	梵语	希腊语	拉丁语	亚美尼亚语
一(阴性)	ékah	hēs	ūnus	mi
(阳性)	ékā	mia	ūna	
(中性)	ékam	hen	ūnum	
二	d(u)vā	dyo	duo	erku
三	tráyah	trēs	trēs	erek'
四	catvāh	téttares	quattuor	čork'
五	pāñca	pēnte	quinque	hing
六	ṣāt	heks	sex	veç

这儿摘录的是梅耶所举的梵语、古雅典希腊语、拉丁语和亚美尼亚语“一”至“六”的数词,略去“七”至“十”。接着梅耶又对亚美尼亚语“二”“三”与其他语言对应词读法的不同做了解释,说明它们的同源关系。

印欧语的经验在阿尔泰语、汉藏语和南岛语的研究中遇到了困难。阿尔泰语系的假设认为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和满一通古斯三个语族。但不同语族语言的数词差别很大,基本数词中除了“四”,其他的没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① 阿尔泰语这些数词不能用来证明阿尔泰诸语族语言的同源关系。侗台语的壮傣、侗水语支语言的十进位数词借自汉语,黎语支和仡央语支的十进位数词系统的“五”“六”“七”等与南岛语的有对应关系。本尼迪克特认为侗台语与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② 印度尼西亚语与黎、仡央诸语数词的对应是他的主要理由之一。

南岛语的数词如:

	布农语	卑南语	印尼语	波那佩语	莫图语
一	tasa	sa	satu	ēu	ta
二	dusa	qusa	dua	riau	rua
三	tau	tu u	tiga	silū	tolu
四	pat	pat	əmpat	pāieu	hani
五	tima	ima	lima	limau	ima
六	num	ənəm	ənəm	weneu	tauratoi
七	pitu	pitu	tudzuh	isū	hitu
八	vau	wa u	dələpan	walū	taurahani
九	siwa	iwa	səmbilan	tuwau	taurahanita
十	masʔan	pu uʔ	sə-pulu	eisek	g ^w auta

这些语言分别代表南岛语的一些不同支系。布农语和卑南语分布在台湾,波那佩语

① G. J. 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陈伟、沈成明译,第 6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② Paul K. Benedict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侗台语与印度尼西亚语构成语言联盟,70 年代提出 Austro-Thai 语系这样的假设。参见 Paul K. Benedict,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Hraf Press, 1975。

分布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波那佩岛,莫图语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半岛。我们注意到南岛语不同支系的语言“五”的读法相近,来自*lima。大于“六”的数不同支系语言的读法大多数是不同的。莫图语“六”是两个3,“八”是两个4,“九”是两个4加1。“十”的读法卑南语与印尼语有相同的来历,其他不同。可见南岛语的十进位计数是南岛语分化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2) 利用核心词判断语言的发生学关系

斯瓦迪什的核心词表有二百词和一百词两种,所选的词大体上包括不同历史条件下都使用的词。其中的少数词,如介词和连词语言中往往是后起的。其他词的选用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故此一般情况下依照斯氏核心词表所包括的词项判断语言的亲缘关系是可取的。但对于亲缘关系较远的语言来说,在语音和形态的历史演变不甚清楚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对应词是否有同源关系。如侗台语与汉语是亲缘关系较远的语言,如不对汉语和侗台语各方的语音和形态的历史作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源词和借词的判断都有问题。

利用核心词判断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关键是建立核心词的同源对应关系。

不同语言或方言因密切的接触关系会有很多借词,以包括借词在内的“关系词”来判断语言的发生学关系或亲疏关系,就失去了意义。但这一类的比较在语言或方言关系的初步研究中较为常见。

(3) 同源对应关系的建立

汉藏、南岛和阿尔泰诸语系诸语族的发生学关系的研究与诸语的词源学紧密相关。发生学关系的判定是在语音和形态较为了解的情况下一些对词根同源关系的证明。只要涉及到词,就与词源研究有关。亲属语的对应词无非有三个来历:承自史前的祖语,或是借词,或是后来自创的。如果要讨论的两种语言(两个语族的语言)它们的发生学关系是史前的,承自它们史前祖语的词或词根是否有同源关系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汉藏诸语族的祖语史前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当时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现在的有很大的不同。最初当地的居民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后来,大约在距今八九千年前,这些地方有了农业,七千年前有了猪的驯养。在种植条件不很优越的地区,畜牧业和粗放的农业并存。阴山山脉以北地区的畜牧业也是稍晚才有的。

出乎意料的是原始社会的语言有很丰富的词汇。任何一种环境中的原始社会的居民对他们的环境以及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对象都有极细致的观察和用词上的分辨。古代使用汉语的居民对于“洗”有很仔细的区分,当承自早期的社会。今天的南岛语还是这样。原始社会的语言,“只适于表现直接围绕着他们的那些东西”,“以极大的准确性来区分身体内外的部位,各种动物和植物”,“但是要在他们那里寻找用于植物、动物、颜色、声音、性别、种等等的抽象概念的词,则是徒劳的”。^①普米语兰坪话中动物的鸣叫分辨得很仔细,马嘶、牛叫、羊叫、狗吠、虎啸、狼嚎、猫叫、鸡啼等都用不同的词。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抽象的概念用得越来越多。而今天的许多事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第164—165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物古代是没有的,如各种各样的金属及其制成品。“铜”在中国古代也叫做“金”,大约在四千多年前开始出现在黄河流域地区。“铁”的冶炼始于春秋时期。“铜”这个词的出现大约是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历史知识对词汇的比较是很有用的。用“铜”和“铁”这样的读法来说明汉藏语系不同语族的同源关系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它们分化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亲属语同源词对应关系的确定是建立在按部就班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的。印欧语发生学关系的研究中如果没有诸语族的语音、形态等的深入研究就不能最终作出同源关系的合理解释。汉藏语的发生学关系研究的一段时间里,侗台语和苗瑶语的中古汉语借词被作为汉语和苗瑶语、侗台语有发生学关系的证据。

2. 借词的区分

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在汉藏语、阿尔泰语的比较研究中分别一再被强调。阿尔泰语的研究中,关于如何区别借词如克劳森(J. Clauson)和A. 罗纳-塔斯(Andres Rona-Tas)提出一些建议。“如果一个词在语言甲和语言乙里有着系统的对应形式,但在语言甲里却没有它的语源,而它的词干(和构词词缀)却可在语言乙里找到,那么,这个词很可能是语言甲从语言乙借入的。”“如果语言甲里有两个同义词表达一个事物,其中之一语言乙里也有,那么,语言甲里的这个词完全可能是借词。”“如果语言甲和语言乙有两个相对应的词,如果能证明语言乙里的这个词是借自第三种语言,那么在语言甲里的那个词也是借词。”“如果语言甲、乙、丙在语源上有亲缘关系,那么,它们由共同原始语继承下来的对应现象,在三种语言里的出现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如果语言甲和语言乙里的大量有对应关系的词,在语言乙和语言丙里没有对应关系,或者在语言乙和语言丙里有许多对应关系的词,而在语言甲和语言乙却没有对应关系(或者很少),那么,很可能这些对应现象都是借用的结果。”^①

汉语和侗台语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壮傣、侗水语支语言有不少中古汉语借词被认为是同源词,我们比较一下黎语支的不同方言的这些词项就会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上不可能有什么“汉台语”。^②

亲属语的同源词来自共同的祖语,分化后在不同的语言中分别经历各自不同的历史演变。亲属语之间的借词,借入前参与贷方的语音和形态的演变(包括构词特征的变化),不能参与借方的演变。借入后参与借方的语音和形态的演变,不能参与贷方的演变。故参照借方和贷方语音和形态的历史,同源词和借词是可以区分的。不同历史层次的借词在借方和贷方中的历史不一样,也是可以区分的。同源词(或同源词根)与借词的区别除了可依据语言以外情况判断外,主要是依据词的语音和形态的历史追溯来判断。语言(甲)中的借词从借入那一刻开始就成为这种语言的词,按照这种语言的语音和形态的规定来表现。如侗台语的数词:

① 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第20—2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如,“藏缅语”通常是指藏缅语族的语言,把这些有共同母语的语言包括在这一概念中。而侗台语和汉语的发生学关系较远,而汉语与藏缅语有较为密切的发生学关系。所以使用“汉台语”这样的术语是不对的。

	武鸣	龙州	临高	侗语	水语
一	it ⁷	it ⁷	ʔit ⁷	ət ⁷	to ²
二	soŋ ¹	ɬoŋ ¹	ŋi ⁴	ŋi ⁶	ŋi ⁶
三	sa:m ¹	ɬa:m ¹	tam ¹	sa:m ^{1'}	ha:m ¹
四	sei ⁵	ɬi ⁵	ti ³	si ^{5'}	ɬi ⁵
五	ŋu ⁴	ha ³	ŋa ³	ŋo ⁴	ŋo ⁴

“一”，水语 to² 是固有词，壮语武鸣话、龙州话等都是汉语借词。侗台诸语“一”都有自己的固有词。武鸣话和龙州话“二”借自汉语“双”，龙州 ɬ- 对应于武鸣 s-。临高语、侗语、水语的“二”是汉语借词。^① “三”“四”临高语 t- 对应于武鸣等的 s-，都是汉语借词。诸语“五”分两类，武鸣、侗和水为一类，龙州和临高为另一类。武鸣、侗语和水语的读法有相同的来源，是中古汉语借词。临高语“五”除了 ŋa³，还有 ŋo⁴，后者也是武鸣类的中古汉语借词。

龙州类的读法应是较早时汉语方言的借词，有清鼻音声母的特点，侗台语中都作清声母调，元音为 a，壮傣、侗水共同语中为 *s-ŋa^B。汉语“五”在古南方方言中当有 *s- 前缀。如“五”的谐声字有“吾”“𠄎”等。“𠄎”《广韵》悉姐切，心母字，^②中古音 *soʔ < 上古音 *sŋa(-ʔ)。汉语谐声时代的“五”的 *s- 来自 *s- 前缀。

侗台语汉语借词“五”的两类读法，反映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汉语“五”的读法。近晚侗台诸语又从它们所接触的汉语方言借词。壮傣、侗水语中古汉语借词的 ABCD 调分别对应于汉语的平上去入调，这是因为当时汉语平上去入 4 调的调值分别与壮傣、侗水共同语或不同语支祖方言 ABCD 调的调值相近。而新借词的调值分别与近晚所接触的汉语方言词的调值相近。如，“电灯”壮语武鸣话是 ten⁵ tuŋ⁶，与汉语西南官话的说法有对应关系。西南官话的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分别对应于壮语的第 6 调、第 2 调、第 3 调和第 5 调。^③ 侗台语两类汉语借词“五”原本都读 B 调。我们仍应判断它们是中古的借词。声母的不同是贷方的汉语方言中原本有两个层次。

日语中的汉字分音读和训读。音读是就字的读法而言，不同时代的日语汉借词所用的汉字可相同，读法不同，于是有吴音和唐音的区别。越南语和朝鲜语中都有类似的情况。

当借词在一种语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往往迫使原有的同义词扮演另一个角色，甚至不再担任任何角色而丢失。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是丹麦人）从 8 世纪末开始对英国的人侵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英语在这期间向丹麦语借了许多词。如古英语的

① 临高语古 B、C 调合并，故第 4 调对应于侗水语的第 6 调。“二”是日母字，汉语南方方言中今声母仍有 ɲ- 和 ŋ- 两种。如苏州话 ɲi⁶，温州话 ŋ⁶ 等。

② 见沈兼士《广韵声系》第 224 页，中华书局，1985 年。另外可以比较的是“午”，原本也有 *s- 前缀。壮语柳江话这一声类中还有“马嘶”一词读作 s- 声母，侗语南部方言中“生铁”的声母都作 s- 声母。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428—43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③ 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民族语文》2003 年第 1 期。

sweostor “姐妹”为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 *syster* (*sister*) 所取代, *eagpyrel* “窗户”为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所取代成为今天的 *window*,^① 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 *sky* 取代了古英语的 *wolcen* “天空”。今英语的 *starve* “挨饿”来自古英语的 *steorfan* “死亡”, 今英语的 “死亡” *die* 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 *deya*。

如果不是尽量地把词的来历搞清楚, 研究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所得出的结论也不能令人信服。

3. 词源研究

正如斯瓦迪什语言年代学的经验公式所说明的, 基本词是词汇中最稳定部分。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或它的词根)一千年后大约能保存八成。一千年前从共同语中分化出来的两种亲属语言同源的基本词(或词根)大约只能保持六成多。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三五千年以后保持的同源的基本词或词根是不多的。由于不同的亲属语所保存的词或词根分布不同, 亲属语越多, 所能提供的来自共同语的词或词根也就越多。亲缘关系较远的不同语言能提供较多语音历史演变的线索。

(1) 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

布拉斯特构拟的原始南岛语 *C(ts), 对应于泰雅语、邹语、鲁凯语、排湾语的 *ts*, 卑南语中为 *t*, 布农语 *t*。语音演变的一般趋势是塞音易变为塞擦音。何大安、杨秀芳构拟为 *t 较为合理。^②

先看一下台湾南岛语的对应关系。下文把与 *t 有关的 *t、*d、*d 的情况作一比较。

邹语、鲁凯语、卑南语和布农语 *t* < *t, 如:

	邹语	鲁凯语	卑南语	布农语
鸡	teoua	tarukuk	turukuk	tuɬkuk
兔子	eutuka	lutuka	—	autuk
女阴	kutəʔi	ʔati	kuti	—
吐	təmæposu	—	təmama	—

邹语部分词中的 *ts* 对应于鲁凯语、卑南语和布农语 *d*, < *d, 如:

	邹语	鲁凯语	卑南语	布农语
地	tseoa	daədaə	darəʔ	daɬaɣ
路	tseonə	kadaɭanənə	daɭan	dan
肚脐	putsəku	ʔəkə	pudək	pusuh
远	—	dail	ʔadawil	madaxvi

“肚脐”, 邹语 *putsəku*, 鲁凯语 *ʔəkə*, 卑南语 *pudək*, 泰雅语 *pugaʔ*, 原始南岛语 **pudək*。*d 由于后面的 *-k 成为泰雅语的 -g。“地”, 邹语 *tseoa*, 鲁凯语 *daədaə*, 卑南语 *darəʔ*, 原始南岛语 **darəq*。

① 古英语 *eagpyrel* “窗户”意为 *eye-hole*, 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vindauga* “窗户”意为 *wind-eye* “风眼”。参见秦秀白《英语简史》第 46 页。

② 何大安、杨秀芳《南岛语与台湾南岛语》,《台湾南岛语言》丛书。

邹语 t、鲁凯语 ts 对应的卑南语 t 和布农语 t, < *t, 如:

	邹语	鲁凯语	卑南语	布农语
跳蚤	timeo	θimakul	taʔumug	tumbus
屎	təʔe	tsaki	muʔaʔi	taki
绳子	teesi	tsaʔis	tiʔuʔ	—

“劈”, 邹语 aatsəʔohu, 鲁凯语 butsuku, 卑南语 mətəkab。邹语、鲁凯语 ts 对应于卑南语 t, 原本可能是 *t。原始南岛语的 *t 卑南语中仍为 t, 布农语中与 *t 合并, 在邹语中成为 θ。

*d 在邹语中演变为 *r, 然后丢失:

	邹语	鲁凯语	卑南语	布农语
二	euso	dusa	dʌa	dusa
脊背	—	dəʔək	dʌkur	ʔiku
大	meoi	maʔaw	maʔiʔaŋ	madaŋ

赛考利克方言的 ts 对应于泽敖利克方言和赛德克语 t, 赛考利克方言 ts < *t, 条件为后随高元音 i。如:

	赛考利克方言	泽敖利克方言	赛德克语	鲁凯语
盐	tsimux	timuʔ	timu	timu
编	tsinun	t-um-inuq	tuminun	tinunu
屎	səqutsiʔ	—	quti	tsaki

“屎”, 卑南语 muʔaʔi, 原始南岛语 *qutaki。即少数情况下泰雅共同语的 ts < *t。

泰雅语赛考利克方言 s 对应于泽敖利克方言 ʃ 和 tʃ, 赛德克语 ts 和 s, < *t 和 *s。如:

	赛考利克方言	赛德克语	鲁凯语	布农语
劈	səbəkəʔ	pusutsax	butsuku	timpuslaʔ
回答	siʔuk	tsumijuh	—	—
中间	səbəkəʔ	tseka	kabətsiaka	—
熊	—	sumai	tsumaj	tumaj
船	qasuʔ	ʔasuʔ	—	χatu
梦	spiʔ	sepi	siʔi	taisaχ
闻	sək	sumukenux	—	sakun
今天	səniʔ	sajaʔ	kaijasaa	—
哭	ŋilis	lumiŋis	—	taŋis

台湾以外南岛语中, 马来语支的爪哇语和马都拉语中有 t 和 k 的对立, 马达加斯加语中是 tʰ 和 t 的对立。如:

	爪哇语	印尼语	马达加斯加语
天	lagit	lagit	lanitʳa
闪电	taʔit	kilat	tselatʳa
皮	kulit	kulit	huditʳa
死	mati	mati	mati

邹—鲁凯共同语经历过 *t > *ts。“天”，邹语 ɲatsa。“闪电”，鲁凯语 lakatsə。

“皮”，卑南语 lubit，排湾语 qalits。排湾语的 -ts < *t。

“桥”，马达加斯加语 tetezana，米南卡保语 titi-an，大瓦拉语 tete。可以和“死”这个词比较说明它们舌尖的 t 有对应关系。

不同语族间 *t 的对应关系较复杂。可以断定在台湾以外的南岛语中发生过 *t(*ts) 和 *t 合并，不能简单地断定它们的合并与台湾一些语言的合并有直接的关系。

马达加斯加语中 *d 与 *t 合并。试比较：

	爪哇语	马都拉语	马达加斯加语	鲁凯语
雷	blədek	gʰaludʱuk	-baratʳa	dərədərə
小勺	sendɔʔ	sinduʔ	suʔu	kidɪŋ

原始南岛语的 *d 马达加斯加语中成为 tʳ。

现代南岛语多分布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这是长期的迁移造成的。散布在太平洋诸岛屿上的南岛语，亲属语之间的接触比起汉藏语和阿尔泰语来说要少得多。由于亲属语分化的久远，语音的对应关系仍是相当复杂的。

(2) 同源词研究中的形态成分

同源词根的确定是亲属语同源词研究的关键。我们比较以下藏缅语不同支系语言，藏语(藏语支)、林布语(喜马拉雅语支)、缅语(缅语支)、克伦语阿果话(克伦语支)、景颇语(景颇语支)、加洛语(或译为加罗语，博多—加洛语支)、卢舍依语(库基—钦语支)几个词的读法：

	太阳	月亮	水	手	肚子
藏文	ɲi ma	zla	təhu	lag	grod
林布语	nam	lā bā	tʃhūā	hūk-tapē	sā-pok
缅文	ne²	la¹	re²	lak⁴	bok⁴
克伦语	muu³¹	la⁵⁵	thi⁵⁵	tsyde⁵⁵	hu⁵⁵ phɣ⁵⁵
景颇语	tʃan³³	ʃā³³ ta³³	khaʔ³¹	taʔ⁵⁵	kan³³
加洛语	sāl	dʒā	tʃhī	dʒāk	ōk
卢舍依语	nī	thlā	tui	kut	pum

“太阳”藏语支语言、羌语支语言和彝语支语言有较为接近的读法。后缀 *-ma 应是较古老的，彝语支语言中仍有它的表现形式，如哈尼语墨江话 nu³³ mo⁵⁵ 等。喜马拉雅语支其他诸语的读法与林布语的读法相近，与藏文所记录的古藏语的“天”gnam 有对应关系。克伦语支的内部有相近的读法，不同于藏羌语支和彝缅语支的语言。景颇语的 tʃan³³ 与

达让僜语“太阳”*ɲuɲ*⁵³有同源关系。卢舍依语“太阳”*ni*可以代表库基—钦语支语言的说法,与藏羌、彝缅的说法有同源关系。由于藏羌、彝缅和库克—钦诸语这个词的对应关系和分布的状态说明可能来自原始藏缅语。这儿所说的分布的状态是指这个词不但分布在不同的数个语支,而且还分布在亲缘关系较远的库克—钦语支。

景颇语“月亮”*ʃa*³³ *ta*³³ < *s-la。^① 请注意“月亮”“手”两词词根声母藏语和缅甸语的 l-对应于景颇语 t-,加洛语 dʒ-。

“水”,羌语支和喜马拉雅语支一些语言的读法与藏语的读法相近,多数情况词根声母为舌面塞擦音,有的是舌尖塞擦音。如,普米语兰坪话 *tʃə*⁵⁵,木雅语 *tɕə*⁵³,迪马尔语(Dimal) *tʃi*。藏缅语的“河”“泉”通常是“水”的派生词或复合词。如,藏文“河”*tɕhu bo*,“泉”*tɕhu mig*(即“水眼”)。我们注意到藏文“一”*gtɕig*,词根的声母也是同样的舌面送气塞擦音。不同支系的语言通常以 t-、th-、l-、r- 及 d-与之对应。克伦语支语言“水”“一”两词的词根声母通常是 t-或 th-,个别是 d-或 l-:^②

	阿果话	因他拉话	马葆克话	德尔木哈话
水	<i>thi</i> ⁵⁵	<i>tai</i>	<i>ti</i>	<i>the</i>
一	<i>tə</i> ⁵⁵	<i>tà</i>	<i>tà</i>	<i>dö</i>

要说明上述藏缅诸语“水”的说法有同源关系,还要对有关的语音作进一步的研究。

“肚子”林布语词根 *pok* 和缅文记录的古缅语 *bok*⁴ 等与那加语支的登沙语(Tengsa) *ta-buk* 等词根同源,当来自原始藏缅语 **bok*。

试比较南岛语不同支系语言的一组动词及布拉斯特构拟的原始南岛语的形式:

	吃	喝	呕吐	吹	哭
泰雅语	<i>qan-iq</i>	<i>nəbuw</i>	<i>putaq</i>	<i>ziʔup</i>	<i>ɲilis</i>
布农语	<i>maun</i>	<i>ɣud</i>	<i>mutaɣ</i>	<i>maip</i>	<i>taɲis</i>
鲁凯语	<i>kanə</i>	<i>uɣul</i>	<i>uta</i>	<i>iʔi</i>	<i>tubi</i>
印尼语	<i>makan</i>	<i>minum</i>	<i>muntah</i>	<i>məniup</i>	<i>taɲis</i>
汤加语	<i>kai</i>	<i>inu</i>	<i>lua</i>	<i>ifi</i> (风吹)	<i>taɲi</i>
马绍尔语	<i>m^wΛɣæ</i>	<i>irāk</i>	<i>mm^wɔc</i>	<i>pæɭ</i>	<i>caɲ</i>
原始南岛语	* <i>kaen</i>	* <i>mimah</i>	* <i>utɑq</i>	* <i>ʃiup</i>	* <i>tsaɲis</i>

今南岛语一些支系语言的动词的记录形式常带着前缀、后缀或中缀,如使用 m-前缀等。我们首先要把现代的词根形式和前、后缀等区别开来。“吃”,泰雅语带着 -iq 后缀,布农语、印尼语带着 ma-前缀,古动词前缀 *ma-在马绍尔语这个词中残留为 m^wΛ-。排湾语“吃”*ʔəman*, -əmə-是动词的中缀,词根是 *ʔan*。原始南岛语“吃”的词根应是 **qen*,布拉斯特构拟中的 **ka*-应是古前缀的遗留。汤加语的 *kai* 已丢失 -n。我们通过比较在弄清语音历史变化的情况下把现代方言或语言的词根上所凝固的古代的形态成分区别出来才能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183 页。

② 因他拉话(Yintala)和马葆克话(Mapauk)是克伦尼语(Karenni)的方言,德尔木哈话(Dermuha)是乍叶因语(Zayein)的方言。

构拟原始南岛语的词根。

“喝”，原始南岛语的形式应是*inum，是“水”*num的派生词。布拉斯特把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的“喝”拟为*inum，“水”拟为*danum。泰雅语“喝”的古词根当为*num，-b<*-m。汤加语丢失-m。

“呕吐”，印尼语 muntah，爪哇语 mutah，巽他语 utah，-h<*-q。布农语-χ<*-q。汤加语的 lua 与斐济语、瓦努阿图的拉加语(Raga)“呕吐”lua 等对应。

“吹”，鲁凯语 iʔi<*ipi。^① 马绍尔语 pæl'可与分布在印尼的芒加莱语“吹”pūr 比较，是古南岛语“风”*bali(布拉斯特拟)派生词*ibali 的遗存。汤加语丢失-l，古前缀*i-凝固在词里。泰雅、布农和印尼诸语的这个词有同源的词根，鲁凯、汤加和马绍尔语的这个词有同源的词根。

“哭”，原始南岛语应是*t-ŋis，如卑南语 maŋaŋis，ma-是现代的前缀。鲁凯语的 tubi 另有来历。

试比较反映汉语与藏缅语同源关系的一组词：

	上古汉语	原始藏缅语	藏文	缅文
耳朵	*nə-g (耳)	*na-r	rna	na ³
眼睛	*mjuk (目)	*m-rak	mig	mjak ⁴
乳房	*no-g (乳)	*nu-g	nu ma	no ¹
肝	*kan	*m-krin	mtəin	tθaŋ ³
肚子	*pok (腹)	*bok	grod	bok ⁴

“耳朵”，古藏语带 r-前缀，羌语支却域语 rŋi⁵⁵ 也是如此。喜马拉雅语支的兰比从语(Lambichong)no-ro，龙语(Rong)ā-nor，那加语梭马方言(Rengma)ŋe-li 等是带后缀的。后缀*-r 在古藏缅语方言中与前缀*r-有相似的功能，表示分叉、突出。在“耳朵”这个词项中，-r 在藏缅语方言中的分布更广，而 r-的分布局限于藏羌语，所以为原始藏缅语构拟了*na-r。

汉语的古后缀*-g 笔者认为有把较为具体的概念变成引申、泛指或虚化概念的功能。

“眼睛”，彝语支的怒苏语 mja⁵³ (dzj³¹)，说明缅语的-j-来自*-r。

“肚子”，藏文 grod 对应于汉语“胃”*grət。^②

藏缅语跟汉语的比较不仅仅是语音对应关系的比较，而且是建立在古藏缅语形态研究的基础上的，否则我们不好确定两者之间的同源词根。

四、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

语言的形态在几个世纪中就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如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从中古英语到近代英语。形态类型的相近往往不能作为发生学关系的证明。正如梅耶所

① 如，“火”鲁凯语 aʔuj，卑南语 apuj。

② “胃”，匣母字三等，谐声字“喟”是二等字。

指出的：“虽然习惯常常使某种类型保持得很久，甚至在这个类型趋于整个废弃的时候，还留下一些痕迹，可是我们却不大能利用这些共同的类型来证明一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因为类型常常有以不等的程度逐渐趋于完全消失的趋势，比方各个印欧系语言的历史里就有过这种现象。”^①所以只有来自共同语的形态成分才能用来说明亲属语的发生学关系。

1. 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

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亲属语的形态和句法比较研究，二是历时的形态和句法的比较研究。前者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前瞻”的研究，后者为利用文献的“回顾”的研究。

(1) 亲属语的形态和句法比较

语言的历时演变中句法范畴和词法范畴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如孙宏开先生曾对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语法类型作分析。他指出：“单就表达语法范畴、语法意义、语法形式等方面的手段来看，各语言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现象。有的语言以粘着形态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形式，兼有少量屈折、分析等形式；有的语言粘着形态、屈折形态兼有之，但分析形式和语序已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还有的语言粘着形态已基本消失，屈折形态已不发达，语法意义主要靠助词和语序来表达；相当多的一些语言，粘着形态已绝迹，屈折形态仅为残存形式，它的规律严整性已遭破坏，形态成分已逐渐凝固，转换为分析形式，或者逐步淡化，有的连同整个语法范畴一起，从语法体系中消失。”^②羌语（北部方言）名词的数、指小，动词的人称、数、时态、体、式、趋向、使动等语法范畴大多是加前缀和后缀表示。一个动词词根最多可以加5个词缀。如羌语芦花话：

kui- da- qhsu -tə -ji. (他们)已向靠山方向跳了。

① ② 跳 ③ ④

① kui-趋向前缀，表示“向靠山方向”；

② da-表示过去时的前缀；

③ -tə 复数后缀；

④ -ji 第三人称后缀。

中国境内以粘着形态为主的藏缅语族的语言还有嘉戎语、扎坝语、尔苏语、独龙语、格曼登语、景颇语等。另外一些藏缅语族的语言如普米语、木雅语、羌语南部方言、藏语、错那门巴语、仓洛门巴语等，孙宏开先生划入“屈折—粘着混合型”或“屈折—分析混合型”。列入分析型语言的有彝语、拉祜语、纳西语、傈僳语、哈尼语、白语、载瓦语和阿昌语等。^③

汉语与藏缅语形态成分的对应关系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

早在1896年康拉德(A. Conrady)就指出s-前缀在藏语有使动和名谓化(把名词变成动词)的功用，如：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19—20页。

② 孙宏开《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

③ 同上。

名 词		动 词	
grib	影子, 阴影	sgrib pa	使黯, 障蔽
gril	一卷, 一团	sgril ba	卷在一起
nyams	灵魂, 思想	snyam pa	想
nad	疾病	snad pa	伤害
bam po	搜集品	sbam pa	集拢
gong bu	丸形, 圆块	sgong ba	揉成圆形

原始藏缅语的*s-是动词的使动前缀, 又是身体部位名称词的前缀。如, “燃烧”藏文 fbar(<*m-par), 使动形式“点火”spar(<*s-par); “倒下”log(<*lok), “弄倒”slog(<*s-lok)。彝缅语方面, 古缅语已开始用分析手段表示使动, 原始藏缅语的*s-使动前缀在古缅语中使后随的声母成为清辅音。如, “转动”缅文 lan², “使转动”hlan¹; “温”(水)nwe³, 使动形式“热”(饭)hnwe³。景颇语中使动前缀 sā³¹-<*s-, tǎ³¹-<*d-, 互补分布。^① 博多—加洛语支的博多语中 s-前缀仍很活跃。如, “裂”go, “使裂”sogo; “害怕”gi, “吓唬”sigi; “断”káw, “切断”sakáw 等。博多语的 s-前缀和景颇语一样, 是带元音的, 博多语前缀的元音与词根元音和谐。

上古汉语“墨”*mæk 加前缀*s-派生出“黑”*s-mæk。除了鼻音声母字跟晓母字和心母字的谐声可以说明上古汉语有*s-前缀外,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 如: ^②

名 词	形容词
條 *d-	修 *s-
潭 *d-	深 *s- ^③
名 词	动 词
帚 *t-	掃 *s-
爪 *tsr-	搔 *s-

上古汉语*s-前缀可以用来表示使动, 对应于原始藏缅语有使动功能的*s-前缀。前缀*s-使用的相似性仍不能用来说明两种语言的发生学关系, 说明的是各自的古方言中分别有过同样的形态成分。

古汉语“黑”和“墨”的词根*-mæk, 藏文的“黑暗”smag 可以拿来比较。

汉语“帚”*tu? 是名词, 古又可为动词, 又作“扫”, 是加*s-前缀派生为动词*s-tu?(-s)。

嘉戎语“扫”ka rit, 马加语 sit-ke(-ke 为现代马加语动词后缀), 仍保留着古藏缅语的*s-前缀。

“热”(动词), 独龙语 lum⁵³, 景颇语 ǎ³¹ lum³³ <*s-lum, 与汉语“炎”*g-lam 原本有相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157 页。

② 梅祖麟《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中国语文》1988 年第 3 期。

③ “潭”《广韵》徒含、以荏两切, 谐声字有“燂”(昨盐)“暉”(式任切)“嫵”(乃玷切)等, “潭”上古音 *lam, “燂” *sglam, “暉” *hlam, “嫵” *m-lam。

同的词根。“燂”《广韵》昨盐切，上古音 *sglam < *s-glam。^① “热(东西)”，原始汉藏语可能有类似于 *s-glam 的形式。

原始藏缅语的 *s- 作为身体部位名词前缀许多语言中能找到它的踪迹。

如“心脏”，藏文 snig，缅文 hna¹ lum³，景颇语 sã³¹ lum³³。“鼻子”，藏文 sna，缅文 hna² khon³，景颇语支的独龙语 suw⁵⁵ na⁵⁵，卢依语组(Lui group)的卡杜语(Kadu) sa-nã。

古汉语也有以 *s- 作为身体部位名词前缀的情况，如“心” *sin < *s-ləm，“手” *snu? < *s-nu?。

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谈到古藏缅语的前缀 *s-、*r-、*b-、*g-、*d- 和 *m- 等容易被取代或丢失，又经常发生音变。^②

藏缅语的一些语言中的句法形态(morphosyntax)有这样的特点，动词有表示人称的后缀，分布于景颇、库基—那加、藏、羌、喜马拉雅和彝等语支的语言中。^③ 如羌语桃坪话动词人称和时后缀的使用情况：

数	人称	将来时	现在时	过去时
单 数	1	-a	-a	-a
	2	-u-nə	-nə	-o
	3	-u	∅	-i
复 数	1	-u-ai	-ai	-i
	2	-sɿ-nə	-sɿ-nə	-sɿ-nə
	3	-u	∅	-i

显然羌语桃坪话表示人称、数和时的后缀已经融合。

西夏语中动词的第一人称单数用-ŋa²，第二人称单数用-na²，还保留着原始的代词形式。可见藏缅语中用来表示与主语一致的谓语动词的后缀来自人称代词。

希腊语原本每一个动词都有一个将来时，到了拜占庭时代这类将来时的形式已消失，为其他的形式所代替。希腊语中每一个动词都有一个完成体形式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大约到古雅典时代才完成，此后又逐渐丢失，现代希腊语中完全丢失。^④

带有古日耳曼语屈折形态的古英语经历了中古及近代英语的演变成为兼有分析形态、粘着形态的现代英语，而形态类型较为复杂的现代诸藏缅语来自有较为明显的粘着特点的原始藏缅语。可见语言的形态在不断的变化中，较少有单一的形态形式。方言众多的现代南岛语和阿尔泰语也是如此。因为一方面类推积极地把形态的不同形式抹平，而创新又在其他方面创造新的形式。如古英语的强势动词和弱势动词的变位兼有屈折形式和粘着形式，后来用粘着形式来表示的动词越来越多，而在古英语的屈折变位完全

① 《说文》：“燂，火热也。从火覃声。”

②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年印。

③ 孙宏开《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④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42页。

瓦解以后的现代英语中新的较为划一的屈折形式又在出现。^①

语言的语法类型从广义形态的角度看,可分为屈折型和综合型两类。词法范畴为分析型的语言在句法范畴多为综合型。

汉藏语系的语言中包括更多的不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它们的句法类型是主题—述题型,与之相对的是主语—谓语型。我们目前见到的主题—述题型语言大体上是主题—述题型句子结构优先的语言。如汉语一方面是主题—述题型句子结构优先,另一方面又包容着 SVO 类的主语—谓语型的句子。从汉藏语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主题—述题型句子结构优先的语言广为分布,缺少被动态的原始形式,缺少动词谓语与主语之间一致关系的原始表达,古汉藏语应是主题—述题型句子结构优先类型的语言。

(2) 形态和句法的历时变化

罗曼语的研究是典型的“回顾”的研究。法语的 il est“他是”,ils sont“他们是”,je fus“我曾经是”与拉丁语的 est,sunt,fui 相符,可以用来证明“法语是由拉丁语变来的一种新形式”。法语和拉丁语形容词阴性和阳性的分别都是任意规定的,法语“新”neuf(阳性)和 neuve(阴性)与拉丁语“新”nouus 及 noua 有对应关系。^② 从古拉丁语到现代罗曼语族诸语,比较研究指出了它们的各种演变情况。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从中古英语到近代英语,语序从 SOV 类型逐渐演变为 SVO 型,另一方面,修饰语的语序也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主题—述题型的结构。如古英语(AD 900)大约有 52% 的所有格修饰成分是前置的,到了中古英语(AD 1400)大约是 84.5%,到了现代英语的词组中修饰成分都是前置的。^③

藏语诸方言中身体部位名词有后起的 *pa 后缀。如“腰”,藏文 rked pa,藏语巴塘话 ke⁵⁵ pa⁵⁵,藏语夏河话 hke pa 等。“手”,藏文 lag pa,藏语巴塘话 la¹³ pa⁵³。这个 *-pa 后缀大约可追溯到藏—羌共同语。如“脊背”,藏文 sgal pa,藏语夏河话 dzap,羌语北部方言 tsup,木雅语 ge³³ pæ⁵³。藏语夏河话、羌语北部方言中这个后缀的声母辅音已经成为韵尾辅音。“额头”,藏文 thod pa,藏语巴塘话 thu⁵⁵ pa⁵³,藏语夏河话 tho pa,木雅语 thə⁵⁵ pæ⁵³,却域语 the⁵⁵ pe⁵⁵ 等。

早期汉语的形态面貌可能与古藏语这样的语言相近,从上古末期开始汉语成为较为典型的分析语。中古以来汉语一直在发展着它的非分析形态,这与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进程是同步的。汉语的非分析形态化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相对来说,在大约一千年中藏语的变化比较大,从一种不带音节声调有较多粘着形式的语言到成为拉萨话那样用音节声调区分意义分析形态为主的语言。

汉语北京话的儿化韵来自成音节构词成分“儿”等。“儿”原指“儿子”,成为指小的后缀大约南北朝时就有,唐时已很普遍。现代的温州方言(温州、瑞安、乐清等地的地方话)里这个后缀读作成音节的 ɿ²,另外又从这个后缀派生出 ɿ⁷ 用来指小。如“篮子”叫做

① 中古英语的后缀 -ed 在现代英语中已失去元音,辅音根据词根尾音的情况读作 -t 或 -d。

②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23 页。

③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Fetter Lane, 199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pp. 244 - 245.

la⁴ŋ², “小篮子”叫做 la⁴ŋ⁷。

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再从近代到现代,汉语的词法结构在变化,句法的结构也在变化,向着主题优先更为明显的方向发展,古汉语纯词法范畴的问题后世或成为句法或词组范畴的问题。古代汉语不是典型的分析型语言,有较为丰富的粘着和一定的屈折形式,句法上是综合型特点的语言。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主题—述题型的语言,它们的主语—谓语句中主语和谓语动词的关系不用标记,因为主题型句子中主题的选择不取决于动词。

2. 形态和句法的构拟

后起的形态形式不能用来证明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可以用来证明印欧、汉藏语系内部发生学关系的早期的形态成分通常已经成为凝固成分。一方面,不同语法范畴的形态在一定时期的语言中很难完全取得一致,我们也不必设想原始语不同语法范畴的形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们既要考虑词法方面的对应情况,还要考虑句法方面的情况。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亲属语可能成为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它们的词法和句法对应范畴也有较大的差别。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词法和句法是交织在一起的。

句法的历史比较和语言句法类型的普遍特点是原始语句法构拟的依据。在亲属语的句法和形态的比较中,我们寻找原始语留下的句法形式的残余,在句法类型学和历史句法学的基础上构拟原始语的句法。^①

在语言形态的转换中常常伴随着语序的变化。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的子句在安排上有一致性,古印欧语的 OV 语序在它的一些后代语言中向 VO 语序演变,在北部的凯尔特语中转向 VSO 结构。

古希腊语和梵语有三种相似的态:主动态(active voice)、被动态(passive voice)和中间态(middle voice)。主动态表示主语的行为影响到另外的人或事物,被动态表示主语是承受行为的,而中间态则表示主语的行为作用于自身。语法学家用中间态这个词来表示古希腊语和梵语中动词态的变化。如希腊语 *théromai* “我暖和自己”,赫梯语 *unuttat* “她打扮自己”。

黎俱吠陀经文(Rig-vedo)中的: *vāyúr yunkte róhiyā ráthe* “瓦尤把(自己)褐色的马套上他的车”。文中没有出现“自己的”这样的字样,动词的中间态表示了这个意思。

谢米列尼认为古印欧语第一人称中间态的后缀是 -ai,第二人称是 -soi,第三人称是 -toi。在后来的日耳曼语中古印欧语中间态的意义用代词来表示,英语是反身代词。^②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和赫梯语的发现为古印欧语和原始印欧语的构拟提供了新的思路。赫梯语的中间态和完成体的相似性,动词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有 -mi 和 -hi 两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都有主动态和被动态,每一种态中都有现在时和简单过去时及祈使语气的形式。其他人称的复数形式的变化稍简单。古印欧语的中间态也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①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1993, pp. 208 - 209.

② 同上, pp. 183 - 194.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有主题—述题型的句子,即使在主语—谓语句中主语和谓语动词也不像以动词为中心的印欧语那样要求有句法关系一致的表示。汉语中的被动结构是后起的。主题优先型语言中主题的选择不取决于动词,我们可以假定原始汉语就是这样的语言。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侗台语和苗瑶语及一些藏缅语中。汉藏诸语族不能构拟出早期的名词和代词的宾格形式、句法上的被动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原始汉藏语是主题优先的语言,它不要求句子的构成上以动词为中心,没有被动态。

印欧诸语形态的历史比较说明它们的形态承自屈折形态的共同语。葆朴根据比较进一步认为印欧语的屈折形式来自更早时期的粘着形式。^①

勒曼(Winfred P. Lehmann)在他的《印欧语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中对于古印欧语名词格系统的形成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始印欧语的早期阶段,名词的屈折形式远较根据梵语、希腊语和其他语言综合构拟的格系统简单。他认为前印欧语(Pre-Indo-European)中名词只有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它们性范畴的表示也是很有限的。如赫梯语主格和宾格的复数形式只是附加后缀-s,早期的吠陀文献中单复数形式也是不作严格区分的。第三人称后缀是后来发展的结果。梵语的名词甚至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不同。如,vīrātara“较男人”,vīrātama“最男人”。而赫梯语的形容词倒没有这一类后缀,这说明古印欧语形容词的比较级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形容词性的屈折变化情况不同。古拉丁语单数的宾格、复数的主格和宾格的形容词词干有阳性和阴性的辅音屈折变化。赫梯语一些词项的形容词和名词可以变换。前印欧语区别性形容词的三种性标记应来自稍晚的原始印欧语。^②

思考题:

- (1) 如何了解语音上的同源对应关系?
- (2) 语言历时演变的阶段是怎样划分的?
- (3) 语言的发生学关系是怎样确定的?
- (4) 怎样区分同源词和借词?
- (5) 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是怎样进行的?

(6) 古藏语的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自主和不自主、自动和使动等形态上的变化。三个范畴的变化是交叉的。自主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可以由动作者的意志支配,不自主动词所表示的行为不由动作者的意志支配。以下比较的是一些同根形式的动词。

不及物动词和使动形式的及物动词,如:figjur“变化”/sgjur“改变”,fikhrug“错乱”/dkrug“搅乱”,fitehad“断”/gteod“弄断”。

自主及物动词的自动和使动形式,如:gon“穿”/skon“使穿”,zon“骑”/skjon“使骑”,fikhur“带”/skur“叫带”。

试指出这些动词的词根形式、派生的方式及派生时的语音变化。

①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29 页。

②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p. 227.

参考书目:

-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
-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劳允栋译,岑麒祥校订,科学出版社,1960年。
-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 年印。
-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1994 年。
-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A. G. 奥德利古尔《越南语声调的起源》,冯蒸译,袁家骅校,《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 孙宏开《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5 期。
- 梅祖麟《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中国语文》1988 年第 3 期。
-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Fetter Lane, 199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
- Roger Las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 H. Matthews,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年。
- 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年。
- Dennis Freeborn,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1998.
- Darrell T. Tryon,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Part 1: Fascicle 1.
- Graham Thurgood,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New York, 1996.

下篇 印欧语、汉藏语的分类和比较

第五章 印欧语的分类和比较

18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 Jones)等学者觉察到希腊语、拉丁语与梵语有密切的关系,相信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到了 19 世纪初,欧洲的学者展开了印欧语的历史比较,并提出了“印欧语系”的设想。两个世纪以来,尽管印欧语亲缘关系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立了历史语言学学科。

一、印欧语的分类

古印欧语大约是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的语言。印欧诸语通常分为 K 类和 S 类两组。这是根据诸语“一百”的首辅音的读法来区分的。K 类语群包括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凯尔特语族、希腊语族、吐火罗语族(Tocharian)、安纳托利亚语族(Anatolian)的语言,阿尔巴尼亚语(Albanian)和亚美尼亚语(Armenian)。S 类语群包括印度—伊朗语族、波罗的语族(Baltic)和斯拉夫语族。

如拉丁语“一百”centum,希腊语 he-katón,吐火罗语 kánt,梵语 śatam,伊朗语 satem,立陶宛语 šimtas,古斯拉夫语 sūto。

K 类语群又称为西部语群,S 类语群又称为东部语群。

1. 日耳曼语族

公元前 250 年至公元 250 年,日耳曼人的部落分布在欧洲的北海、莱茵河和易北河一带。古日耳曼语有西支、东支和北支三个支系。西支的语言演变为今天的德语、荷兰语和英语,北支的语言演变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和冰岛语。东支的哥特语(Gothic)大约在 3 世纪时从维斯杜拉(Visdula)向黑海一带传播,成为勃艮地语(Burgundian)和汪达语(Vandalic),它们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①哥特语和北欧语言的碑铭是所知最早的古日耳曼语文献。

2. 罗曼语族

罗曼语族的主要语言有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卡塔兰语、摩尔达维亚语(Moldavian)及罗马尼亚语等。^②

古拉丁语最初是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拉丁部族的语言。由于古罗马的强盛,罗马人的古拉丁语在并存的方言中占主导地位,公元前 5 世纪成为罗马共和国官方的语言。从那时至

^① Albert C. Baugh,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 30, 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2001 年。

^② 分布在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弗留利语(Friulian)、拉迪恩语(Ladin)和罗曼什语(Romansch)被认为是罗曼语族的利托—罗曼语(Rhaeto-Romance)的方言。

公元5世纪的1000年中随着罗马人的扩张,拉丁语广为传播,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此后的1000年中中古拉丁语作为教会的语言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中古拉丁语成为教会统治下的宗教、文化和行政方面的语言。各地的通俗拉丁语演变成不同的方言,成为罗曼语族的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卡塔兰语及罗马尼亚语等语言。古拉丁语中的C原本读作k,罗马帝国后期的通俗拉丁语中C在e、i、y、æ、œ等元音前读作了s、ts、tʃ等。

3. 凯尔特语族

凯尔特语(Celtic)曾是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语言,纪元初年分布于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和意大利北部,区分为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

古高卢语为大陆凯尔特语,公元5世纪时消亡。海岛凯尔特语区分为盖尔语(Goidelic)和不立吞语(Brythonic)两组。盖尔语组包括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和马恩语,不立吞语组包括威尔士语、科尼什语及分布在法国的布列塔尼语。

4. 希腊语族

希腊语是希腊语族唯一传世的语言。

公元前2000年古希腊人从巴尔干半岛来到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岛屿,形成不同部落的方言。主要的方言有4种:伊奥尼—阿提卡方言,阿尔卡底—塞浦路斯方言,爱奥利方言和西希腊语—多里亚方言。后来的希腊语是从阿提卡方言演变来的。现存最早的古希腊语文献是公元前15世纪用克里特岛线形文字B记录的。

5. 印度—伊朗语族

印度—伊朗语族区分为印度语支(或称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伊朗语支。

印度语支的主要语言有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比哈尔语、奥里亚语、拉贾斯坦语等。伊朗语支的主要语言有波斯语、普什图语等。

印度语支语言最早的阶段是吠陀语,然后是史诗梵语、古典梵语,稍晚的是它们的俗语,巴利语是其中的一种。

伊朗语支早期的语言有古代波斯语(阿吠斯陀语和使用楔形文字的古代波斯语),公元3~10世纪的安息语、中世波斯语、大夏语、花刺子模语、粟特语等,现代的有波斯语、普什图语等。^①

6. 波罗的语族

波罗的语族分东支和西支。东支的语言有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已消亡的库罗尼亚语、塞米加里亚语和塞罗尼亚语。西支的古普罗士语于17世纪消亡。

7. 斯拉夫语族

斯拉夫语族分东部语支、西部语支和南部语支3支。东部语支有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西部语支有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卢萨提亚语,南部语支有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东部语支的诸语来自14世纪前的共同东斯拉夫语。^②

8. 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

阿尔巴尼亚语是印欧语系的独立的语言,来自古伊利里亚语。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454、2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② 同上,第3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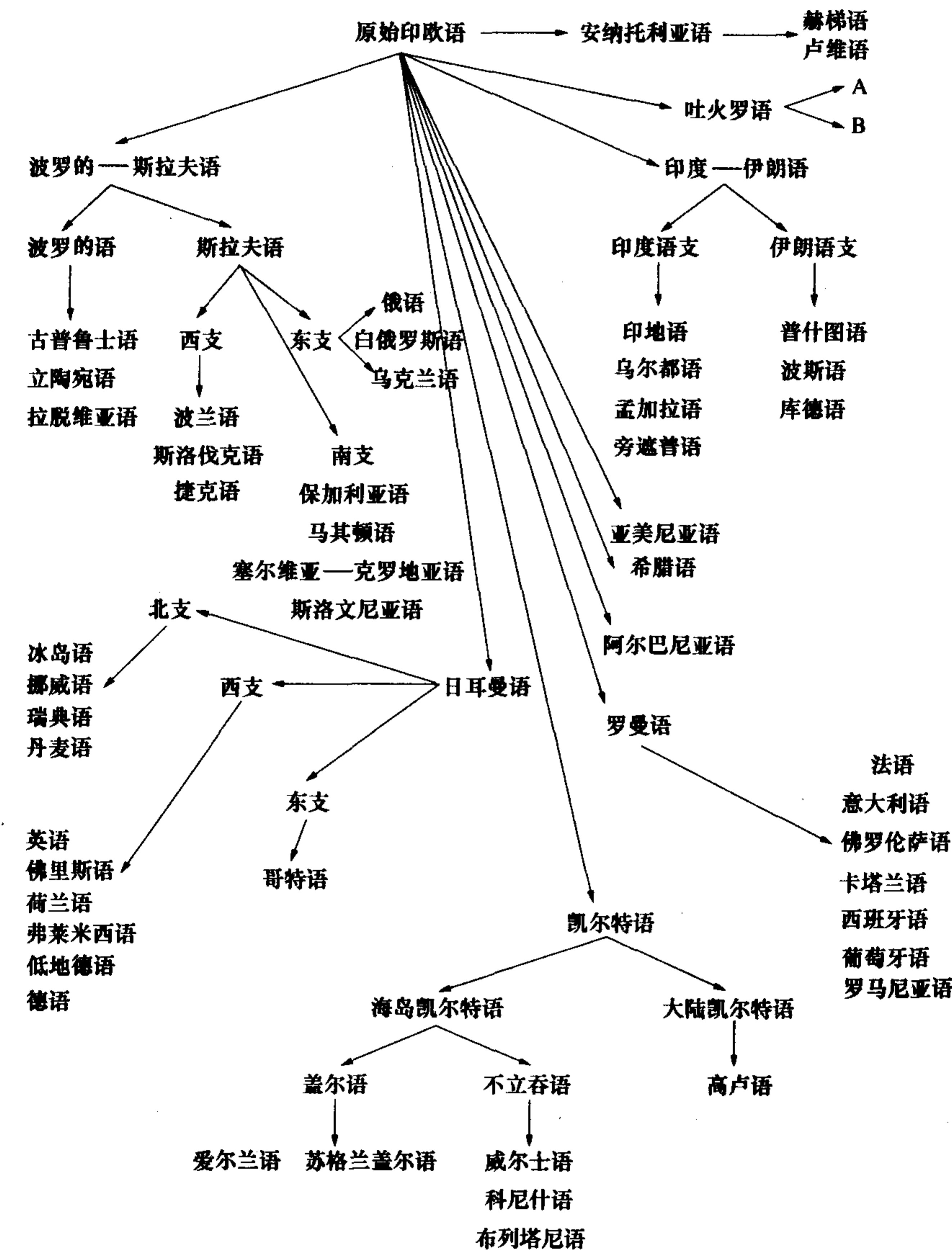
亚美尼亚语也叫做阿尔明尼亚语,是印欧语系独立的语言,17 世纪以后分化为东部和西部两种方言。

9. 吐火罗语族和安纳托利亚语族

吐火罗语族包括已经消亡的焉耆语(吐火罗语 A,东吐火罗语)和龟兹语(吐火罗语 B,西吐火罗语)。焉耆语的文献发现于吐鲁番和焉耆,龟兹语的文献发现于库车一带,使用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①

安纳托利亚语族包括已经消亡的赫梯语(Hittite)和卢维语(Luiwian),它们原来分布在今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地区。赫梯语的最早文献是公元前 14 世纪的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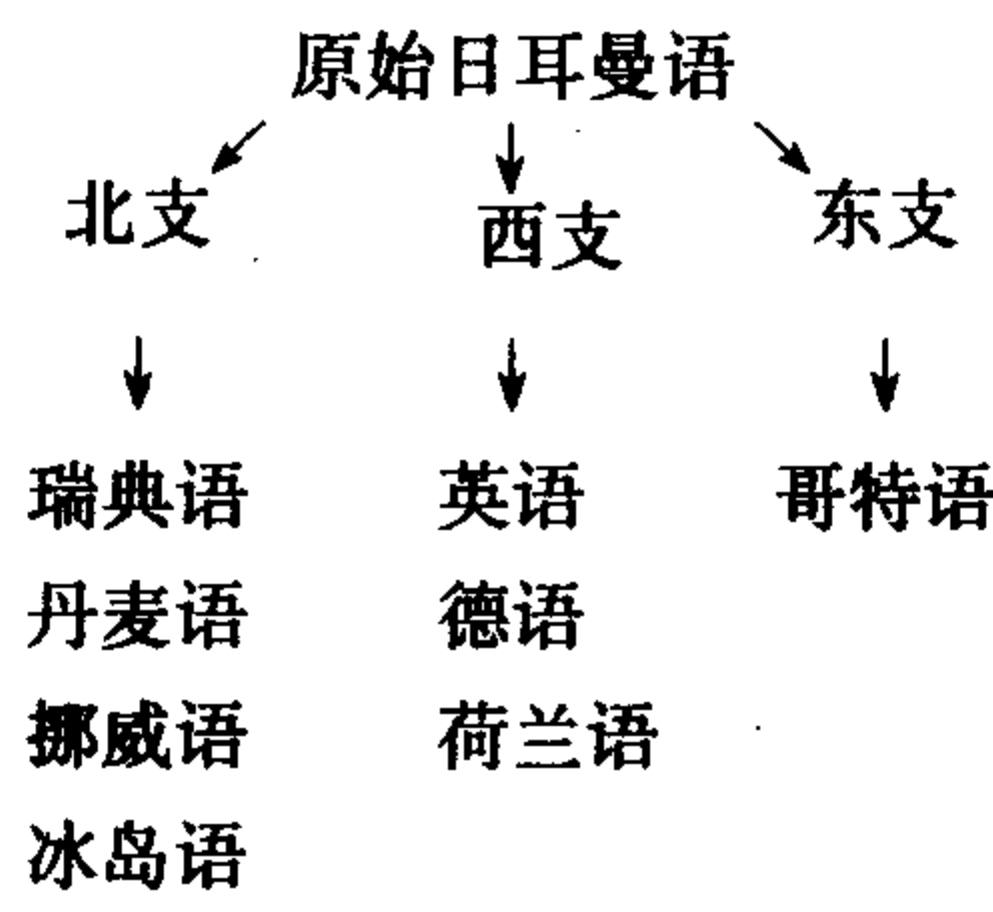
以下是印欧语发生学关系(谱系)图: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 390 页。

二、日耳曼语的比较

原始日耳曼语分化为古日耳曼语的西支、东支和北支,诸语的发生学关系为:



1. 日耳曼语的语音

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时,西部语群的印欧语发生了有别于其他印欧语的语音演变,古印欧语的 *p、*t、*k 演变为 f、þ、h, *bh、*dh、*gh 演变为 b、d、g, *b、*d、*g 演变为 p、t、k。古北欧铭刻使用 24 个字母。原始日耳曼语的语音系统可构拟为:

辅音							
p	b	f	m				w
t	d	þ	n	r	l	s	z
k	g	h	ŋ				j
kw	gw	hw					
单元音							
i		u			ī		ū
e		o			ē		ō
	a					ā	
复元音							
ei		oi			iu		ou
	ai					au	

2. 日耳曼语的形态

古印欧语名词的 8 个格演变为古日耳曼语的 6 个格(现代日耳曼语中进一步简化为 4 个格),动词式从 5 个演变为 3 个。

(1) 日耳曼诸语动词的形态

古日耳曼动词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类,强式动词即不规则动词,弱式动词即规则动词。

以下是日耳曼语族瑞典语、丹麦语、荷兰语、德语和英语 5 组强势动词的原形、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的比较:

瑞典语	丹麦语	荷兰语	德 语	英 语
komma	komme	comen	commen	come (来)

kom	kom	kwam	kam	came
kommit	kommet	gekomen	gekommen	come
finna	finde	vinden	finden	find (找到)
fann	fandt	vond	fand	found
funnit	fundet	gevonden	gefunden	found
flyga	flyve	vliegen	fliegen	fly (飞)
flög	fløj	vloog	flog	flew
flugit	fløjjet	gevlogen	geflogen	flown
rida	ride	rijden	reiten	ride (骑)
red	red	reed	ritt	rode
ridit	redet	gereden	geritten	ridden
se	se	zien	sehen	see (看见)
såg	saa	zag	sah	saw
sett	set	gezien	gesehen	seen
sjunga	synge	zingen	singen	sing (唱)
sjöng	sang	zong	sang	sang
sjungit	sunget	gezongen	gesungen	sung

(2) 日耳曼语名词的形态

古英语的名词分阴性(feminine)、阳性(masculine)和中性(neuter),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格有4个:主格、宾格、与格和所有格。名词的单数、复数和格的不同用后缀表示。现代英语名词仅残留着少数古代名词单、复数的区分形式,格的分别也都没有了。而德语显然保留得多一点:

			日子	水	舌头	熊
古英语						
单数	主格		daeg	waeter	tunge	bear
单数	宾格		daeg	waeter	tungan	beran
单数	与格 ^①		daege	waetere	(同上) ^②	(同上)
单数	所有格		daeges	waeteres	(同上)	(同上)
复数	主格		dagas	waeter	(同上)	(同上)
复数	宾格		dagas	waeter	(同上)	(同上)

① 动词的间接宾语。

② “同上”指与上一行的 *tungan* 一样。

复数	与 格	dagum	waeterum	tungum	berum
复数	所有格	daga	waetera	tungena	berena
德语					
单数	主 格	Tag	Wasser	Zunge	Bär
单数	宾 格	Tag	(同上)	(同上)	Bären
单数	与 格	Tag(e)	(同上)	(同上)	(同上)
单数	所有格	Tages	Wassers	(同上)	(同上)
复数	主 格	Tage	Wasser	Zungen	(同上)
复数	宾 格	Tage	Wasser	(同上)	(同上)
复数	与 格	Tagen	Wassern	(同上)	(同上)
复数	所有格	Tage	Wasser	(同上)	(同上)

在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中,表达格变化的音节形式已简化,格变系统大致还完整。

(3) 日耳曼诸语后缀、前缀比较

以下是日耳曼语族瑞典语、丹麦语、荷兰语、德语和英语后缀及前缀的比较^①：

	英 语	瑞典语	丹麦语	荷兰语	德 语
名词后缀	(king)-dom	-dom	-dom	-dom	-tum
	(write)-er	-are	-er	-er	-er
	(father)-hood	-het	-hed	-heid	-heit
	(warn)-ing	-ing	-ing	-ing	-ung
	(kind)-ness	-ness	—	—	-nis
	(friend)-ship	-skap	-skab	-schap	-schaft
形容词后缀	(wish)-ful	-full	-fuld	-vol	-voll
	(hell)-ish	-isk	-isk	-isch	-isch
	(life)-less	-lös	-løs	-loos	-los
	(lone)-ly	-lig	-lig	-lijk	-lich
	(losth)-some	-sam	-som	-zaam	-sam
	(dust)-y	-ig	-ig	-ig	-ich, -ig
形容词前缀	un-(kind)	o-	u-	on-	un-
副词后缀	(home)-wards	—	—	-waarts	-wärts
	(like)-wise	-vis	-vis	-wijze	-weise
动词前缀	be-(hold)	be-	be-	be-	be-
	for-(bid)	för-	for-	ver-	ver-
	fore-(see)	före-	fore-	voor-	vor-
	mis-(take)	miss-	mis-	mis-	miss-

^① Frederick Bodmer, *the Loom of Language*, p. 272.

古英语的形容词也像名词那样变化,与被它们修饰的名词在性、数、格上保持一致。

三、罗曼语的比较

意大利语、法语、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卡塔兰语、摩尔达维亚语及罗马尼亚语等罗曼语族的语言来自公元 5 世纪以后的教会传播的通俗拉丁语,其源头是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古罗马的古拉丁语。现存的最早的古拉丁语文献是公元前 600 年的石刻碑铭和公元前 6 世纪金属搭扣上的刻字,拼写法从右往左。

拉丁字母产生于公元前 7 世纪,其基础是源于希腊字母的伊特拉斯坎字母。

从古典拉丁语到通俗拉丁语以及罗曼语族诸语,是通俗的口语得以传播和成为权威方言的过程。

1. 罗曼语的语音

K 本是古拉丁语的字母,后来几乎都被 C 所取代。Y 只用来表示希腊语借词,Z 也只用来表示借词。

古拉丁语 jŭgum“(两头牛的)牛轭”,对应于拉丁语 iugum,希腊语 ζυγόν,梵语 yugam。古拉丁语 j 对应于拉丁语、梵语和哥特语的 j,其音值当为 *j。

古拉丁语 qu-即拉丁语 qu-,对应于梵语 c-和 k-。如“谁,什么”:拉丁语 quis,quid;梵语 kas,čid。“五”,拉丁语 quinque,梵语 pañca,哥特语 fimf,立陶宛语 penki。故古拉丁语 qu-<*k^w-。古拉丁语的 k 既为 c 所取代,原本这两个字母可能代表两个不同的音。

早期古拉丁语的语音系统可构拟为:

辅音						
p	b	f	v	m		w
t	d	s		n	r	l
k	g	h				j
kw						
单元音						
i	u		ī	ū		
e	o		ē	ō		
	a			ā		

其复元音包括: au ai iu oi ou。

2. 罗曼语的形态

(1) 罗曼语动词的形态

拉丁语的动词有不同的变化形式。如动词 canto“唱”:

	陈述语气	虚拟语气
现在时	canto	cantem
将来时	cantabo	—

未完成时	cantabam	cantarem
完成时	cantavi	cantaverim
过去完成时	cantaveram	cantavissem
将来完成时	cantavero	—

拉丁语第一人称动词陈述式完成时以*-i 结尾,如:

	现在时	完成时
我收集	colligo	collegi
我拣	carpo	carpsi
我放	pono	posui
我跑	curro	cucurri

古拉丁语的将来时和将来完成时的变化形式在伊比利亚拉丁语中失去,保留了未完成时的形式,试与伊比利亚拉丁语的后代语言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比较:

	拉丁语	法 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现在时				
我爱	amo	j'aime	amo	amo
你爱	amas	tu aimes	amas	ami
他爱	amat	il aime	amat	ama
我们爱	amamus	nous aimons	amamos	amiamo
你们爱	amatis	vous aimez	amáis	amate
他们爱	amant	ils aiment	aman	amano
未完成时				
我曾爱	amabam	j'aimais	amaba	amavo
你曾爱	amabas	tu aimais	amabas	amavi
他曾爱	amabat	il aimait	amaba	amava
我们曾爱	amabamus	nous aimions	amábamos	amavamo
你们曾爱	amabatis	vous aimeiz	amabais	amavate
他们曾爱	amabant	ils aimaient	amaban	amavano

(2) 罗曼语名词和代词的形态

拉丁语的名词有主格、宾格、所有格、与格、离格(夺格)和呼格等六个格,如:

	主 格	宾 格	所有格	与 格	离 格
玫瑰(单数)	rose	rosam	rosae	rosae	
主人(单数)	dominus	dominos	domini	domino	domino

方位格在古拉丁语中已经由离格来表示,它的屈折形式仅保留在一些地名中。

拉丁语名词主格和非主格(间接格)的单、复数形式仍用屈折形式表示,如:

	单 数		复 数	
	主格	间接格	主格	间接格
月亮	luna	luna	lune	luna(s)
马	caballu(s)	caballu	caballi	caballo(s)
狗	cani(s)	cane	cane(s)	cane(s)

古拉丁语中人称代词很少出现,如“我”“我们”等人称的主格形式由动词的词尾来表示。拉丁语及它的后代语言人称代词的形式如:

第一、第二人称代词

	法 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拉丁语
我(主格)	je	eu	yo	io	ego
(宾格)	me	me	me	mi	me
(与格)					mihi
你(主格)	tu	tu	tu	tu	tu
(宾格)	te	te	te	ti	te
(与格)					tibi
我们(主格)	nous	nós	nosotros	noi	nos
(宾格)	nous	nos	nos	ci	nos
(与格)					nobis
你们(主格)	vous	vós	vosotros	voi	vos
(宾格)	vous	vos	os	vi	vos
(与格)					vobis

第三人称代词

	法 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他(主格)	il	êle	él	egil, esso
(宾格)	le	o	le(或 lo)	lo
(与格)	lui	lhe	le	gli
她(主格)	elle	ela	ella	ella, essa
(宾格)	la	a	la	la
(与格)	lui	lhe	le	le
他们(主格)	ils	êles	ellos	essi, loro
她们(主格)	elles	elas	ellas	esse, loro
他们(宾格)	les	os(或 los)	los	li
她们(宾格)	les	as(或 las)	las	le
(与格)	leur	lhes	les	loro
他(们)自己	se	se	se	si ^①

① “她(们)自己”和“它(们)自己”与“他(们)自己”同。

(3) 罗曼语形容词的形态

古拉丁语的形容词和分词如同古英语,根据所修饰名词性、数、格的分别而有所分别。如形容词 bonus“好”和 tristis“坏”:

	bonus			tristis		
	阳性	阴性	中性	阳性	阴性	中性
主格单数	bonus	bona	bonum	tristis	tristis	triste
宾格单数	bonum	bonam	bonum	tristem	tristem	triste
主格复数	boni	bonae	bona	tristes	tristes	tristia
宾格复数	bonos	bonas	bona	tristes	tristes	tristia

现代罗曼语形容词比较级有规则和不规则的变化,可与拉丁语的相比较。规则变化的,如:

	拉丁语	法 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热	calidus	chaud	cálido	caldo
较热	calidior	plus chaud	más cálido	più caldo
最热	calidissimus	le plus chaud	el más cálido	il più caldo

不规则变化的,如:

	拉丁语	法 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好	bonus(-a, -um)	bon(-ne)	bueno(-a)	buono(-a)
较好	melior	meilleur(-e)	mejor	migliore
最好	optimus	le meilleur	el mejor	il migliore
大	magnus	grand(-e)	grande	grande
较大	major	plus grand	más grande	più grande
最大	maximus	le plus grand	el más grande	il più grande

四、古印欧语的构拟

荷兰学者兰伯特·邓·卡德(Lambert Ten Kate)18 世纪初将峨特语、德语、荷兰语、古英语和冰岛语的语法结构作比较,发表了《峨特语和低地德语间的共同性》。1786 年,精通梵语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根据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的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有共同的来源。他在“亚洲学会”上宣读题为《三周年》的论文时说:“梵语的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同希腊语和拉丁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巧合。”1816 年,弗朗兹·葆朴发表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互相比较》。后来他还出版了三卷本巨著《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葆朴假定印欧语的词最初都是由单音节的词根构成的;印欧语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包含着动词词根与代词词根的结合;动词的人称词尾是人称代词主语的后缀化等意见。他以梵语为出发点,在比较中努力追溯古印欧

语语法形式的发展过程和来历。

1818年,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发表了他较早时写成的《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的研究》。他认为:“语法对应是亲属关系和起源共同性更为可靠得多的标志”,“跟其他语言相混杂的语言是极少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来也不模仿那种语言的变格和变位形式的,但相反地却宁肯失去自己固有的变格和变位形式。”另外他又强调基本的词汇,他说:“一种语言,无论它怎样混杂,只要构成这种语言的基础的最重要、最具体、最不可少和最原始的词跟其他语言的词是共同的,那它就与其他语言一起属于同一个语族。”在语音方面,他所强调的“字母转换的法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音对应关系。拉斯克的原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

德国学者雅各布·格里姆主要从事日耳曼语的历史研究,1819~1837年间出版了四卷本的《德语语法》,184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德语史》。格里姆深受拉斯克的影响。他在拉斯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格里姆定律”。日耳曼语和其他印欧语辅音的对应规律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格里姆还设想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词根和词的创造、成长与形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词尾繁盛时期;第三个阶段是词尾被抛弃的时期。^① 格里姆与当时的其他学者一样受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

罗曼诸语来自十多个世纪前的通俗拉丁语。罗曼诸语比较研究的奠基人是弗利特利赫·狄慈(Friedrich Diez, 1794~1876)。他的主要著作有三卷本的《罗曼语族诸语言的语法》(1836, 1838, 1844)和两卷本的《罗曼语族词源词典》(1857)。

有关斯拉夫语的研究中,俄国学者沃斯托科夫(А. X. Востоков, 1781~1864)在1820年出版了《论斯拉夫语》。在这部著作里,他确定了斯拉夫语和俄语的历史分期,阐明了古俄语同波兰语、塞尔维亚语的关系。后来他在《鲁勉采夫博物馆俄罗斯和斯拉夫抄本记述》(1842)中明确地划分了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在斯拉夫语的研究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还有米克洛施(F. Miklosich, 1813~1891),主要著作有1852~1874年间出版的四卷本《斯拉夫语比较语法》。斯列兹涅夫斯基(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1812~1880)1849年出版了《论俄语史》。在他去世后的1893年出版了他的三卷本的《古俄语词典资料汇编》。^②

1. 古印欧语的语音

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或简单地用PIE来表示。西方的研究者认为其动词词根的基本构成为CVC。C代表辅音(consonant),V代表元音(vowel)。如“越过”梵语中是táratī,拉丁语为trāre,赫梯语为tarhzi,原始印欧语词根构拟为*ter-。

(1) 古印欧语的元音

奥斯瓦尔多·谢米列尼(Oswald Szemerényi)认为古印欧的单元音系统应该是^③:

①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 120.

②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第71—82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③ О. Семереньи,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0, pp. 47—50.

i	u	i	ū
e	o	ē	ō
a		ā	

谢米列尼的比较摘录如下:

① *a

*agō“(我)追”: 希腊语 ἄγω, 拉丁语 agō, 梵语 aṣami, 斯堪的纳维亚语 aka(骑)。

*agros“牧场,原野”: 希腊语 ἀγρός, 拉丁语 ager, 梵语 aśras, 斯堪的纳维亚语 akrs。

*dakru“眼泪”: 希腊语 δάκρυ, 古拉丁语 dacruma(晚期拉丁语 lacrima), 哥特语 tagr, 古高地德语 zahar。

*ghans-“鹅”: 希腊语 χᾶν, 古希腊语 χήν, 拉丁语 anser, 梵语 haṁsa-, 古高地德语 gans。

② *ā

*swādu-“甜的”: 希腊语 ἄδύς, 古希腊语 ἡδύς, 拉丁语 suāvis, 梵语 svādu-, 古高地德语 s(w)uozī。

*bhāghu-“手(臂)”: 希腊语 πᾶχυς, 古希腊语 πῆυς, 梵语 bāhu-, 古高地德语 buog(指骨)。

*mātēr-“母亲”: 希腊语 μάτηρ, 古希腊语 μήτηρ, 拉丁语 māter, 梵语 mātār-, 古英语 mōdor, 古高地德语 muoter, 立陶宛语 motė(女人), 古斯拉夫语 mati, mater-。

*bhrātēr“兄弟”: 希腊语 φράτηρ(同胞), 拉丁语 frāter, 梵语 bhrātar-, 哥特语 brōþar, 古高地德语 bruoder。

③ *e

*bher-“带来”: 希腊语 φέρω, 拉丁语 ferō, 梵语 bharāmi, 哥特语 bairan, 古高地德语 beran。

*esti“是”(第三人称单数): 希腊语 ὥστί, 拉丁语 est, 梵语 asti, 哥特语 ist。

*genos“氏族”: 希腊语 γένος, 拉丁语 genus, 梵语 jānas-。

*nebhos, *nebhelā, “云,天”: 希腊语 νέφος νεφέλη, 拉丁语 nebula, 梵语 nabhas-, 古斯拉夫语 nebo nebes-。

④ *ē

*rēg-s“国王”: 拉丁语 rēx, 梵语 rājā, 古爱尔兰语 rī, rīg(生格,第二格)。

*sē-“播种”: 拉丁语 sēmen, 哥特语 mana-sēps, 古高地德语 sāmo, 古斯拉夫语 sēme, 古爱尔兰语 sil(种子)。

*dhē-“放”: 希腊语 τίθημι, 梵语 da-dhā-mi, 拉丁语 fē-ci, 哥特语 missa-dēds(过失), 古高地德语 tāt。

*plē-“满的”: 希腊语 πλήρης, 拉丁语 plēnus, 梵语 plātas。

⑤ *o

*oktō“八”: 希腊语 ὀχτώ, 梵语 aṣṭa, 拉丁语 oetō, 哥特语 ahtau, 古爱尔兰语 ocht。

*owis“母绵羊”: 希腊语 ὄvis, οἷς, 梵语 avis, 拉丁语 ovis, 哥特语 awistr-is(羊圈), 古

高地德语 ou(wi), 立陶宛语 avis, 古斯拉夫语 ovīca。

*potis“先生、丈夫”: 希腊语 πόσις(δεσπότης), 梵语 patis, 拉丁语 potis potior, 哥特语 brūþ-faþs(未婚夫), 立陶宛语 patis(丈夫)。

*orbhos“丧父母的”: 希腊语 ὀρφανός, 拉丁语 orbus, 亚美尼亚语 orb(孤儿), 哥特语 arbi(遗产)(*orbhyom), 古高地德语 orbi, erbi, 古爱尔兰语 orb(继承人)。

⑥ *ō

*gnō“知道”: 希腊语 ἔγνων, 梵语 jñāta-, (g) nōtus, 古拉丁语 gnōscō, 古典拉丁语 nōvī, 古斯拉夫语 znati。

*dō“给”, *dō-no-m, *dō-ro-m(赠品): 希腊语 ἔδωχα, δίδωμι, δῶρον, 拉丁语 dō dōnum, 梵语 da-dā-mi, dā-nam, 古斯拉夫语 dati(给), darŭ(赠品), 立陶宛语 dúoti(给)。

*ōku“快”: 希腊语 ὥχους, 梵语 āśu-, 拉丁语 ōcior。

*yōs“束(腰带)”: 希腊语 ζώστος ζώνυμι ζώνη, 阿维斯陀经 yāsta, 立陶宛语 júostas, 古斯拉夫语 po-jas-ŭ(腰带)。

⑦ *i

*wid“管理, 了解”: 希腊语, 荷马史诗(ῥ)ιδ-μεν, 梵语 vid-ma, 哥特语 witum。

*widhewā“寡妇”: 拉丁语 vidua, 梵语 vidhavā, 哥特语 widuwō, 古高地德语 wituwa, 古斯拉夫语 vīdova。

*misdho“付钱, 报酬”: 希腊语 μισθός, 梵语 mi dha-(mīlha-)(猎获物), 阿维斯陀经 mižda-(付钱), 古斯拉夫语 mīzda, 哥特语 mizdō, 德语 Miete。

*k^wis, *k^wid, “什么”“谁”: 拉丁语 quis, quid; 赫梯语 kwis, kwid; 希腊语 τίς, τί(τιδ)。

⑧ *ī

*g^wiwuos“活的”: 立陶宛语 gývas(ý=ī), 古斯拉夫语 živŭ, 梵语 jīva-, 拉丁语 vivos。

*wīs“力量”: 希腊语(ῥ)ῖς, 拉丁语 vīs。

*piwon“胖”: 希腊语 πίων, 梵语 pīvan-。

*pī“饮”: 希腊语 πίνω πιθι, 梵语 pīta-(喝), 古斯拉夫语 pivo(啤酒)。

⑨ *u

*yugom“压制”: 希腊语 ζυγόν, 拉丁语 iugum, 梵语 yugam, 古斯拉夫语 igo, 哥特语 juk。

*rudhros“红的”: 希腊语 ἐρυθρός, 拉丁语 ruber, 梵语 rudhira, 古斯拉夫语 rūdrŭ。

*medhu“蜂蜜”: 希腊语 μέθυ, 梵语 madhu, 古斯拉夫语 medŭ, 古英格兰语 medu, 古高地德语 metu。

*snusūs“儿媳”: 希腊语 νύς, 拉丁语 nurus, 梵语 snuṣā, 古高地德语 snur。

⑩ *ū

*mūs“洗”: 希腊语 μῦς, 拉丁语 mūs, 梵语 mūṣ-, 古斯拉夫语 myšī, 古高地德语 mūs。

*bhrŭ“眉毛”: 希腊语 ὄφρῦς, 梵语 bhrŭ-, 古英格兰语 brŭ。

*ūdher“乳房”(兽): 拉丁语 ūber, 梵语 ūdhar, 古英格兰语 ūder, 古高地德语 ūtar。

*dhūmos“烟”: 希腊语 θυμός, 拉丁语 fūmus, 梵语 dhūma-, 立陶宛语 dúmai, 古斯拉夫语 dymŭ。

谢米列尼认为古印欧的复元音有^①:

ei	oi	eu	ou
ai		au	

āi、ōi、ēu、ōu 只出现在构形的词尾中。

① *ai

*aidha“烧”: 希腊语 αἶθω, 拉丁语 aedēs(最初指“炉灶”, 后来表示“房子”), aestus, aestās; 梵语 edha-(木柴), 古高地德语 eit(篝火)。

*kaiko“失明的”: 拉丁语 caecus, 古爱尔兰语 caích(独眼的), 哥特语 haihs(独眼的), 希腊语 χχίχίς。

*daiwēr“丈夫的兄弟”: 希腊语 δαήρ, 梵语 dēvar-, 亚美尼亚语 taigr, 古斯拉夫语 dēverī, 古高地德语 zēihur。

*ghaido“山羊”: 拉丁语 haedus, 哥特语 gaitis, 古高地德语 geiz。

② *ei

*deik“指(给)”: 希腊语 δείχνμι, 拉丁语 diēō, 哥特语 ga-teihan(宣布, 公布), 古高地德语 zīhan。

*deiws“神”: 拉丁语 deus, divus, 梵语 dēvas, 古普鲁士语 deiws, 立陶宛语 dievas。

*ei-ti“(他)走”: 希腊语 εἶσι, 拉丁语 it, 梵语 ēti, 立陶宛语 eit(i)。

*sneig^wh“下雪”: 希腊语 νεῖφι, 古拉丁语 nīvit, 古高地德语 snīwan。

③ *oi

*woida“(我)知道”: 希腊语 (Ϝ)οῖδα, 梵语 vēda, 古斯拉夫语 vědēt, 哥特语 wait, 古高地德语 weiz。

*oinos“一”: 希腊语 οἶνη, 拉丁语 ūnus(古拉丁语 oino), 哥特语 ains, 古爱尔兰语 oin。

*snoig^whos“雪”: 古普鲁士语 snaygis, 立陶宛语 sniegas, 古斯拉夫语 sněgŭ, 哥特语 snaiws, 古高地德语 snēo。

*toi“那(些)”: 希腊语(多利斯方言)τοι, 拉丁语 is-tī, 梵语 tē, 哥特语 þai。

④ *au

*aug“增加”: 希腊语 αὔξω, αὔξάνω, 拉丁语 augeo, 哥特语 aukān(繁殖), 立陶宛语 áugti(生长)。

*sausos“干(旱)”: 希腊语 αὔος, 梵语 śōṣa-, 立陶宛语 sausas, 古斯拉夫语 suxŭ, 古高地德语 sōrēn。

*aus“耳朵”: 拉丁语 auris, auscultō, 哥特语 ausō, 立陶宛语 ausis。

*aus“汲”: 希腊语 αὔω, ἐξάύω, 拉丁语 hauriō, 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ausa。

① О. Семереньи,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0, pp. 52 - 54.

⑤ *eu

*deuk-“拉,扯”: 拉丁语 dūcō(古拉丁语 doucit), 哥特语 tiuhan, 古高地德语 ziohan。

*geusō“尝”: 希腊语 γεύμαι, 哥特语 kuisan。

*eusō“燃烧”: 希腊语 εῶω, 拉丁语 ūrō, 梵语 ōṣāmi。

*leuk-“发光”: 希腊语 λευχός, 哥特语 liuhaþ(光), 梵语 rōcati。

⑥ *ou

*roudos“红色”: 拉丁语 rōbigō, 哥特语 rauþs, 古高地德语 rōt, 立陶宛语 raudas, raudonas。

*loukos“林间空地”: 拉丁语 lūcus(古拉丁语 loucom), 梵语 lōka-(世界), 立陶宛语 laukas(田野), 古高地德语 lōh(灌木林小路)。

*klounis“臀”: 拉丁语 clūnis, 立陶宛语 šlaunis(大腿), 梵语 śrōṇi, 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hlaun。

*louksno“发光的”: 拉丁语 lūna, 古普鲁士语 lauxnos, 阿维斯陀经 raoxšna-。

(2) 古印欧语的辅音

布鲁格曼(Brugmann)构拟了包括腭音 kj-的塞音, 塞音五分, 擦音 s 和 z 有送气和不送气对立的原始印欧语的辅音系统。谢米列尼修改后的辅音系统为①:

p	b	bh	m	m̥							w
t	d	dh	n	n̥	r	r̥	l	l̥	y	s	z
k	g	gh		ṇ̥		ṛ̥		ḷ̥			
g ^w	k ^w	g ^w h									

① *p

*ped-, *pod-“脚跟”: 希腊语 ποῦς ποδός, 拉丁语 pēs ped-is, 梵语 pad-, 哥特语 fōtus, 亚美尼亚语 otn。

*spek-“观看”: 希腊语 σχέπ-τομαι, 拉丁语 speciō spectō, 阿维斯陀经 spas-, 古高地德语 spehōn(看出)。

*tep-“温暖”: 拉丁语 tepeo(暖人的), 梵语 tapati, 古斯拉夫语 teplostī(热)。

*uper(i)“在……上空, 从上面”: 希腊语 ὑπέρ, 梵语 upari, 拉丁语 s-uper, 哥特语 ufar, 古高地德语 ubir。

② *b

*belo-“力气”: 梵语 balam, 希腊语 βέλ-τερος(有力气的), 古斯拉夫语 bolijī(较大的), 拉丁语 dē-bilis(无力的)。

*pibeti-“他喝”: 梵语 pibati, 拉丁语 bibit, 古爱尔兰语 ibid。

*dheub-“深的, 空的”: 哥特语 diups, 立陶宛语 dubūs(深的), 古斯拉夫语 dūbrī, 高卢语 Dubno-rīx(宇宙主宰), 古爱尔兰语 domun(宇宙)。

③ *bh

① О. Семереньи,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0, pp. 55 - 83.

*bher-“带来”: 希腊语 φέρω, 拉丁语 ferō, 梵语 bhar-, 哥特语 bairan, 古高地德语 beran。

*bhendh“连接”: 拉丁语 of-fend-ix(神职人员系于下巴的帽带), 梵语 bandh-(有血缘的), 哥特语 bindan, 希腊语 πείσμα(粗绳)。

*albho-“白的”: 希腊语 ἀλφούς, 拉丁语 albus, 古英格兰语 ælbitu(天鹅)。

*gombho-“牙齿”: 希腊语 γόμφος, 梵语 ģambhas, 古斯拉夫语 zǫbŭ, 古高地德语 kamb, 古英格兰语 comb(梳子), 吐火罗语 A. kam B. keme。

④ *t

*treyes-“三”: 希腊语 τρεῖς, 拉丁语 trēs, 梵语 trays。

*teutā“氏族, 人民”: 古立陶宛语 tauta(人民), 梵语 touto, 古爱尔兰语 túath(人民, 国家), 哥特语 þiuda, 古高地德语 diot, 赫梯语 tuzzi-(军队)。

*tres-“摇摆”: 希腊语 τρέω(激动), 梵语 trasati, 拉丁语 terreō, 古爱尔兰语 tarrach(胆小的), 立陶宛语 trišu。

*pet-“驱使, 飞”: 梵语 patati(飞驰), 拉丁语 petō(走动), 古英格兰语 feðer, 古高地德语 fedara(羽毛), 古爱尔兰语 ethait(鸟)。

⑤ *d

*domos“房子”: 希腊语 δόμος, 梵语 damas, 拉丁语 domus。

*ed-“吃”: 希腊语 ἔδοντι, ἔδομεναι, ἔδομαι, 梵语 ad-mi, 哥特语 itan。

*sed-“坐着”: 希腊语 ἕζομαι(*sed-y-), 梵语 asadat, 拉丁语 sedeō, 哥特语 sitan, 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sitja, 古高地德语 sitzen。

*reud“喊, 嗥叫”: 梵语 rudāti(使列队), 拉丁语 rudō(嗥叫), 古英格兰语 rēotan, 古高地德语 riozan(埋怨), 立陶宛语 raudóti(呻吟)。

⑥ *dh

*dhūmos“烟”: 希腊语 θυμός, 拉丁语 fūmus, 梵语 dhūma-, 立陶宛语 dúmai, 古斯拉夫语 dymŭ。

*medhyos“中间的”: 梵语 madhyas, 拉丁语 medius。

*ūdher“乳房”(兽): 拉丁语 ūber, 梵语 ūdhar, 古英格兰语 ūder, 古高地德语 ūtar。

*widhewā“寡妇”: 拉丁语 vidua, 梵语 vidhavā, 哥特语 widuwō, 古高地德语 wituwa, 古斯拉夫语 vīdova。

*werdho-, *wrdho-“话”: 拉丁语 verbum, 哥特语 waurd, 古高地德语 wort。

*bhardhā“胡子”: 拉丁语 barba, 古斯拉夫语 brada, 古高地德语 bart, 拉脱维亚语 barda。

⑦ *k

*kerd-, *krd“心脏”: 希腊语 καρδία, 古荷马史诗 χῆρ, 拉丁语 cor, cordis(生格), 哥特语 haírtō, 古爱尔兰语 cride, 立陶宛语 širdis, 古斯拉夫语 srŭdice。

*porkos“小猪”: 拉丁语 porcus, 古爱尔兰语 orc, 古高地德语 far(a)h, 立陶宛语 paĩšas。

*ekwos“马”: 拉丁语 equus, 哥特语 aihwa-yundi, 梵语 ašvas, 古撒克逊语 ehu-skalk。

*ōku-“快”: 希腊语 ὤχως, 拉丁语 ōcior, 梵语 āśu-。

⑧ *g

*agō“(我)追”: 希腊语 ἄγω, 拉丁语 agō, 梵语 aṣami, 斯堪的纳维亚语 aka(骑)。

*agoros“牧场,原野”: 希腊语 ἀγρός, 拉丁语 ager, 梵语 aṣras, 哥特语 akrs。

*genu, *gonu“膝盖”: 希腊语 γόνυ, 拉丁语 genu, 梵语 jānu, 赫梯语 genu。

*geus-“试,尝”: 希腊语 γεύμαι, 拉丁语 gustō, 哥特语 kiusan, 梵语 jōṣti(喜欢)。

⑨ *gh

*gheim-, *gh(i)yem-“冬天,雪”: 希腊语 χιών(雪), 拉丁语 heims(冬天), 立陶宛语 žiemà, 古斯拉夫语 zim, 梵语 hēman。

*anghu-“狭窄的”: 拉丁语 angī-portus(山口), 哥特语 aggwus, 古高地德语 angī, engī, 古斯拉夫语 ōzŭ-kŭ, 梵语 amhu-。

*dheigh-“粘,塑”: 希腊语 τῶχος(墙), 拉丁语 fingo, figulus, figūra, 哥特语 ga-digan(揉), 古高地德语 teig(面团), 亚美尼亚语 dizanem(放入一堆), 阿维斯陀经 pairi-daēza-(围墙), 梵语 déhmi(涂上)。

*wegh-“乘坐”: 希腊语 Φεχέτω(应带来), 拉丁语 vehō(我搬运), 哥特语 ga-wigan(移动), 古高地德语 wegan(移动), 古斯拉夫语 vizŏ(搬运), 梵语 váhati(搬运)。

⑩ *k^w

*k^wi, *k^wo-“谁,什么”: 希腊语 τίς, ποῦ, 拉丁语 quis, quid, 赫梯语 kwis, 哥特语 hwa(s), 梵语 kas, cid, 古斯拉夫语 kŭ-to, čī-to, 立陶宛语 kàs(谁)。

*k^wi-“报答”: 希腊语 τίνω(抵偿), 梵语 čayatē(报仇)。

*k^woinā“弥补”: 希腊语 ποινή, 立陶宛语 kàina(价格), 古斯拉夫语 cěna。

*k^welo-, *k^wek^wlo-“轮子”: 希腊语 χύχλος, 古斯拉夫语 kolo, 斯堪的纳维亚语 hvel, 梵语 čakra-, 古英格兰语 hwēol。

*wlk^wos“狼”: 希腊语 λύκος(*wluk^wos), 梵语 vrkas, 古斯拉夫语 vlíkŭ, 立陶宛语 vilkas, 哥特语 wulfs, 拉丁语 lupus。

*penk^we“五”: 希腊语 πέντε, 拉丁语 quinque, 梵语 pañca, 哥特语 fimf, 立陶宛语 penki。

*sek^w-“跟随”: 希腊语 ἑπομαι, 拉丁语 sequor, 梵语 saçatē, 阿维斯陀经 haçaitē, 立陶宛语 sekù。

*sek^w-“看见”: 赫梯语 sakuwa(眼睛), 哥特语 saihwan, 古爱尔兰语 rosc(眼睛)。

*pek^w-“煮,烤”: 希腊语 πέσσω(*pek^wyō), 拉丁语 coquō, 古斯拉夫语 pekŏ, 立陶宛语 kepù。

⑪ *g^w

*g^wen-“妻子”: 希腊语 γυνή, 古爱尔兰语 ben, 梵语 jāni-, 古斯拉夫语 žena, 古普鲁士语 genna。

*g^wiws, *g^wiws“活的”: 希腊语 βίος(生命), 拉丁语 vivos, 立陶宛语 gývas, 古斯拉

夫语 živū, 梵语 jivas, 哥特语 qius, 古高地德语 quek, 古爱尔兰语 beo。

*g^wem-“来到”: 希腊语 βαίνω(*bany 第一人称单数, *bamyō 第三人称单数), 哥特语 qiman, 拉丁语 venio(*venio), 阿维斯陀经 jamaite, 立陶宛语 gemù(出生)。

*g^wou-“畜类的”: 希腊语 βοῦς, 拉丁语 bōs(方言词), 古爱尔兰语 bó(母牛), 古英格兰语 cū, 梵语 gaus, 亚美尼亚语 kov(母牛)。

*bheg^w-“跑”: 希腊语 φέβομαι(我跑), 立陶宛语 bėgu, 古斯拉夫语 běgati, běžati。

*nog^w-“裸体的, 裸露的”: 哥特语 naqaps, 古英格兰语 nacod, 古高地德语 nackut, 拉丁语 nūdus, 梵语 nagna-, 古斯拉夫语 nagŭ, 立陶宛语 núogas。

*reg^wos“黑暗”: 哥特语 riqis, 希腊语 ἔρεβος, 梵语 raśas, 亚美尼亚语 erek(晚上)。

⑫ *g^wh

*g^wher-, *g^whormo-“热的, 热”: 希腊语 θερμός, 拉丁语 formus(热的), 梵语 gharma-(热), 古爱尔兰语 gorim(炽热), 亚美尼亚语 ĵerm(暖和的), 古斯拉夫语 gorěti(燃烧), 古普鲁士语 gorme(热), 立陶宛语 gāras(蒸汽)。

*g^whedh-“希望, 请求”: 古爱尔兰语 guidiu(我请求 *g^whodheyō), 立陶宛语 gedù(我忧愁), 古斯拉夫语 žedati。

*g^when-“殴打, 打击”: 赫梯语 kwen-, 希腊语 θείνε φόνος, 拉丁语 dē-fendō(我击退), 古爱尔兰语 gonim(我打击), 古英格兰语 gūþ(战役), 古高地德语 gund-fano(战旗), 梵语 han-ti(他打击), 古波斯语 aĵanam(我打了), 立陶宛语 genù(我赶走), 古斯拉夫语 ženŭ(我赶走)。

*snoig^whos“雪”: 古普鲁士语 snaygis, 立陶宛语 sniėgas, 古斯拉夫语 sněgŭ, 哥特语 snaiws, 古爱尔兰语 snigid。

*dheg^wh-“燃烧, 烧热”: 拉丁语 feveo, 古爱尔兰语 daig(火), 梵语 dahati, 阿维斯陀经 dažaiti, 立陶宛语 degù。

⑬ *m

*mātēr-“母亲”: 希腊语 μάτηρ, 古希腊语 μήτηρ, 拉丁语 māter, 梵语 mātār-。

*wem-“拉”: 希腊语 ἐμέω, 拉丁语 vomō, 梵语 vamiti(他拉)。

⑭ *m̥

*g^wm̥tos“来过的”: 梵语 gata-, 拉丁语-ventus, 希腊语-βχτος, 立陶宛语 gimtas(天生的, 天然的)。

*septm̥“七”: 希腊语 ἑπτά, 拉丁语 septem, 梵语 sapta。

⑮ *n

*nok^wit-“夜里”: 希腊语 νύξ νυχτός, 拉丁语 nox, 梵语 nak, 立陶宛语 naktis, 哥特语 nahts, 赫梯语 nekut-(晚上)。

*seno-“老的, 旧的”: 希腊语 ἔτος(去年的), 拉丁语 senex, 梵语 sana-, 立陶宛语 sėnas, 哥特语 sineigs。

⑯ *n̥

*m̥nti-s“想法”: 拉丁语 mēns, mentis, 梵语 matís(思想), 立陶宛语 mintis(思考), 哥

特语 gamunds(记忆力), 古斯拉夫语 pa-meťi(记忆力)。

*yuwnkos“年轻的, 幼畜”: 梵语 yuvaša-(年轻的), 拉丁语 iuventus, 古爱尔兰语 óac (=ōag), 哥特语 juggs(=jungs)。

⑰ *n̥

*gn̥tos“出生”: 梵语 jātas, 拉丁语 gnātus, 哥特语 airþakunds。

⑱ *l

*leuk-“发光”: 希腊语 λευχός(白色的), 拉丁语 lūx, lūcēre, 哥特语 liuhaþ(光), 梵语 rōcate。

*leubh-“喜欢”: 拉丁语 lubēt, libet, 哥特语 liuba-, 古斯拉夫语 ljubŭ, 梵语 lubh-(很愿意)。

*pelu-, *pl̥u-“许多”(副词): 希腊语 πολύς, 哥特语 filu, 古高地德语 filu, 古爱尔兰语 il, 梵语 puru-, pulu-, 古普鲁士语 paru。

⑲ *l̥

*wl̥k̥os“狼”: 梵语 vr̥kas, 古斯拉夫语 vlikŭ, 立陶宛语 vilkas, 哥特语 wulfs。

*pl̥t(h)u-“宽的”: 梵语 pr̥utu, 希腊语 πλατύς, 古爱尔兰语 lethan。

*ml̥du-“软的”: 梵语 mr̥du, 希腊语 βλαδεις, 拉丁语 mollis。①

⑳ *l̄

*wl̄nā“兽毛”: 立陶宛语 vilna, 哥特语 wulla, 古英格兰语 ūrnā, 希腊语 λάνος, 梵语 vr̥kas, 古斯拉夫语 vlikŭ, 拉丁语 lāna。

*pl̄nos“满的”: 梵语 pūr̄na-, 立陶宛语 pilnas, 哥特语 fulls, 古爱尔兰语 lān, 古斯拉夫语 plünŭ, 拉丁语 lāna。

*pl̄mā“手掌”: 古爱尔兰语 lām(手), 古高地德语 folma, 希腊语 παλάμη, 拉丁语 palma。

㉑ *r

*reudh-, *rudh-“红色的”: 希腊语 ἐρυθρός, ἐρεύθω, 拉丁语 ruber, rōbigō, rūfus, 立陶宛语 raudas, 古斯拉夫语 rudŭ, 古高地德语 rōt, 哥特语 rauda-, 梵语 rohit(a)。

*dhwer-, *dhur-“门, 院门”: 希腊语 θύρα, 拉丁语 forēs, 哥特语 daur, 古斯拉夫语 rudŭ, 古高地德语 tor, 立陶宛语 durys, 梵语 dvāras。

*bher-“带来”: 希腊语 φέρω, 拉丁语 ferō, 梵语 bharāmi, 哥特语 bairan, 古高地德语 beran。

㉒ *r̥

*krd(*kerd)“心脏”: 希腊语 καρδία, 拉丁语 cor, 古爱尔兰语 cride, 立陶宛语 širdis, 古斯拉夫语 srŭdice。

① О. Семереньи,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p. 60.

*dhrs“敢,敢做”: 梵语 dhr̥ṣṇōti, 希腊语 θρασύς(勇敢的), 哥特语 gadaursan(敢做)。

*dr̥k“看见”: 梵语 dr̥ś(外表), 希腊语 δραχῆιν(看见了), 古爱尔兰语 drech(脸), 古英格兰语 torht, 古高地德语 zoraht(明亮的)。

②③ *r̥

*g^wr̥tos“所希望的”: 梵语 gūrta-, 拉丁语 grātus(奉承的), 立陶宛语 girtas(受吹捧的)。

*gr̥nom“种子”: 拉丁语 grānum, 古爱尔兰语 grān, 哥特语 kaurn(草), 立陶宛语 žirnis(豌豆粒), 古斯拉夫语 zrino, 梵语 jirna(磨碎)。

*p̥rwo, p̥rmo“前面的,第一”: 梵语 pūrva-, 古斯拉夫语 prīvū, 立陶宛语 pirmas, 古英格兰语 forma(第一), 哥特语 fruma。

②④ *s

*eusō“烧毁”: 梵语 ōṣami, 希腊语 εῶω, 拉丁语 ūrō(灼热)。

*wes“给……穿衣”: 梵语 was-tē(穿上), 拉丁语 vestis(衣服), 希腊语 ἐννυμι(外衣), 赫梯语 wes-(穿上), 哥特语 wasti(衣服)。

*es“有,存在”: 梵语 asāni, 希腊语 ἔω, 拉丁语 erō。

*wers“高处”: 拉丁语 verrūca, 梵语 varṣman(高度), 立陶宛语 veršus(在……上), 古斯拉夫语 vrīxū(顶尖)。

②⑤ *z

*ozdos“树枝”: 希腊语 ὄζος, 哥特语 asts, 亚美尼亚语 ost。

*nizdos“孵卵,鸟巢”: 拉丁语 nidus, 古高地德语 nest, 梵语 niḍa-(niḥda > niḥḍa), 亚美尼亚语 nist, 立陶宛语 lidzas。

②⑥ *y

*yek^wrt“肝”: 梵语 yakṛt, 希腊语 ἥπαρ, 拉丁语 iecur, 立陶宛语 jiknos。

*yugom“枷锁,牛轭”: 梵语 yugam, 希腊语 ζυγόν, 拉丁语 iugum, 哥特语 juk, 斯堪的纳维亚语 ok。

*treys“三”: 梵语 trayas, 拉丁语 trēs, 希腊语 τρεῖς, 哥特语 þeris。

*alyos“别的”: 希腊语 ἄλλος, 拉丁语 alius(三个音节), 哥特语 aljis。

*medhyos“中间的”: 梵语 madhya-, 希腊语 μέσ(σ)ος, 拉丁语 medius, 哥特语 midjis。

②⑦ *w

*wiro-, *wiro-“男人”: 梵语 vīras(英雄), 立陶宛语 vīras, 拉丁语 vir, 哥特语 wair, 古爱尔兰语 f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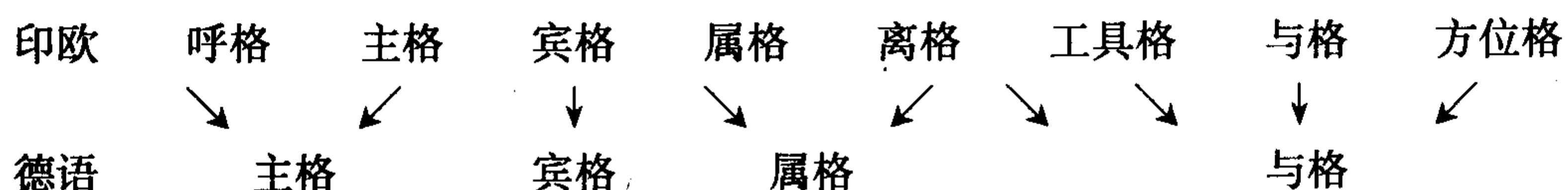
*woida“我知道”: 梵语 vēda, 希腊语 (F) οἶδα, 哥特语 wait, 古斯拉夫语 vědě。

*owis“母绵羊”: 希腊语 ὄρις, ὄις, 梵语 avis, 拉丁语 ovis, 哥特语 awistr-is(羊圈), 古高地德语 ou(wi), 立陶宛语 avis, 古斯拉夫语 ovīca。

*newos“新的”: 希腊语 νε(φ)ός, 拉丁语 novus, 梵语 navas, 古斯拉夫语 novū, 哥特语 nijuis。

2. 古印欧语的形态

梵语名词有阳性、阴性和中性,单数、双数和复数,体格、业格、具格、为格、从格、属格、依格和呼格的变化。动词的变位包括单数、双数和复数,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的不同,有现在时、未完成时、完成时、不定过去时、将来时和假定时,主动态、中间态和被动态等。^① 梵语和古拉丁语、古日耳曼语一样是屈折型的语言。根据吠陀梵语、波罗的诸语和斯拉夫语的格系统,人们认为原始印欧语的名词有 8 个格。现代德语的 4 个格与原始印欧语格的关系为:^②



语言类型学的发展和赫梯语的发现为古印欧语和原始印欧语的构拟提供了新的思路。

赫梯语与印欧语其他语言不一致的成分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赫梯语的三种情况是很重要的:缺少主格的屈折变化;名词的复数形式不太发展;名词复数的间接格——所有格、与格和方位格都用-as 后缀,它也出现在单数的所有格上。复数的另外两个格——离格和工具格跟单数的相同。

赫梯语名词变格的“缺陷”也许是古印欧语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或是单音节形式向屈折形式发展的早期阶段,可是梨俱吠陀经(Rig-Veda)中名词复数的间接格也缺少变化。

(1) 古印欧语名词的格系统

当初葆朴就认为印欧语的屈折形式来自更早时期的粘着形式。^③ 梅耶认为在印欧语屈折形态以前,“许多词干都只由一个词根构成;这就显出语言的古代状况,——那时,每一个词根不加后缀便可以作为词干。由此可见,每一个词根就是一个词,既可以有名词的意义,又可以有动词的意义,大致好像英语的 love‘爱’一样”^④。

勒曼(Winfred P. Lehmann)在他的《印欧语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中对于古印欧语名词格系统的形成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许多学者假设原始印欧语的早期阶段名词的屈折形式远较根据梵语、希腊语和其他语言综合构拟的格系统简单。从类型上说,这是一种主动态的语言,名词区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名词的施动格带*-s 后缀,受事格带*-m 后缀,表示无生命事物的名词只有受事格,如赫梯语缺少无生命名词的主格形式。在主动态的语言中,无生命名词充当主语时动词只能用非主动态。

他认为前印欧语(Pre-Indo-European)中名词只有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它们性范畴的表示也是很有限的。如赫梯语主格和宾格的复数形式只是附加后缀-s,早期的吠陀文献中单复数形式也是不作严格区分的。前印欧语的名词只有 4 个标记:

*-s 标记有生命的施动者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 75 页。

②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60.

③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29 页。

④ 同上,第 170 页。

*-m 标记无生命的目标或受动

*-h 标记集合名词

*-Ø 即无标记形式,由分词或语调控制其词汇意义

-s 对应于后来印欧语的主格,也成为所有格的标记。-m 对应于后来的宾格和无生命名词与静态动词共同使用时的主格。吠陀经文中的双数和复数用以名词为基础的短语和词尾表示。这表明印欧语的格系统是经过扩充的。表示地点的*-bh-来自后缀。希腊语的后缀-phi < *-bh-和*-i,用于名词的单数和复数,对应于其他语言的所有格和与格。也就是说,希腊语的-phi 原本只具有间接格的意义。而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是梵语工具格的复数标记-bhis,与格和离格的复数后缀-bhyas,工具格、与格和离格的双数结尾-bhyām。如果说一些语言中发生了所谓的格形式丢失,梵文中的连读说明情况正好相反。赫梯语的材料说明前印欧语格范畴的区分是逐步扩展的,而不是残留。^①

(2) 古印欧语的动词

印欧语的动词系统是最早被描述的。葆朴比较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的动词,认为梵语保留了祖语的特点。奥斯瓦尔多·谢米列尼认为梵语的三种态,主动态、中间态和被动态,每一种都有7个时式:现在时、未完成体、完成体、不定过去时、过去完成体、将来时和假定时。^②

与希腊语和拉丁语比较,赫梯语动词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有-mi 和-hi 两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都有主动态和被动态,每一种态中都有现在时和简单过去时及祈使语气的形式。其他人称的复数形式的变化稍简单。

赫梯语-mi 对应于梵语和希腊语的-mi、-si 和-zi,-zi 是条件音变。对应于-hi 的分别是-hi、-ti 和-i。联系喉音理论(laryngeal theory)可将它们构拟为*-h、*-th 和*-Ø。

在主动态的语言中,词的构成是主要的。动词有主动态和静态两类。主动态的动词是行为动词,如“放”“扔”等,静态的动词如“考虑”“知道”等。其屈折形式首先表现在体上,然后才是式,没有被动态的表述。

前印欧语的动词单数的后缀有这样两组:

主动态动词

*-m

*-s

*-t

静态动词

*-ho

*-tho

*-o

主动态动词后缀加*-i 成为*-mi、*-si 和*-ti,为陈述语气简单过去时的后缀,演变为赫梯语的-mi 后缀。静态动词的后缀加*-i 成为赫梯语的-hi。静态动词的后缀加*-a 成为*-ha、*-tha 和*a,再加*-i 成为*-hai、*-thai 和*ai。*-r 与*-i 的结合在卢维语中成为后缀*-hari、*-thari 和*ari。^③

①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pp. 223 - 226.

② 同上, p. 161.

③ 同上, pp. 217 - 219.

原始印欧语动词原本像汉语和日语的动词那样,没有人称的标记,它们的人称标记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词尾的比较表明早期的印欧语可能没有数和人称标记,复数和双数的人称词尾显然是在单数标记的基础上构成的。

最古老的人称标记保留在梵语的现在时、不定过去时和将来时的系统中,吠陀经文文献中就更清楚了。梨俱吠陀经文中,动词“给”d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简单形式为 dām、dās 和 dāt。当时,式成为动词系统的范畴后,-i 就进一步成为标记人称的后缀。试比较梵语和希腊语动词“给”单数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现在时和未完成体的构成:

	现 在 时		未 完 成 体	
	梵 语	希腊语	梵 语	希腊语
第一	dādāmi	dídōmi	ádadhām	edídoun
第二	dádāsi	dídōs	ádadhās	edídous
第三	dádāti	dídōsi	ádadhāt	edídou

这说明原始语中开始时用词尾-m、-s 和-t 表示人称的不同。

试比较原始印欧语 *woyd-“知道”在梵语、希腊语和赫梯语中单数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完成体的读法及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和前印欧语的后缀:

	梵语	希腊语	赫梯语	原始印欧语	前印欧语
第一	véda	oída	sak-hi	-ha	-h
第二	véttha	oístha	sak-ti	-tha	-th
第三	véda	oíde	sak-(k)i	-e	-Ø

-e 是原始印欧语的后缀,前印欧语第三人称单数是无标记的-Ø。

吠陀经、希腊语、古拉丁语和赫梯语复数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的后缀为:

	吠陀经	希腊语	古拉丁语	赫梯语 ^①
第一	-mas(i)	-men/mes	-mus	-weni
第二	-tha(na)	-te	-tis	-teni
第三	-nti	-nti	-nt	-ntsi

第三人称后缀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诸语复数的完成体后缀更能说明这一点:

	吠陀经	希腊语	古拉丁语	赫梯语
第一	-má	-men	-mus	-weni
第二	-á	-te	-stis	-teni
第三	-úr	āsi	-ērunt	-ntsi

赫梯语使用与前一表相同的后缀。^②

① 赫梯语中 m 在后高元音后变成 w, i 前 t 变成了 ts。

②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pp. 173 - 175.

(3) 古印欧语的形容词

梵语的名词甚至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不同。如, *vīrātara*“较男人”, *vīrātama*“最男人”。而赫梯语的形容词倒没有这一类后缀,这说明古印欧语形容词的比较级也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形容词性的屈折变化情况不同。古拉丁语单数的宾格、复数的主格和宾格的形容词词干有阳性和阴性的辅音屈折变化。赫梯语一些词项的形容词和名词可以变换。前印欧语区别性形容词的三种性标记应来自后来的原始印欧语。^①

3. 古印欧语的数词、亲属称谓及其他

印欧语比较研究已尽量地与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体质学的研究结合起来,验证结论的合理性。通过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形态有了一定的认识。

(1) 古印欧语的数词

以下是印欧语不同语族语言基本数词的比较:

	英语	哥特语	拉丁语	希腊语	梵语	古斯拉夫语
一	one	ains	ūnus	heīs	ekas	jedinū
二	two	twai	duo	dúō	dvā	dūva
三	three	θrija(宾格)	trēs	trēis	trayas	triје
四	four	fidwor	quattuor	téttares	catvāras	četyre
五	five	fimf	quīnque	pénte	pañca	peṭi
六	six	saihs	sex	héks	ṣat	šestī
七	seven	subun	septem	heptá	sapta	sedmī
八	eight	ahtau	octō	októ	aṣṭā	osmī
九	nine	niun	novem	ennéa	nava	devetī
十	ten	taihun	decem	déka	daśa	deseti

(2) 古印欧人的亲属称谓

在印欧共同语时代存在父系或母系家庭的形式。我们可以从不同印欧语族语言有关的同源词中观察到这一情况。

“父亲”,古印度语 *pitár-*,希腊语 *πατήρ*,拉丁语 *pater*,古爱尔兰语 *athir*,哥特语 *fadar*,亚美尼亚语 *hayr*,吐火罗语 A *pācar*,吐火罗语 B *pātar*。

“母亲”,古印度语 *mātár-*,希腊语多利加方言 *μάτηρ*,拉丁语 *māter*,古斯拉夫语 *мати*,古爱尔兰语 *māthir*,古冰岛语 *móðer*,亚美尼亚语 *mayr*,吐火罗语 A *mācar*,吐火罗语 B *mātar*,阿尔巴尼亚语 *motër*(姐妹)。

“妻子”,希腊语 *γυνή*,古爱尔兰语 *ben*,梵语 *ṣani-*,古斯拉夫语 *žena*,古普鲁士语 *genna*。

“兄弟”,古印度语 *bhrātar-*,希腊语 *φράτωρ*,拉丁语 *frāter*,古斯拉夫语 *братръ*,古爱尔兰语 *brāthir*,哥特语 *brōþar*,亚美尼亚语 *etbayr*,吐火罗语 A *pracar*,吐火罗语 B

^①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p. 227.

procer。

“姊妹”，古印度语 svāsar-，拉丁语 soror，古爱尔兰语 siur，哥特语 swistar，亚美尼亚语 khoyr，古斯拉夫语 сѣнѣ，立陶宛语 seser。

“儿子”，古印度语 sūnuḥ，希腊语 υἱός，古斯拉夫语 сынѣ，立陶宛语 sūnūs，哥特语 sunus，吐火罗语 A se，吐火罗语 B soyā。

“女儿”，古印度语 duhitār-，希腊语 θυγάτηρ，哥特语 dauhtar，古斯拉夫语 дѣшти，立陶宛语 dukter-，亚美尼亚语 dustr，吐火罗语 A kācar，吐火罗语 B tkacer。

“儿媳”，古印度语 shusā，希腊语 νύς，拉丁语 nurus，古斯拉夫语 снѣха，古盎格鲁—撒克逊语 shoru。

“公公”，古印度语 svācūrah，希腊荷马语 εκυρός，阿维斯塔语 xvasurō，拉丁语 socer（岳父），俄语 свекор，立陶宛语 šėšuras，阿尔巴尼亚语 vjerr（公公、岳父），古高地德语 swehur。

“婆婆”，古印度语 svācrūḥ，希腊语 εκυρά，阿维斯塔语 xvasurō，拉丁语 socrus，古斯拉夫语 срекры，亚美尼亚语 skesur，哥特语 swaihro，古高地德语 swigar-。

“寡妇”，古印度语 vidhāvā，阿维斯塔语 viḍava，拉丁语 vidua，古斯拉夫语 вѣдова，阿尔巴尼亚语 ve，梵语 vidhavā，哥特语 widuwō，古高地德语 wituwa，哥特语 widuwo，古爱尔兰语 siur，古普鲁士语 widdewū。^①

（3）社会组织和农耕文化

从“氏族，人民”等同源词来看，印欧共同语时代社会形态的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

“氏族，人民”，梵语 touto，古立陶宛语 tauta（人民），古爱尔兰语 túath（人民，国家），哥特语 þiuda，古高地德语 diot，赫梯语 tuzzi-（军队）。

据“犁”“播种”等词看来印欧共同语时代是农耕文化时代。

“木犁，犁”，古斯拉夫语 рало（<*ordlo），立陶宛语 árklas，拉丁语 aruum（耕地），爱尔兰语 arathar。

“播种”，立陶宛语 sėjù，拉丁语 serō，爱尔兰语 síl，古普鲁士语 semen。

思考题：

（1）印欧诸语 K 类和 S 类两组是依据它们的什么特征来区分的？这两组分别包括哪些语族的语言？

（2）古印欧语的 *p、*t、*k、*b、*d、*g 和 *bh、*dh、*gh 分别演变为现代英语的哪些辅音？

（3）从古日耳曼语到现代英语名词的格是怎样简化的？

（4）举例说明梵语、古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等的对应情况。

（5）赫梯语形态对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有什么启发？

（6）以下是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动词 be 的单、复数形式：

^①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第 271—273 页。

		梵语	希腊语	拉丁语	哥特语
单数	1	ásmi	eimí	sum	im
	2	ási	e ĭ, essí	es	is
	3	ásti	estí	est	ist
复数	1	smás	eimés	sumus	sijum
	2	sthá	esté	estis	sijup
	3	sánti	eisí	sunt	sind

试构拟原始印欧语 be 的词根及其单、复数形式。

参考书目：

J. R. V. Marchant, Joseph F. Charles, *Cassell's Latin Dictionary*,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38.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New Fetter Lane, 199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

Roger Las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

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

О. Семереньи,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0. 原著: Oswald Szemerényi, *Einführung in die vergleichende Sprachwissenschaft*, 1970.

Frederick Bodmer, *the Loom of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Sixth impression, 1955.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New York, 1996.

第六章 汉藏语的分类和比较

一、汉藏语的分布和分类

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初,20 世纪 30 年代李方桂先生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把汉藏语系分为汉台和藏缅两种,70 年代调整为汉、侗台、苗瑶和藏缅 4 个语族。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aul K. Benedict)的分类中汉藏语系不包括侗台和苗瑶,下辖汉语和藏—克伦两支,藏—克伦语又包括藏缅和克伦两支。^①

1. 汉藏语的发生学关系

东亚大陆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一万年以前。一万三千年以前的冰河时期(长达一万多年),长江以北是稀树草原。一万多年前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大抵是自东北到西南分布着细石器文化,南部和东部分布着砾石文化。到一万年前气候转暖,距今八千年前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相当于今天长江中下游的气候,长江中下游相当于今天海南岛的气候。这样温暖的气候大约持续了两三千年。随着气候转暖,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较大规模的农业文化是河南舞阳一带八九千年前种植水稻的农耕文化。

鼎类三足器最早出现在舞阳贾湖和山东,它是古汉藏文化的象征。从以下的考古的发现中可以看出古汉藏文化的传播:

带支架鼎:河南舞阳,山东(距今八九千年)。

三足鼎、三足罐、三足釜:甘肃、陕西、河北、山东(距今七八千年),湖北、江苏、浙江(距今五六千年),江西、广东(距今四五千年)。

鬲(三足中空):陕西、甘肃(距今四千多年)。

鬻(三足,偏口):河南安阳,山东历城,江苏徐州、连云港(距今约四千年),浙江(距今约四千年),辽东半岛(距今约四千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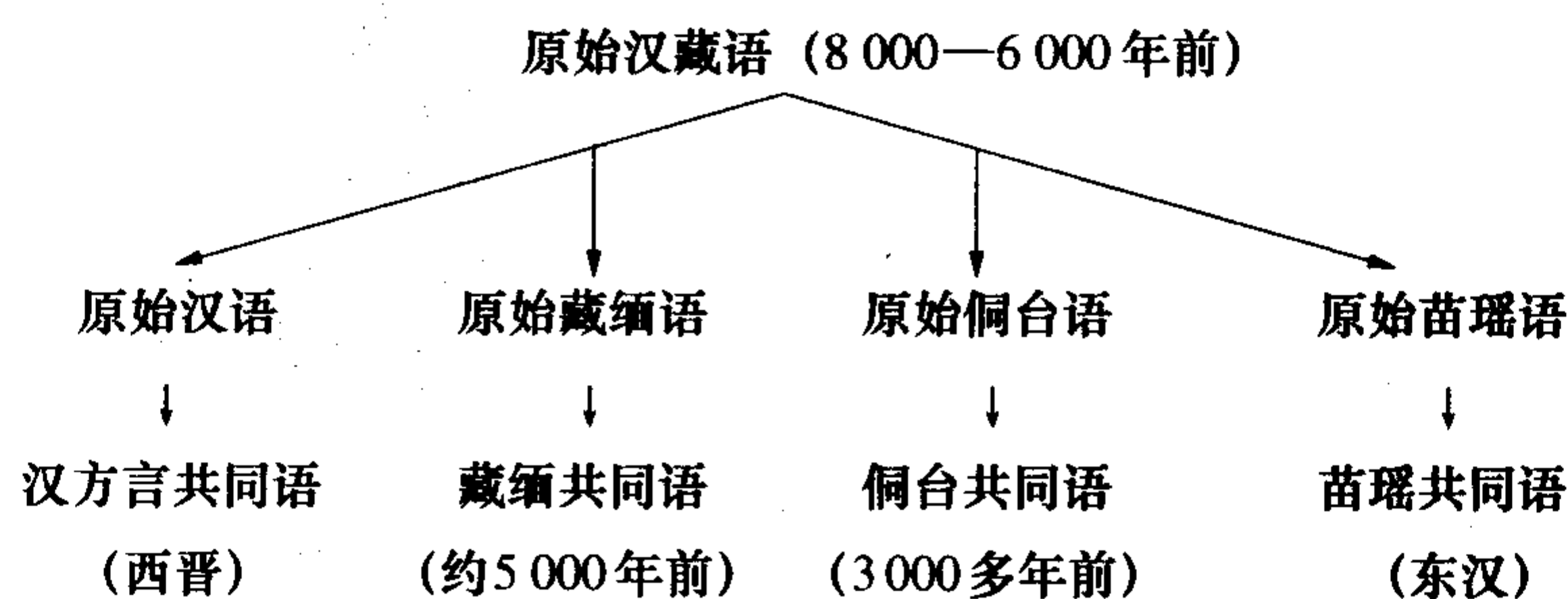
从新石器早期的舞阳贾湖文化到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它们是有密切关系的。马家窑文化后来又演变为齐家文化,是早期藏缅文化的一部分。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在距今约五千年时演变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文化。此后分布于河南和伊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演变为夏文化,鲁西豫东地区出现先商的文明。

^①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1984 年。

古侗台先民和古苗瑶先民原本分布在长江流域。东部沿海新石器早中期使用鼎和种植水稻的有青莲岗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有大溪文化。古侗台文化与商周时期长江下游的文化有密切关系,古苗瑶文化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有密切关系。这是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语、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的文化背景。^①

与文化传播有密切关系的是语言的传播。中原地区距今八九千年前的语言应是今汉藏语系语言的前身,今汉藏语系不同支系的语言只是古代许多汉藏支系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发生学关系可表示为:



如上图所示,汉语与藏缅语有更密切的发生学关系。黄河流域的汉藏语古方言中发生过 *pl- > *ŋ- 的演变而侗台和苗瑶语中仍保留着原有的形式。如: ^②

	汉语	藏缅语	苗瑶语	侗台语
鱼	*s-ŋa	*ŋa	*bla(-ʔ)	*pla
我们	*ŋar	*ŋa-r	*pre	*phlo
烧	*s-ŋe	*s-ŋe	*ple(-ʔ)	*ple(-g)
五	*s-ŋa	*mǎ-ŋa	*pla	—
额	*ŋrak	*mǎ-plaŋ	*bloŋ	*plak

汉语“烧” *s-ŋe 是后起字,见于《战国策·齐策》,对应于藏缅语如“(加)热”缅文 hnwe³、载瓦语 ŋje⁵⁵ (< *s-ŋe)。“烧(饭)”侗语 taru³,“烧(茶)”水语 pla:u⁶ (< *ple(-g))。

“额”,藏缅语中如载瓦语 mē²¹ laŋ²¹,达让僜语 ma³¹ plaŋ³⁵ (< *mǎ-plaŋ)。“额头”,侗语 pja:k⁹,壮语 na³ pla:k⁷,仫佬语 ŋə⁶ pɣa:k⁷。

苗瑶、侗台语的 *pl- 与汉语、藏缅语 *ŋ- 的对应关系也可能是原始汉藏语的 *m-l- > 汉—藏缅共同语的 *ŋ-, 而侗台、苗瑶语中 *m-l- > *pl-。

汉—藏缅共同语的塞音有唇、舌尖、舌根和小舌的对立。而藏缅共同语时期出现小舌音与舌根音的合并。如: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29—32页。

② 同上,第310、313页。

	汉语	藏文	缅文	景颇语
屎	*qrak-s(恶)	skjag	khje ³	khji ⁵⁵
血 ^①	*qhlik	khrag	tθwe ³	—
圆	*Glən	sgor	won ³	tin 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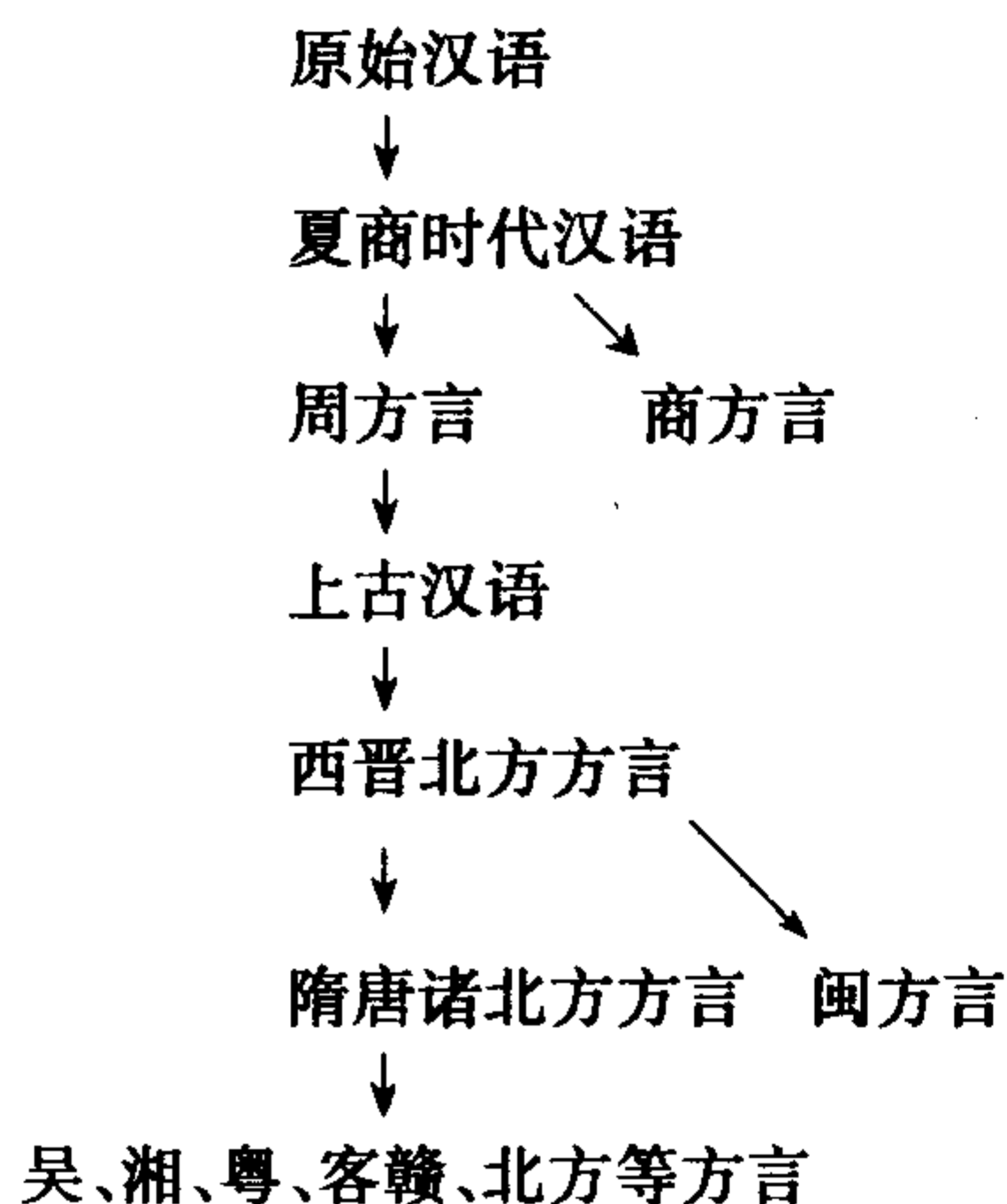
2. 汉语的古今方言

汉语的几个大方言也可以看作是几种有亲缘关系的语言或不同的语支,构成汉语族。如闽方言亦不妨叫做闽语,粤方言不妨称做粤语。

(1) 古汉语的方言

目前最早的汉语文献是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从文献看,那时的汉语已经有方言的差别。

商时,汉语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地区。从先商时代算起,到了商周之交,汉语已有大约 10 个世纪的历史。殷商时代,商周已使用不同的汉语方言。大约又过了 10 个世纪,到了西汉的扬雄时代,函谷关东边与函谷关西边的方言差别较大。汉代之后黄河流域东、西之间的方言的差别逐渐变小,而南、北之间的差别变大。汉语诸方言的历史关系大体上可表示如下:



扬雄《方言》是研究上古晚期汉语方言情况的重要依据。从扬雄的叙述看,当时有一种权威方言,扬雄称之为“通语”。通语词部分与函谷关东、西的方言相近。

如《方言》(卷三):“斟、协,汁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曰斟,自关而东曰协,关西曰汁。”

《方言》(卷二):“逞、晓、佼、苦,快也。自关而东或曰晓,或曰逞。江淮陈楚之间曰逞,宋郑、周洛、韩魏之间曰苦,东齐、海岱之间曰佼,自关而西曰快。”

《方言》(卷一):“娥、嫫,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嫫。秦晋之间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媯,或谓之姁。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姝。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

① 上古汉语“血”*-t<*-k,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217 页。缅文 tθwe³<*-ski-g。

“悼、怒、悴、愁，伤也。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汝谓之怒，秦谓之悼，宋谓之悴，楚颍之间谓之愁。”

(2) 现代汉语的方言

今吴、湘、客、赣、粤方言的形成应是隋唐时代不同的北方方言向南发展的结果。后来北方方言的创新是船禅母 ʃ 的分化。塞擦音声母一般出现在船禅母的平声中,不出现在上、去声中(入声只有个别的如“植”“殖”为塞擦音声母)。高本汉总结为“平声字变作送气的塞擦音或擦音,仄声变作擦音”。^① 而吴、湘、客、赣、粤方言后起的文读有这种情况。

汉语晋以前分化出来的南方方言已被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方言所覆盖,只有它们的底层仍保留在今天的不同方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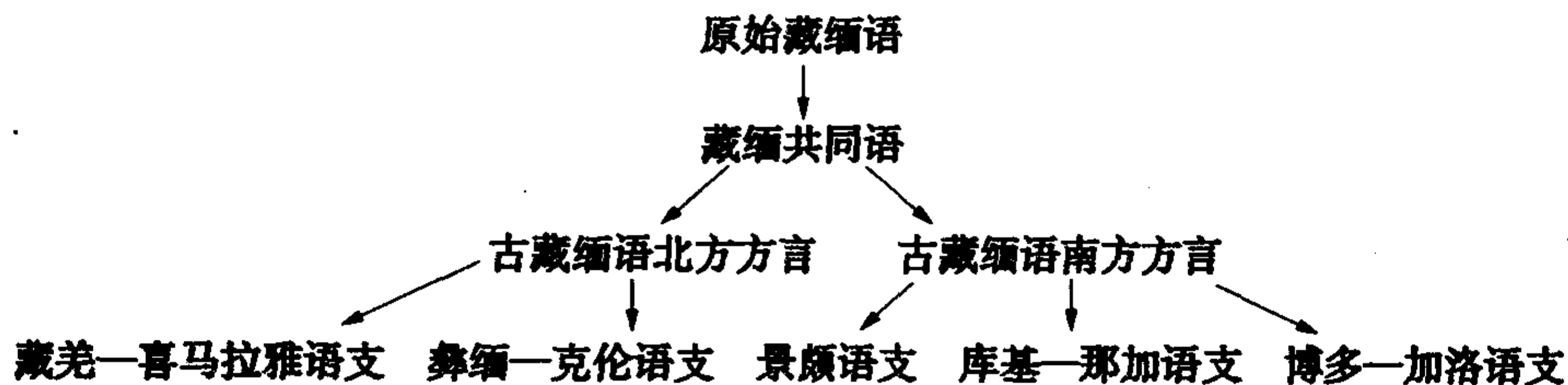
原始汉语—藏缅语文化最初分布在黄河中游,后来向黄河上游、四川及云南北部(新石器晚期)传播,并进入缅甸、印度、西藏地区(春秋、战国时代)。

① 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编译,第58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

春秋时代分布于云南的藏缅文化后来进入缅甸,印度那加地区的那加语分布于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的东部。

今天保留下来的藏缅语族的语言大致上可分为五大支系:藏羌—喜马拉雅语支,彝缅—克伦语支,景颇语支,库基—那加语支,博多—加洛语支。

其发生学关系图示如下:



藏羌—喜马拉雅语支和彝缅—克伦语支的语言来自古藏缅语的北方方言,它们共同的创新是产生了舌尖塞擦音,而景颇语等不同。如:

	藏文	普米语	阿昌语	彝语	景颇语
肋骨	rtsib	—	tʃham	tɕe ³³	kăʒep ³¹
骨节	tshigs	tsi ⁵⁵	—	tsɿ ⁵⁵	khʒiɿ ³¹
核	tshi	—	tsiɿ ³¹	tɕu ³³	kʒi ³³

古藏缅语北部方言先是前缀的元音弱化、失落,产生复辅音,进而产生舌尖塞擦音声母。而古藏缅语的南部方言中,前缀一直保留着元音,如同今天景颇语支、库基—那加语支和博多—加洛语支的语言。景颇语支的语言中后来也产生塞擦音,但与藏羌、喜马拉雅及彝缅语支的塞擦音没有对应关系。

(1) 藏羌—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

藏羌—喜马拉雅语支包括藏、羌、喜马拉雅三支(语支或次语支)。藏语支的语言除了分布在中国境内,还分布于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羌语支的语言分布在中国。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

分布在中国境内藏语支的语言有藏语、白马语、错那门巴语、墨脱门巴语。嘉戎语是否属藏语支目前尚有争议。中国境外藏语支的语言分布在不丹的有宗卡语(Dzongkha)、戈布姆坦普语(Kebumtamp)、萨戈登巴语(Sagtengpa)、沙尔查帕卡语(Sharchagpakha)、桑拉语(Sangla)等,分布在尼泊尔的有坦瓦尔语(Dhanwar)、多尔波语(Dolpo)、戈勒语(Ghale)、江格里语(Janggali)、吉勒尔语(Jirel)、木加里语(Mugali)、那巴语(Naba, Nawa)、拉基语(Raji)、夏尔巴语(Sherpa)、塔米语(Thami)、底楚龙语(Tichurong)等,分布在印度的有拉达克语(Ladakhi)、嘉戎语(Gyarung)、陶楚语(Thauchu)、达克巴语(Takpa)、豪尔巴语(Haurpa)、加戈德语(kagate)、夏尔巴语(Sherpa)、巴尔底语(Balti)、旦戎加语(Danjongka)、荷罗戈语(Hloke)等。

划归羌语支的一些语言分布在中国境内,主要有羌语、普米语、道孚语(尔龚语)、却域语、木雅语、扎坝语、贵琼语、纳木义语、史兴语、吕苏语(尔苏语)等。

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分布在印度的有巴兴语(Bahing)、林布语

(Limbu)、满查底语(Manchati, Patini)、昌巴拉胡里语(Chamba Lahuli)、加那斯语(Kanasi)、卡瑙里语(Kanauri)、朗加斯语(Rangkas)、迪马尔语(Dimal)、塔米语(Thami)、雅卡语(Yakha)、坎布语(Khambu)、巴拉里语(Balali)、桑班语(Sangpang)、罗荷隆语(Lohorong)、兰比耶语(Lambichong)、瓦零语(Waling)、青当语(Chingtang)、隆成朋语(Rungchenbung)、东马里语(Dungmali)、罗东语(Rodong, Chamling)、那车梭语(Nachereng)、古龙语(Kulung)、吐龙语(Thulung)、朝拉西亚语(Chaurasya)、卡林语(Khaling)、杜米语(Dumi)、吉姆达尔语(Jimdar, Rai)、瓦尤语(Vayu)、古隆语(Gurung)、木尔米语(Murmi)、逊瓦尔语(Sunwar)、马加尔语(Magari, Magar)、尼瓦里语(Newari)、巴迪语(Padi, Pahri)、勒布查语(Lepcha, Rong)、多多语(Toto)等。吐龙语、雅卡语、瓦尤语、古隆语、尼瓦里语也分布于尼泊尔。尼泊尔的耽芒语(Tamang)有东、西两种方言,西部方言即印度的木尔米语。马囊巴语(Manangba)、耽芒语、尼瓦里语归于古隆语群。尼泊尔的达杭语(Tahang)、坎语(kham)也是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

(2) 彝缅—克伦语支

彝缅—克伦语支包括彝、缅、克伦3支和白语,可能还有土家语。彝语支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和泰国。土家语和白语可能应归于该语支,但目前尚未能确定。缅语支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和缅甸,克伦语主要分布在缅甸。

中国境内彝语支的语言有彝语、纳西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基诺语、毕苏语等。老挝、缅甸、泰国的哈尼语被称为阿卡语(Akha, Kaw, Aini等等)。分布在泰国北部的姆比语(Mpi, Mpi, Mi)是彝语支南部语群的语言,此外还有姆比傈语、普诺伊语(Phunoi)、彬语(Pyen)、西拉语(Sila)等。

中国境内缅语支语言有阿昌语、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怒苏怒语等,分布在缅甸及印度的有载瓦语(Atsi, Szi)、拉斯语(Lasi)、马鲁语(Maru)、马路语(Maruu)、马因沙语(Maingtha)、桑蒙语(Samong, Phun)、姆鲁语(Mru)、梅加语(Megya)、阿拉肯语(Arakanese)、达温尤语(Taungyo)、因沙语(Intha)、达窝因语(Tavoyan)、查温他语(Changtha)、荷本语(Hpon)、扬比语(Yangbye)、怒苏怒语等。

(3) 景颇语支

景颇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和印度。分布在中国的有景颇语、独龙语、阿依怒语、达让僜语、格曼僜语、博嘎尔珞巴语、义都珞巴语等。分布在缅甸的景颇语称为克钦语(Kachin),有多种方言。缅甸的星颇方言(Singpho)是差别较大的一种。阿博尔语(Abor)和米里语(Miri)是两种相近的方言,分布在印度阿萨姆邦,与博嘎尔珞巴语相近。境外的学者将阿博尔语归入博迪语支,而把独龙语(Drung, Trung, Tulung, Dulong)归入缅语支。^①分布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米佐语(Miju)与中国境内的格曼僜语相近。分布在缅甸的独龙语称为日旺语(Rawang)或怒语(Nung)。日旺语的昆兰方言(Kunlang)20世纪50年代进入印度。

(4) 库基—那加语支

库基—那加语支(Kuki Naga)由库基—钦(Kuki Chin)和那加(Naga)两支构成。这

^①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leventh Edition.

两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和缅甸。

分布在印度的库基—钦语支的语言有梅梯语(Meithei)、老梅梯语(Old Meithei)、他多语(Thado)、希因语(Siyin)、来语(Lai)、卢舍依语(Lusei)、班尤几语(Banjogi)、班库语(Pankhu)、荷朗库尔语(Hrangkhoh)、哈尔兰语(Hallam)、朗龙语(Langrong)、爱摩尔语(Aimol)、齐鲁语(Chiru)、戈尔何棱语(Kolhreng)、康语(Kom)、布鲁姆语(Purum)、阿那尔语(Anal)、黑洛依—蓝干语(Hiroi Lamgang)、达湾沙语(Taungtha)、钦薄克语(Chinbok)、雅敦语(Yadwin)、钦本语(Chinbon)、卡米语(Khami)、钦语(Chin)等。钦语包括巴浣(Bawn)、法兰(Falam)、哈克(Haka)、苦米(Khumi)、马拉(Mara)、白德(Paite)、底迪姆(Tiddim)等多种方言,或视为不同的语言。拉尔德语(Ralte)、冈德语(Gangte)和钦语的十数种方言分布在缅甸。

那加语支有32种差别较大的方言,如安格米方言(Angami)、色马方言(Sema)、棱马方言(Rengma)、哥乍马方言(Kezama)、索布窝马方言(Sopvoma)、奥方言(Ao)、荷罗达方言(Hlota)、登沙方言(Tengsa)、吐苦米方言(Thukumi)、雅楚米方言(Yachumi)、达布棱方言(Tableng)、耽鲁方言(Tamlu)、班巴拉方言(Banpara)、南桑亚方言(Namsangia)、昌方言(Chang)、莫桑方言(Mosang)、俄姆比奥方言(Empeo)、加布依方言(Kabui)、夸依佬方言(Khoirao)、米基尔方言(Mikir)、马兰方言(Maram)、夸依令方言(Kwoireng)、坦库尔方言(Tangkhul)、帕当方言(Phadang)、马林方言(Maring)、邝奥依方言(Khangoi)等分布在印度。齐阿姆印方言(Khiamngan)、当沙方言(Tangsa)分布在缅甸。

(5) 博多—加洛语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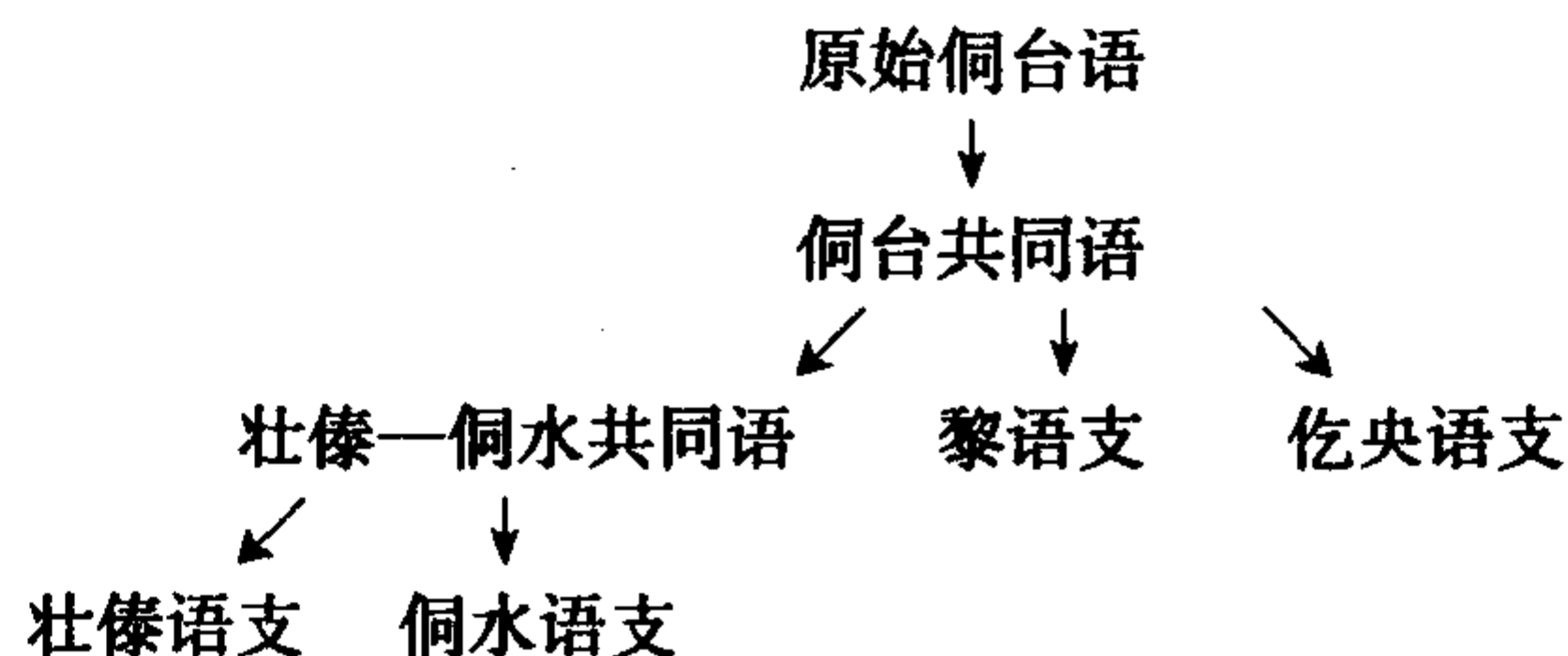
博多—加洛语支(Bodo-Garo)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除博多语(Bodo)、加洛语(Garo)外,还有德奥里语(Deori)、迪马萨语(Dimasa)、卡恰里语(Kachari)、科奇语(Koch)、科克布洛克语(Kok Borok)、拉巴语(Rabha)、梅甘语(Megam)和利昂语(Riang)等。分布在印度的卢依语群(Lui Group)的语言有安德罗语(Andro)、生迈语(Sengmai)、蔡勒尔语(Chairel)、卡多语(Kadu),应属于博多—加洛语支。卡多语也分布在缅甸。

4. 侗台语的分布和分类

今侗台语族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两广、云南和贵州等地,另外还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老挝及越南。侗台人商周时期居住在长江下游的南北两岸。战国时代百越支系主要由侗台人和南岛人的部落组成。有肩石斧、有段石镞、几何硬陶是古侗台和南岛不同支系共同拥有的器具,古百越分布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后来,江苏、浙江和江西的侗台人陆续转用汉语,大陆的南岛人转用侗台语。侗台语中有不同层次的南岛语底层,是不同时代的南岛人转用侗台语的证据。而南方吴、粤、闽的汉语方言中恰好保存着侗台语的底层。

楚灭越,古侗台人仍在浙南和福建立国。汉时浙南为瓯越,其南为闽越。西汉后期瓯越、闽越之号不复见。西汉时期广东地区已出现与闽地相近的文化。到东汉时期,福建地区的文化才基本汉化。

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图示如下:



壮傣、侗水语支较相近，黎语支的语言又与侗水、壮傣语支的语言相近。仡央语支的语言除了内部差别较大外，与其他三个语支的语言差别也比较大。侗台诸语支的声调是后起的，侗台共同语塞音声母清、清送气、浊和先喉塞浊四分，有别于其他汉藏语的古方言。如：

	喝	蚯蚓	热	圆 ^①
侗台语	*ʔdəm	*ʔdun	*ʔdət	*ʔdun
汉语	*q-dəmʔ(饮)	*g-nan(蠃)	*nat	*Glən
藏缅语	*g-dam	*bu-dan ^②	—	*glor

侗台共同语浊塞音的先喉塞来自前一音节 *k-、*q- 等的简化。如“黑”，壮语龙州话 dam¹，版纳傣语有 dam¹ 和 kam¹ 两种读法，临高语 lam¹，侗语、仡佬语 nam¹，佯僂语 ʔnam¹，黎语通什话 dam³，布央语峨村话 ʔdam²⁴，木佬语 n̩.ɑŋ⁵³，来自侗台共同语的 *ʔdam < *q-dam。它是侗台语的南岛语底层词，来自南岛语的 *qudam。

侗台共同语有先喉塞鼻音。如“这”，壮语龙州话、武鸣话 nai³，侗语南部方言、佯僂语 nai⁶，黎语保定话 nei²，白沙话 nen³，仡佬语贞丰话 nai⁴²，泰语 ni³，拉珈语 ni²，黎语通什话 ni⁵，布央语峨村话 ni³³。

侗台语的这个指示代词有两个不同的来历。侗台共同语 *ʔnar < *C-nar, *ʔni(-ʔ) < *qini(-ʔ)。侗台语的 *C-nar 与苗瑶语“这” *C-nar 同源，来自古汉藏语南方方言。*C-ni(-ʔ) 来自南岛语。布拉斯特拟原始南岛语、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这” *i-ni，如台湾的赛德克语 hini < *qini，阿眉斯语 kuni，赛夏语 hiniʔ。

壮傣语支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临高语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泰语分布在泰国，老挝语分布在老挝。这一语支的掸语(Shan)、昆语(Khun)分布在缅甸，坎提语(Khamti)分布在缅甸和印度，阿含语(Ahom)分布在印度(已消亡)，石家语(Saek)主要分布在老挝，侬语(Nung，壮语南部方言)分布在越南，诺语(Nyo, Nyaw)分布在泰国。侗水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黎语支的黎语和村语(又称村话)分布在海南岛。黎语内部方言差别较大。仡央语支的语言有仡佬、木佬、拉基、羿、普标、布央、耶容等，主要分布在云南和贵州，境外的越南。木佬语、羿语、普标语今已趋于消亡或已经消亡。越南除了仡佬语外还有拉梯语(Lati)和拉瓜语(Laqua)。梁敏先生认为越南的拉梯语就是中国境内的拉基语(境外又拼为 Lachi, Pula 等)。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308—314页。

② 如独龙语 bu³¹dan⁵³，普米语 bu¹³da⁵⁵，哈尼语 bu³¹de⁵⁵。

5. 苗瑶语的分布和分类

苗瑶先民史籍中称为“武陵蛮”、“五溪蛮”。关于他们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武陵郡之称始于西汉初年,为今湘西地区。“苗”专指苗族人见于唐宋时代的史籍,如樊绰的《蛮书》等。据苗人的《迁徙歌》,苗人是从“水乡”迁入武陵五溪地区的。东汉时古苗瑶人大约居于沅水中游与酉水下游一带。^①

瑶族唐代开始从湖南迁至两广境内,称为“莫徭蛮”、“莫徭”或“徭人”。^② 瑶语支的语言只有勉语一种。勉话有勉、金门、标敏、藻敏 4 种方言。勉语还分布在越南、泰国、老挝,另有一些使用勉语的瑶族人已迁居到美国和法国。

“畲”之名始于南宋,他们在福建一带被称为“畬民”。^③ 畬人大约南北朝时沿湘黔边境南下,经桂北、桂东,至广东潮州,聚居于粤、闽、赣交界地区。南宋时部分畬人向福建的不同地区和浙江等地迁移。^④ 客家人南下广东,与畬人杂居,大部分畬人渐转用汉语客家方言,广东地区保存下来的畬语中亦有不少客家话的借词。^⑤

苗瑶共同语和后来的苗语共同语塞音六分: *p-、*ph-、*b-、*mp-、*mph-、*mb- (以唇塞音代表各种塞音)。

如古苗语和古苗瑶语声母拟为 *mp- 的“猪”“梦”等词苗瑶语中的读法:

	苗语古音 ^⑥	巴哼语文界话	畬语	勉语江底话
猪	*mpa ^C	mpe ⁵	—	—
梦	*mpoi ^C	mpi ⁵	pui ⁵	bei ⁵

从苗语支诸语的对应看苗语支共同语这一声类为 *mp-, 从勉语诸方言的对应看,“梦”的勉语古声母当为 *ʔb-。苗瑶共同语为 C 调。

古苗语和古苗瑶语拟为 *nt- 的“长”“烤”等词和其他苗瑶语的读法为:

	苗语古音	巴哼语文界话	畬语	勉语江底话
长	*ntæ ^B	to ³	ta ³	da:u ³
烤	*ntæ ^C	nto ⁵	ta ⁵	dza:u ⁵

苗瑶共同语时期有四个原始调。塞音六分是苗瑶共同语不同于其他汉藏语的创新。苗瑶共同语声母的鼻冠塞音主要有两个来历,是古鼻音前缀和词根声母及声母复辅音演变的结果。苗瑶语分为苗、瑶和畬三支。

苗语支的语言有苗、布努、巴哼、炯奈等四种语言。苗语又有黔东、湘西、川黔滇三种方言。川黔滇方言有七种次方言。广西地区的一些瑶族人使用布努语,布努语是苗语支语言。布努语有布努、瑙格劳两种方言。一部分瑶族人使用巴哼语。巴哼语分三江、黎

① 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第 85、81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

② 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中)第 517 页,民族出版社,1990 年。

③ 同上,第 524 页。

④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第 2、3 页,民族出版社,1986 年。

⑤ 同上,第 24、25 页。

⑥ 参见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中的构拟。

平两种方言,分别分布于广西和贵州。巴哼语可能还分布在越南,被称为那峨语或巴腾语。

二、汉藏语谱系关系的不同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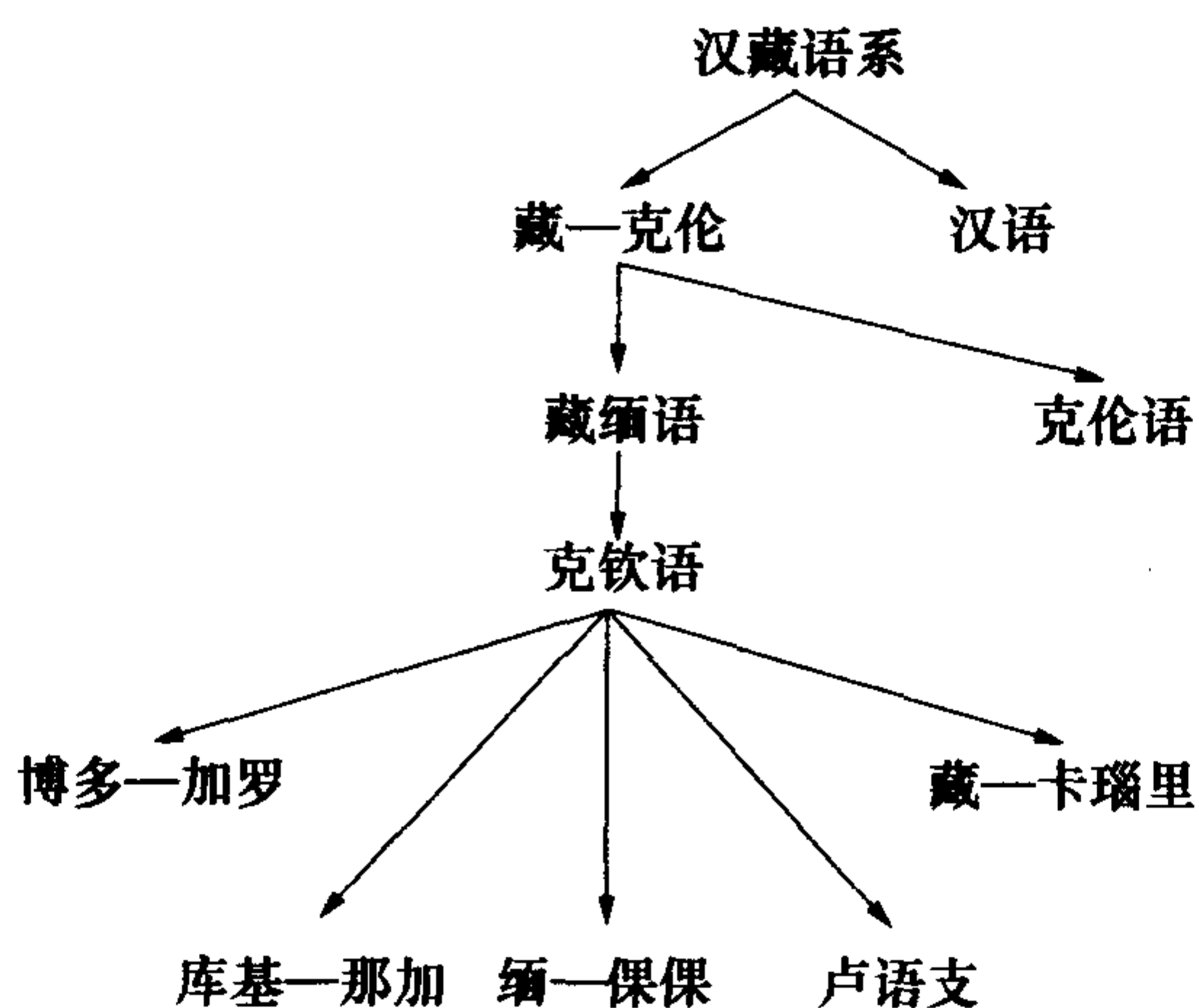
1. 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研究史

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初,当时的学者莱顿(B. J. Leyden)、布罗恩(N. Brown)等把分布在东南亚的今天称为藏缅、侗台和南亚语系的语言归入印度支那语系(Indo-Chinese Family)。19 世纪末期,孔好古(August Conrady)把汉语、台语和藏缅语三个支系归入印度支那语系。20 世纪初,英国学者戴维斯(H. R. Davies)把苗瑶语归入汉藏语系孟高棉语族。^① 1929 年,西门华德(Simon)发表了《汉藏语同源词初探》(*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richungen, Ein Versuch*),挑选了 338 对汉语和藏语词作为讨论的对象,说明汉语和藏缅语的同源关系。

20 世纪 30 年代李方桂在他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把汉藏语系分为汉台和藏缅两支,70 年代调整为汉、侗台、苗瑶和藏缅 4 个语族。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aul K. Benedict)20 世纪 40 年代完成了《汉藏语言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的材料准备,1972 年修改出版。他的分类中汉藏语系下辖汉语和藏—克伦两支,藏—克伦语又包括藏缅和克伦两支等。他的藏缅语的分支中还包括巴兴—瓦尤语(基兰提语支)和阿博尔—米里—达夫拉语(米里语支)。藏—卡瑙里语包括博迪语支和喜马拉雅语支。他认为白语和汉语构成汉语族。

他的观点可简单表示如下^②:



^① 孙宏开《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第 13 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年。

^②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4 页。

2. 关于侗台苗瑶语归属的不同观点

本尼迪克特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侗台语与印度尼西亚语等可组成语言联盟,又说与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于是此类观点在西方占上风。本尼迪克特把印尼语与卡岱语(侗台语)放在一起的设想以及他的论证的方法和材料的处理多有疏漏,应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解释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关系。

20 世纪初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苗瑶语与孟高棉语有发生学关系。^① 本尼迪克特则认为苗瑶语与汉语、藏缅语没有发生学关系,苗瑶语与藏缅语某些词的相同是早期借用的结果。在西方语言学界,这一类的意见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占主导地位。

3. 汉藏语系诸语内部的分类问题

汉藏语系内部争议最大的是白语的归属。本尼迪克特认为白语不应属于藏缅语,应是汉语族的一员。目前国内也有学者同意他的观点。国内研究藏缅语的学者一般认为白语应归于藏缅语。白语有一些古汉语对应的词,语序又是 SVO,难免令人得出本尼迪克特这样的看法。同意把白语划归藏缅语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白语应划归彝语支,有的不同意。

藏缅语族包括的语言多,语言的差别大,分类的意见多有分歧。如对羌语支有不同意见。对嘉戎语、独龙语、纳西语、土家语等的语支归属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说羌语与某几种语言属于羌语支,必须回答它们历史上的共同创新是什么。

本尼迪克特把克伦语作为一个特别的语支,理由是克伦语的宾语在动词之后。这种说法我们现在知道是不合适的。他不把克伦语和汉语归在一起,理由是词汇差别太大。

三、汉语的历史比较

关于汉语的历史分期,王力先生的意见是:公元 3 世纪以前为上古期,3~4 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 4 世纪到 12 世纪为中古期,12~13 世纪为过渡期;公元 13 世纪到 19 世纪为近代;20 世纪为现代。^②

以下是周祖谟的汉语历史分期^③:

上古前期	商代至西周末	公元前 771 年前
上古后期	东周至秦汉	公元前 770 年~公元 219 年
中古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 220 年~588 年
近古时期	隋唐五代和北宋	公元 589 年~1126 年
近 代	南宋至“五四”	公元 1127 年~1919 年

汉语音韵学界通常把魏晋南北朝至北宋的这一段通称为汉语的中古时期,或在这一段中再区分出中古早期、中期和晚期。

① 如戴维斯把苗瑶语归入孟高棉语族。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上)第 35 页。

③ 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论集》第 6—1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亲属语或方言语音方面的渊源关系是有共同来源的系统之间的关系。现代汉语诸方言的比较已经证明它们原来的音系结构与《切韵》音系结构相近。闽方言的声韵调的结构也与《切韵》相近。现代汉语诸方言是早期中古方言分化的结果,上古音的构拟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先秦的文献材料。

1. 汉语古音构拟依据的材料和方法

汉语比较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1) 汉语的历史文献;(2) 现代汉语的方言;(3) 其他相关的语言材料。历史文献所依据的语言既有古代的权威方言,也有当时的其他方言。文献的研究又与训诂学、音韵学与汉语文字学有直接的关系。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类型上有较大的差别。汉语传统语法忽视形态的描写,今天看来,即使是高本汉,对古汉语形态的认识也还是很初步的。汉语的历史比较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描写和比较两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忽视,应以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为基础。

《切韵》是研究汉语中古音最重要的文献。第一个依据《切韵》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古音的是高本汉。高本汉根据《切韵》对汉字读音的分类和反切、方言材料和对音材料构拟了汉语的中古音。不过,关于《切韵》所描写的到底是当时的哪种地方话还有不同的看法。高本汉认为是当时的长安方言,王力认为不能代表长安的实际语音,是“一种被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① 一些意见认为《切韵》所代表的不是—种方言,因为现代汉语方言中没有—种方言有这么多的韵类。不过目前“海内外主要的音韵学家,都是把《切韵》作为单一音系来接受”。^②

古语语音系统的构拟有两种依据,一种以那一个时代的该语言的文献为依据,另一种以其后代方言的读法为依据。汉语的文献,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到近现代,极为丰富。虽非拼音文字文献,然有一脉相承的文字系统。上古元音和韵的构拟以《诗经》等用韵的分部和谐声的研究为基础,声母主要是结合谐声,依据中古音上推。

汉语古音的研究中也借助于现代汉语的方言和亲属语的读音。如罗杰瑞在他的《闽方言中的来母字和早期汉语》中从闽方言来母字有 l-、t- 和 s- 三种读法出发,比较侗台和苗瑶语中汉语借词的读音,认为闽方言的来母字来自较早时的 *l- 和 *lh-。共同闽语阴声调的 *lh- 来自早期汉语清塞音的复辅音声母。^③

利用藏汉比较构拟汉语上古音国内外都很流行。如龚煌城先生认为:“汉语的来母与藏语 r-、gr-、dr-、br- 等音对应,而汉语的二等字也含有 -r 音(例如匣母二等作 gr-),由于与藏语 gr-、dr-、br- 等对应的汉语来母字大多属于三等,合理的推测是:

*gr- > ɣ- (匣母二等)	*grj- > *rj- > lj- (来母三等)
*dr- > d- (澄母二等)	*drj- > *rj- > lj- (来母三等)
*br- > b- (并母二等)	*brj- > *rj- > lj- (来母三等)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上)第 49 页。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3 页。

③ 罗杰瑞《闽方言中的来母字和早期汉语》,《民族语文》2005 年第 4 期。

依此推论,汉语的‘凉’、‘量’、‘联’、‘类’应来自*grj-。”
 龚先生的构拟和比较为^①:

汉语	藏语	原始汉藏语
凉 *grjaŋ > *rjaŋ > ljaŋ [±]	grang	*grjaŋ
量 *grjaŋs > *rjaŋs > ljaŋ [±]	grangs	*grjaŋs
联 *grjan > *rjan > ljan [±]	gral	*grjal
类 *grjæds > *rjæds > ljwi [±]	gras	*grjæds

2. 中古音的构拟

在中国古代的学者区分中古汉语的声类和韵类的基础上,高本汉参照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以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中古汉语借词的读音为参考材料,构拟了汉语中古音。

(1) 声母的构拟

传统音韵学的“字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声母,唐宋时期用代表字表示当时的这些声母。唐代轻、重唇尚未分化时用 30 个字代表当时的 30 个不同的声母。到了宋代,多了轻唇的非敷奉微、鼻音的娘母和浊塞擦音的床母,就成了 36 声母。它们分别是:

帮滂並明 非敷奉微 端透定泥 来
 知彻澄娘 精清从心邪 照穿床审禅 日
 见溪群疑 晓匣 影喻

高本汉根据唐代的情况为《切韵》系统构拟中古声类的音值,基本上为后来的学者所肯定:^②

p	ph	bh	m		
t	th	dh	n		l
ʈ	ʈh	ɖh	ɳ		
ts	tsh	dzh		s	z
tʃ	tʃh	dʒh		ʃ	
tɕ	tɕh	dʑh	ɳʑ	ɕ	ʑ
k	kh	gh	ŋ	x	ɣ
ʔ					

喻母拟为零声母。高本汉构拟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是送气的,后来的学者多改为不送气。

(2) 韵母和元音的构拟

宋代的等韵图(声韵调表)把韵分为一、二、三、四等,等的分别与介音和主元音有关。大体上中古一、二等的不同在于元音,三、四等不同于一、二等的在于它们的介音。三等

^① 龚煌城《从汉藏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 年。

^②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第 28 页,齐鲁书社,1987 年。

韵含有介音-j-, 四等带介音-i-。

元音的构拟各家的分歧较大。高本汉构拟了包括 16 个单元音的系统, 王力构拟了 10 个单元音, 潘悟云构拟为 11 个单元音。中古音共有六种辅音韵尾, 即入声韵尾-p、-t、-k 及阳声韵尾-m、-n、-ŋ。

(3) 声调

中古汉语的声调, 最初是平、上、去、入四个声调。^① 稍晚不同的方言中四声开始分化。有的方言中平声和上声因声母清浊的不同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和阳上, 有的方言中平、上、去、入四声都因声母的清浊而分化。北京话为代表的现代北方方言先是平声和上声分别分化为阴平和阳平, 阴上和阳上, 阳上与没有分化的去声合并。入声分化后又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 于是有今天这样的声调格局。

中古声调的调值日本僧人安然的论述可以参考。安然《悉曇藏》作于日本元庆四年(公元 880 年), 相当唐代僖宗广明元年。安然说: “……平声直低, 有轻有重; 上声直昂, 有轻无重; 去声稍引, 无轻无重; 入声径止, 无内无外。”依安然所记, 平声已分阴平和阳平。唐代传到日本的另一种读法是四声各分轻重, 即四声已经分化为八个调。^②

3. 上古音的构拟

汉语方言的差别可追溯至殷商之时, 商周交替可能伴随着权威方言的改变。从周早期至秦汉, 基本谐声字有相承的传统。

如果《切韵》系统依据的方言与上古谐声所依据的主要方言没有直接的承传关系, 甚至根本就没有关系, 拿这些谐声反映的语音情况来研究中古声类的来历就没有意义了。目前看来可能不好直接用谐声关系推测商代的古音。通常默认上古谐声所依据的上古方言有传承关系。

谐声研究贡献最大的是清代的段玉裁。段以古代表示字音的偏旁(声符)为依据区分上古的韵, 他认为同一谐声偏旁的字属于同一韵部, 他的名言是“同声必同部”。譬如说, “母”“每”“海”“悔”同为一部, 因为“每”“海”“悔”从“母”得声, 都归入之部。“其中稍有差异的地方, 似乎表示有些谐声系统可能比押韵系统更古一点儿。”^③

上古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可用一个字表示, 后来或添加不同的意符成为不同的字。几个这样的字就构成了一组同声(符)的字。“草”为“皂”本字。甲骨文和周早期金文“史”“吏”本一字, 春秋后才有区别。尽管后世的这些字音的声母差别很大, 但它们的韵往往很相近。上古同声(符)的字当有相同或相近的声母。今天一些有相同谐声组合方式的字上古的读法中应有相同的声母(参见附录部分有关谐声的讨论)。

(1) 声母的构拟

中古声类是上推上古声类的依据。

① 入声是-p、-t、-k 韵尾音节的声调, 在汉语南方的一些方言中保留有入声辅音韵尾的声调较为短促, 入声是这一类韵尾的伴随特征。一些方言中-p、-t、-k 韵尾已完全消失, 入声仍保留, 成为这一类音节区别于其他类型音节的区别特征。

② 周祖谟《关于唐代方言中的四声读法》, 《文字音韵训诂论集》第 186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3 页。

高本汉从中古 36 母上推得到的上古的声母系统为^①：

p	ph	(b)	bh	m		
t	th	d	dh	n		l
ts	tsh	dz	dzh		s	z
tʂ	tʂh	dʒ			ʒ	
ʈ	ʈh	ɖ	ɖh	ŋ	ʃ	
k	kh	g	gh	ŋ	x	
ʔ						

高本汉的浊音分送气和不送气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否定。李方桂先生说：“我们既然认为中古的浊塞音是不吐气的，就没有理由说它是从上古吐气的浊塞音来的。”^②

李方桂的声母系统为^③：

p	ph	b	hm	m		
t	th	d	hn	n		l, r
ts	tsh	dz			s	
k	kh	g	hŋ	ŋ	h	
kw	khw	gw	hŋw	ŋw		
ʔw					hw	

后来李方桂先生对上古的复辅音有一些假设。他为这个系统增添了^④：

pr	phr	br	mr	
		brj		
tr	thr	dr	nr	
trj	thrj	drj	nrj	
tsr	tshr	dzr		sr
tsrj	tshrj	dzrj		srj
kr	chr	gr	ŋr	hr
kwr	chw	gwr	ŋwr	hwr
		gwrj		

他解释说，与喻_四谐声的“𪔐”、“𪔑”、“𪔒”等读作 jiuēt，又读床_三的 dzjuēt，又与见母字“橘”谐声，假定上古读作 *gwrjit，在方言中有两种变化，jiuēt 和 dzjuēt。

如果认为跟舌根音谐声的喻_四、禅以及床_三都是从 *grj-变来的，那么跟舌根音谐声的

①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13 页。

③ 同上，第 21 页。

④ 同上，第 86 页。

照_三、穿_三及审_三分别来自 *krj-、*khrj-和*hrj-。①

高本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各”与“洛”谐声,它们来自 *kl-。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逐渐认识到应来自 *kr-,中古的来母来自上古的 *-r-,喻_四来自 *-l-和*l-。与喻_四有谐声关系的审_三(书母)上古音为 *hl-。

(2) 韵的构拟

上古韵的构拟一方面根据《切韵》上推,另一方面依照先秦古籍的用韵。清代学者把先秦古籍的用韵,如《诗经》押韵的字按韵分部。高本汉的分部建立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王念孙、江有诰)。韵母的构拟牵涉到上古韵母所包含的介音、元音和韵尾。

上古元音为 a 的,分别有鱼部的 *a,谈部的 *am,元部的 *an,阳部的 *aŋ,盍部的 *ap,月部的 *at,铎部的 *ak 和歌部的 *ar。由于《诗经》等文献中鱼部的字可与铎部的字押韵,高本汉把鱼部拟为 *aq。高本汉的上古韵尾有 -p、-t、-k 和 -b、-d、-g 的分别。李方桂先生除了同意高本汉的意见,假定上古有清浊塞音韵尾的对立,还假定有 *-ŋ 和 *-ŋw 的分别和 *-kw 和 *-gw 的分别。现以王力的六元音系统为代表说明上古韵部的拟音②:

		-k	-ŋ	-i	-t	-n	-p	-m
a	鱼	铎	阳	歌	月	元	盍	谈
e	支	锡	耕	脂	质	真		
ə	之	职	蒸	微	物	文	缉	侵
ɔ	侯	屋	东					
o	宵	沃						
u	幽	觉	(冬)					

歌、脂和微王力拟为 -i 尾,依高本汉歌部是 *ar,脂部是 *ər。王力脂、微分立。王力的元音系统中没有 i。早期的构拟如高本汉是十五个元音的系统。后来李方桂构拟了一个四元音的系统。包拟古、白一平、郑张尚芳、潘悟云都认为上古汉语有一个六元音的系统。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的六元音是 a、e、i、u、u、o,高本汉的 -r 改为 -l。③

中古三等字有 -j 介音,四等有 -i 介音。从《切韵》看三等韵的分布有这样的特点:

歌哈泰豪覃谈等主元音为 a 等低元音韵无对应的三等韵。

支脂之微祭盐严侵凡真殷文蒸等高元音三等韵无对应的一等韵。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方言中由于新的 -j 介音的产生,从帮滂並明中分化出非敷奉微,端透定中分化出三等的知彻澄,泥母中分化出娘母,匣母中分化出云母,不带 -j 介音的群母一律增生 -j。*gw-和*gwj- 在上古晚期已分别演变为 *ɣw-和*ɣwj-,南北朝时期产生新的*gwj-。④

(3) 声调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法国学者奥德利古尔(A. G. Haudricourt)1954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88 页。

② 王力《王力文集》第十卷《汉语语音史》第 39 页。

③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262 页。

④ 吴安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 -j 介音》,《语言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年提出汉语的去声对应于越南语的问声(清声母)或跌声(浊声母),上声对应于越南语的锐声(清声母)或重声(浊声母)。古汉语去声和上声的音节借到越南语中分别读作两类,每一类由于声母的清浊又分别归入两个声调。越南语与它的亲属语——其他孟高棉语比较表明,问声和跌声来自*-s,锐声和重声来自*-ʔ。^①因此设想汉语读作去声的音节借入越南语时带*-s韵尾,上声带*-ʔ韵尾。奥氏的假设半个世纪来基本上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海南岛的临高语较晚的汉语上声借词不带-ʔ韵尾,早期的上声汉语借词带-ʔ韵尾,读促声调。^②

郑张尚芳先生的材料也可以说明去声来自-s韵尾。朝鲜语中的汉语借词如,“磨”mais,“篋”pis,“芥”kas,“盖”kas,“器”kuruus,“制”tsis,“味”mas,“界”kas等带-s。^③

4. 汉语的历史形态

汉代是汉语句法和词法发生较大变化的时代。这一点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已有论述。如分析形式的使动式从文献看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④至于汉语的这种变化不能说是有什么进步,只是语言形态上的一种演变而已。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上古汉语表示使动的*s-前缀的消失。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里早已指出中古汉语的形态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⑤中古汉语声调变化的屈折特点可追溯至上古汉语。

俞敏先生曾说明上古汉语有几种派生新词的方式,一个字表示两个或几个相近的意思各有相近的读法。原本用一个字表示的意思后来用两个字或几个读音相近的字来表示。^⑥如:见/现,示/视,教/傲,罗/离/罹,知/智,等等。它们的读法表示的是一些同源的派生词。这些同源派生词后世有的是声母的不同,有的是介音的不同,还有的是韵尾或声调的不同。多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一些积累,也初步弄清了一些问题。如入声的动词可以变为去声的名词这种现象不断有学者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中古及中古以前的北方汉语入声字音节带-p、-t、-k等辅音韵尾,去声应来自-s韵尾。那么入声的动词变为去声的名词是由后缀-s造成的。梅祖麟先生认为汉语动词变名词在先,名词变动词在后。^⑦

我们先讨论上古汉语的前后缀等可能的情况。

(1) *s-前缀

早在1896年康拉德(A. Conrady)就指出s-前缀在藏语中有使动和名谓化(把名词变成动词)的功能。

① A. G. 奥德利古尔《越南语声调的起源》,冯燕译,袁家骅校,《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②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86页。

③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156页。

④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404页。

⑤ 同上,第213页。

⑥ 俞敏《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⑦ 梅祖麟《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

苏联学者雅洪托夫 1960 年提出汉语中是:

*sm->x- *sn->th- *sng->x-

汉语的这个*s-前缀可以在上古的任何单辅音声母前出现。

明母字和晓母字的互谐如:

明母	中古	m-	墨勿亡每蓍微
晓母	中古	x-	黑忽盍悔薨徽

上古汉语“墨”*mæk加前缀*s-派生出“黑”*s-mæk。除了鼻音声母字跟晓母字和心母字的谐声可以说明上古汉语有*s-前缀外,还有其他一些例子:①

名 词	形 容 词
條 *d-	修 *s-
潭 *d-	深 *s- ②
名 词	动 词
帚 *tj-	掃 *s-
甌 *ŋ-	獻 *sŋ- ③

(2) *m-前缀

上古汉语的*m-前缀是及物动词的前缀。如:

名 词	动 词
膠 *kru (粘物)	繆 *m-kru (绞结)
实 *C-lit (果实)	密 *m-lit > *mit (《礼记》, 闭也)
	来 *m-ra(-g)
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连 *C-ran ④	繇 *m-ran > *man
失 *s-lit	没 *m-lit > *mæt
续 *gluk	睦 *m-gluk > *mjuk

《说文》:“续,连也。”引申为人际关系的“睦”。

上古中期*m-前缀可能已有两种读法,*m-和*mǎ-。作为构词的前缀——王力先生所说的词头,读*mǎ-。如“无念”的“无”。⑤ “袂”从“夬”得声,谐声时代当读作*m-krat。这个*m-不带元音连同词根用一个字表示。

① 梅祖麟《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中国语文》1988年第3期。

② “潭”《广韵》徒含、以荏两切,谐声字有“燂”(昨盐)“暉”(式任切)“嫵”(乃玷切)等,“潭”上古音*lam,“燂”*sglam,“暉”*hlam,“嫵”*m-lam。

③ “甌”是炊具,用甌盛牲品供奉便是“獻(献)”。

④ 《孟子》:“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⑤ 《诗·大雅·文王》:“王之蓋臣,无念尔祖。”无念,念也。

*mā-作为构词的前缀在后世的方言中有所保留,如“马蜂”“蚂蚁”“蚂蟥”等等。

(3) *G-前缀

*G-是动词的完成体前缀,或表现为*g-,如:

沉 *qhləm(词根 *ləm)	陷 *Gram-s
作 *sklak	昨 *sGlak
卷 *kan	蹇 *gan

*G-作为形容词的前缀,如:

夹 *krap	狭 *Grap
圈 *gan	圆 *Gən
盐 *gram	咸 *Gram

(4) *p-前缀

*p-是使动前缀,如:

脱 *khlat	扒 *prat
列 *k-rat	别(分别) *p-rat>*pjat
密 *mit	闭 *pit
转 *klan	般 *p-lan>*pan ^①
降 *krəm	贬 *p-krəm>*pjam

*p-也能把名词变为动词,如,“鍼” *gram>“砭” *pjam。《说文》:“砭,以石刺病也。”

*p-前缀和*m-前缀不像*G-前缀的派生词那样有相同声符字,相信是采用谐声字以前的前缀。

(5) 后缀*-s

上古汉语的*-s后缀主要有动词派生名词,名词、形容词派生动词和使动三个功能。

动词派生名词的,如:

坐 *sgrar-ʔ	座 *sgrar-s
入(进入) *nip	内(内部) *nip-s>*nis
列(排列) *ret	例 *ret-s>*res
责 *skrek	债 *skrek-s>*skres

形容词和名词派生动词的,如:

空 *koŋ(空虚)	空 *koŋs(空缺)
中 *kloŋ(平也,和也)	中 *kloŋs(当也)
间 *kran(隙也)	间 *krans>*kans(隔也)
恶 *ʔak(坏)	恶 *ʔak-s(厌恶)
好 *huʔ(不坏)	好 *huʔ-s>*hus(喜欢)

① 甲骨文“般”,以使舟转会意。

构成使动动词:

受 *C-nu?

闻(听) *mun

授 *C-nu-s > *zus

问 *mun-s > *muns

*-s 后缀上古末期以后渐趋消失。

(6) 后缀 *-?

中古的上声来自上古的 *-? 韵尾, 多与上古汉语 *-? 后缀有关。上古汉语的 *-? 后缀有指小或爱称等构词功能, 也有把名词或形容词变为动词和使动等功能。

早期的身体部位词和人称代词多附 *-? 后缀。如上声字“首”“项”“体”“股”“足”“耳”“口”“齿”“我”“吾”“尔”等, 及稍晚的“头”“眼”。

*-? 后缀可把名词或形容词变为动词, 如:

巫 *ma

间 *kan

背 *pək

舞 *ma-?

限 *gan-?

负 *pək-? > *bu?

把动词变成名词, 如:

卷 *kan

波 *par

卷 *kan-?

簸 *par-?

构成使动动词, 如:

印(高也) *ʔaŋ

缠(直连切, 绕也) *dan

仰 *aŋ-? > *ʔaŋ?

缠(持碾切, 缠绕物也) *dan-? > *dan?

三个不同时代的押韵情况可说明 *-? 和 *-s 上古中、后期的活动情况。

以下是《诗经》时代平、上、去、入调的主要押韵情况(当时无声调, 平、上、去、入代表当时可能的韵尾类别):

	上	去	入
平	70	56	5
上		34	11
去			49

两汉时代主要是入声可与去声押韵(平上入调可能已分化, 去入声调的韵尾相近):

	西汉, 入声	东汉, 入声
平	1	1
上	2	2
去	26	33

魏晋时代的主要押韵情况是: ①

① 丁邦新《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补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第34—36页。

	上	去	入
平	11	8	0
上		24	0
去			86

《诗经》时代平声和上声字的押韵为常见,上声和入声的押韵并不普遍。魏晋时代平声、上声和入声不押韵。魏晋时代韵尾及作为伴随特征的声调已与中古相近。

《诗经》、两汉至魏晋时代去声都能与入声押韵,但魏晋时代-k 尾入声字不与去声字押韵。南北朝时期主要是-t 韵尾的祭霁韵字(中古去声字)与入声字押韵。魏晋时去入已分化为不同的声调。

上古时期带韵尾*-s 的词中古读去声。*-s 后缀与-p、-t、-k 结合构成-ps、-ts、-ks 韵尾,于是上古有去入通押。*-s 后缀经历了一定的活跃时期后逐渐凝固在词末,魏晋时与去声互为伴随特征。

《诗经》时代后世平、上、入声调的词可以押韵无疑与这些词的韵尾有关。由于*-s 和*-ʔ 后缀魏晋时代已不活跃,带*-ʔ 韵尾的上声词只与*-s 韵尾的去声词等押韵,不能与带-p、-t、-k 韵尾的入声押韵。

(7) 后缀*-g

中古读平声的字《诗经》时代可与入声押韵,高本汉假定部分阴声韵带*-g 韵尾。阴声类字仍有两种情况,有的可与入声押韵,有的不与入声押韵。^① 可与*-k 入声字押韵的阴声韵可能有两种情况: *-gs 韵尾, *-g 韵尾。*-g 韵尾的后来读平声或上声(由于*-ʔ 韵尾), *-gs 韵尾的读去声。

除押韵外,如高本汉提到的两读:恶,乌格切/乌路切;遘,五各切/五故切;度,徒落切/徒故切;莫,慕各切/莫故切;貉,莫白切/莫驾切;射,食亦切/神夜切。^② 入去两读,又与入声字谐声的,如“恶”“遘”“度”“莫”“貉”等字当为*-ks 韵尾;^③“射”为*-gs 韵尾, *-gs 可演变为 -k 和-s,分别读入声和去声。很少有语言只有闭音节的,上古汉语的*-g 韵尾一定是有来历的,它们可能是后缀*-g 的遗存。

后缀*-g 使从较为具体的所指成为有引申、泛指或虚化的所指。如:

昔 *sklak	古 *kla-g
落 *krak	下 *Gra-g
逆 *ŋak	忤 *ŋa-g
曲 *khok	勾 *ko-g
独 *glok	孤 *ka-g
弗 *pət	不 *pət-g
兀 *ŋət	傲 *ŋe-g

① 如鱼侯部的“度、霸、射、借”“务、裕、窋”等与入声字押韵,“家、苦、土、鱼”“句、主、数”等不与入声字押韵。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169页的讨论。

②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第169页。

③ 如“恶”的谐声字“哑”,分别有乌格切、于革切和乌下切。

集 *sgləp

聚 *sglo-g

私 *s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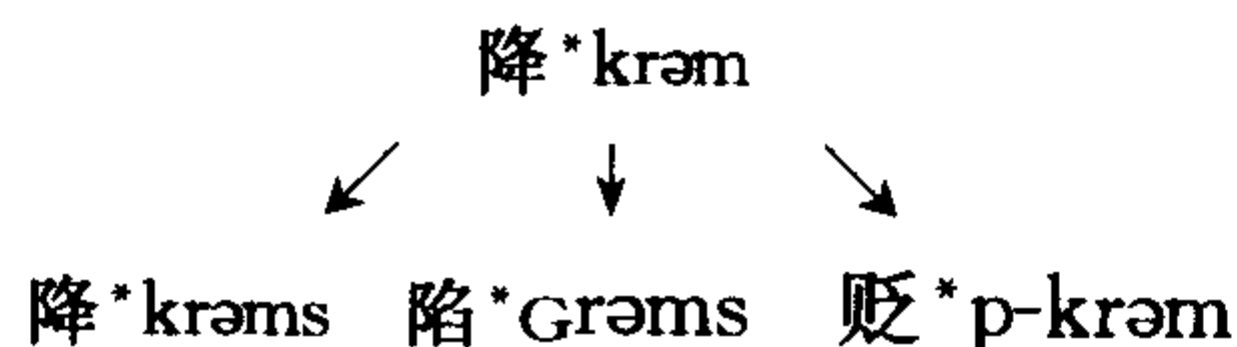
小 *se-g

“不”，《广韵》除了有方久、甫鸠两切外，还有分勿切。

“私”，亦指小。《方言》(卷二)：“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小者谓之私小或曰纤缙。”“私” *sir 的派生词有“细” *sirs。

(8) 词根及其派生

我们依照历史语言学和形态学的原则讨论这个问题，而有别于不加分辨地归纳汉语的词族。^① 上古读音和意义相近的词或有引申意义的词可能是同一个历史层面的或同一方言的，也可能是不同历史层面和不同方言的。不同历史层面和方言遗留的读音和意义相近的词如同今方言中的文白异读，与形态无关。以下以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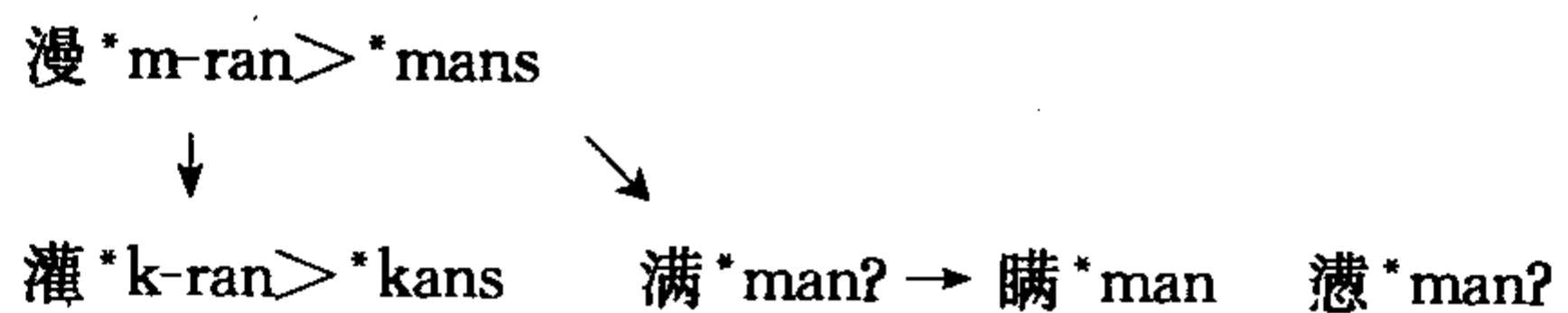


下面的这个例子有不同解释：



本尼迪克特(Benedict)将“民”与藏缅语比较，认为早期有 *-n 后缀。沙加尔(Sagart)认为-ŋ 是受前面的-i 同化产生的，氓 *mraŋ 中的-r 是中缀。^② 中缀 *-r 具有表示“重复的动作”、“成双或多歧分布物体的名称”的功能。^③

上古汉语原本用“盈”表示“满”。“满”是后来才出现在权威方言中，从语音上分析我们有：



“漫” *m-ran 的 *m- 是不及物动词的前缀，词根是 *-ran。

“长”“乔”都有两读。“乔”，巨娇切，高而曲也；举乔切，树枝曲卷似鸟羽毛。这种声母清浊不同的同源派生关系，有的早就用不同的字来表示。词根加后缀的派生词，后来成为声调的不同，一个字有两种读法，或另造形声字表示。派生的动词有的有使动的意义，形容词也可派生为动词。

① 如高本汉在《汉语词类》(张世禄译)中词族第一组为：景、镜、光、晃、煌、旺、莹、耿、颖、炯、荧、萤、杲、赫、旭、熙、熹、晓、曠。

② 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龚群虎译，第14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③ 同上，第125—138页。

上古以后出现一些用字表示的后缀如“子”“头”等。构词成分“子”是名词的后缀,如“妻子”“儿子”“孙子”“老头子”“老婆子”“桌子”“椅子”“凳子”“种子”等等,中古时期才流行起来。上古时期“子”一般有实在的意义。“君子”“臣子”中的“子”是作尊称用。“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后汉书·班超传》)中的“虎子”是指“虎崽子”。北京话中作后缀用的“子”读作轻声。河北一些地方管鸡蛋叫“鸡子儿”。这个“子”倒是指鸡下的“蛋”,但已读儿化音。

5. 汉语的历史句法

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再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法一直变化着,句法也在变化,向着主题优先更为明显的方向发展,古汉语词法范畴的手段后世或成为句法或词组范畴的手段。古代汉语不是典型的分析型语言,有较为丰富的粘着形式和一定的屈折形式,句法上具有综合型的特点。现代汉语不同方言的分析型特点突出。

(1) 句法类型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是主题—述题型优先的语言。它们的主语—谓语句中主语和谓语动词的关系也不像印欧语那样是有标记的一致性的句法关系。因为主题型句子中主题的选择取决于动词。

“我喝茶。”是主语—谓语句。

“茶,我也喝。”是主题—述题句。

“一条板凳坐四个人。”也是主题—述题句。“一条板凳”数量名结构,充当主题。可以是“一条板凳四个人坐”和“四个人坐一条板凳”。

“一件衣服穿十年。”

“一斤酒喝不完。”

“一个巴掌拍不响。”

“台上坐着主席团。”

“那边来了个人。”

“今天下雨。”等主题—述题句中主题用来强调不同的逻辑成分。

古代汉语也是主题优先的语言,商周以来就是如此。

甲骨卜辞: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南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北来雨?”(《卜辞通纂》第 375 片)

《诗经》: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桧风·羔裘》)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曹风·蜉蝣》)

中古汉语:

“堂中间置高广佛座一座,上立金色像五百。”(《白居易文集》)

“蛇无头不行,鸟无翼不飞,军无将不战,兵无粮不存。”(《李陵变文》)①

“者”“也”等曾作为古汉语主题的标记。

① 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第 359、107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年。

(2) 语序

我们注意到古今汉语都有较为固定的语序。而甲骨文中既有“商受年”语序,又可刻为“受年商”。

古汉语否定句代词做宾语前置于动词是正常语序。甲骨文中宾语不是代词时也有这种现象。甲骨文否定句代词作宾语的如:

“王勿之比?”(丙 278)(王不要去联合它?)

“方不我征?”(掇 1. 258)(方国不会攻打我们?)

否定句宾语不是代词的如:

“今来羌勿用?”(丙 38)

但有的不前置,如:

“弼用三牢?”(南·明 585)(不用三牢?)

甲骨文中“𠄎”放在宾语的前面,为前置宾语的标记。

代词类宾语前置于动词和介词的形式先秦时代为常见,汉代之后残存于书面语。如:

“五谷,所以养人也。”(《孟子·滕文公》)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墨子·所染》)

现代汉语通常以“数量名”结构表示数量。殷商卜辞直接用数词与名词结合表示名词的数量。数词可置于名词前也可置于名词之后。上古时期最为常见的仍是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结构。

春秋以后汉语的数量结构逐渐可以前置于名词,到了中古以后数量名词序成为汉语的正常语序。

(3) 分析型的使动

使动的意义古汉语原本用前缀*s-及后缀*-s这样的形态手段来表示。王力先生根据后来的汉语的结构区分为“使成式”和“处置式”,认为是汉语的一种完善。事实上这是汉语从综合型语言向分析型语言演变的结果。如:

败之→把他打败

“败”,《广韵》薄迈切,自败;补迈切,破他。故“败之”的“败”是及物动词,是不及物动词薄迈切“败”的使动用法。后世只用薄迈切的一种读法,使动用法用分析型的结构表示。

活之→救活他

“活”,《广韵》户括切,不死也。又古活切。

古汉语中一字两读,以声母的清浊不同表示动词的自动和使动两种意义。

语法通常分为词法和句法两个范畴。词法和句法之间还有短语和词组的语法范畴,或归于词法,或归于句法。

(4) 句法演变中的虚词

汉语与其他许多语言一样,在它的历史演变中由于句法发展的需要,一些实词演变为虚词。

被动句式发展的需要产生被动标记。遭受动词“见”“被”“吃”>被动的标记。

执持义动词“将”“把”>工具格标记>宾格标记>使成标记。

意欲义动词“欲”“要”>将来时标记。

指示代词“之”>属格标记。

指示代词“是”>系词。

限定副词“但”“祇(只)”>转折连词。^①

6. 词源研究

古今用词有别,一方面是旧词的废弃和新词的替换,另一方面是词本身的变化。词的变化与形态、语音和词义的变化有关。词源研究是有关词的来历和变化的研究。

汉语方言的源头可追溯至殷商,从古至今由于权威方言的替换,各地方言的词汇产生了一定倾向性的变化。

从扬雄《方言》中的叙述看,当时的通语用词与函谷关东部的方言或西部的方言相近。如《方言》(卷一):“娥、嫫,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嫫。秦晋之间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媯,或谓之姁。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姝。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今天北方方言的“妙”是先秦时代东中部的方言词。

前面我们还提到“河”和“江”上古汉语中是专名,“河”即“黄河”,“江”即“长江”,后来成为通名。“文”甲骨文指人身上的“纹”,刻为胸口有纹之形。^②到了汉代,“文章”用来指文艺作品,^③与文身没有什么关系。古汉语“首”,中古以后称“头”;古汉语“目”,现代的多数方言中叫做“眼”或“眼睛”;古汉语“面”,北方方言中叫做“脸”。只是潮州话“眼睛”仍叫“目”,“脸”仍叫“面”,“鼻子”仍为“鼻”,“耳朵”仍是“耳”,“舌头”还叫“舌”。

只有少数身体部位的叫法古今无异,如“背”“手”。也有一些是原词作为词根或合成词的一部分构成新词,还用来指原来的部位。如,“鼻”→“鼻子”,“耳”→“耳朵”,“舌”→“舌头”,“眉”→“眉毛”,“发”→“头发”,“拳”→“拳头”,“膝”→“膝盖”等等。

一些学者注意到古汉语的一些词原本不是汉语的固有词,而是来自古藏缅语。由于汉语原本就和藏缅语有密切的发生学关系,有不少同源词。一些后起的词,在藏缅语中有较广的分布。

“我”殷商时并不是代词第一人称单数的形式,第一人称单数的形式是“余”。“我”上古音 *ŋar, *-r 是古藏缅语的复数后缀。^④

“注”,《说文》:“灌也,从水主声。”“注”是后起字,见于《诗·大雅》,上古音 *kjo-s。“水”,藏语 tɕhu, 普米语 tɕə⁵⁵, 勒期语 kjei³¹等。汉语方面上古的-s 后缀把来自藏缅语的这个名词 *kjo- 变成动词。我们同意包拟古的意见,认为汉语“注”的词根最初来自藏缅语。^⑤

我们已经认识到,汉语词源的研究不但与汉语不同时代文献用字的比较研究有关,

① 吴福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检讨与反思》,《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996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下)第551—552页。

④ 藏语支和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中仍有这一人称代词复数后缀。如藏语支的达克巴语(Takpa),“我”ŋai-kū/“我们”ŋaw-row,“你”i/“你们”i-row。

⑤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燕译,第201页,中华书局,1995年。

与古代汉语的形态研究、语音研究、方言研究有关,还与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有关。由于汉语和藏缅语有更密切的发生学关系和接触关系,藏缅语方面的研究也是不能疏忽的。

四、藏缅语的历史比较

1. 文献材料

藏缅语的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藏文文献,其次是缅文文献。

(1) 藏文文献

藏缅语的构拟中用得最多的是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词的拼写。

藏文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拼音文字,相传创于 7 世纪。9 世纪厘定之后的藏文文献中已经见不到-d 后缀,反映 11 世纪以后的拼写以文字形式保留至今。为了便于研究,通常将古藏语的拼音写法转写为国际音标,带有拟音的性质。个别字母的转写法有争议。如形如 R 藏文字母有人转写为 ʁ,有人转写为 v。藏语方言的比较说明藏文的 ʁ(或转写为 v)原本是古藏语不及物动词的前缀:

	藏文转写	藏方言拉萨话	康方言巴塘话	安多方言夏河话
动	ʁgul	ky ¹³	ŋgy ⁵⁵	ŋgu
传染	ʁgo	kø ¹³²	ŋgø ⁵⁵	ge
吹	ʁbud	—	pu ⁵⁵	mbə
燃烧	ʁbar	par ¹³	mba ¹³	mbar

用 ʁ(或 v)来表示的这个古前缀在声母简化得不那么厉害的康方言巴塘话和安多方言夏河话中使声母带鼻冠音,它原本可能是鼻音,譬如说 *ŋ- 或 *m-,只有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构拟出藏文创制时代这个字母的音值。而且还要注意七、八世纪和 11 世纪的音值是否相同。

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词典中转写的古藏语有五个元音,辅音 30 个。222 个声母中包括单辅音声母 30 个,二合复辅音 115 个,三合复辅音 71 个,四合复辅音 6 个。^① 这一类繁复的复辅音的形成与古藏语的形态有关。

古藏语的动词有现在、未来和过去三种时态和命令式,简称三时一式。如:

	现在时	未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吃	za	bzafi	bzas	zo
站	laŋ	laŋ	laŋs	loŋs
睡	nal	nal	nal	noI

如上表所示,“站”的现在时和未来时的形式相同,“睡”的三时形式相同。^② 动词命令式元音一律改为 o,可能与原本来自第二人称代词的后缀有关。

①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第 629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② 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 年第 3 期。

古藏语的语音和形态反映的早期藏语的形式,是更早一阶段历史演变的结果,显然不可视为原始藏语或原始藏缅语的形式。

(2) 缅文文献

缅文也是拼音文字,从现知的最早的碑文算起有近千年的历史。国内通用的古缅文的转写也是一种构拟,多参照现代缅语的读音。转写描写的古缅语有元音八个,包括分长短的元音a和aa。单辅音声母32个,复辅音声母68个。声调4个。^① 早期碑文中的拼写法和后来的也有所不同。

与同语支的亲属语比较,通用的转写尚有斟酌的余地。如:

	缅文(转写)	阿昌	仙岛	载瓦
虱	tθan ³	ʃan ³¹	ʃan ³¹	fin ²¹
水果	a ¹ tθi ³	ʃə ³¹	ʃl ³¹	fi ²¹
铁	tθam ²	ʃam ⁵⁵	ʃam ⁵⁵	fam ⁵¹ toʔ ⁵⁵
喝	tθək ⁴	ʃəʔ ⁵⁵	ʃuʔ ⁵⁵	fuʔ ⁵⁵
死	tθe ²	ʃl ⁵⁵	ʃl ⁵⁵	fi ⁵¹
肝	a ¹ tθan ³	a ³¹ ʃəŋ ³¹	a ³¹ ʃuŋ ³¹	sin ²¹
三	tθum ³	sum ³¹	sum ³¹	sum ²¹
血	tθwe ³	sui ³¹	sui ³¹	sui ²¹
擦	tθut ⁴	sut ⁵⁵	sut ⁵⁵	sut ⁵⁵
认	tθi ¹	sa ³⁵	sa ³¹	se ⁵⁵
杀	tθat ⁴	sat ⁵⁵	sat ⁵⁵	sat ²¹

阿昌语和载瓦语是缅语支的语言,阿昌语是缅语支语言中与缅语最接近的亲属语。仙岛语实际上可以算是阿昌语的一种方言。^② 缅文的 tθ-在现代缅语仰光话中读作 tθ-,但在阿昌等缅语支亲属语中有两种对应关系。我们有理由假定古缅语中读做 s-(或 ʃ-)。缅文转写为 s-和 sh-的对应关系为:

	缅文(转写)	阿昌	仙岛	载瓦
生(的)	a ¹ sim ³	a ³¹ tsin ⁵⁵	tsin ⁵⁵	a ²¹ tfum ²¹
骑	si ³	tsi ³¹	tsi ³¹	tji ²¹
守卫	səŋ ¹	təŋ ³⁵	kjoŋ ³⁵	tsuŋ ⁵⁵
对(量词)	sum ²	təŋ ³¹	kjum ³¹	tsum ⁵⁵
滴(量词)	sak ⁴	tək ⁵⁵	kjak ⁵⁵	—
米	shan ²	tshen ⁵⁵	tshen ⁵⁵	tfhin ⁵¹
十	shəj ²	təhe ⁵⁵	tshi ⁵⁵	tshe ⁵¹
染	sho ³	tshau ³¹	tshau ³¹	tshau ²¹

①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第656页。

② 王朝晖《仙岛语与阿昌语的元音对应关系》,《民族语文》2005年第4期。

以上的对应关系说明现代缅甸语仰光话的 s-和 sh-很可能来自古缅甸语的塞擦音,古缅甸语的 s-并无送气不送气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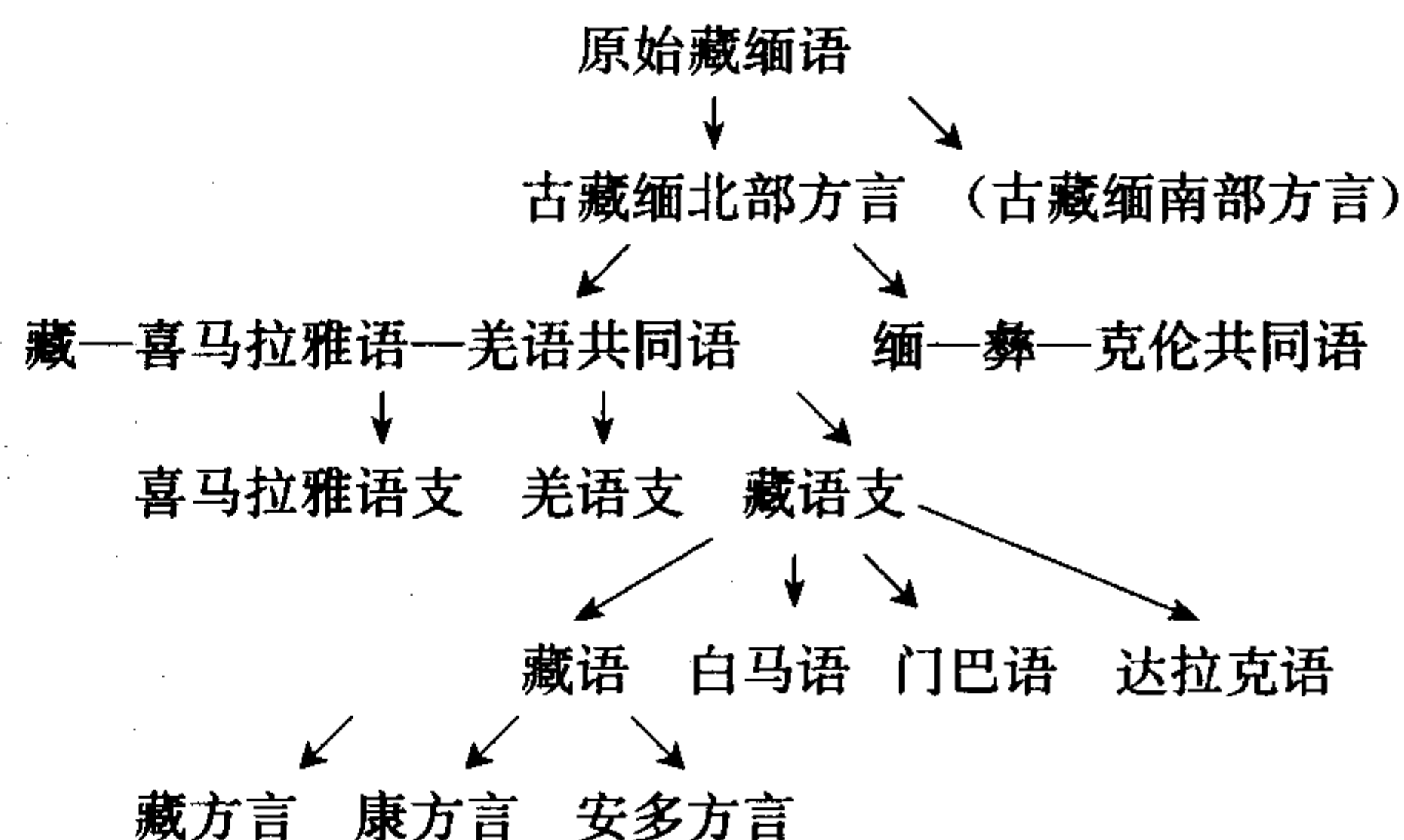
2. 亲属语的比较

藏文文献和缅文文献本身是研究和构拟古藏语支语言乃至古藏缅语最重要的资料,前面已经说明,其实它们的一些读法的确定有赖于亲属语和方言的比较。这是由于语音和形态的历史演变是可以区分历史阶段的。我们通常是在比较中划分历史阶段,又在区分历史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的。

藏语有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藏语支有藏、白马、门巴、洛巴、达拉克等语言。与藏语支发生学上有密切关系的是喜马拉雅语支和羌语支,其次是缅甸语支、彝语支和克伦语支。这些语支的建立目前还是依靠词汇异同的比较,而不是它们历史上的创新。

前面已经提到,一定区域内原本一致的方言由于创新不能遍及整个区域时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创新是划分方言或划归亲属语的条件。一组方言或亲属语最初共同的创新在后世的方言或亲属语中可演变为不甚相同的语音或形态的形式,如果历史比较能够说明这些不同的形式来自它们历史上的共同创新,也就能用这一创新来把它们与另一组方言和亲属语区别开来。

以语言历史年代学为依据,依照不同语言中核心词保留情况所设想的藏语的发生学关系是这样的:



藏语支、喜马拉雅语支和羌语支等语言数词的比较,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藏缅语的比较应从相近的亲属语开始,才能发现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及形态的演变。

试比较藏、嘉戎语、喜马拉雅语支的罗东语(Rodong)和马加里语(Magari)、克伦语支的克伦尼语和因他拉语(Yintala)、缅甸语支的缅甸语和马鲁语(Maru)、景颇语支的景颇语和独龙语、库基语支的梅梯语(Meithei)和朗龙语(Langrong)、那加语(那嘎语)的索布窝马方言(Sopvoma)、加洛语(加罗语)的数词: ①

①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 Part II, *Comparative Vocabulary*, by G. A. Grierson, K. C. I. E., Ph. D., Litt., L. D. C. S. Printed in India 1973.

	一	二	三	四	五
藏 文	gtəig	gn̥is	gsum	bzi	l̥ɿ
嘉 戎 语	kə tɛk	kə nɛs	kə sam	kə wdi	kə mɿo
罗 东 语	itto	hā-ka-rā	sūm-ra	lyū-ra	ŋā-ra
马加里语	kat	nis	som	buli	ba-ŋa
緬 文	tas ⁴	hnas ⁴	tθum ³	le ³	ŋa ³
马 鲁 语	tà	ji	sām	bjit	ŋa
克伦尼语	tö	nö	θö	lwi	ɿa
因他拉语	tà	ni	θü	lwi	ŋai
景 颇 语	lǎ ⁵⁵ ŋai ³¹	lǎ ⁵⁵ khon ⁵¹	mǎ ³¹ sum ³³	mǎ ³¹ li ³³	mǎ ³¹ ŋa ³³
独 龙 语	ti ⁵⁵	a ³¹ ni ⁵⁵	a ³¹ sum ⁵³	a ³¹ bli ⁵³	pu ³¹ ŋa ⁵³
梅 梯 语	a-mā	a-ni	a-hūm	ma-ri	ma-ŋa
朗 龙 语	pā-kāt	pā-ni	pā-tūm	pā-li	pā-ŋa
那 加 语	ka-li	kā-he	ko-so	pā-dai	po-ŋo
加 洛 语	sā	nī	gi-tām	bri	bo-ŋā

	六	七	八	九	十
藏 文	drug	bdun	brgiad	dgu	btəu
嘉 戎 语	kə tʂok	kə ʃnəs	wə rjat	kə ngu	ʃtʃɛ
罗 东 语	tuk-ka-ra	rai-ka-ra	b'ok-ka-ra	kī-pu-ra	lī-pu-ra
马加里语	— ①				
緬 文	khro ⁴	khu ¹ hnas ⁴	hras ⁴	ko ³	shaj ²
马 鲁 语	to-rūk	nai	ʃä	gok	tatsä
克伦尼语	θöθo	θöθo tö	lwi θo	lwi θo tö	ʃit
因他拉语	sun so	sun so tà	lwi so	lwi so tà	ʃai
景 颇 语	kʒu ³⁵	sǎ ³¹ nit ³¹	mǎ ³¹ tsat ⁵⁵	tʃǎ ³¹ khu ³¹	ʃi ³³
独 龙 语	kʒu ⁵⁵	su ³¹ ni ⁵⁵	ɕat ⁵⁵	du ⁵¹ gu ⁵³	ti ⁵⁵ san ⁵⁵
梅 梯 语	ta-rūk	ta-rēt	ni-pāl	mā-pal	ta-rā
朗 龙 语	rūk-ka	pa-sarri	pā-riet	pā-kūāe	pā-ʃuom
那 加 语	cho-ro	tʃā-nē	tʃā-tʃā	tʃo-ko	tʃi-ro
加 洛 语	dök	snī	tʃhet	sku	tʃi-kun

(1) 藏缅语的“一”恐怕有不同来历。藏文 gtəig < *g-tik。库基语支的朗龙语的词根 -kāt 及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Tangkul) 等的 khat(-ka) 皆为同源词。

(2) “二”，藏文 gn̥is < *g-ni-s，緬文 hnas⁴ < *s-nit-s。词根为 *nit。这个词根在不同支系中除了少数语言，通常都能保存。

① 马加里语“六”至“十”为印欧语借词。

(3) “三”，藏文 *gsum* < **g-sum*，缅文 *tθum*³ < **sum*。词根为 **sum*。诸语支仍通常能保存它的词根形式，前缀的变化较大，克伦语和那加语丢失了词根的辅音韵尾 **-m*。

(4) “四”，藏文 *bzi* < **b-li*，缅文 *le*³ < **li*。词根为 **li*。

(5) 藏文“五”*l̥a* < **l-ŋa*，缅文 *ŋa*³ < **ŋa*，词根为 **ŋa*。前缀多有不同。藏语支语言或保存 **l*-前缀。景颇语 *mă*³¹ *ŋa*³³ < **ma-ŋa*。**ma*-前缀还分布在库基—那加语支的一些语言中。克伦语支的一些语言中有 **-ma* 后缀的遗存，如克伦比乌语(Karenbyu)“五”*jä mā*，格库语(Gheko) *ŋai mā*。克伦比乌语“一”至“五”都用这个后缀，“六”“八”“十”中又当作前缀。**ma*-前缀当来自原始藏缅语。

(6) 藏文“六”*drug*，其他藏语支的语言如加戈德语(Kagate)、夏尔巴语(Sherpa) *tuk*、错那门巴语 *kro*⁵⁵。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如巴兴语(Bahing) *ruk-ba*、罗东语 *tuk-ka-ra*、吐龙语(Thulung) *ru-le*，词根为 **ruk*。藏文“六”*drug* < **g-ruk*。

缅文“六”*khro*⁴，怒苏怒语 *kh̥u*⁵³，< **kh̥u-ruk*，**kh̥u*-为古前缀。

景颇语 *k̥u*³⁵，独龙语 *k̥u*⁵⁵，< **k-ruk*。

梅梯语 *ta-rūk*，朗龙语 *rūk-ka*，卢舍依语(Lusei) *pa-ruk*，钦薄克语(Chinbok) *khurūk*，< **-ruk*。

(7) 藏文“七”*bdun*，拉达克语 *rdun*。喜马拉雅语支的巴兴语 *tʃhan-ni*。

缅文“七”*khu*¹ *hnas*⁴，马路语(Mruu) *ra-hnit*，< **s-nit(-s)*。

景颇语 *să*³¹ *nit*³¹，独龙语 *su*³¹ *nit*⁵⁵，< **s-nit*。

梅梯语 *ta-rēt*，卢舍依语 *pa-sa-ri*，< **s-rit*。

加洛语 *snī*，迪马沙语(Dimasa) *sinni*，< **s-ni*。原始藏缅语 **s-nit*。

(8) 藏文“八”*brgiad*，拉达克语 *rgiat*。喜马拉雅语支的吐龙语(Thulung) *jet-le*，词根简化，使用后缀 *-le*。

缅文“八”*hras*⁴，马路语(Mruu) *ri-jāt*。

景颇语 *mă*³¹ *tsat*⁵⁵，独龙语 *çat*⁵⁵ < **-krat*。

朗龙语 *pā-riet*，卢舍依语 *pa-riat*，< **-rat*。

博多语(Bodo) *zit*。

原始藏缅语 **b-g-rat*。藏语支语言 **g* 和 **-r* 换位，羌语支及其他藏语支以外的语言没有这种换位。喜马拉雅语支语言一般丢失这个 **g*，如古龙语(Gurong) *b're*。库基—钦语中前缀 **b*-保留元音，成为 *pa-*。

(9) 藏文“九”*dgu*，拉达克语 *rgu*。古藏语原本可能用 **b*-前缀，读作 **b-gru*。

吐龙语(Thulung) *ga-le*，与“八”一样有后缀 *-le*。

缅文“九”*ko*³，马鲁语 *gok*，< **gu-g*。马路语 *ta-kū*。克伦尼语 *lwi θo tö*，因他拉语 *lwi so tà*，显然是“八”加“一”的形式，古数词的遗存。

景颇语 *tjă*³¹ *khu*³¹，< **s-gu*。

库基—那加语支中如卡米语(Khami) *ta-kū*。那加语莫桑方言(Mosang) *ta-krū*，俄姆比奥方言(Empeo) *sū-gūi*。

加洛语 *sku*，迪马沙语 *sugū*，< **s-gu*。

原始藏缅语“九”**s-gru*。藏语支等语言中丢失**s-*,**g*和**-r*换位,**-r*成为**d-*。

(10) 藏文“十”*btəu*,拉达克语 *stfu*。

缅文 *shaj*², < **khla-r*。^①

景颇语 *ji*³³, 格曼佤语 *kiap*⁵⁵ *mu*⁵³。格曼佤语 *mu*⁵³ 是后缀,出现在数词“九”“十”之后。

朗龙语 *pā-fūom*, 米基尔语(Mikir) *kep*。

加洛语 *tʃhi-kun*。原始藏缅语 **klap*。

3. 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和原始藏缅语的构拟

(1) 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

原始藏缅语的构拟是对现代藏缅语语音、形态和词三方面差异的解释。

原始藏缅语塞音有唇、舌尖、舌根和小舌 4 个系列,清不送气、清送气及浊的对立;有唇、舌尖、舌根鼻音。原始藏缅语的辅音系统为:

p	ph	b	m				w
t	th	d	n	s	z	r	l
k	kh	g	ŋ	h	ɦ	j	
q	qh	ɠ					

塞音及 *s*、*z* 可与流音 *l* 和 *r* 构成复辅音声母。

有 *-m*、*-n*、*-ŋ*、*-p*、*-t*、*-k*、*-ʔ*、*-s*、*-l*、*-r*、*-g* 韵尾。

元音系统为: *a e i ə o u*。^②

前缀有 **s-*、**r-*、**b-*、**g-*、**d-* 和 **m-*, 后缀有 **-s*、**-m*、**-r* (**-l*)、**-t* 和 **-n*。^③

前面的比较中以数词为例,从诸语的语音对应、词根的同源关系和形态的历史三个方面说明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数词“五”词根辅音 *ŋ* 的对应关系可进一步说明如下:

	五	我	鱼
藏 文	<i>lŋa</i>	<i>ŋa</i>	<i>ŋa</i>
缅 文	<i>ŋa</i> ³	<i>ŋaa</i> ²	<i>ŋa</i> ³
景颇语	<i>mǎ</i> ³¹ <i>ŋa</i> ³³	<i>ŋai</i> ³³	<i>ŋa</i> ⁵⁵
独龙语	<i>pu</i> ³¹ <i>ŋa</i> ⁵³	<i>ŋa</i> ⁵³	<i>ŋu</i> ⁵⁵ <i>tɕi</i> ⁵⁵
加洛语	<i>bo-ŋā</i>	<i>āŋā</i>	—

① 缅语支其他语言仍保留着没有演变为塞擦音的读法,如:

	缅文转写	阿昌语	仙岛语	载瓦语
盐	<i>sha</i> ³	<i>tɕho</i> ³¹	<i>khjo</i> ³¹	<i>tsho</i> ⁵⁵
摘(~花)	<i>shot</i> ⁴	—	<i>phet</i> ⁵⁵	<i>pjo</i> ⁶⁵
臼	<i>shum</i> ²	<i>tɕham</i> ³¹	<i>thum</i> ³¹	<i>tshum</i> ⁵¹
踩(~脚)	<i>shəŋ</i> ¹	<i>thəŋ</i> ³⁵	<i>thəŋ</i> ³⁵	<i>thiŋ</i> ⁵⁵

这说明缅文转写为 *sh-* 应是 *tsh-*, 来自 **khl-* 或 **phl-*。

②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169—176 页。

③ 同上,第 176—183 页。

藏文“鱼” ηa 可能 $< * \eta j a$, 现代藏语诸方言都读做 η -。表中的其他语音对应关系不作一一说明。

(2) 藏缅语的人称代词

藏缅语的人称代词也可以用来说明不同语支语言的亲缘关系。

	我	我们	你
藏 文	ηa	$\eta a \text{ tsho}$	$khjod$
嘉 戎 语	ηa	$\eta \partial \eta \text{E}$	no
罗 东 语	$k\bar{a}-\eta a$	$ka-i$ (包括式)	$kha \text{ na}$
古 龙 语	ηa	$hneo-\eta a-\eta a$	ki
木 雅 语	$\eta \partial^{53}$	$\eta \partial^{33} n\partial^{53}$	$n\partial^{53}$
緬 文	ηaa^2	$\eta aa^2 to^1$	$ma \eta$
马 鲁 语	$\eta \grave{a}$	$\eta \grave{a}-no \eta$ (排除式)	ni
克伦尼语	$v\grave{a}$	$p\grave{a}$	$n\grave{a}$
莫桑方言	$\eta \bar{a}$	$ni-fi$	$mn\partial \eta$
景 颇 语	ηai^{33}	$an^{55} the^{33}$	$na \eta^{33}$
独 龙 语	ηa^{53}	$i \eta^{55}$	na^{53}
博嘎尔语	$\eta o:$	$\eta o: lu$	$no:$
朗 龙 语	$kai-m\bar{a}$	$kai-ni$	$na \eta$
博 多 语	$\bar{a} \eta$	$za \eta$	$na \eta$

古藏缅语“我”有 $* \eta a$ 和 $* a \eta$ 两种读法。 $* \eta a$ 来自古藏缅语北方方言, $* a \eta$ 来自南方方言。 $* a \eta$ 在古南方方言的今语言如博多—加洛语支和景颇语支的语言多有保留。克伦语支语言来自北方方言。这一语支中如:

	克伦尼语	因他拉语	叶乍因语(Zayein)
我	$v\grave{a}$	$kwa i$	$\eta \grave{a}$
五	$n\grave{a}$	ηai	ηai

古克伦语中“我”可能有古前缀 $* k-$, 读做 $* k-\eta a$ 。喜马拉雅语支中如巴兴语 $g\bar{o}$, 巴拉里语 $k\bar{a}-\eta \bar{a} < * ka-\eta a$ 。

古藏缅语“你”有 $* na$ 和 $* na \eta$ 两种读法, $* k-$ 和 $* m-$ 两种前缀。喜马拉雅语支中如罗东语 $kha \text{ na}$, 同马里语(Dungmali) $h\bar{a} \text{ na}$ 等, $< * ka-na$ 。緬语 $ma \eta$, 阿兹语(Atsi) $mj\grave{a} \eta$, 那加语莫桑方言 $mn\partial \eta$ 等, $< * m-na \eta$ 。 $* m-$ 前缀还出现在汉语和侗台语中。

原始藏缅语“我”为 $* \eta a$ ，“你”为 $* na$ ， $* -\eta$ 是古南方方言的后缀。

$* -r$ 是古藏缅语北方方言人称代词复数的后缀。如，拉达克语“我们” $\eta a-za$ (包括式)，“你们” $hjo-za$ 。喜马拉雅语支巴尼语(Patni)“我们” $\eta je-re$ ，“你们” $kje-re$ 。怒苏怒语“我们” $na^{33} du^{31}$ ，“你们” $\eta u^{33} du^{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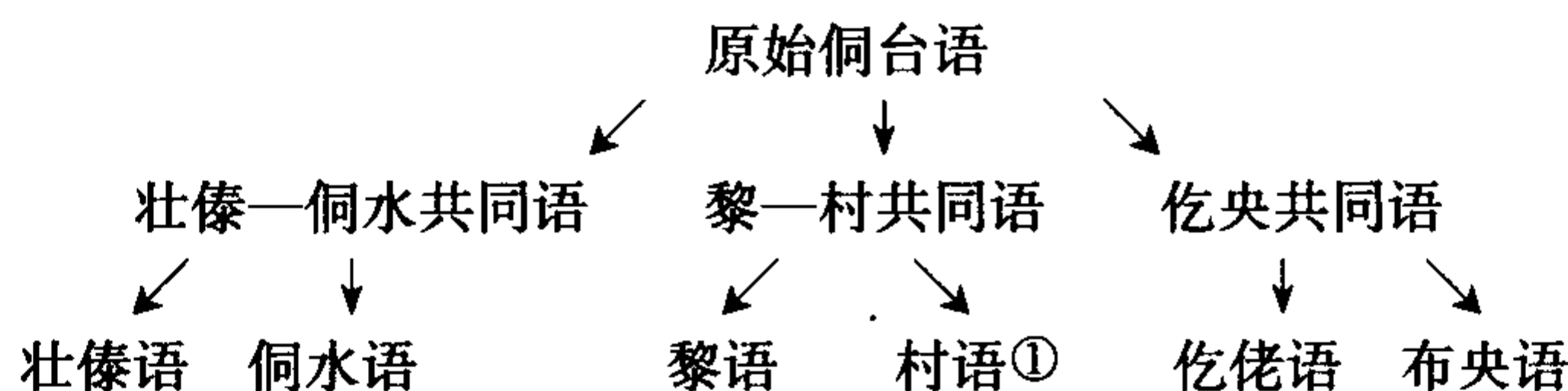
$* -r$ 也是古藏缅语南方方言人称代词复数的后缀。那加语的方言中还有索布窝马方言(Sopvoma)和夸依佬方言(Khoirao)有这样的情况:

	我	我们	你	你们
索布窝马方言	ji	i-kru	ni	ni-le-kru
夸依佬方言	i	i-rō	naŋ	na-rō

可见 *-r 应是原始藏缅语人称代词复数的后缀,古南方方言的后代语言中仍有保存。

五、侗台语的历史比较

侗台语或叫做壮侗语,其内部的发生学关系目前没有大的分歧意见。我们设想从原始侗台语到现代诸语的历史为:



问题的研究仍从诸语支内部的比较研究开始。

1. 文献材料

侗台语的文献中最重要的是泰文材料。泰文创于 13 世纪,后来有几次改动。现代泰文的拼写仍反映古泰语的读法,有辅音字母 42 个,元音字母和其他符号 32 个。泰文拼写所反映的古泰语辅音系统转写为:

p	ph	b	m	f	w
t	th	d	n	s	r
ts	tsh				
k	kh			h	j
ʔ					

声母包括: pl-、phl-、kl-、khl-、pr-、phr-、tr-、kr-、khr-、kw-和 khw-。

9 元音系统: a ɛ e i ə u ɔ o u。^②

泰文转写为 ts-的词,如: ^③

	泰文	版纳傣语	德宏傣语	老挝语	布依语
吻	tsu:p ⁹	tsup ⁹	tsup ⁷	tsu:p ⁹	ɕup ⁷
主(人)	tsau ³	tsau ³	tsau ³	tsau ⁴	su ³
牵	tsuŋ ²	tsuŋ ¹	tsuŋ ⁶	tsuŋ ²	ɕiŋ ¹
沉	tsom ²	tsum ²	tsam ²	tsom ^{1'}	ɕam ¹

① 从声调的对应情况看,村语与黎语通什话、保定话等更接近,与加茂话远。故把加茂话叫做加茂语,村语视为黎语的方言亦无不可。

② 李方桂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p. 4, p. 5。

③ 李方桂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p. 164;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第 412—415 页。

壮傣语支语言,泰语与版纳傣语、德宏傣语和老挝语等的比较说明,舌尖塞擦音的这一转写是可信的。而其原始壮傣语和原始侗台语的来历有赖于进一步的比较。

2. 亲属语的比较

壮傣语支的比较表明泰语的这一声类单数调通常与原始壮傣语的清辅音声母有关,双数调与原始壮傣语的浊辅音声母有关。但双数调中的第2调有的对应于同语支语言的单数调,应是泰语方面的问题,如:

	泰文	布依语	武鸣壮语	临高语
主(人)	tsau ³	su ³	ɕau ³	tsu ³
咂(嘴)	tsip ⁷	ɕap ⁷	—	tsap ⁷
沉	tsom ²	ɕam ¹	tsam ¹	—

而壮傣和侗水的比较表明这一声类的塞擦音是后起的:

	泰文	水语	侗语	莫语
主(人)	tsau ³	sau ³	ɕu ³	sau ³
蘸	tsim ³	ham ³	—	sam ³
吻	tsu:p ⁹	—	ɕap ⁷	ɕap ⁷
淡	tsu:t ⁹	—	hit ⁹	sit ⁹

壮傣语的 ts- 可能主要来自 *skr- 和 *kr-。如“沉”,莫语 sam¹,佯僐语 ram¹, < *sram。“拈”,龙州壮语 tsap⁷,水语 sap⁷,莫语 zap⁹,布央语 ka:p⁵⁵, < *skrap。“蘸”,泰语 tsim³ < *skram,可能是壮傣—侗水语中古前的汉语借词。

3. 原始侗台语的构拟

原始侗台语的构拟仍建立在侗台语不同支系的比较和逐个层次构拟的基础上。

(1) 原始侗台语的音系

在壮傣、黎和仡央等语支语言的比较和构拟的基础上,笔者曾构拟以下的辅音和元音的系统^①:

p	ph	b	m			
t	th	d	n	s	r	l
k	kh	g	ŋ			
q	qh	G	N			
ʔ						

流音 r 和 l 可构成塞音 p、t、k 系列和 s 系列的复辅音。

元音音系为: a e i ə o u。

(2) 侗台语的代词

侗台语的人称代词可以用来观察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如: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242—247页。

	我	我们	你	你们
泰 语	ku ²	tu ²	muŋ ²	su ¹
临高语	hau ²	hau ² lo ⁴	mə ²	mə ² lo ⁴
侗 语	ja:u ²	ɬiu ²	ŋa ²	ɕa:u ¹
水 语	ju ²	ndiu ¹	ŋa ²	sa:u ¹
黎语通什话	hou ¹	fau ¹	mew ¹	tau ¹
村 语	kə ²¹	ha ²¹	mə ²¹	ma ³⁵
仡佬语	ɣi ⁴²	tau ³⁵	mu ³¹	tsau ³⁵
布央语	ku ²⁴	ɕom ⁵⁵ θa ²⁴	ma ³³	ɕom ⁵⁵ ma ³³

“我”泰语 ku², 龙州壮语 kau¹ 等 < *ku; 黎语通什话 hou¹, 加茂话 kau¹, < *ku, 来自南岛语。侗语 ja:u², 水语 ju² < *nju。①

贞丰仡佬语 ɣi⁴² < *qi。布央语 ku²⁴ 应是布依语借词。

壮傣、侗水语的“我们”有同源关系。② 壮语邕宁话 phlou¹, 佯僂语 ljeu¹, 来自共同语的 *phlu 或 *plu。③

“你”, 泰语、壮语等的读法有同源关系, < 原始侗台语 *m-nə(-ŋ)。可与古藏缅语南方方言的“你” *m-naŋ 比较。侗水语的 ŋa² 与临高语的 mə² 等应有同源关系。如“手”, 泰语 mu², 仡佬语 nja²。

壮傣、侗水语的“你们”可拟为 *su, 来自南岛语。“你”, 原始邹—卑南语 *su, 原始南岛语 *su。

“你”, 黎语通什话 mew¹, 中沙话 mew¹, 加茂话 məi¹。“你们”, 黎语通什话 tau¹, 中沙话 mew¹ tau¹, 加茂话 tshau¹。

(3) 侗台语的数词

侗台语不同支系语言的十进位数词是汉语和南岛语的借词。既不能用来说明和汉语的渊源关系, 也不能用来说明与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试比较侗台语不同支系的数词:

	一	二	三	四	五
版纳傣语	deu ¹	soŋ ¹	sam ¹	si ⁵	ha ³
临高语	hə ³	von ³	tam ¹	ti ³	ŋa ³
侗 语	—	ja ¹	sa:m ¹	si ⁵	ŋo ⁴
水 语	ʔda:u ³	ɣa ¹	ha:m ¹	ɕi ⁵	ŋo ⁴
黎语通什话	ʔew ³	ɬau ³	tshu ³	tsho ³	pa ⁴
村 语	tsi ¹³	tθa ⁴²	fu ⁴²	hau ⁴²	bɔ ¹³
仡佬语	sɿ ⁴²	sa ³⁵	tau ³⁵	pu ³⁵	muɿ ³¹
布央语	pi ⁵³ (B2)	θa ²⁴ (A1)	tu ²⁴ (A1)	pa ²⁴ (A1)	ma ³³ (A2)

① 侗水语的 j-对应于老挝语的 n-。如, “祖母”, 水语 ja⁴, 老挝语 ɲa⁵。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第 396 页。

②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第 340 页。

③ 同上, 第 675 页, 侗台诸语“你们”等词项的元音对应。

	六	七	八	九	十
版纳傣语	hok ⁷	tset ⁷	pet ⁹	kāu ³	sip ⁷
临高语	sok ⁷	sit ⁷	bat ⁷	ku ³	təp ⁸
侗语	ljok ⁸	sət ⁷	pet ⁷	tu ³	ɛəp ⁸
水语	ljok ⁸	ɛət ⁷	pa:t ⁷	tu ³	ɛəp ⁸
黎语通什话	tom ⁴	tso ³	gou ⁴	fau ³	fu:t ⁷
村语	tsim ¹³	tθet ³³	ba:t ⁴²	koi ⁴²	sep ³³
仡佬语	naŋ ³¹	tsau ³⁵	zau ³¹	so ⁴²	sɿ ⁴² pe ⁴²
布央语	nam ²⁴ _(A1)	tu ³³ _(A2)	ma ⁰ ðu ³³ _(A2)	va ⁵⁵ _(B1)	put ⁵⁵ _(D1)

仡央诸语声调的对应关系在拙著《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已说明。^① 原始侗台语分为三支后各自成为有四个原始调的语言。这三支 A、D 调有某些对应,可能与声调的发生条件有关,B、C 调尚未发现有同源的对应关系。

版纳傣语、侗水语,黎语通什话、村语、仡佬语贞丰话和布央语峨村话等所代表的不同支系的数词有不同的来历。壮傣—侗水共同语的数词多借自汉语,黎—村共同语和仡央共同语的数词借自南岛语。黎语和仡央语的构拟也请参阅拙著《汉藏语同源研究》。^②

“一”,版纳傣语 deu¹,水语 ʔda:u³ < 壮傣—侗水共同语的 *k-da^B。黎语通什话 ʔeu³、保定话 tseu³、村语 tsi¹³ < 黎—村共同语的 *te^B。仡佬语 sɿ⁴² 和布央语 pi⁵³ 来历不同。^③ 临高语 hə³ < *to^B。

“二”,版纳傣语 sɔŋ¹ 借自汉语“双”。黎语通什话 ɬau³ < 黎—村共同语的 *la^B。仡佬语 sa³⁵、布央语 θa²⁴ < 仡央共同语 *s-la^A。

“三”,版纳傣语 sam¹、临高语 tam¹、侗语 sa:m¹ 和水语 ha:m¹ 借自汉语“三”。黎语通什话 tshu³、加茂话 ta:u¹ < 黎—村共同语 *to^A。仡佬语 tau³⁵、布央语 tu²⁴ < 仡央共同语 *tu^A。

“四”,版纳傣语 si⁵、临高语 ti³、侗语 si⁵ 和水语 ɕi⁵ 借自汉语“四”。

黎语通什话 tsho³、加茂话 tiəu¹、村语 hau⁴² < 黎—村共同语的 *ta^B。仡佬语 pu³⁵、布央语 pa²⁴ < 仡央共同语 *pa^A。

“五”,版纳傣语 ha³、临高语 ŋa³、侗语、水语 ŋo⁴ 借自汉语“五”。黎语通什话 pa⁴、村语 bo¹³ < 黎—村共同语 *ma^A。仡佬语 muɿ³¹、布央语 ma³³ < 仡央共同语 *ma^A。

汉语谐声时代的“五”有 *s-前缀。^④ 临高语“五”有 ŋa³、ŋo⁴ 和 ŋu⁴ 三种读法。声调和元音的不同都可以用来说明借入时间的不同。ŋa³ 说明原始壮傣语的“五”来自 *hŋa^B,借自汉语。如“大雁”,版纳傣语 han⁵ (nām⁴),侗语 ŋa:n⁶ (qo³),第一音节借自汉语“雁” *ŋan。

壮傣语“五”单双数调的不同分别是声母清浊的不同。临高的汉语借词 ŋa³ 和 ŋu⁴ 分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233 页。

②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有关章节。

③ 布央语 pi⁵³ < *biʔ,可能来自南亚语。参见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223 页。

④ 吴安其《汉藏语的数词》,《民族语文》2006 年第 2 期。

别对应于壮语的 ha³ 和 ŋu⁴, 原本是声母 *sq- 和 *ŋ- 的不同。

“六”, 版纳傣语 hok⁷、临高语 sok⁷、侗语 ljok⁸、水语 ljok⁸ 借自汉语“六”。黎语通什话 tom⁴、村语 tsim¹³ < 黎一村共同语 *nəm^A。仡佬语 n̄aŋ³¹、布央语 nam²⁴ < 仡央共同语 ?nəm^A。

汉语“六”的谐声字有“鼃”等。“鼃”,《广韵》七宿切,清母字,中古音 *tshjuk, 上古音 *skhruk。中古精清从母字与来母谐声的多分别来自上古的 *skr-、*skhr- 和 *sgr-。① “六”谐声时代读作 *skhruk 或 *khruk。

“七”, 版纳傣语 tset⁷、临高语 sit⁷、侗语 sət⁷、水语 ɕat⁷ 和村语 tθet³³ 借自汉语“七”。黎语通什话 tso³、加茂话 dau¹ < *C-du。仡佬语 tsau³⁵、布央语 tu³³ < 仡央共同语 du^A。

“八”, 版纳傣语 pet⁹、临高语 bat⁷、侗语 pet⁷、水语 pat⁷ 和村语 bat⁴² 借自汉语“八”。

黎语通什话 gou⁴、黑土话 ru¹、加茂话 ku¹, < 黎一村共同语 *gru^A。

仡佬语贞丰话 zau³¹、布央语峨村话 ma⁰ ɔ̄u³³, 巴哈话 mu³¹, < *m-lu^A。拉基语 bɔ²³, 仡佬语安顺话 vla⁴⁴ < *valu。

“九”, 版纳傣语 kǎu³、临高语 ku³、侗语、水语 tu³ 和村语 kɔi⁴² 借自汉语“九”。黎语通什话 fau³ < 黎一村共同语 *pu^B。

仡佬语贞丰话 so⁴², 布央语峨村话 va⁵⁵, 郎架话 va¹¹, 木佬语 so²⁴ < 仡央共同语 *s-va[?]。

峨村话 v-可出现在清调类和浊调类, 55 是舒声清调类。与仡佬语声调的对应关系, 如峨村话“灶”θou⁵⁵, 贞丰话 sau⁴²。“耙子”峨村话 ɔ̄a:u⁵⁵, 贞丰话 tso⁴²。② 元音的对应, 如峨村话“马”ŋa³², 贞丰话 n̄o³⁵。可见布央 v-读作清调类原本前头有 s-。

“十”, 版纳傣语 sip⁷、临高语 tɔp⁸、侗语、水语 ɕɔp⁸ 和村语 sep³³ 借自汉语“十”。

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fut⁷, 黑土话 phut⁷, < 黎一村共同语 *put。

布央语峨村话 put⁵⁵, 巴哈话 vat⁵⁵, 木佬语 ve⁵³, 仡佬语贞丰话 pe⁴², < 仡央共同语 *plut。仡央语这个词读法的同源对应关系可与“瓜”的读法比较。如, 峨村话 pak⁵⁵ (冬瓜), 巴哈话 vak⁵⁵, 木佬语 va⁵³。

现根据以上的构拟, 将黎、仡央的数词与南岛语的比较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古黎语	te(-?)	p-la(-?)	to	ta(-?)	ma
古仡央语	si	s-la	tu	pa	ma
马来—他加洛语	isa	ɖuwa	telu	sapat	lima
原始南岛语	tasa	ɖusa	telu	sepat	lima
	六	七	八	九	十
古黎语	nəm	C-du	gru	pu(-?)	put

① 吴安其《精母的谐声和拟音》,《民族语文》2005 年第 1 期。

②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233 页。

古佤央语	ʔnəm	du	valu	s-vaʔ	plut
马来—他加洛语	ənam	pitu	va u	sipat-lima	sə-puluh
原始南岛语	ənam	pitu	va u	—	—

“一”，亚齐语 sa，他加洛语、摩尔波格语 isa，原始马来—他加洛语 *isa。

“二”，印尼语 dua，马都拉语 duwaʔ，亚齐语 duwa，他加洛语 dalawa，巴拉望语 duwa，原始马来—他加洛语 *duwa。

他加洛语“九”sijam，印尼语 səmbilam，似为“四”*sipat 和“五”*lima 的约音。

我们未能在南岛语中发现与黎语 *put 有直接联系的读法。黎语 *put 可与佤央语的 *plut 联系起来，也来自南岛语。如，印尼语 sə-puluh < *sə-puluq，十进位系统在南岛语中也是后来才有的。南岛语不同支系的“十”有数种没有词源关系的读法。

上表的比较表明黎语和佤央语的“二”以后的数词借自南岛语的古马来—他加洛语。

4. 侗台语与南岛语的接触关系

侗台语与南岛语的接触关系可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侗台共同语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侗台分化以后的不同支系的诸共同语时期。根据古代文化的分布和迁移情况来看，侗台语与南岛语接触的第一个阶段在商周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第二个阶段在周以后的长江以南的不同地区。侗台语中的南岛语词大多是南岛人转用侗台语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

(1) 侗台共同语时期的底层词

除了上文提到的侗台语的“我”“你们”外，其他的如：

“月亮”侗台共同语 *C-blən，布拉斯特(Robert Blust)拟原始南岛语为 *bulan/qinaf，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bulan。^① 侗台语这个词的读法与台湾的一些南岛语及马来语支的语言和占语支的语言有较相近的读法，如印尼语、爪哇语、萨萨克语 bulan，亚齐语 buluən，雷德语 mlan、加莱语 blan。

“水”侗台共同语 *r-nam，原始南岛语“水”*danum。

“火”侗台语“火”有两个不同的来历。侗语南部方言 pui¹，水语 vi¹，拉珈语 pui¹，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fei¹，黑土话 pei¹，普标语 pei^{A1}，布央语郎架话 pui⁵⁴ < 侗台共同语 *pui，来自南岛语，原始南岛语“火”*sapuj。

壮傣语支的，如泰语、老挝语、版纳傣语、壮语武鸣话等 fai²，临高语 vɛi² 等 < 原始台语 *bei^A < *ber，与藏缅语“烧”*C-bar 有同源关系。

“路”侗台共同语 *k-lun，壮语邕宁话 hlon¹，临高语 sun¹，侗语南部方言 khwən¹，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kun¹，布央语峨村话 hun²⁴，佤佬语六枝话 qə³³ʔlan³¹，拉基语 khin³⁵。

原始南岛语“路”笔者拟为 *da|a-n，布拉斯特拟原始南岛语、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zalan。占语支的加莱语 dʒəlan，雷德语 elan。台湾的阿眉斯语 lalan，鲁凯语 ka-dalan-

① Robert Blust,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nglis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Taipei, 1999. p. 86.

anə。① 侗台语 *k-lun 当来自南岛语的 *ka-dalan。

“肚子”侗台共同语 *C-lun, 壮语龙州话 toŋ⁴, 泰语 thoŋ⁴, 侗语南部方言、水语 loŋ², 仡佬语贞丰话 ka⁴²luŋ³⁵, 布央语朗架话 qa⁰luŋ⁵⁴。

“肚”“胃”, 加莱语、占语书面语 tuŋ, 原始占语 *tuŋ。印尼语 dzantun(心), 他加洛语支的沙玛语 botton(胃)、巴拉望语 totōŋ(胃), 台湾的鲁凯语 baran。

古侗台语可能利用古南岛语方言“肚子”*-lun 这样的末音节形式加前缀构词。仡央语 *qa- 前缀使词根声母-l- 清化, 仡佬语、布央语中读作清声母调。

“角”, 侗台共同语 *v-qu, 泰语 khau¹, 临高语 vau², 水语 qa:u¹, 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hau¹, 仡佬语安顺话 qau³³。

侗台诸语“角”“腿”两词声母差别较大, 但又分别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诸语两词的韵又与另两类词的韵分别有对应关系。② 显然诸语这两个词分别有同源关系。

“角”, 台湾的邵语 waqa、阿眉斯语 waʔa、布农语 vaχa < *vaqa。③

水语 q- 对应于壮傣语 k- 或 kh-。“角”侗语南部方言、佯僂语 pa:u¹, 毛南语 ŋa:u¹。可能是 *vaqu 曾读作 *paqu 和 *ŋaqu。

“腿”, 侗台共同语 *p-qa, 泰语 kha¹, 临高语 va², 侗语南部方言 pa¹, 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ha¹, 仡佬语安顺话 qau³³。

“腿”印尼语 paha、巴拉望语 paʔa、亚齐语 pha, ④原始马来—他加洛语 *paqa; 赛德克语 qaqaj、泰雅语 kakaj, 原始泰雅语 *qaqal。

“黑”, 侗台共同语 *q-dam。如, 壮语龙州话 dam¹、临高语 lam¹, 侗语、仡佬语 nam¹, 佯僂语 ʔnam¹, 黎语通什话 dam³, 布央语峨村话 ʔdam²⁴、木佬语 n-aŋ⁵³。版纳傣语有 dam¹ 和 kam¹ 两种读法。布拉斯特拟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ma-qitem。

“这”, 侗台共同语 *C-nar、*C-ni(-ʔ)。壮语龙州话、武鸣话 nai³, 侗语南部方言、佯僂语 nai⁶, 黎语保定话 nei²、白沙话 nen³, 仡佬语贞丰话 nai⁴²。泰语 ni³, 拉珈语 ni², 黎语通什话 ni⁵, 布央语峨村话 ni³³。

侗台语“这”两类不同的读法有两个不同来历。⑤ 侗台共同语的 *C-nar 与苗瑶语“这”*C-nar 同源, 来自古汉语南方方言。*C-ni(-ʔ) 来自南岛语。布拉斯特拟原始南岛语、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这”*i-ni。如台湾的赛德克语 hini < *qini, 阿眉斯语 kuni, 萨斯特语 hiniʔ。

(2) 不同共同语时期的底层词或借词

① 鲁凯语雾台方言前缀和后缀 ka...-anə 用于名词的构词, 意为“真正的”。参见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Part I Fascicle I, p. 301.

②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732—735、518—521 页。

③ 邵语、卑南语、布农语、阿眉斯语和排湾语可归为卑南—布农语支, 邵语 w- 对应于卑南 w- 和布农 v-。如“左”(边)邵语 tanawiʔi, 卑南语 tarawiri, 布农语 aviʔi, 阿眉斯语 kawili, 排湾语 aviʔi, 鲁凯语 viri。邵语 q-、阿眉斯语 ʔ- 和布农语 χ- 有对应关系。

④ 占语支语言送气塞音是前一音节塞音和后一音节-h 的结合。pha < *paha。

⑤ 如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730—732 页表中“扇子”“哥哥”“汗垢”“好”等词也有 ai 和 i 的对应。

侗台语不同支系保存着较晚时才有的南岛语词,是侗台共同语分化之后与南岛语的不同支系接触时吸收的南岛语底层词或借词,其分布有局限性。如:

“鼻子”,壮傣—侗水共同语 *q-daŋ,壮语龙州话 daŋ¹、临高语 loŋ¹,侗语、仂佬语 aŋ¹,佯僂语 ʔnaŋ¹。

“鼻子”,亚齐语 idoŋ,雷德语 adūŋ,加莱语 aduŋ。他加洛语支语言,他加洛语 iloŋ,巴拉望语 ɔruŋ。马来语支语言,印尼语 hiduŋ、巽他语 iruŋ、贡诺语(Konjo) kaʔmuruŋ。^① 原始马来—他加洛语 *hiduŋ,为壮傣—侗水共同语提供的可能是 *idaŋ。

“晚上”,壮傣—侗水共同语 *k-mlamʔ,壮语龙州话 taŋ² kam⁶,版纳傣语 kaŋ¹ xam⁶,临高语 da³ kɔm⁴,侗语南部方言 ka:u² ɲam⁵、水语 ʔmak⁷ ʔɲam⁵。壮傣语和侗水语这个词有同源关系。壮语靖西话 ʔan² jam⁶,德保话 ʔan¹ jam⁶ 的 j-<*ɲ-。*k-是共同语的前缀,词根 *ɲjamʔ<壮傣—侗水语共同语 *mlamʔ。如“蚊子”,龙州话 juŋ²,靖西话 ɲoŋ²,侗语北部方言 ɲoŋ⁴,侗语南部方言 mjuŋ⁴,壮傣—侗台共同语 *mluŋ。

“晚上”,原始占语 *malam。如占语支的亚齐语、马来语支的米南卡保语、印尼语 malam。一些语言中前缀 k-代替了 ma-。如马来语支的萨萨克语(Sasak) kələm,他加洛语支的卡格因仁语(kagayanen) kiləm。侗台语中来自南岛语的“微笑”可比较,如龙州话 jəm⁵,侗语南部方言 ɲem³,佯僂语 ʔɲem³。“微笑”马来语支的爪哇语 mēsəm,马都拉语(Madurese) misəm,巴拉望语 sələm 等。

马来—他加洛语族“晚上” *malam 这个词又不同于其他南岛语族的语言。布拉斯特拟原始南岛语和马来—玻利尼西亚语为 *beŋi(夜),如邹语 feŋəna,泰雅语 həŋan,鲁凯语 nmauŋ,所罗门群岛的罗维阿那语(Roriana) boŋi,斐济语 boŋi,马绍尔语 pwəŋ 等。

“舌头”,侗水共同语 *C-ma,侗语、仂佬语、水语、佯僂语 ma²、拉珈语 ŋwa²。

布央语郎架话“舌头” ma⁰ len¹¹ (<*malin^C) 应与黎语通什话 ɬi:n³、壮语 lin⁴ 等有同源关系。

布拉斯特拟原始南岛语“舌头” *ʃema,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hema(及 *dilaq)。台湾的南岛语如排湾语 səma、卑南语 səmaʔ、邵语 ɔama。^②

“叶子”,原始台语 *q-baw,古黎语 *q-bew,^③壮语龙州话 bau¹,武鸣话 bau¹,临高语 bɔ²,黎通什话、保定话 bew¹,加茂话 pi¹,村语 bou³⁵。

泰雅语赛考利克方言 ʔabaw,泽敖利方言 ʔaβaŋ<*qabaw。^④ 泰雅—赛德克语应是现存的南岛语中最早进入台湾的支系。大陆的侗台语保存了它们留下的一些词。卑南语 biraʔ,邵语 fiɬaq<*biɬaq,是南岛语的另一种形式。

① 西方学者将这些语言归为马来—玻利尼西亚语族,太平洋西支。印尼语、占语等归入巽他语支。笔者把马来、占和他加洛语支语言归入马来—他加洛语族。

② 邵语 ɔ<*l-。如“鳝鱼”,邵语 tuɔa,卑南语 tula。“孩子”,邵语 aɔaɔak,卑南语 walak。

③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把“叶子”原始侗台语的形式拟为 *k-bar。看来台语和黎语方言-w 除了 *-r 还有 *-w 的来历。

④ 赛考利克方言-w 对应于泽敖利方言-ɣ,赛德克语-x 或-w。如“脏”赛考利克 məʔuraw,泽敖利 ma-ʔuraŋ,赛德克语 suturax。“雷”,赛考利克 bisuw,泽敖利 Bitjuŋ,赛德克语 buluwa。赛考利克-w< *-g 或 *-w。

“叶子”，侗语 pa⁵，仡佬语 fa⁵，水语 wa⁵，毛南语 va⁵ < *C-baʔ。显然与壮傣语、黎语的不同。毛南语 v- 分布于单数调和双数调，单数调的与侗语 p- 对应。其他如“肿”，毛南语 vək⁷ 又读 ʔwok⁷，对应于壮语 fok⁸。

“名字”，侗水共同语 *k-dan，侗语南部方言 kwa:n¹，北部方言 tan¹，仡佬语 ʔɣən¹，水语、毛南语、佯僂语 da:n¹，拉珈语 ja:n¹。侗水语“聋”这个词可比较，水语、佯僂语 dak⁷，拉珈语 jak⁷，临高语 mak⁸，黎语通什话 ɬo:ʔ⁷，侗水语 *k-dək。

“名字”，布拉斯特拟原始南岛语、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ŋadʒan 不合适，dʒ- 在南岛语中是后起的。台湾的南岛语及马来—他加洛语中的读法与侗水语中的有直接关系。排湾语 ŋadan，阿眉斯语 ŋaŋan，他加洛语支的摩尔波格语 (Molbog) ŋadan，马来语支的巴厘语 adan，萨萨克语 aran，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宁德娄语 (Nyindrou) ŋara-n。*-n 是原始南岛语名词的后缀，现代南岛语中仍在活动。^① 古南岛语 *ŋadan 这样的读法到了古侗水语中用自己的前缀 *k- 代替了它们的首音节 *ŋa- 读作 *k-dan。

“聋”，排湾语 ma-tsulək < *ma-tuluk，^② 巴拉望语 lɔpak < *paluk，萨萨克语 kədok。临高语中残存着南岛语的形容词前缀 *m-。南岛语为黎语等提供了 *tuluk 这样的形式，在古黎语中改造为 *k-lok。古南岛语如果是 4 元音系统的语言，如同现代的邹—鲁凯语支的语言和他加洛语支的一些语言那样，u 和 o 不对立。

“红色”，侗水共同语 *k-deŋ，壮语龙州话 deŋ¹，版纳傣语 deŋ¹，临高语 liŋ¹，标语 lyŋ⁵。

黎语支语言“红色”有数种说法。通什话 geŋ¹ < *greŋ，保定话 ga:n³ < *gran-ɣ。韵尾的对应关系与古形容词、数词后缀 *-g 有关。^③

南岛语的形容词保存着前缀 *m- 的形式。“红色”如布农语 madaŋ ɣas，卑南语 midaraŋ。“黄色”布农语 madiav，卑南语 ma|u|uʔ。

“红色”，印尼语 merah，锡加语 (Sikka) ^④mera-ŋ，巴拉望语 mərəŋaŋ。锡加语中 -ŋ 后缀出现在颜色词中。如“黑色”mita-ŋ，“绿色”daʔa-ŋ。巴拉望语这个词中的 -g < 原始马来—他加洛语 *-ɣ < 原始南岛语 *-g。这三种语言的不同讲法与布农语、卑南语的讲法有着同源的词根。古南岛语的形式有 *m-idaŋ 和 *m-ida-ŋ。

壮傣—侗水语的“红色”，*k-deŋ 当来自南岛语。

“七”，古黎语 *tu，仡央语 *C-du。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thou¹，黑土话 thu¹，加茂话 dau¹。布央语峨村 tu³³，巴哈话 ru³³，仡佬语贞丰话 tsau³⁵。

卑南语、布农语 pitu，鲁凯语 ʔitu < *pitu。摩尔波格语 turuʔ，印尼语 tudʒuh。爪哇语、戈龙塔洛语、锡加语 pitu，马达加斯加语 fitu。

印尼语 tudʒuh < *tuduh，^⑤ 不同于爪哇语和卑南语等的 pitu。爪哇语等的读法是先

① 如印度尼西亚语“唱”minum/“饮料”minum-an，“关闭”tutup/“监牢”tutup-an，“抛锚”labuh/“码头”labub-an。

② 原始南岛语 *t 成为台湾的邹—鲁凯语支的 ts-，而在马来—他加洛语中一般与 *t 合并，有的词中成为 k-。这一点笔者与布拉斯特等学者的看法不同。

③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213—215 页，“古黎语的形容词和数词后缀”部分的讨论。

④ 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中部和小巽他群岛，与马来语支语言相近。

⑤ 如“雨”印尼语 hudʒan，爪哇语、巴塔克语 (Batak) udan。

到达该地的南岛语带去的, tud3uh 这样的读法是后来才有的。

“九”, 原始侏央语 *s-vaʔ, 布央语峨村话 va⁵⁵, 郎架话 va¹¹, 木佬语 so²⁴, 仡佬语贞丰话 so⁴², 安顺话 səu⁴²。

“九”, 排湾语 siva, 布农语 siwa < *siva。其他如, 马达加斯加语 sivi, 巴塔克语 sia < *siwah。^①马来—他加洛语中如印尼语“九”səmbilan 是晚起的。古南岛语大陆方言为侏央语提供的是 *sivaq。

与侗台语的这些词有对应关系的南岛语, 主要有台湾的邹—鲁凯语, 卑南—布农语和马来—他加洛语, 它们现在分布在与今侗台语似乎是不相关的地区。可以设想它们的几种祖方言原来与侗台语分布在同一区域。今浙江南部和闽地汉代之前是瓯越和闽越。而更早以前, 在距今五千多年和三千年的这段时间里, 粤、闽、台地区一直保持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统, 那就是古南岛文化。历史语言学比较得出的结论和考古研究的结论是相同的。

另外, 我们也注意到马来—他加洛语中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南岛语而与侗台语很接近的词, 应来自侗台语。

六、苗瑶语的历史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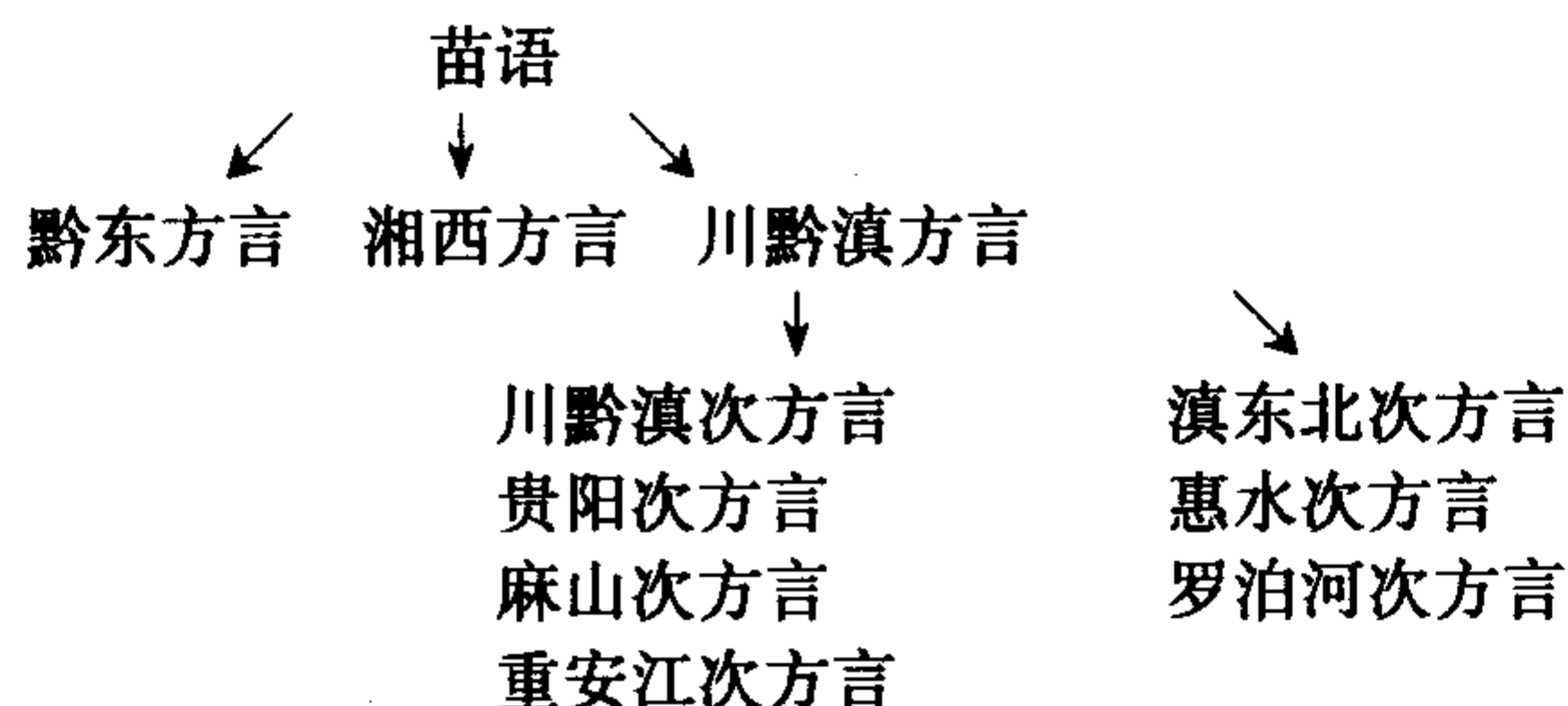
我们尚未发现有关苗瑶语族的语言的历史文献。苗瑶语的分类是依据 20 世纪的语言调查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作出的。研究苗瑶语的著名学者有张琨、王辅世、唐纳 (Gordon B. Downer) 等。王辅世的《苗语古音构拟》, 王辅世、毛宗武的《苗瑶语古音构拟》^②是综合数十年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后的苗瑶语研究都很注意他们的结论。

1. 苗瑶语族语言的关系

根据王辅世、毛宗武等学者的研究, 苗瑶语族的语言划分为苗、瑶和畲三个语支。苗语支有苗、布努、巴哼和炯奈四种语言, 其中苗语的情况最为复杂。

(1) 苗语方言的划分

苗语诸方言土语的发生学关系为: ^③



①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Part 4, p. 41.

②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 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东京, 1994 年。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③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2 页。

川黔滇方言和湘西方言土语的音系中有鼻冠塞音声母。黔东方言的清塞音声母与湘西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的鼻冠清塞音对应。王辅世先生为古苗语构拟了一套鼻冠塞音声母,根据诸方言包括声调在内的语音系统的对应情况指出川黔滇方言的鼻冠清塞音来自古苗语的鼻冠清塞音。如“猪”“梦”“披”等词古苗语声母拟为 *mp-, 苗语诸方言点的读法为^①:

	猪	梦	披(衣服)
养 蒿	pa ⁵	pu ⁵	pa ⁵
腊乙坪	mpa ⁵	mpei ⁵	—
大南山	mpua ⁵	mpou ⁵	mpua ⁵
石门坎	mpa ⁵	mpu ⁵	mpa ⁵
摆 托	mpo ⁵	—	mpo ⁵
甲 定	mpa ⁵	mpo ⁵	mpu ⁵
绞 坨	mpa ⁵	mpo ⁵	mpa ⁵
野鸡坡	mʔpei ^C	mʔpu ^C	—
枫 香	mpa ⁵	mpou ⁵	mpa ⁵

养蒿话属黔东方言,腊乙坪话属湘西方言,大南山话属川黔滇方言黔滇次方言,石门坎话属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摆托话属川黔滇方言贵阳次方言,甲定话属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绞坨话属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野鸡坡话属川黔滇方言罗泊河次方言,枫香话属川黔滇方言重安江次方言。

如“稻子”“叶子”“光滑”等词古苗语声母拟为 *mbl-, 苗语诸方言点的读法为^②:

	稻子	叶子	光滑	糯(米)	舌头
养 蒿	na ²	nə ²	—	nə ⁸	ɲi ⁸
腊乙坪	nu ²	nu ²	mjen ⁶	nu ⁸	mja ⁸
大南山	mple ²	mplon ²	mpla ⁶	mplou ⁸	mplai ⁸
石门坎	ndlfɿ ²	ndlfau ²	ndlfie ⁶	ndlfau ⁸	ndlfai ⁸
摆 托	mpla ²	mplen ²	mplen ⁶	mplou ⁸	mplai ⁸
甲 定	mplæ ²	mplon ²	mplɛ ⁶	mplə ⁸	mple ⁸
绞 坨	mplæ ²	mplaŋ ²	mplɛin ⁶	mplu ⁸	mple ⁸
野鸡坡	—	mplon ^A	mplen ^C	mplo ^D	mple ^D
枫 香	—	mplon ²	mplen ⁶	mplou ⁸	mple ⁸

(2) 苗瑶语的比较

试比较古苗语和古苗瑶语声母拟为 *mp- 的“猪”“梦”等词其他苗瑶语的读法:

①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 9 页。

② 同上,第 17 页。

	苗语古音 ^①	巴哼语文界话	畲语	勉语江底话
猪	*mpa ^C	mpe ⁵	—	—
梦	*mpoi ^C	mpr ⁵	pui ⁵	bei ⁵

从苗语支诸语的对应看,苗语支共同语这一声类为*mp-;从勉语诸方言的对应看,“梦”的勉语古声母当为*ʔb-。苗瑶共同语为C调。

试比较古苗语和古苗瑶语声母拟为*mbɭ-的“稻子”“叶子”“光滑”等词在其他苗瑶语的读法,原始苗瑶语这些词中的*ɭ-在苗语以外的语言中多演变为*-j-,如^②:

	苗语古音	巴哼语文界话	畲语	勉语江底话
稻子	*mblæ ^A	mpfjo ²	pja ²	bja ²
叶子	*mbluŋ ^A	mpfjo ²	pjoŋ ²	nəm ²
光滑	*mblin ^C	mpfi ⁶	—	—
舌头	*mblei ^D	mpfi ⁸	pi ⁸	bjet ⁸

古苗语拟为*t-的“地”“答”“深”“虱子”等词和其他苗瑶语的读法为^③:

	苗语古音	巴哼语文界话	畲语	勉语江底话
地	*tæ ^A	to ¹	ta ¹	dau ¹
答	*tæ ^A	nto ¹	—	tau ¹
深	*to ^A	to ¹	tɻ ¹	du ¹
虱子	*ton ^B	—	taŋ ³	tam ³

古苗语拟为*nt-的“长”“烤”“戴”“肚脐”等词和其他苗瑶语的读法为^④:

	苗语古音	巴哼语文界话	畲语	勉语江底话
长	*ntæ ^B	to ³	ta ³	da:u ³
烤	*ntæ ^C	nto ⁵	ta ⁵	dza:u ⁵
戴(帽子)	*ntuŋ ^C	nɔ ⁵	toŋ ⁵	doŋ ⁵
肚脐	*nteu ^D	—	tɔk ⁷	nut ⁷

“肚脐”,如勉方言的罗香话 dut⁷,金门方言的览金话 dut⁷, <*ʔd-。

无疑“地”“答”“深”“虱子”等词和“长”“烤”“戴”“肚脐”等词在苗瑶共同语时代有两类不同的声母。有的词交叉对应,如文界话的“答”为 nto¹当来自*nt-,勉语江底话的“地”和“深”来自*ʔd-。

2. 苗瑶语共同语与原始苗瑶语

(1) 苗瑶语语音比较

①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79、72页。

② 同上,第126页。

③ 同上,第162页。

④ 同上,第178页。

王辅世先生依据现代苗语诸方言构拟了古苗语的声母系统^①：

p	ph	b	ʔm	m̥	m	mp	mph	mb	ʔv	f	v
pts	phtsh	bdz		m̥n̥	mn	mpts	mphts	mbdz		fs	vz
ptɕ	phtɕh	bdz̥		m̥ɕ	mz̥	mptɕ		mbdz̥	ʔvz̥	fɕ	vz̥
pl	phl	bl			ml	mpl	mphl	mb̥l			
pl̥		bl̥									
ts	tsh	dz			nts	ntsh	ndz			s	
t	th	d	ʔn	n̥	n	nt	nth	nd	ʔl	l̥	l
t̥	t̥h	d̥	ʔn̥	n̥̥	n̥	n̥t̥	n̥t̥h	n̥d̥			
t̥l̥		d̥l̥				n̥d̥l̥		n̥d̥l̥	ʔl̥	l̥̥	l̥
tɕ	tɕh	dz̥				n̥tɕ	n̥tɕh	n̥dz̥		ɕ	
tɕ̥	tɕ̥h	dz̥̥	ʔn̥̥	n̥̥̥	n̥̥	n̥̥tɕ̥	n̥̥tɕ̥h	n̥̥dz̥̥	ʔn̥̥̥	ɕ̥	ɕ̥̥
c	ch	ɟ				n̥c	n̥ch	n̥ɟ			
k	kh	g	ʔŋ		ŋ	n̥k	n̥kh	n̥g		x	
q	qh	ɣ				Nq	Nqh	NG			
ql		ɣl̥									
qlw		ɣlw						Nɣlw			
qwɟ	qhɟ	Gɟ									
ʔ										h	

古苗语的塞音是：*p-、*ph-、*b-、*mp-、*mph-和*mb-六分（以唇塞音代表各种塞音）。

前面讨论到的苗语的*m̥p-与勉语ʔb-，苗语的*nt-与勉语ʔd-的对应依照《苗瑶语古音构拟》应解释为：勉语ʔb- < *m̥p-，ʔd- < *nt-。那么勉语共同语和苗瑶共同语的塞音与古苗语一样，也是六分的。

苗瑶语的这一类鼻冠塞音使我们感到疑惑。试比较：

	苗语古音	文界话	畲语	勉语江底话
鸽子	*Nqou ^A	Nqo ¹	—	kop ⁷
茅草	*Nqen ^A	ŋe ¹	kan ¹	gan ¹
价钱	*Nqa ^C	Nqa ⁵	—	tɕa ⁵ (tsin ²)

江底话“鸽子”kop⁷是汉语借词。苗瑶语“茅草”应是汉语“菅”的同源词，而苗语的“价钱”*Nqa^C应是“价”中古前后的汉语借词。在苗语诸方言和苗语支的语言中，这两个词的声母有对应关系。“价”在汉语中是没有鼻冠音的，苗语支语言带鼻冠音。很可能原始苗瑶语原本没有这一类鼻冠音，到了苗瑶共同语才产生。原始苗瑶语的塞音是清、清送气和浊三分的。苗语支语言中“价”不但带鼻冠音，而且是小舌音。“价”中古是二等

①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6页。

字,上古汉语中有*-r-介音,这个词借到苗瑶语后的变化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2) 苗瑶语的代词

苗瑶语的人称代词同样可以用来观察苗瑶语的历史情况。如:

	苗语古音 ^①	文界话	畲语	勉语江底话
我	*con ^B	vɬɔ ⁴	vaŋ ⁴	je ¹
我们	*ptsæ ^A	pu ¹	pa ¹	bwo ¹
你	mon ² (养蒿)	mɬu ²	muŋ ²	mwei ²
你们	*mi ^A	mɬu ⁶	mi ²	mwei ² bwo ¹

“我”,勉语的读法来历不同。勉语江底话 je¹ < *ʔno^A。

“我们”,诸语支的读法有同源对应关系。^② 勉语的 ʔb < *mp-, 来自原始苗瑶语的 *pr-或 *pl-, 而不是 *pts-。

“你”,原始苗瑶语 *me(-ŋ)。苗瑶语的第二人称可能来自南亚语,如徕语(巴琉语)“你”mi³³,“你们”mai³³。人称代词的 *-ŋ 后缀来自古汉藏语南方方言。

(3) 苗瑶语的数词

苗瑶语的数词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苗瑶语的历史。试比较:

	苗语古音	文界话	畲语	勉语江底话
一	*ʔe ^A	jɬu ³	i ⁶	jet ⁸
二	*ʔau ^A	va ¹	u ¹	i ¹
三	*ptsæ ^A	py ¹	pa ¹	pwo ¹
四	*ploi ^A	pi ¹	pi ⁶	pjei ¹
五	*ptɕæ ^A	pja ¹	pi ¹	pja ¹
六	*tɬə ^C	tɕu ⁵	kɔ ⁵	tɕu ⁷
七	*dzɔŋ ^C	tɕɬa ⁶	tshuŋ ⁴	sje ⁶
八	*za ^D	jɬi ⁸	zi ⁶	ɕet ⁸
九	*dzɔu ^A	kɬo ²	khiu ²	dwo ²
十	*jə ^D	kɬu ⁸	khjɔ ⁶	tsjop ⁸

勉语“一”jet⁸是汉语借词。

“二”,苗瑶诸语有同源关系,《苗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ʔiu^A。

“三”的声母苗瑶诸语中与“我们”“满”等词有对应关系,^③或可拟为 *pre^A,可能来自南亚语。如莽语“三”pai⁵⁵,徕语 pe⁵⁵。

“四”,如苗语高坡话 plo¹,勉语东山话 pləi¹,古苗瑶语可拟为 *plei^A。

“五”,苗语高坡话 pla¹,勉语东山话 pla¹,古苗瑶语可拟为 *pla^A。

① 除了“你”,其余是《苗语古音构拟》中的构拟。

②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113 页。

③ 同上,第 113 页。

“六”，苗语高坡话 to³，勉语东山话 klo⁷，古苗瑶语可拟为 *klok^D。

“七”，苗语养蒿话 eoŋ⁶，来自 *gruŋ^C。勉语的，如大坪江 sje⁶，东山 ni⁶ 等。^① 东山 ni⁶，三江 ŋi⁶，<原始勉语 *ŋi^C<原始苗瑶语 *g-ni。苗语等中的-ŋ 是增生的。

“八”，古苗语 *za^D<*glat。如苗瑶语同一声类的“舔”，炯奈语长垌话 ŋklai⁸。

“九”，古苗语 *dzou^A<*gru^A。如文界话 kfo²，畲语 khiu²。

“十”，古苗语 *jə^D<*grəp^A。如文界话 kfu⁸，畲语 khjo⁶。

苗瑶语的数词大体上有 *p- 和 *g- 两类，可能与古前缀有关。尤其是后一类与藏缅语关系密切。

3. 苗瑶语与南亚语的历史关系

两千年前苗瑶的先民称为“武陵蛮”“五溪蛮”。东汉时古苗瑶人居于湖南的沅水中游与酉水下游一带。新石器时期他们的主体则分布于汉水一带。两千多年前，使用南亚语的南亚先民则是“百濮”的主体。汉水西侧、湘西一带是他们的居住地，直至藏缅人和苗瑶人分别到了这些地方。苗瑶语的核心词多与汉藏语的其他语言有同源关系，少数词与孟高棉语的相近，如：^②

	苗瑶共同语	佯语	德昂语	布朗语
太阳	*snoi ^A	si ŋei?	si ŋǎi	saʔ ³¹ ŋi ⁵¹
土(地)	*te ^A	ka te?	ka dǎi	theʔ ⁵¹
水	*ʔjom ^A	ry ʔom	ʔym	ʔom ⁵¹

苗瑶语核心词中的孟高棉语词应是苗瑶语进入湘西等地时从古孟高棉语中吸收的，与今孟高棉语的读法仍相近。

七、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明

汉藏诸语族语言发生学关系的证明是对诸语族语言分歧的解释，建立在对它们的语音和形态重建的基础上。基本词同源关系的论证和语音及形态重建是有密切关系的。语音系统和形态的构拟应依照方言和亲属语的亲疏关系区分不同的历史层次，前面已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1. 汉藏语的语音对应关系

语音的对应关系可区分为发生学的对应关系和非发生学的对应关系。发生学的对应关系是亲属语或方言的同源词或词根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之间的巧合对应和借用的对应不能说明问题。发生学关系的对应则有语音系统对应的支持。

语支和语族内部，语音对应关系的说明和语音系统的重建必须按亲疏关系进行，排

①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398 页中认为大坪江 sje⁶、东山 ni⁶ 等的来历不同，大坪江的 sje⁶ 与苗语的同源，韵母不对应。我们注意到大坪江的 sje⁶、东山 ni⁶ 等的韵和声调有对应关系。

② 佯语马散话，参见《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61 页“中国孟高棉语言词汇表”。德昂语硝厂沟话、布朗语胖品话，参见《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第 561 页“中国孟高棉语言词汇表”。

除借词的干扰。侗台语和苗瑶语的重建中要排除汉语借词。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概论》和王辅世、毛宗武的《苗瑶语古音构拟》都已经这样做了。下文以汉语与侗台语为例说明它们的对应关系。

(1) 语音系统的对应关系

上古汉语与原始侗台语有如下相同的辅音系统^①：

上古汉语							
p	ph	b	m				
t	th	d	n	s	z	r	l
k	kh	g	ŋ	h	ʃ	w	
q	qh	G					
原始侗台语							
p	ph	b	m				
t	th	d	n	s	z	r	l
k	kh	g	ŋ			w	
q	qh	G	N				
?							

古汉语与原始侗台语分别有 *a e i ə o u* 和 *a e i o u* 元音系统。

现代侗台语的塞音表现为有 *ʔb-*、*ʔd-* 一类的先喉塞音，侗台语的不同支系都有这一类喉塞音声母，汉语的侗台语底层中也有这一类表现。侗台语的先喉塞音声母的 *ʔ* 是从 *b-*、*d-* 等前面的 *k-* 或 *q-* 变来的。这一点从侗台语的南岛语词中可以观察到。壮语等的一些方言无送气塞音，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始侗台语无送气塞音。如，“胳膊”“腿”“角”等词：

	泰语	版纳傣语	壮语龙州话	壮语柳江话	黎语
胳膊	khe:n ¹	xen ¹	khem ¹	kje:n ¹	khi:n ¹
腿	kha ¹	xa ¹	kha ¹	ka ¹	ha ¹
角	khau ¹	xau ¹	kha ¹	ka ¹	ha ¹

布依语和壮语的一些方言受底层语音影响丢失了送气成分。大约是该地的居民学习布依语或壮语时原来的母语是没有送气塞音的。古侗台语复辅音的简化中可能出现新的送气塞音。

于是我们构拟的原始侗台语与汉语一样，塞音是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和浊音三分。

前面已经提到苗瑶共同语的塞音与古苗语一样，也是 **p-*、**ph-*、**b-*、**mp-*、**mph-* 和 **mb-* 六分（以唇塞音代表各种塞音）。它们的鼻冠音是苗瑶共同语时代才产生的。原始苗瑶语的塞音是清、清送气和浊三分的。如苗语支语言中汉语借词“价”的声母是带鼻冠音的小舌塞音。勉语“剪刀”借自汉语的“绞”，诸方言的读法有一致的对应关系，“绞”应是苗瑶共同语时期借入的，可与“价”比较，它们的鼻冠音是后起的：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91、242 页。

	苗语古音	文界话	勉语东山话	勉语江底话
剪(刀)	*Nqau ^B	—	gjau ³	dziu ³
价钱	*Nqa ^C	Nqa ⁵	—	tɕa ⁵ (tsin ²)
夹(菜)	*nteĩ ^D	nfiɛ ⁶	kan ⁷	dzap ⁷

而“夹”，苗语的 *nteĩ^D 与勉语的 dzap⁷ 来历不同。dzap⁷ < *ŋkjap, 仍是汉语借词。

(2) 汉藏共同语的语音

我们可以在诸语族构拟的基础上构拟汉藏共同语的辅音系统：

p	ph	b	m				
t	th	d	n	s	z	r	l
k	kh	g	ŋ	h	ʃ	w	
q	qh	G	N				
ʔ							

从谐声、重文、异文和传注读若看，上古汉语有一种流音韵尾。如，辉/军、祈/斤、雉/难、播/番等的谐声可以解释为上古汉语有流音韵尾。^① 这些词中的 -l 或 -r 在方言中易成为鼻音韵尾 -n。但很难确定有 -l 和 -r 的区分，大体上我们只能认为《诗经》时代只有一种流音韵尾。

原始藏缅语有 -m、-n、-ŋ、-p、-t、-k、-ʔ、-s、-l、-r、-g 等韵尾。汉语与藏语流音韵尾有对应关系，如：

汉语	藏文
河 *gar (黄河的专名)	rgal 渡过
荷 *gar (负荷)	khal 驮畜的负荷物
洗 *sər (《说文》，洒足也)	bsil 洗，沐浴
飞 *pər	ʃphur 飞
归 *kər	ʃkhor 旋转，轮回

据此推测，原始汉藏语可能有 -l、-r 两种流音韵尾，古汉语中合并为一种。

2. 汉藏语的同源词

汉藏语的同源词不能仅仅依据藏语和汉语的比较研究来构拟。即使只是构拟汉—藏缅共同语的形式，也不能仅仅根据藏文和汉语的读音。只有藏缅语内部的比较和构拟才能说明它们的历史演变。以下试以汉藏语的代词和数词的比较为例。

(1) 汉藏语的代词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我	*sɿa(吾)	*ŋa	*ku	*blaŋ
我们	*ŋar(我)	*ŋa-r	*plu	*pre

^① 龚煌城《从汉语、藏语的比较看汉语上古流音韵尾的拟测》，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第49页。

你	*m-nir(尔)	*m-naŋ	*m-nə(-ŋ)	*me(-ŋ)
你们	*m-nir	*naŋ	*su	*me

“我”，卜辞多为殷商自称，指“我们”。“吾”见于周代文献，应来自藏缅语。“余”是早期汉语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上古音 *C-la。侗台语的 *ku 来自南岛语。

“我们”，藏缅语 *ŋa-r 的 *-r 是复数后缀，我们尚未发现汉语有这样的后缀。藏缅诸语，如喜马拉雅语支的满查底语 (Manchatī, Patini) ŋje-re, 博多—加洛语支的迪马沙语 āni-rao, 景颇语支的阿博尔语 ŋa-lu。

汉语的 *ŋar 可能来自藏缅语。汉语和藏缅语这一词项与苗瑶语、侗台语语音的对应关系前面已经谈到。

“你”，汉藏诸语的说法有同源关系，*m-前缀和*-ŋ 后缀也出现在另一些词中。

“你们”，侗台语的来自南岛语，汉语、藏缅语和苗瑶语的词根形式与单数的相同。

(2) 汉藏语的数词

	汉 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一	*qik	*g-tik	*k-do	*q-ri
二	*nir-s	*g-nit-s	*k-la	*q-ro
三	*s-hrəm	*g-səm	—	*pre
四	*s-hlit-s	*b-li	—	*pli
五	*sŋa	*ŋa	—	*pla
六	*khruk	*khū-ruk	—	*klok
七	*s-hnit	*s-nit	—	*g-ni
八	*prat	*g-rat	—	*glat
九	*kru-g	*s-gru	—	*gru
十	*k-ləp	*klap	—	*grəp

“一”，汉语上古音 *ʔit < *qlik。^①

“二”，汉语上古音 *nis < *nir-s。“次”古文从“二”得声。《说文》：“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声。”故上古韵尾原为 *-rs。

“三”，古字或为“叁”。“叁”《周礼》《战国策》等指“三”，谐声字“掺”《广韵》所今切，二等字。“三”，*səm < *s-hrəm。

“四”，谐声字有“𠂔”“𠂔”等。“𠂔”《广韵》虚器切，“𠂔”丑几切、丑利切。这样的谐声组合可解释为“四”的上古音为 *sis < *słit-s。

“七”，清母字，汉语上古音 *s-hnit。

“八”，汉语上古音 *prat。

“九”，谐声字有“𧈧(𧈧)”“𧈧”等。“𧈧”《广韵》许交切，“𧈧”力救切。“九”汉语上古音 *kuʔ < *kru-g。

①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217、218 页。从《诗经》等的押韵、汉语与藏语的比较看，质部和真部部分字原本分别应是 -k 尾和 -ŋ 尾。

汉语与藏缅语的数词显然有很密切的关系。侗台语的“一”和“二”可能与苗瑶语的关系,原来的“三”至“十”已经丢失。苗瑶语的“五”与汉语和藏缅语的“五”有同源关系,因为原始藏缅语的 *pl- 在黄河流域的方言中演变为 *ŋ。原始汉藏语“五”可拟为 *pla。根据一些词的对应情况可推测黄河流域的汉藏语古方言中曾发生过 *pla > *ŋa 的演变。

古汉藏语的一些方言中,数词的 *s- 前缀恐怕是常见的。一直到后来,汉语的“四”“五”“七”还有 *s- 前缀。

原始汉藏语数词五进位系统中“六”是“一”的派生词,可拟为 *khū-ruk。

苗瑶语的“六”“七”“八”“九”“十”是汉藏语的数词。

3. 汉藏语的历史形态

今汉藏诸语中仍保存着不同历史阶段古语的形态,不过它们是一些残存的形式。上文我们已经讨论到汉藏语不同历史时期人称代词和数词的残存的形态形式。某些不同语族的共同残存形式当来自原始汉藏语。

(1) 汉藏语的 *s- 前缀

通过如“亡”和“丧”,“吏”和“使”等比较,可知上古汉语 *s- 前缀可以用来表示使动。^①关于原始藏缅语使动功能的 *s- 前缀早已有学者讨论过。汉语的“帚” *tu? 是名词,加 *s- 前缀派生为动词“扫(扫)” *s-tu?(-s)。嘉戎语“扫” ka rit, 马加语 sit-ke(-ke 为现代马加语动词后缀),仍保留有 *s- 前缀。

“热”(动词),独龙语 lum⁵³,景颇语 jā³¹ lum³³ < *s-lum。“烧”,傣语 sum¹,黎语通什话 rum⁶,与汉语“炎” *g-lam 有相同的词根。“燂”《广韵》昨盐切,上古音 *sglam。^②

“编”,藏文 sla,却域语 pɬo, 原本有 *s- 前缀。“编(辫子)”黎语通什话 phan¹,“编(筐)”泰语 san¹。

(2) 汉藏语的 *m- 前缀

汉藏语的 *m- 前缀一方面是身体部位名词的构词前缀,另一方面又是不及物动词的前缀。原始汉藏语身体部位名词的 *m- 前缀保留在不同的支系中,如:

“眼睛”,上古汉语 *mjuk。藏文 mig, 嘉戎语 mŋak, 缅文 mjak, 原始藏缅语 *m-lak。

“舌头”,壮语彬桥话 lin⁴,黎语通什话 ɬin³,布央语郎架话 ma⁰ len¹¹,古侗台语 *m-lin-s, 原始侗台语 *m-lit。

“肝”,藏文 mtəin, 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mathin, 原始藏缅语 *m-krin。勉语 ɬan¹, 原始苗瑶语 *m-krin。

“手”,侗语北部方言 lja²,南部方言 mja²,布央语峨村话 ŋiak⁵⁵,原始侗台语 *m-lak。原始藏缅语 *lak。

作为不及物动词的前缀,如:

“睡”,壮语彬桥话 nom²,黎语通什话 tshu:n¹ (< *prun), 原始侗台语 *m-lun。上古汉语“寐” *mət-s。

“来”,布央语峨村话 ʔdɔŋ²⁴,黎语加茂话 muŋ⁴,古侗台语 *m-doŋ, 原始侗台语 *m-

①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99页。

② 《说文》:“燂,火热也。从火覃声。”

lak。上古汉语“来”**m-lak(-g)*。

“走”，原始藏缅语**m-gro*。上古汉语“行”**Graŋ*。原始苗瑶语**groŋ*。

“飞”，原始藏缅语**m-bjer*。上古汉语“飞”**pir*。

(3) 汉藏语的**g*前缀

汉藏语的**g*是动词的完成体前缀，又是数词和形容词的前缀。

完成体前缀**g*又往往表现为**G-*。如：

原始汉藏语的“叠”的词根是**dap*，“叠”景颇语 *kă³¹ thap³¹* (< **gădap*)，上古汉语“叠”**dap*。

“脱”，汉语上古音**khlat*，词根是**lat*。“逃脱”，苗语腊乙坪话 *qwei⁸*，原始苗瑶语**G-lat*。

“析”，汉语上古音**srek*，词根**rek*；“解”为“析”的结果，上古音**krak*。嘉戎语“破”*ŋgrak* < **m-grak*。**m-*是及物动词前缀。

“沉”，汉语上古音**qhləm*，词根**ləm*；“陷”是“沉”的结果，上古音**Gram-s*。景颇语“沉”*lup³¹*，“下陷”独龙语 *a³¹ gləm³¹*。

汉藏语“旋转”**lan*的完成体形式是**g-lan*。“旋转”缅文 *lan²* < **lan*。汉语“团”上古音**g-lan*。

g*及其后来的形式G-*作为形容词的前缀，如：

“圆”，汉语上古音**Glən*。藏文 *sgor*，道孚语 *kar*，原始藏缅语**Glor*。苗语养蒿话 *len²* (< **Glon^A*)，勉语江底话 *təun²* (< **glon^A*)，原始苗瑶语**Glon*。

“黄”，汉语上古音**Groŋ*。独龙语 *guər⁵³*，格曼僜语 *kui³¹ lă uŋ³⁵*，原始藏缅语**gluŋ*。原始苗语**Gleŋ^A*，勉语江底话 *jwar²* (< **grəŋ^A*)，原始苗瑶语**Gleŋ*。壮语彬桥话 *ləŋ¹* (< **ləŋ^A*)，黎语通什话 *ɬeŋ⁴* (< **mləŋ^A*)，原始侗台语**m-leŋ*。侗台语古方言中前缀有变化，原始汉藏语的前缀是**G-*。

“冷”，汉语上古音**graŋ* (凉)。藏文 *graŋ*，景颇语 *kă³¹ fuŋ³³* (< **găluŋ*)，原始藏缅语**graŋ*。

“咸”，汉语上古音**Gram*与“盐”**gram*有同源派生关系。“咸”，独龙语 *dzuum⁵³*，景颇语 *jum³³*，①原始藏缅语**g-rum*。黎语通什话 *gwa:n³* (< **C-gran^C*)。

(4) 汉藏语的使动前缀**p-*

古汉藏语“死”的词根是**rat*，“杀”有**srat*和**prat*两种读法。如，汉语“杀”上古音**srat*，藏语阿力克话 *psat*，布央语巴哈话 *pwan³²²* (< **p-rat*)。

汉藏语的“给”是“有”的派生词。如，汉语“余”上古音**k-la*，“赍”**qhla*，“予”**g-la*，词根是**la*。“有”，墨脱门巴语 *la*，羌语峨口话 *le*，博嘎尔洛巴语 *da:*。“给”，那加语南桑亚方言、昌方言 *lā*，班巴拉方言 *pha* < **p-la*。

汉语“扒”**prat*与“脱”**khlat*是同根词，词根是**lat*。“脱(粒)”，壮语 *pjet⁷*，仡佬语 *pyət⁷* < **plet*。

① 如“冷”，独龙语 *dzuŋ⁵³*，景颇语 *fuŋ³³*。

(5) 汉藏语的名词后缀 *-g

原始汉藏语的 *-g 是类称词的标记。早期的汉语中,如“黑”*hmək 与“晦”*hməg、“途”*k-la(-g)与“路”*k-lag 是同根词,“逆”*ŋak 与“忤”*sŋag、“落”*krak 与“下”*Grag 原本也是同根词。^①

汉语“息”*s-klək,“子息”。^②“子”,甲骨文为孩童形,上古音*sklөг。它们的词根当为*klək。“儿子、女儿”,黎语通什话 ɬak⁷ (<*klok)。“女儿”,勉语大坪江话 sje⁷ (<*slok)。

汉语“下”*Grag < *Grak-g,藏文“掉(下)”zags < *glak-s,景颇语“下(方)”kǎ³¹ ta³³ < *gǎla-g。早期汉语、藏缅语的 *-g 当有共同的来历。

汉语“烧”*sɿrug 和“燎”*C-rug 是同根词。景颇语“煮”jǎ³¹ tu³³ < *sǎlu-g。布努语“煮”tu⁸ < *gluk。

(6) 汉藏语的后缀 *-m

名词的 *-m 后缀

“泥”,汉语上古音*k-nir。^③藏缅语和侗台语中或带后缀 *-m。如,缅文“泥巴”hrwam¹ < *kh-nar-m,景颇语 khum⁵⁵。“泥巴”,壮语武鸣话 nai² < *nar。“泥巴、土”,壮语武鸣话、侗语 nam⁶,水语 khəm⁵。

“肚子”,汉语*pok(腹),缅文 bok。带后缀 *-m 构成的词如载瓦语 vam²¹,卢舍依语 pum,版纳傣语 pum¹。侗语“膀胱”pom¹ nœu⁵ (即尿肚)。藏缅语中如,缅语支的蓬语(Phun)“肚子”pauk mā,博多—加洛语支的拉龙语(Lālŋung) pu-mā。它们在使用 -mā 后缀。

动词的 *-m 后缀

动词的 *-m 后缀仍是不及物的标记。

汉语“下”*Grak-g,“陷”*Grak-m > *Gram,“降”*Græk-m > *Grəm,“下”为形容词,“陷”和“降”为不及物动词。独龙语“落”,glom⁵³。“陷(下)”壮语 lom¹。

汉语“泼”*phjat,“汜”*phjat-m > *phjam,“泼”是及物动词,“汜”是不及物动词。“泼”是水使濡,“汜”是水自濡。“洒”,独龙语 pɿam⁵³,格曼僜语 mphlat³⁵,词根为*phlat。“洒”侗语 phjən⁵ < *phjət。

(7) 汉藏语的 *-n 后缀和 *-t 后缀

古汉藏语的 *-n 后缀和 *-t 后缀的功能似乎相同,可交替出现。可作为名词和动词的后缀。

“弯”藏文 gug,缅文 kək,原始藏缅语*kuk。汉语“曲”*khuk,“屈”*khət,“卷”*kans。“卷(起)”,壮语钦州话 ky:n³,邕南话 kli:n³。“弯(腰)”,版纳傣语 kot⁸。

汉语“下”*Grak-g,“降”*Græk-m,“损”*sGən? < *s-Græk-n。“损”从“员”得声。“员”云母字,上古音*Gən。

① “下(方)”,如缅文 kre²。

② “息”从“自”,“自”谐声字有“泊”(几利切)等。

③ “泥”从“匕”,“匕”的谐声字有见母字“稽”、章母字“指”、来母字“秭”等。

藏缅语“圆”*Glor。汉语“帷”，上古音*Glər，“圆”*Gən<*Glər-n。“圆”，苗瑶语*Glon，侗台语*C-lon。

藏文“新”gsar，“活”gson，“新鲜”sos，“养”gso，词根是*sar。*g是形容词和动词的前缀。“新鲜”独龙语ɕar⁵⁵<*srar。汉语“新”*sin<*srir，苗瑶语*srin。

思考题：

- (1) 汉藏语系是怎样分类的？
- (2) 汉语的中古音和上古音是依据什么构拟的？
- (3) 简述近年来古汉语形态的研究情况。
- (4) 举例说明汉语和藏语的同源对应关系。
- (5) 关于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 (6) 苗瑶语族苗、瑶和畲三个语支，以下是苗语养蒿话、高坡话，苗语支炯奈语长垌话，瑶语支勉语江底话、大坪话等不同分支语言的一组同源词：

	村寨	粮仓	锐利	穿山甲
苗语养蒿话	ɣaŋ ⁴	—	ɣa ⁶	ɣo ⁶
苗语高坡话	zəŋ ⁴	zəŋ ⁴	—	zə ⁶
炯奈语长垌话	—	—	ŋkja ⁶	—
勉语江底话	laŋ ⁴	lam ⁴	lai ⁶	lai ⁶
勉语大坪话	dzəŋ ⁴	dzum ⁴	—	—

声母的对应情况表明诸语声母的不同形式可能来自共同语的一种鼻冠塞音的复辅音声母，其构拟形式为*ŋgl-。^①

试解释苗瑶共同语这一声母在不同语言中的演变。

参考书目：

-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年。
-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龚煌城《从汉藏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1984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①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322—323页。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1994 年。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年。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 Part II, Comparative Vocabulary, by G. A. Grierson, K. C. I. E., Ph. D., Litt., L. D. C. S. Printed in India, 1973.

Darrell T. Tryo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附录

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汉语有三千多年的文献积累,是世界上唯一的数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记录的语言。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期是有关语义的研究,如《尔雅》。稍后是有关方言的研究,如扬雄的《方言》。有关文字和语音、语义关系的研究,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汉末发明了反切注音法。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有声韵调分析法,出现了韵书和对声调的研究。

中国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李登的《声类》,其次是晋代吕静之的《韵集》,都已失传。现存最早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等编著的《切韵》。宋代的《广韵》是《切韵》的扩充修订版。宋代的等韵图相当于今天的声韵调配合表,反映不同音节的结构情况。清代是传统汉语音韵学的鼎盛时期,著名的学者有王念孙、章炳麟等。

现代汉语音韵学始于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根据《切韵》的分类和反切、方言和对音材料构拟汉语中古音,并在清代学者古音研究的基础上构拟上古音。高本汉之后,中国、欧美和俄罗斯的学者都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1. 反切

反切注音法自汉末沿用至清代,直到民国时期有了注音字母注音法才不再用来注音。反切的用法,如“妇”《广韵》房九切,“房”是反切上字,“九”是反切下字。两字音快读,上字的声母与下字的韵母拼合在一起就读出被切字的音。根据反切用字,就能知道当时字音的声母、韵母和声调。

“反切”最初不叫反切,叫做“某某反”或“某某翻”。因为“某某反”可指某某人造反,唐代宗时改用“切”。^① 徐铉、徐锴为许慎《说文解字》反切注音,如:“‘秉,禾束也,从又持禾。’兵永切。”

2. 《切韵》和《广韵》

隋开皇初年,陆法言与刘臻、萧该、颜之推等论古今音韵是非,南北通塞,公元 601 年编成《切韵》。这部韵书把同音字分韵按四声排在一起。《切韵》原书已佚失,唯存陆法言的《切韵序》。后来又发现《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三种唐代写本。其中敦煌出土的韵书残卷(王一)据说基本上是陆法言原书的片断。“王二”即项子京跋本。“王三”是宋濂

* 附录部分承郑张尚芳先生提出宝贵意见,特致谢忱。

①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 2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跋本,是王仁煦(昉)《刊谬补缺切韵》的完本。

后来的《唐韵》是在《切韵》基础上修订。宋代在《唐韵》基础上修订《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

《广韵》是最早的官修韵书,共五卷,陈彭年等奉诏所修,收字两万六千有余。平声分上下卷。上声、去声和入声各一卷,共计206韵。其中193韵是《切韵》原有的,新的13韵是在原有韵的基础上增加的(严韵多了上去,歌韵、真韵、寒韵分开合)。王力先生认为如果不算声调的分别,共是61个韵类,92个韵。^①

3. 字母和韵

传统音韵学的“字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声母,唐宋时期用代表字表示当时的这些声母。如“端”“透”“定”“泥”等字母当时分别代表*t-、*th-、*d-和*n-四类声母。唐代轻、重唇尚未分化时用30个字代表当时的30个不同的声母。到了宋代多了轻唇的非敷奉微、鼻音的娘母和浊塞擦音的床母就成了36声母。

传统音韵学的“韵”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韵母。当时的韵包括介音和声调,即只要介音和声调有所不同就是不同的韵。

宋代的学者已按照发音部位对字母分类。如“端透定泥”被称为舌头音。

4. 重唇音和轻唇音

唐宋以来的传统音韵学根据字母的发音部位以“唇、舌、齿、喉、舌齿”等名称为字母分类。唇音又分重唇和轻唇。轻唇音大约到了唐末才有。轻唇音从重唇音“帮、滂、並、明”中分化出来,宋代分别用“非、敷、奉、微”等字母来代表。

重唇音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唇塞音和唇鼻音声母(p-、ph-、b-、m-),轻唇音指唇擦音和唇齿鼻音声母(f-、v-、m-)。唐五代的北方方言中可能经历唇齿塞擦音声母(pf-、pfh-、bv-)的阶段才有轻唇音声母。

5. 舌头音和舌上音

舌头音字母有“端、透、定、泥”,即今天的舌尖音声母(t-、th-、d-、n-);舌上音的字母有“知、彻、澄、娘”,当时可能先是舌尖后音(t-、th-、d-、n-),后来成为舌面音。中古北方方言带-j-、-i-和来自-r-介音的元音类介音把舌尖音声母变成舌尖后音声母,即原来的舌尖塞音类声母分化为舌尖音和舌尖后音两类。这两类声母分布上互补,宋代的韵图中端透定泥只有一四等,知彻澄娘只有二三等。

中古来母音值为l-,被归入“半舌音”。

6. 等韵图

宋元时兴起的“等韵学”为后世留下《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和《切韵指南》。等韵学的等韵图相当于现代用来说明一种语言全部音节结构的声韵调配合音节表(单音字表)。如《韵镜》以不同声调的韵跟以唇、舌、牙、齿、喉和舌齿音等声类配合列表说明《切韵》的字音。《切韵指掌图》中以“端”“透”“定”“泥”“知”“彻”“澄”“娘”“见”“溪”“群”“疑”等36个字母代表声类配合说明宋时的读音。《切韵指掌图》中的韵又分4等。声和韵的配合又与“等”有密切关系。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上)第51页。

7. 四声

《切韵》一系列的韵书按照平、上、去、入四声编排。当时汉语的不同方言有平、上、去、入四声,来自南北朝。如《切韵》作者陆法言评四方之音:“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周祖谟先生指出:“四声的名称和四声类别的确定则从宋齐时代开始。从文献我们知道宋洛阳人王斌曾著有《五格四声论》,到了梁代吴兴沈约又著有《四声谱》,后来编纂韵书的人就以四声来分类了。如梁夏侯该《四声韵略》、北齐阳休之《韵略》都是如此。”^①

北方方言中大约是唐代,四声开始分化。有的地方话仅平声因声母清浊的不同分化为阴平和阳平。有的平、上、去、入四声都因声母的清浊而分化。北京话的祖方言经历了平声和上声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和阳上,阳上与没有分化的去声合并,入声分化后又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

8. 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

古时的学者常用阴阳五行的术语来描绘事物。音韵学者把韵区分为阴、阳、入三类。用现代语言学的说法来解释大体上是:阴声韵不带辅音韵尾,阳声韵带鼻音韵尾,入声韵带塞音韵尾。当时的入声韵带有 *-p、*-t、*-k 韵尾,读四声中的入声,称为入声韵。^②

阴声韵、阳声韵分平声、上声和去声,入声韵只读入声调。

9. 清浊

传统音韵学把字母(声母)分成全清、次清、全浊和次浊四类。以今天的眼光看,全清是清的塞音、擦音、塞擦音和喉塞音声母,次清是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全浊是浊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声母,次浊是鼻音、流音和半元音声母。中古 36 字母清浊的分类王力先生的意见为:^③

全清	见端知帮非精照影心审
次清	溪透彻滂敷清穿晓
全浊	群定澄並奉从床匣邪禅
次浊	疑泥娘明微 喻来日

10. 等

等韵图中韵分一、二、三、四等。清代音韵学家江永的理解是这样的:“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之,三四皆细,而四尤细。”(《音韵学辨微·八辨等列》)高本汉认为:一、二、三、四等表示元音由后到前。一等是 α , 二等是 a , 三等是 æ , 四等是 e 。^④ 现在我们知道中古等的分别与介音有密切关系。

从声母的角度看,韵图中“等”的分布是这样的:

① 周祖谟《关于唐代方言中的四声读法》,《文字音韵训诂论集》第 18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② 这里说“大体上”,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如果我们承认中古时代的上声,至少是部分方言中的上声,还带喉塞音韵尾,那么上声阴声韵的韵尾为 *-ʔ, 上声阳声韵的韵尾有 *-mʔ、*-nʔ 和 *-ŋʔ。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上)第 57 页。依《韵镜》,晓母归全清。

④ 王力《汉语语音史》第 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四等俱全	帮滂並明 影晓见溪疑来
只有一二四等	匣
只有一四等	端透定泥 精清从心
只有二三等	知彻澄娘 照穿床审(二等庄初崇山,三等章昌船书)
只有三四等	喻(三等为云,四等为余)
只有三等	非敷奉微 禅日 群 ^①
只有四等	邪

韵图的作者为了排列整齐,规定精清从心等只有一四等,从反切看应排入三等的字也归入四等。有些与三等字同类的庄初崇山的字也归入二等,故有假四等和假二等之说。^②

“照穿床审”根据反切上字的不同区分为二等的庄初崇山(简称照_二)和三等的章昌船书(简称照_三)。喻母有三等和四等的分别。三等的喻母简称喻_三,即云母。四等的喻母,简称喻_四,即余母(或称以母)。

《广韵》61个韵类所属等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 等	冬模泰灰咍魂痕寒桓豪歌唐登侯覃谈
一三等	东戈
二 等	江佳皆夬刪山肴耕咸衔
二三等	麻庚
三 等	鍾支脂之微鱼虞祭废真諄臻文欣元仙宵阳清蒸尤侵盐严凡
四 等	齐先萧青幽添

今天的吴、湘、粤、客家和北方诸方言的系统跟《切韵》、《广韵》和韵图所描写的情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完全对应。

11. 开口和合口

等韵图中的韵目分开合,又称之为“开口”和“合口”,或称为“开口呼”和“合口呼”。

现在我们知道属于开口类的韵不带-u介音或是不圆唇的韵,属于合口类的韵带-u介音或-w介音,或主元音是-u。

12. 纽和重组

传统音韵学把声母叫做“声纽”或“纽”。

《切韵》的同一韵类用不同的反切下字,可以分辨出开合(带不带-u介音)或等(带不带 u、j 和 i 等介音)的不同。出现在支、脂、真、祭、仙、宵、侵、盐等韵的一些声母(喉、舌根、唇)三等和四等字的反切中,开口和合口的韵都可能另有分别,称之为重组三等和重组四等。^③《切韵》的一些字有两读。如,“蹶”纪劣反,薛韵,为重组三等;又有居月反,月

① 群母只有个别字属四等,故通常认为群母只有三等。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上)第 57 页。

③ 周法高和李荣把重组四等称为 A 类,重组三等称为 B 类。参见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年。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21 页。

韵,纯三等。“缺”倾雪反,薛韵,重组四等;又有苦穴反,屑韵,纯四等。重组三四等的不同通常反映在反切下字上,也有反映在反切上字上的。

重组是否表示读音的不同开始时是有争议的。高本汉认为没有分别,李方桂认为是方言现象。经多年的研究,结论渐趋一致:重组三、四等和纯三、四等的分别是介音的不同。今天的一些汉语方言中还可以看出来。朝鲜、越南和日本中古时代中国传去的汉字读音中也有分别。早在20世纪40年代那格尔(Nagel)就提到在汉越语中重组四等的唇音字发生舌齿化,如支韵的“卑、俾、臂”读作 ty。^①

13. 韵部

传统音韵学把上古汉语的韵归为韵部。

清代学者根据先秦古籍的用韵,如《诗经》等押韵的字按韵分部。最初顾炎武分10部,江永分13部,段玉裁分17部,江有诰分21部,王念孙分22部。

后来的学者,如高本汉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王念孙、江有诰)分35部,李方桂22部,王力11类29部。

高本汉修订了清代学者的分部并构拟了诸韵部的读法。上古元音为a的,分别有谈部的*am,元部的*an,阳部的*ang,盍部的*ap,月部的*at,铎部的*ak和歌部的*ar。由于《诗经》等文献中鱼部的字可与铎部的字押韵,李方桂把鱼部拟为*ag。高本汉的上古韵尾除了-r,还有-p、-t、-k和-b、-d、-g的分别。李方桂先生说:“古韵学家往往把古韵分为:阴阳入三类,其实阴声韵就是跟入声相配为一个韵部的平上去声的字。这类的韵尾我们可以写作*-b、*-d、*-g等。但是这种辅音是否是真的浊音,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很好的证据去解决他。”^②

以下是李方桂先生按中古读法上推的鱼部字拟音情况:^③

		开 口	合 口
阴声韵 *-g	一等	恶 *agh	孤 *kwag
	二等	家 *krag	瓜 *kwrag
	三等	借 *tsjiagh	车 *kjag
入声韵 *-k	一等	恶 *'ak	郭 *kwak
	二等	客 *khrak	获 *gwra ^h k
	三等	若 *njak	缚 *bjak

二、《切韵》和中古音的研究

1. 《切韵》的研究

陆法言《切韵》所描写的到底是当时的哪一种方言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戴震认为《切韵》分韵过细,“强生轻重,定为音切,不足为凭也。”他认为《切韵》所代表的不是—种方

①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2—45页。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33页。

③ 同上,第58、59页。

言,方言中没有一种有这么多的韵类。而陈澧认为《切韵》206 韵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认为《切韵》是代表当时的一种方言的又有三种意见,有吴音说、洛阳音说和长安音说。

高本汉认为是当时的长安方言,王力认为不能代表长安的实际语音,是“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①

隋时洛阳为东都。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人,梁益则平声似去。”陈寅恪先生说:“陆法言序文述各地方言之失,而独不及中原一区,则中原即洛阳及其近旁之语音,乃诸贤所视为正音者无疑。”

令人产生疑问的是《切韵》鱼虞有别,如果《切韵》是洛阳及近旁话的系统应是鱼虞合流。中古早期鱼虞相混的是河南一带的方言。^②

分析《切韵》最基本的工作是反切上字的“系联”。所谓系联就是清陈澧《切韵考》(卷一)中所说的:“切韵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则切语上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声必同类也。”也就是说同一声类的字或有相同的反切上字,或反切上字又为另外的反切上字所切(互用),再次互用就把更多的反切上字联系起来。于是《切韵》的每一个声类都有一组与别的声类不同的反切上字。

2. 中古音的构拟

(1) 声母的构拟

高本汉构拟的中古声母系统为:^③

p	ph	bh	m		
(帮)	(滂)	(並)	(明)		
t	th	dh	n	l	
(端)	(透)	(定)	(泥)	(来)	
tʰ	tʰh	dʰh	ɳ		
(知)	(彻)	(澄)	(娘)		
ts	tsh	dzh		s	z
(精)	(清)	(从)		(心)	(邪)
tʂ	tʂh	dʒh		ʃ	
(照二)	(穿二)	(床二)		(审二)	
tɕ	tɕh	dʒh	ɲɕ	ɕ	ʐ
(照三)	(穿三)	(床三)	(日)	(审三)	(禅)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上)第 49 页。

② 参见潘悟云《中古汉语方言中的鱼和虞》,《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③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第 28 页。

k	kh	gh	ŋ	x	ɣ
(见)	(溪)	(群)	(疑)	(晓)	(匣)
ʔ					
(影)					

喻母拟为零声母。

高本汉构拟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是送气的,后来的学者多改为不送气。“照”“穿”“床”“审”等声类(字母)的名称见于宋代的《切韵指掌图》,《切韵》时代的反切上字二等和三等的混淆,现代的一些方言中也有分别。二等字的声类分别用“莊、初、崇、山”等来代表,三等字的用“章、昌、船、书、禅”来代表。《切韵》时代这两组声母是不同的。庄母的音值陆志韦、王力等拟为 *tʃ-, 章母的音值蒲立本拟为 *c。

根据《切韵》反切上字的情况,也有意见认为庄初崇山同部位的中古音还有一个俟母,音值为 *ʒ-。^①

(2) 韵母

中古韵母的构拟以《切韵》韵类为依据,包括介音、元音和韵尾的构拟。

宋代的等韵图(声韵调表)把韵分为一、二、三、四等,等的分别与介音和主元音有关。大体上,中古一、二等的不同在于元音,三、四等不同于一、二等的在于它们的介音。三等韵含有介音-j-, 四等带介音-i-。

高本汉参照汉语方言的读音,以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中古汉语借词的读音为参考材料,他构拟的中古音系基本上为后来的学者所肯定。元音的构拟各家的分歧较大。高本汉构拟了包括 16 个单元音的系统,王力构拟了 10 个单元音,潘悟云构拟了 11 个单元音。

诸家关于《切韵》韵的构拟如: ^②

韵类	等别	高本汉	王力	潘悟云
歌	一	â	a	a
戈	三		ǎa	ia
麻	二	a	a	ua
	三	ja	ǎa	ia
模	一	uo	u	o
鱼	三	jwo	ǎo	io
虞	三	ju	ǎu	iu
泰	一	âi	ai	ai
哈	一	âi	ɒ	əi
灰	一	uâi	ui	uoi

① 李荣《切韵音系》第 127 页。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83—89 页。

佳	二	ai	ai	uæ
皆	二	ǎi	ɐi	uæi
夬	二	ai	æi	uai
祭	三	ǰäi	ǰei	iei
废	三	ǰɔi	ǰɐi	iei
齐	四	iei	iei	ei
支	三	(j)ie	ǰe	i ^e
脂	三	(j)i	i	i
之	三	(j)i	ǰə	ɨ
微	三	(j)ěi	ǰɐi	ɨi
豪	一	âu	au	au
肴	二	au	au	uau
宵	三	ǰäu	ǰeu	ieu
萧	四	ieu	ieu	eu
侯	一	ǔu	əu	əu
尤	三	ǰǔu	ǰeu	iu
幽	三	ǰeu	ieu	ɨu
谈(盍)	一	âm	am	am
覃(合)	一	âm	ɔm	əm
衔(狎)	二	am	am	uam
咸(洽)	二	ǎm	ɐm	uæm
盐(叶)	三	ǰâm	ǰem	iem
严(业)	三	ǰɔm	ǰem	iem
侵(缉)	三	ǰəm	ǰem	im
凡(乏)	三	ǰwɔm	ǰwem	iem
添(帖)	四	iem	iem	em
寒(曷)	一	ân	an	an
删(鐸)	二	an	an	uan
山(黠)	二	ǎn	æn	uæn
仙(薛)	三	ǰän	ǰen	ien
元(月)	三	ǰɔn	ǰen	ien
先(屑)	四	ien	ien	en
痕	一	ən	ən	ən
魂(没)	一	uən	uən	uon
臻(栊)	二	ǰen	ǰen	in

真(质)	三	ǐēn	ǐēn	in
殷(迄)	三	ǐən	ǐən	in
文(物)	三	ǐuən	ǐuən	iun
唐(铎)	一	āŋ	ɑŋ	ɑŋ
阳(药)	三	ǐɑŋ	ǐɑŋ	ieŋ
庚(陌)	二	oŋ	ɔŋ	uaŋ
	三	ǐoŋ	ǐɔŋ	uiaŋ
清(昔)	三	ǐäŋ	ǐeŋ	ieŋ
青(锡)	四	ieŋ	ieŋ	eŋ
江(觉)	二	ɑŋ	ɔŋ	uaŋ
耕(麦)	二	eŋ	æŋ	uaæŋ
登(职)	一	əŋ	əŋ	əŋ
蒸(职)	三	ieŋ	ieŋ	iŋ
东(屋)	一	uŋ	uŋ	uŋ
	三	ǐuŋ	ǐuŋ	iuŋ
冬(沃)	一	uoŋ	uoŋ	uoŋ
鍾(烛)	三	ǐwoŋ	ǐwoŋ	ioŋ

括号中的入声韵与阳声韵对应,所构拟的音值分别为-p、-t、-k尾。

三、上古音的研究

前面已经提到汉语历史比较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1) 汉语的历史文献;(2) 现代汉语的方言;(3) 相关的其他语言材料。汉语古音的研究又与训诂学、音韵学与汉语文字学有直接的关系。

《切韵》是研究汉语中古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上推古音的依据。上古元音和韵的构拟以《诗经》等的用韵和谐声材料为依据,声母主要是结合谐声依据中古音上推。

利用藏汉比较构拟汉语上古音国内外都很流行。如李方桂、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蒲立本(Pulleyblank)等学者都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1. 谐声的研究

上古的谐声是研究上古音的重要依据。清代学者段玉裁以古代表示字音的偏旁(声符)为依据来区分上古的韵,他认为同一谐声偏旁字的读法属于同一韵部,他的名言是“同声必同部”,即上古同一声符的字读法一定属于同一韵部。从殷商到汉的一千多年中不但语音和形态可能有较大的变化,谐声所依据的方言可能不一致,于是有不同声符的异体字。如,《说文》“迹”或作“蹟”。“迹”“亦”声,而“蹟”从“束”。“亦”“束”上古分属铎部和锡部,韵的元音不同。许慎根据当时的读音和他对声符的认识写成《说文解字》,无疑对文献进行过整理,有过取舍。上古不同时代的谐声都是以一定的方言为依据的。上古谐声时代纵向的是不同时代的方言差别,横向的是不同地区的方言差别。在谐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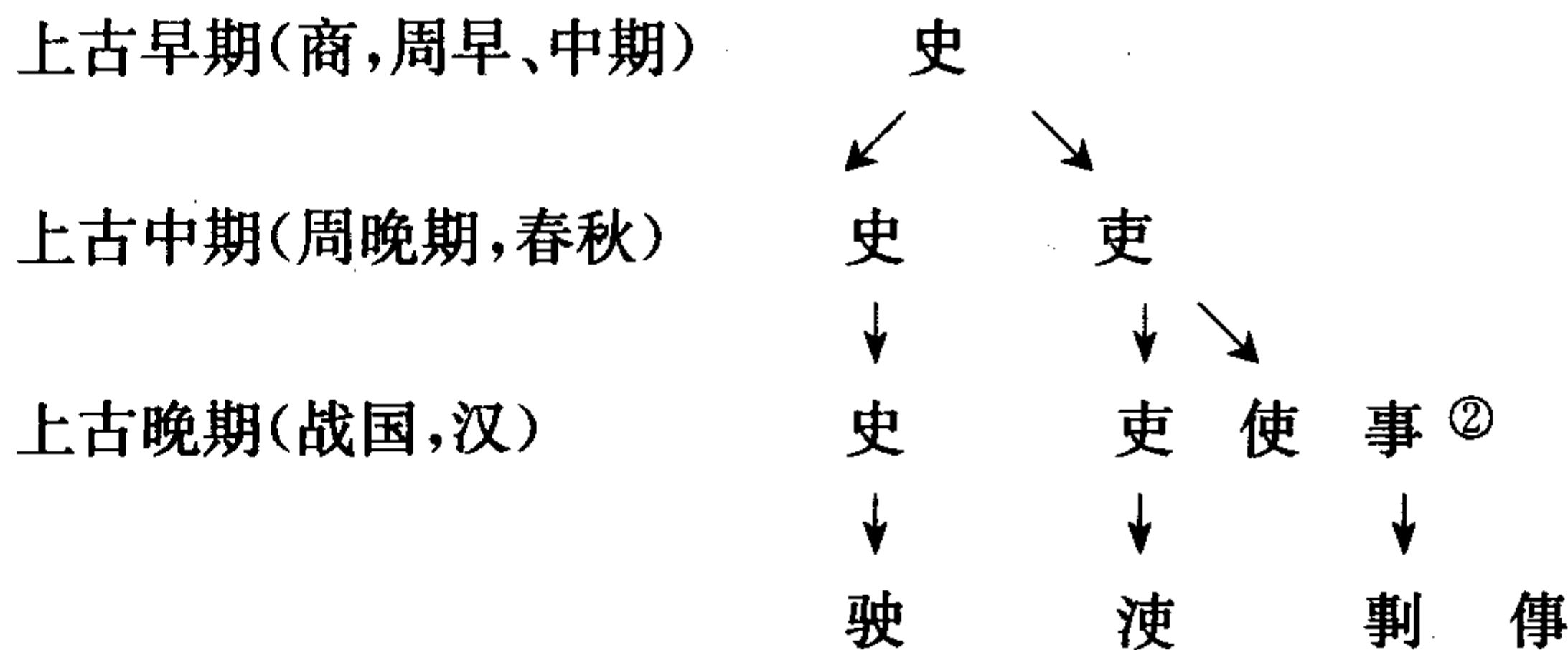
的方法上,我们不得不比段玉裁前辈有进一步的考虑。

上古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可用一个字表示,后来或添加不同的意符成为不同的字。同声必同部,是对韵的读法而言,声母的情况较为复杂。甲骨文和周早期金文“使”“吏”本一字,春秋后才有区别。尽管后世的声母差别很大,韵却相同或相近。

上古同声(符)的字当时应有相同或相近的声母,后来不同的方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所变化。早期的谐声关系到了后来变得很复杂。中古一种声类从上古的谐声关系分析可归纳为几种主要谐声方式或可称为谐声的组合。而且,早期的一种谐声方式后期可能发展出不同的谐声方向。这实际上与上古复辅音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上古复辅音声母分化演变的结果是上古的一个声类对应于中古的几个声类,中古的一个声类通常是上古几个声类演变合并的结果。这些是笔者根据谐声的情况参考藏缅语复辅音演变的认识。

“命”“令”甲骨文为一字,周中期才有分别。“蔡”从“祭”,但与“杀”本为一字,春秋时才有分别,“蔡”又可假为“崇”。“史”“使”“吏”“事”本为一字,“鼎”“贞”本为一字,皆战国时有别。这些都是研究上古音的重要线索。后起字及后起谐声字多与较早前的语音历史演变无关。汉代之后晚出的形声字对研究此前的语音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应对不同时期的谐声关系予以区分。甲骨文“史”即“事”,又指任事者,又用如“使”。^①“史”“使”“吏”“事”古文献中的谐声关系可表示如下:



我们大约可以假设“史”上古早期读作名词和读作动词声母是不同的,当时一个词和它的派生形式往往可以用一个字来表示,后来采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史”“使”中古为山(生)母字,上古晚期声母为*sr-,“吏”为来母字,上古晚期声母为*r-。

中古的声母系统是上古包括复辅音的声母系统简化的结果。大凡简化了的系统,与原有系统的对应关系是有规律的。某些声符后来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谐声组合关系,即它们的声母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历史演变。

李方桂先生在他的《上古音研究》中提到上古谐声的两条原则:^③

第一,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

a. 舌根塞音可以互谐,也有与喉音(影及晓)互谐的例子,不常与鼻音(疑)谐。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317页。

② 战国时“事”仍可用如“使”。《墨子·七患》:“民无食则不可事。”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10页。

b. 舌尖塞音互谐,不常跟鼻音(泥)谐。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谐。

c. 唇塞音互谐,不常跟鼻音(明)相谐。

第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

李先生所说的诸音是构拟得到的中古音,上古的谐声时代不等于是这种读法的谐声。

2. 上古声母的构拟

李方桂先生修改了高本汉的上古声母的系统,构拟的单辅音声母系统为:①

p	ph	b	hm	m	
t	th	d	hn	n	l,r
ts	tsh	dz			s
k	kh	g	hŋ	ŋ	h
kw	khw	gw	hŋw	ŋw	
ʔw					hw

复辅音系统为:

pr	phr	br	mr	
		brj		
tr	thr	dr	nr	
trj	thrj	drj	nrj	
tsr	tshr	dzr		sr
tsrj	tshrj	dzrj		srj
kr	chr	gr	ŋr	hr
kwr	chw	gwr	ŋwr	hwr
		gwrj		

诸家结合谐声和对音材料认为上古有-l类复辅音声母,另外还有这样的不同意见:

a. 中古的二等来自上古的*-r;上古的*-r>中古的l-。②

b. 上古的*-l>中古的j-,即中古的喻四来自上古的*-l。

c. 上古的*-k-l>中古的t-,即中古的端母可来自上古的*-k-l。③

d. 上古有清的鼻音和清的流音。④

潘悟云认为上古有小舌音,上古的*-hl>中古的ɕj-(书母),即中古的书母部分来自上古的*-qhl-。上古的*-qh>中古的h-(晓母),上古的*-skl>中古的ts-,即中古的精母部分来自上古的*-skl-。⑤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21页。

② 雅洪托夫(Yakhontov)最先提出。

③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第267页。

④ 最早是董同龢提出的,李方桂等国内外学者陆续都承认这一点,并扩大为清鼻、流音系列。

⑤ 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

谐声的复杂关系除了与语音的历史演变有关外,还与上古前缀(可能还有中缀)有关。上古早中期的前缀使得一些词演变为以声母送气和不送气的交替或清浊的交替表示不同的意义,于是部分的谐声字不区分清浊、送气和不送气。有的谐声仍有区分清浊、送气和不送气的倾向。以下我们以谐声关系扼要讨论上古声母的可能情况。

(1) 帮组声母的来历

“帮滂並明”和“非敷奉微”的互补关系是中古早期北方方言增生*-j*介音造成的。

帮组字主要是同部位塞音字谐声。从《广韵》的反切看,帮母字的谐声关系有这样的情况:

番(博禾切、普官切、附袁切)

本(布忖切)/笨(蒲本切)

半(博慢切)/判(普半切)

唇塞音的谐声可不区分清浊、送气和不送气。

帮组的二等字及帮组字与其他声类字的谐声主要应解释为声母原本是复辅音。如:

崩(北藤切)/棚(薄庚切二等)

擺(北买切二等)/罷(皮彼切)

諄(补妹切)/諄(蒲角切二等)/孃(蒲没切)

般(北潘切、布还切二等、薄官切)

贝(博盖切)/败(补迈切二等、薄迈切二等)

风(方戎切)/岚(卢含切)

非(甫微切)/罪(徂贿切)

八(博拔切二等)/穴(胡决切二等)

抚(芳武切)/撫(荒乌切)/无(武夫切)

𨾏(博巧切二等)/𨾏(力救切)/卯(莫饱切)/殍(爱黑切、方久切)

丙(兵永切)/更(古行切)/鞭(五争切)

標(甫遥切)/漂(抚招切)/標(子小切、符小切)

包(布交切二等)/庖(博交切二等)/雹(薄角切二等)/詔(徒刀切)

匕(卑履切)/尼(女夷切)/泥(力脂切)/旨(职雉切)/耆(渠脂切)/稽(古奚切)/嗜(常利切)/诣(五计切)/耆(女夷切)

与二等字谐声的帮母字或二等的帮母字当来自上古**pr-*,不排除**-r*可能是方言或形态变化的残留。

帮母字与其他声类字的谐声较复杂。

“风”与来母字“岚”谐声,上古音**prəm*。

“八”与二等的匣母字“穴”谐声,上古音**p-grat*, **p-*是前缀。

“丙”与见母字“更”及疑母字“鞭”谐声,上古音**p-kaŋ*。

“匕”的谐声字,如“尼”是泥母字,“泥”是来母字,“旨”是章母字,“耆”是群母字。

“匕”上古音**m-grir*, **m-*是前缀。

(2) 端知组声母的来历

端组和知组中古有互补关系,此前归为一组。

端、知母字与舌根塞音和喻_四字谐声的有:

堆(都回切)/佳(职迫切)/淮(户乖切)/睢(息遗切、许规切)/惟(以迫切)

擔(都甘切)/詹(职廉切)/澹(徒敢切)/檐(余廉切)

鈞(多嘯切)/勺(之若切、市若切)/芍(胡了切、七雀切)/约(於略切)

答(都合切)/合(古沓切、侯閣切)/给(居立切)/歛(书涉切)/欲(呼合切)

与书、晓母等谐声的有:

刀(都牢切)/召(直照切、寔照切)/刃(许交切)/鴈(即消切、陟交切二等)

亶(多旱切)/譴(透旱切、陟山切)/壇(定干切)/羶(式连切)/翻(许延切)

滴(都历切)/敵(徒历切)/摘(他历切二等)/適(之石切、施只切)

与舌根塞音和喻_四谐声的端母当来自上古 *kl-。包拟古提出上古汉语的 *k-l > 中古的 t-。^① 并说明:“为了与 *kl-型区别开来,我暂时使用 *k-l-型的写法来代表这一类。”

上古的 *kl-声母可演变为后来的 t-(端)、k-(见)、kj-(章)和 l-(喻_四),主要与演变发生的时间和范围有关。现以“合”“答”的谐声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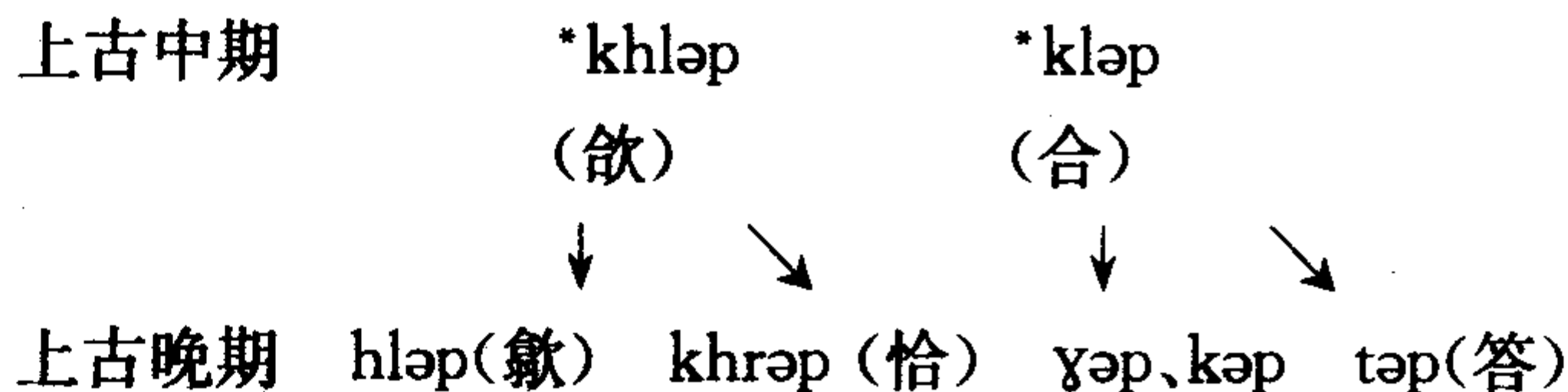
“合/答”谐声字组涉及中古的舌根音、舌尖音、舌面音等不同的声母。

舌根音 如:合、郃、恰、洽等。

舌尖音 如:答、搭、瘩、塔等。

舌面音 如: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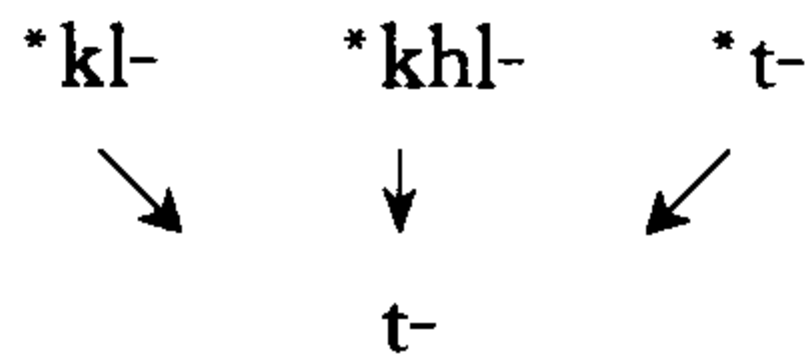
“答”的本字是“合”,《左传》“答”作“合”。应答义的“合”成为后世的“答”。“合”“答”等谐声字的语音历史关系解释如下:



最初的声符“合”读作 *kləp,在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演变为 ɣəp、kəp 和 təp。当读作 təp 时,就用“答”来表示。

关于 *kl-到 t-(端)的演变可能早于 *kl-到 k-(见)和 l-(喻_四)的演变。而 *kl- > k-和 l-的两类演变通常不发生在同一个谐声组内。“合”成为“答”不晚于汉代。

这样,我们假定中古端母有上述不同的来历,上古到中古,它们是:



中古的一个声类上古往往不止一个来历,端母、来母和喻_四等声类都是如此。

李方桂先生推测中古汉语透母字(th-)可来自上古 *hl- (*l-),并以唐代的藏文文献为佐证。

定母字的声母上古可来自 *gl-。

①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第 267 页。

(3) 章组声母的来历

中古章母、昌母和船母较早前有相近的演变方式。蒲立本最早提出章母如“支”“只”等来自 *kj-。^① 今闽方言中仍有章母字“指”“枝”“痣”“獐”等读作舌根音的。章母 *kj- > tʃj- 大约发生在汉以后南北朝以前。从俞敏先生的梵汉对音看章母字“支”“枝”和书母字“翅”等字的声母还是 k-。^② 潘悟云认为章组字的声母来自上古的 *klj- 和 *khlj-。

上古的情况是章母不但与见母等舌根音谐声,还与定、禅母或喻_四谐声,山母及精清从谐声,也与鼻音谐声。^③ 与见母和定、禅母或喻_四谐声的如:

支(章移切)/妓(居宜切)/岐(巨支切)/翅(施智切)

詹(职廉切)/檐(都甘切)/澹(徒敢切)/檐(余廉切)

止(诸市切)/企(丘弭切)/徙(斯氏切)/齿(昌里切)/祉(敕里切)

疹(章忍切)/胗(居忍切)/簪(作含切)/渗(所禁切)/参(苏甘切、仓含切)

勺(之若切、市若切)/芍(胡了切、七雀切)/豹(北教切)/钓(多啸切)/约(於略切)

佳(职追切)/淮(户乖切)/堆(都回切)/睢(息遗切、许规切)/惟(以追切)

与端母、禅母等谐声的如:

周(职流切)/凋(都聊切)

旃(诸延切)/丹(都寒切)

州(职流切)/酬(市流切)

朱(章俱切)/株(陟输切)/殊(市朱切)

帚(之九切)/扫(苏老切)/韶(市昭切)

正(诸盈切)/定(徒茎切)

与见母等舌根音谐声的章母上古多为带 *-l- 的复辅音。如章母字“詹”“佳”分别与喻母字“檐”“惟”谐声。

章母字“周”与“凋”这样的端母字谐声表明上古末期 *tj- > tʃj-。

“舟”谐声字有“𦨇”“朝”“廟”等。“𦨇”又作“𦨇”“𦨇”。“朝”从“舟”见于春秋石鼓文。^④ “廟”古文从“苗”或从“朝”。故此可考虑原有 *m- 前缀。“舟”字有过 *ŋklu < *m-klu 或 *m-glu。亲属语的比较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问题。如,“船”,藏文 gru, 道孚语 grə, 泰语 ruə², 德宏傣语 hə², 壮语武鸣话 ɣu², 壮语钦州话 lu², 侗语 lo¹, 原始侗台语 *glu。^⑤

(4) 精庄组声母的来历

中古精、清、从三母分别构拟为 *ts-、*tsh- 和 *dz-。学术界大多不再坚持认为中古的精、庄组声母上古早中期同样是塞擦音声母。

精组字的谐声比较复杂,除了精、清、从与庄、初、崇互谐外,心母、山母也与精母关系较为密切,同时也涉及喻母和见组。潘悟云拟精母为 *sk(l)-, 清母为 *skh(l)-, 庄、初、崇

①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第 61 页,中华书局,1999 年。

②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第 28 页,商务印书馆,1999 年。

③ 吴安其《精母的谐声与拟音》,《民族语文》2005 年第 1 期。

④ 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336 页。

⑤ 如“树阴”泰语 rom³, 德宏傣语 hom⁶, 壮语武鸣话 ɣam⁶, 壮语龙州话 kham¹。它们原本是舌根塞音的复辅音。

母分别为 *skr-、*skhr- 和 *sgr-。^①

山母常与来母谐声。如,数/娄、屡、缕,曬/灑、麗,梳/流,史使/吏,率摔/率。心母和山母与精母等谐声,上古末期它们的关系是:

$$\begin{array}{c} s- \quad \text{---} \quad sr- \\ | \\ ts-(tsh-, dz-) \\ tsr-(tshr-, dzr-) \end{array}$$

精母常与山母谐声,如:旌/生,積/醕,接/霰,濺/棧,跽/栓,蹙/撼,隋/稍。山母上古末期为 *sr-, 上古中期的谐声表明精母的读法中应包含着 *-r-。

精母主要的谐声关系有:精、心谐声,精、山、心谐声,精、见谐声。

精、山、心母谐声的如:

借(子夜切)/潜(山责切)/昔(思积切)
旌(子盈切)/生(所敬切)/星(桑经切)
宰(作亥切)/莘(所臻切)/辛(息邻切)
簪(作含切)/渗(所禁切)/参(苏甘切、仓含切)
俊(子峻切)/諛(所化切)/酸(素官切)
濺(子贱切)/棧(即浅切、苏盱切、所八切)
朴(子了切)/稍(所教切)/小(私兆切)

精、见母谐声的如:

井(子郢切)/耕(古茎切)
浹(子协切)/夹(古洽切)
遒(即由切)/猶(居祐切,以周切)/猷(以周切)
枸(即刃切)/均(居匀切)/匀(羊仑切)

精母与喻_四的谐声如上述谐声中的“左/隋”、“遒/猷”及“酒/酉”等。而且精、心谐声的字也往往与庄母字谐声。

精母和其他精组字偶尔也与泥母、端母及唇塞音字等谐声。

精、庄组谐声的见母字通常又与喻_四、山母或其他二等字谐声。

多数精母字仅在组内谐声,部分谐声复杂。与山母谐声的上古与 *s- 和 *-r- 有关,与喻_四谐声的字早期的读音中应含有 *-l-。

有的清母字与泥母有谐声关系。白一平(Baxter)提出以下的假设:^②

$$\begin{array}{l} *sn- > s-hn- > s-th- > tsh- \\ *sr- > s-hr- > s-th- > tsh- \end{arr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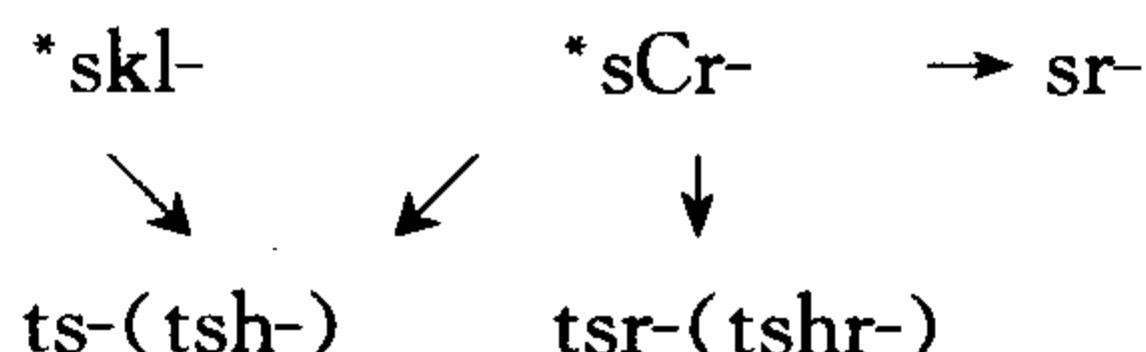
白一平的第一条解释了清母与泥母的谐声关系,并有商周古文“千”从“人”等为依

① 潘悟云、冯蒸《汉语音韵研究概述》,丁邦新、孙宏开《汉藏语同源研究》(一)第280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② Willam H.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pp. 223 - 224.

据。① 第二条中的-hr-可换成-Cr-。上古末期照_二的*-r-应来自较早时的*-r-。与山母来母谐声的精母字上古音可能是*sCr-,C代表-k-、-p-塞音。与见母及喻_四谐声的上古音可能是*sCl-。“酒”、“酉”等谐声,上古音可拟为*skl-。

*skl-变为精母和*sCr-为精庄母的演变可表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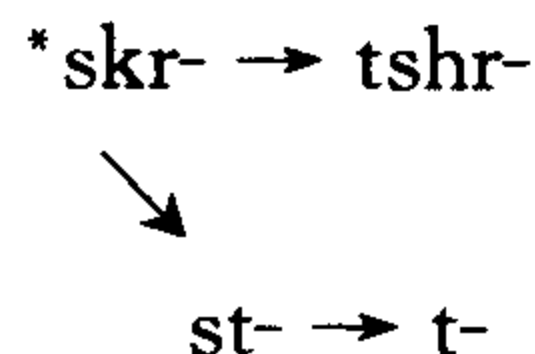


精、清母从*sCr-到ts-(tsh-)可能经历了*st-(*sth-)的阶段。少数端精(清)的谐声应能说明这一点。如:

刀(都牢切)/鵠(即消切)

端/端(七绢切、职缘切)/揣(初委切)

“端”“端”的谐声大约可解释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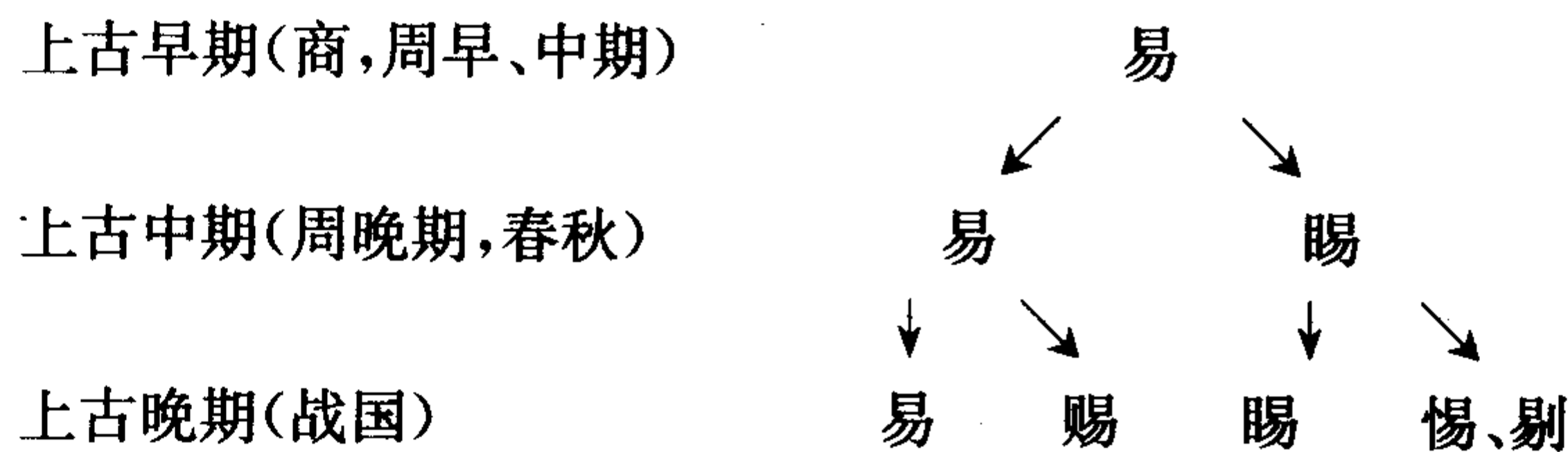
-k-由于受-r-的影响成为-t-。

精母与心、山母的谐声是规律性的,与端母的谐声是例外。与喻_四谐声的精组字通常与庄组没有谐声关系。精庄的谐声与*-r-有关,与喻_四谐声的精组字与*-r-无关。

(5) 心邪喻_四等声母的来历

中古心母诸家构拟为*s-,邪母为*zj-。② 郑张尚芳、潘悟云、白一平、沙加尔诸家大体上认为中古的*s-与上古的*s-前缀或复辅音有关。前缀*s-是上古重要的形态成分,这个前缀不再活跃之后成为复辅音的一部分。

商周时期“易”“赐”为一字,战国时有分别。“赐”是心母字,“易”属喻_四。相关谐声字的历史关系为:



周晚期毛公鼎以“赐”为“赐”。

“易”的声母上古早期、中期为*sl-。

“易”,上古晚期*sl-的*s-丢失成为*l-;“赐”的*-l-丢失成为*s-。

“惕”*sl->*hl->*th-,“惕”*sl->*hl->*ej-。

① 其他如“二”与“次”、“恣”谐声。《说文》:“次,从欠二声。”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14页。

邪母一方面可与喻_四及定、禅母等谐声,另外又可与匣、群母及书、精母等谐声。

梅祖麟提出邪母当来自 *lj-, 郑张尚芳认为邪母有 *lj- 和 *sɣ- 两个来源。^① 谐声的情况表明邪母上古的读法不那么简单。

从沈兼士《广韵声系》的谐声材料看,邪母的谐声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类是与喻_四、定、禅母等谐声;第二类除了与喻_四、定、禅母等谐声外,还与见组及心母等谐声;第三类是与匣、群母等谐声,未见与喻_四谐声。

邪母与喻_四、定、禅母等谐声如:

袖(似祐切)/迪(徒历切)/由(以周切)

汙(似由切)/游(以周切)

似(详里切)/以(羊己切)

斜(似嗟切)/徐(似鱼切)/余(以遮切)/途(同都切)

邪母与喻_四及见、书母等谐声如:

羨(似面切、以脂切、喻脂切、于线切)

洋(似羊切、与章切)/羊(与章切)/姜(居良切)/薰(息两切)/牂(则郎切)

颂(似用切、余封切)/公(古红切)/松(私宗切)/翁(乌红切)

象(徐两切)/勳(余两切)/螽(式亮切)

錫(徐盈切)/易(羊益切)/锡(先击切)/賜(施只切)

辞(似兹切)^②/诒(与之切)/飢(式支切)

炮(徐野切)/也(羊者切)/驰(施是切)

序(徐吕切)/予(以诸切)/舒(伤鱼切)

涎(夕连切)/延(以然切)/挺(式连切)

邪母与精心及匣群母等的谐声如:

旬(详遵切)/郇(户关切)/筍(思尹切)/胸(舒闰切)/胸(火营切)/胸(所律切)

卬(似用切、况袁切)/權(巨员切)/鸛(古玩切)/勸(去愿切)/瞞(古患切)

关于喻_四的上古读法,有诸家多次提到的“弋”汉时用来译 Alexandria 中的 l-。汉语地支字“酉”借到侗台语中,如西双版纳傣语 lāu³, 德宏傣语 hau⁴, <古台语 *l-。

“斜”原用“邪”,“邪”本字为“袞”,从衣。《诗·小雅》:“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说文》:“邪,从邑牙声。”但汉时“邪”已通“馀”,《史记·历书》:“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左传》为“归馀于终”。“馀”原可读为“邪”。

与喻_四、定、禅母等谐声的邪母和喻_四的上古晚期分别为 *lj- 和 *l-。闽方言邪母白读多带 -i 介音,喻_四或不带。如:

	厦门	潮州	福州	建瓯
斜(邪)	tshia ¹	sia ¹	sia ¹	tsia ³
也(喻)	ia ⁶	a ⁶	ia ⁶	a ³

①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 108 页。

② 籀文“辞”。

喻母字“痒”，福州文读 $y\alpha\eta^4$ ，白读 $su\alpha\eta^6$ 。文读原有-i介音，白读没有。

邪母字“已”原本有 *s-，后来丢失了。“已”与精母字“子”本一字，甲骨文、周早期金文同。^① 后又有“巳”。上古早期声母为 *skl-。

“样”精母字，与邪母字“洋”、喻母字“羊”、见母字“姜”、心母字“养”谐声，上古音为 *skl-。邪母字“洋”和喻母字“羊”的上古音与精母字“样”相同或相近。

“颂”的谐声字“忞”，又作“忽”，是清母字，上古音 *skhl-。与精组有谐声关系的邪母和喻_四上古音是 *(s)gl-。

有的喻_四与书母有谐声关系。如，寅(以脂切)/瞋(舒闰切)，宄(以周切)/沈(式任切)，锐(以芮切)/税(舒芮切)等。上古音为 *qhl-。^② 与书母有谐声关系的邪母和喻_四上古音可能是 *(s)gl-。

邪母与群匣母谐声中或与精、清、从谐声，或与心母谐声。而精母字与喻_四谐声的上古早中期为 *skl-。^③

试比较邪、喻_四构拟的上古读法与藏文代表的古藏语的读法：

	象	麝	淫	痒
汉语	*Glaŋ	*glaks	*glam	*glaŋ
藏文	glaŋ(po)	gla	glam	glaŋ
藏文	glaŋ(po)，‘象、牛’。			
藏文	gla，‘麝、獐’。			

《说文》：“淫，侵淫随理也。”藏文 glam，“潮湿、湿润”。

《说文》：“痒，疡也。”藏文 glaŋ，“一种疮疮”。

汉语与古藏语的对应关系有的可能是早期的借用。但可说明中古邪、喻_四的上古来历可能是 *(s)gl- 和 *(s)gl- 类的复辅音。

邪母从上古到中古早期的主要演变过程可概括为：

上古早中期	* (s)gl-	* (s)gl-
	↓	↓
上古晚期	* (s)l-	* l-
	↓	↓
中古早期	lj-	j-
	↓	↓
中古中期	zj-(邪)	j-(喻)

(6) 船禅声母的来历

李方桂先生说：“中古时代切韵系的韵书虽有船禅之分，但是从他分配的情形看来，除去少数例外，大都有船母字的韵就没有禅母字，有禅母字的韵就没有船母字。从近代方言的演变看起来，船禅也不易分辨。”“因此切韵系统的分船禅两母似乎有收集方言材

① 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第7、49页。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591页。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340页。

③ 吴安其《精母的谐声和拟音》，《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料而定为雅言的嫌疑。”^①

《切韵》船母的反切上字为：神食乘实。船母的谐声关系如：

绳(食陵切)/蝇(余陵切)
射(神夜切、食亦切、羊谢切)/谢(辞夜切)
食(乘力切、羊吏切)/飭(耻力切)/饰(赏识切)
纾(神与切)/予(以诸)/野(承与切)/舒(施智切)
吮(食尹切)/允(余准切)/菱(息遗切)/俊(子对切)
舌(食列切)/栝(他玷切)/结(私列切)
船(食川切)/沿(与专切)/税(舒芮切)/靺(杜外切)
舐(神帛切)/也(羊者切)/施(式支切)/铤(视遮切)
锡(神帛切)/易(羊益切)/赐(斯义切)/赐(施只切)
蛇(食遮切、弋支切)/驼(徒何切)/饬(式支切)

船母主要与喻_四谐声，在一些谐声组中还与书母谐声。如，纾/舒、船/税、舐/施、锡/赐，船书互谐。船母偶尔也与精组字谐声。与定澄母的谐声实际上是与喻_四的关系。

船母的谐声关系可表示为：

船—喻_四
|
书精(组)

船母与喻_四有密切的谐声关系，喻_四上古早中期是*Cl-(C代表一个辅音)，故可假定中古的船母来自上古*gl-一类的复辅音。

禅母的反切上字为：殊市蜀时是氏视寔植署成承常尝臣。禅母的谐声关系如：

垂(是为切)/埤(丁果切)/涇(土禾切)/騶(子垂切)/脛(羽求切)
殳(市朱切)/股(公户切)/投(度侯切)
臣(植邻切)/馭(苦寒切、胡田切)/紧(居忍切)/罍(口茎切)
恂(常伦切)/钩(居匀切)/构(即刃切)
訖(氏任切)/宄(余针切)/眈(徒含切)/沈(式任切)
醇(常伦切)/墩(都混切)/噀(徒浑切)
丞(署陵切)/𨾏(居隐切)/蒸(煮仍切)
是(承纸切)/提(杜奚切)/𨾏(居企切、施智切)
善(常演切)/撻(九輦切)
甚(常枕切)/湛(徒减切)/堪(口含切)/𣎵(桑感切)/醢(余针切)
蜀(市玉切)/独(徒谷切)/擗(测角切)
社(常者切)/土(徒古切)
擅(时战切)/壇(徒干切)/羶(式连切)

禅母主要与定、见及匣云母谐声。其谐声关系大体上是这样的：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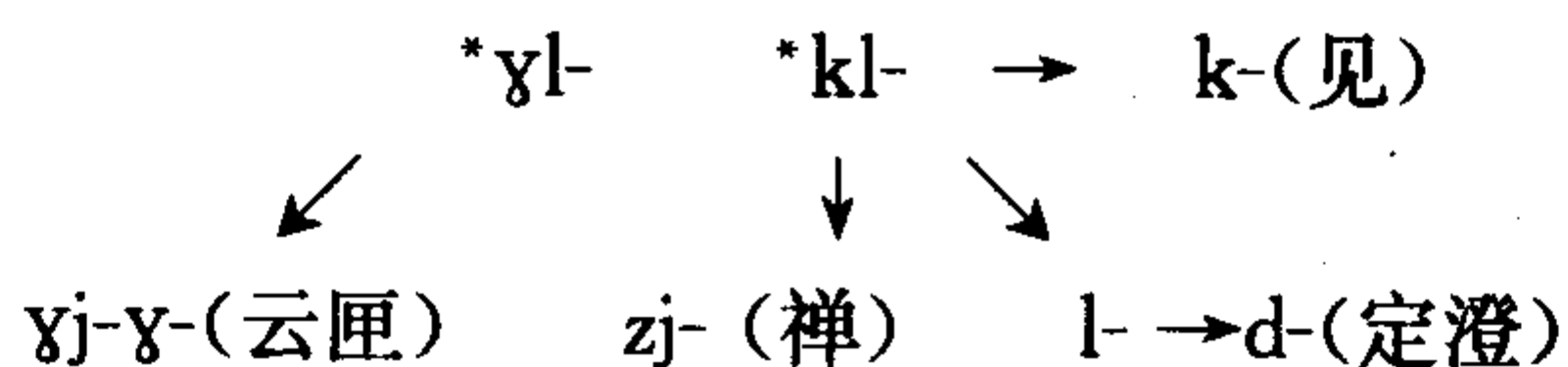
禅一定

|

见匣云

此外禅母也与精母谐声,有的与书母有谐声关系。

与见母等谐声的禅母主要来自 *kl- 和 *ɣl-。它们的关系可解释为:



从谐声看船禅母上古来历不同。

俞敏先生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上古晚期禅母与喻_四的读法相近,都用来译梵文的 j,①而且定母和喻_四的分别是清楚的。

3. 上古韵的构拟

汉语中古音共有六种韵尾,即入声韵尾 -p、-t、-k 及阳声韵尾 -m、-n、-ŋ。如果完全以中古音的情形为依据,认定中古的这六种辅音韵尾来自上古同样的情况,便依照中古音推上去,可能是有问题的。

中古的韵与上古韵部构拟的依据是不同的,后者的构拟的另一项主要依据是上古的文献。高本汉构拟上古元音为 a 的,分别有鱼部的 *ag, 谈部的 *am, 元部的 *an, 阳部的 *aŋ, 盍部的 *ap, 月部的 *at, 铎部的 *ak 和歌部的 *ar。由于《诗经》等文献中鱼部的字可与铎部的字押韵,李方桂把鱼部拟为 *ag。高本汉的上古韵尾有 *-p、*-t、*-k 和 *-b、*-d、*-g 的分别。

李方桂先生除了同意高本汉的意见,假定上古有清浊塞音韵尾的对立,还假定有 *-ŋ 和 *-ŋw 的分别和 *-kw 和 *-gw 的分别。由于上古屡屡出现开音节的字和读作 *-n 的字押韵和谐声,又不能用鼻音韵尾的丢失和鼻音化来解释,高本汉又为上古构拟了 *-r 韵尾。如,歌部字的韵为 *ar。

高本汉的系统中脂部是 *ər, 歌、脂和微三部王力拟为 *-i 韵尾,脂、微分立。

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的系统中 *-p、*-t、*-k 改为 *-b、*-d、*-g, 高本汉的 *-r 改拟为 *-l。②

法国学者奥德利古尔设想汉语去声原本带 *-s 韵尾,上声带 *-ʔ 韵尾。奥氏的假设半个世纪来基本上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海南岛的临高语较晚的汉语上声借词不带 -ʔ 韵尾,早期的上声汉借词带 -ʔ 韵尾,和固有词一样读促声调。③ 这说明近晚的海南相关的汉语方言中上声的 -ʔ 韵尾已丢失,而早期提供借词的汉语方言的上声还带 -ʔ 韵尾。

潘悟云解释说:“古代越南人用带擦音 -s 韵尾的问声和跌声去对译汉语的去声字,这说明中古汉语的去声在更早的时期曾经带韵尾 *-s。在上古与 -p、-t、-k 发生接触的去声字是 -ps、-ts、-ks, 如‘度’作动词读入声为 *dak, 作名词时读去声为 *daks。这种拟音容易

①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62页。

③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86页。

解释一些蟹摄、止摄字与-p尾字的交替现象,如‘盖’读泰韵,又读盍韵。盍韵读音的上古形式为*kap,泰韵一读的上古音则是*kaps>kats>kai,-p受-s同化变作-t。”^①

上古的元音,早期的构拟如高本汉是15个元音的系统。后来李方桂构拟了一个4元音的系统,蒲立本构拟了2个元音的系统,王力构拟了6元音的系统。王力以后的学者,如包拟古、白一平、郑张尚芳、潘悟云都认为上古汉语有一个6元音的系统。

4. 上古介音的构拟

中古三等字有-j介音,四等为-i介音。四等的-i介音为中古后起。-j的上古来历颇有争议。蒲立本(Pulleyblank)、斯大罗司丁(Starostin)、郑张尚芳和潘悟云认为三等和非三等的对立来自长短元音的对立。罗杰瑞的设想颇有意思,他认为早期汉语有喉壁化(Pharyngealization)的音节,喉壁化音节和带-r的音节不产生-j介音,只有非喉壁化音节产生-j介音。^②汉语中古的音系是逐步形成的,隋唐的音系来自魏晋南北朝,汉语北方方言中古-j介音的分布格局是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方言的演变所决定的。

蒲立本最早提出介音-j来自长元音。他说:“我现在的假设是上古汉语原来有长短元音系统。长元音发生了腭化。这种变化无疑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一直到《切韵》以后的北方汉语还在进行中。”^③

包拟古把介音-j区分为原生和次生两类自然是有道理的。^④不同来源的材料表明,大约从上古末期开始到隋唐时代的三四百年间北方方言的一些音节中的-j介音是陆续增生的。

中古分布在介音位置上的还有-u、-i和其他来自较早时-r介音的元音性介音。中古-j介音的分布往往以多项其他音素的分布为条件,笔者认为它是为了增加音节区别特征而增生的音素。如中古的-u介音多为较早时舌根音声母和圆唇主元音诱发的过渡音。

从《切韵》看三等韵的分布有这样的特点:

歌哈泰豪覃谈等主元音为a等低元音韵无对应的三等韵。

支脂之微祭盐严侵凡真殷文蒸等高元音三等韵无对应的一等韵。

李新魁在《论〈广韵〉音系的三等韵》中已提到微废文殷元严凡韵图中只列于三等,与其他韵不发生牵涉。幽臻两韵从反切下字看也应归入这一类。钟支脂之鱼虞祭真谆仙宵阳清蒸废度尤侵盐韵在韵图中以列为三等为主。^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方言中制约-j介音和促成-j介音产生的强弱作用可表示如下:

-i介音 > 低元音 > 唇音声母 > 唇音韵尾

-u介音 > 高元音 > 舌根声母 > 舌根韵尾

①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155页。

② Norman J.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 Paper for the 25th ICSTII, U. C. Berkeley, 1992.

③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第52页。

④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第189页。

⑤ 《李新魁音韵学论集》第87、88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i等元音类介音完全排斥-j介音的产生,低元音a次之,唇音声母和唇音韵尾作用较弱。

-u介音的舌位有利于-j介音的产生,舌根声母和舌根韵尾也是如此。舌根声母和圆唇高及半高元音易产生-u介音,然后再产生-j介音。

精清从母和庄初崇山母字主要来自带-r的复辅音声母音节。精清从的-r演变为-j或-i的,中古为三四等,庄初崇山母为二等。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方言中由于新的-j介音的产生,从帮滂並明中分化出非敷奉微,端透定泥中分化出知彻澄娘,匣母中分化出云母,不带-j介音的群母一律增生-j。*gw-和*gwj-在上古晚期已分别演变为*ɣw-和*ɣwj-,南北朝时期产生新的*gwj-。^①日母上古末期仍是*n-,魏晋时代为*nj-(*n-),佛经的对音大约能说明这一点。泥日的分化早于泥娘的分化。闽方言中日母字的白读多为n-,文读多为l-就是证据。

南北朝期间新的-j介音的产生与主元音及其他介音的分布有密切关系,加上原有的-i介音构成新的分布格局。在上古介音的研究中,完全按照《切韵》的三等与非三等的区别、开口和合口的不同构拟上古音是不对的。

前面已经谈到中古的重组三等和重组四等当时有读法上的不同,主要是介音的不同。

蒲立本发现重组三等字与来母字有谐声关系,如:

来母字	律	立	临	櫟
重组三等字	笔	泣	品	稟

白一平认为重组三等的介音来自上古的*-rj-。包拟古接受白一平的这一观点,进一步提出:^②

上古介音	带后元音	带前元音
∅	中古一等	中古四等
-r-	中古二等	中古二等
-j-	中古纯三等	中古纯三等
-rj-	中古重组三等	中古重组四等

大陆学者俞敏和郑张尚芳也有类似的结论。

① 吴安其《南北朝期间的-j介音》,《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97—299页。

主要参考文献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史》，黄振华译，科学出版社，1960年。
-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
-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
-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年。
-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97年。
-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 王力《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 A. 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劳允栋译，岑麒祥校订，科学出版社，1960年。
- 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
-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1984年。
-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 龚煌城《从汉藏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G. J. 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陈伟、沈成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龚群虎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沈兼士《广韵声系》，中华书局，1985年。
-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
-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年。
-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中华书局，1995年。
- 王铭玉、宋尧编《符号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
- J. R. V. Marchant, Joseph F. Charles, *Cassell's Latin Dictionary*,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38.
- Theodora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New Fetter Lane, 199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

Roger Las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H. Matthews,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

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

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

Dennis Freeborn,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1998.

Darrell T. Tryon,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Part 1: Fascicle 1.

Graham Thurgood,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O. Семереньи,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0. 原著: Oswald Szemerényi, *Einführung in die vergleichende Sprachwissenschaft*, 1970.

Frederick Bodmer, *the Loom of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Sixth impression, 1955.

Winfred P.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New York, 1996.

Robert J. Jeffers and Ilse Lehisté,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9.

William H.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New York, 1992.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历史语言学

作者 = 吴安其著

页数 = 2 1 0

S S 号 = 1 1 8 7 3 9 6 9

出版日期 = 2 0 0 6 . 1 2

封面
前言
目录

历史语言学常用符号

导言

上篇 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

- 1 . 格里姆定律
- 2 . 谱系理论
- 3 . 方言地理学
- 4 . 波浪理论
- 5 . 新语法学派的理论
- 6 . 类推

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 1 . 索绪尔和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
- 2 . 布拉格学派的观点
- 3 . 内部构拟法、空格和互补
- 4 . 链移
- 5 . 语音演变过程的解释
- 6 . 语言年代学
- 7 . 语言的接触关系和底层理论
- 8 . 有关形态和句法演变的理论
- 9 . 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

第二章 方言和亲属语

一、社团方言和地域方言

- 1 . 社团方言
- 2 . 地域方言

二、方言的演变

- 1 . 方言的传播和演变的趋向
- 2 . 方言的底层
- 3 . 文白异读

三、方言的分化史和亲属语的谱系关系

- 1 . 方言的分化史
- 2 . 确定方言分化史的原则

第三章 语言结构的历史演变

一、语言演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 1 . 语言演变的内部因素
- 2 . 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

二、语音结构的历史演变

- 1 . 语音的演变
- 2 . 音位结构的演变
- 3 . 声韵调结构的演变
- 4 . 声调的起源和格局的调整

5 . 语音存古的方式

三、形态的历史演变

- 1 . 形态的范畴和类型
- 2 . 形态的历史演变
- 3 . 形态系统变化的原因
- 4 . 形态的存古

四、句法的历史演变

- 1 . 句法的范畴
- 2 . 句法历时变化的特点
- 3 . 句法演变的机制

五、词汇的历史演变

- 1 . 借词和借词的历史层次
- 2 . 词的废弃与创新
- 3 . 词义的变化
- 4 . 同源词根和同源词

六、系统间的关系

- 1 . 语音系统和形态系统的关系
- 2 . 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关系
- 3 . 形态句法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关系

第四章 发生学关系的研究

一、原始语和祖方言

- 1 . 原始语
- 2 . 不同历时阶段的划分

二、语音对应的解释和构拟

- 1 . 语音的对应
- 2 . 语音对应关系的解释
- 3 . 文献的利用
- 4 . 语音系统的构拟

三、同源词和借词

- 1 . 词的同源对应关系
- 2 . 借词的区分
- 3 . 词源研究

四、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

- 1 . 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比较
- 2 . 形态和句法的构拟

下篇 印欧语、汉藏语的分类和比较

第五章 印欧语的分类和比较

一、印欧语的分类

- 1 . 日耳曼语族
- 2 . 罗曼语族
- 3 . 凯尔特语族
- 4 . 希腊语族
- 5 . 印度—伊朗语族
- 6 . 波罗的语族

- 7 . 斯拉夫语族
- 8 . 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
- 9 . 吐火罗语族和安纳托利亚语族
- 二、日耳曼语的比较
 - 1 . 日耳曼语的语音
 - 2 . 日耳曼语的形态
- 三、罗曼语的比较
 - 1 . 罗曼语的语音
 - 2 . 罗曼语的形态
- 四、古印欧语的构拟
 - 1 . 古印欧语的语音
 - 2 . 古印欧语的形态
 - 3 . 古印欧语的数词、亲属称谓及其他
- 第六章 汉藏语的分类和比较
 - 一、汉藏语的分布和分类
 - 1 . 汉藏语的发生学关系
 - 2 . 汉语的古今方言
 - 3 . 藏缅语的分布和分类
 - 4 . 侗台语的分布和分类
 - 5 . 苗瑶语的分布和分类
 - 二、汉藏语谱系关系的不同观点
 - 1 . 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研究史
 - 2 . 关于侗台苗瑶语归属的不同观点
 - 3 . 汉藏语系诸语内部的分类问题
 - 三、汉语的历史比较
 - 1 . 汉语古音构拟依据的材料和方法
 - 2 . 中古音的构拟
 - 3 . 上古音的构拟
 - 4 . 汉语的历史形态
 - 5 . 汉语的历史句法
 - 6 . 词源研究
 - 四、藏缅语的历史比较
 - 1 . 文献材料
 - 2 . 亲属语的比较
 - 3 . 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和原始藏缅语的构拟
 - 五、侗台语的历史比较
 - 1 . 文献材料
 - 2 . 亲属语的比较
 - 3 . 原始侗台语的构拟
 - 4 . 侗台语与南岛语的接触关系
 - 六、苗瑶语的历史比较
 - 1 . 苗瑶语族语言的关系
 - 2 . 苗瑶语共同语与原始苗瑶语
 - 3 . 苗瑶语与南亚语的历史关系

七、汉藏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明

- 1 . 汉藏语的语音对应关系
- 2 . 汉藏语的同源词
- 3 . 汉藏语的历史形态

附录

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